

依田憇家 著

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1868—1945

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

(1868—1945)

〔日〕依田嘉家 著

卞立强 陈生保 任清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

〔日〕依田憇家 著

卞立强等 译

责任编辑：刘 方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787×1092毫米 32开本12.875印张260千字

1989年10月第一版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81—2,000册

I S B N 7-301-00675-6/K·049

定价：5.10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依田憇家是日本进步历史学家，现为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主攻日本近代史，对中国、朝鲜近现代史亦颇有研究。他长期从事日中友好活动，自1956年以来多次访问我国。主要著译除本书外，尚有《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与革命任务》、《星火燎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等，译作有《中国近代产业发达史》（严中平著）、《太平天国》（牟安世著），并参与编辑《日中战争史资料》。

本书写成于1976年，原书名为《战前的日本和中国》。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但是，无可讳言，其间也有过长达半个世纪的严重对抗。这是由极少数军国主义头子所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战前的中日关系史，可以说是一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最终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灾难。对此，中日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都要作为严重的历史教训，引为鉴戒。为了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能够世代友好下去，如实地记述两国之间这段严重对抗的历史乃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看来，本书的作者正是怀着这样的动机，着手写作本书的。作者在书中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种种侵略和犯下的无数暴行，并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军国主义思想产

生的历史背景；同时歌颂了日本人民反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反对对外扩张、侵略的斗争以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另外，作者还从更广阔视野，讴歌了亚洲人民，特别是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战斗友谊和团结。

本书内容翔实、史料丰富，对于我们研究战前的日本和中日关系，很有参考价值；同时也将有助于在这方面进行历史教育。译者相信，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将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进而有助于促进中日友好以及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

本书由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卞立强同志（前言、第一章）、上海外国语学院陈生保同志（第二、三、四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任清玉同志（第五、六章、后记和中文版附言）根据三省堂1976年版译出。译者在必要的地方加了脚注。另外，因篇幅关系，中文本将部分图表删去并重编表号。译文最后由卞立强同志作了统一审定。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错误和不妥之处，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1988年6月

前 言

笔者是1967年开始从事于本书有关问题研究的。当时日本由于所谓“高度经济增长”的结果，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大国日本”的论文，并把这种观点与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结合起来，使得盛赞“明治100周年”的论调曾经喧嚣一时。

这种潮流的来源，应当说是在于当时政府所策划的“纪念明治100周年庆祝典礼”。在日本的历史上，由国家来举办的典礼迄今有两次，除了1940年的“皇纪2600年大典”外就是这个“纪念明治100周年庆祝典礼”。而且贯穿在这些典礼中的基本思想是极其危险的。1967年政府（佐藤内阁）发表的《纪念明治100周年实施纲要》说：

过去鼓舞着我国国民的“赶超欧美”的目标，已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因此，吸取先进各国的文明并赶上了这些国家的我国，现在已处于发展中的邻邦要求我国给予指导和援助的地位；

由于认识到明治时代是值得怀念的美好时代，在战败后日本获得令人惊异的复兴中，俨然存在着明治以来所培育起来的国民的潜力，因此要回顾与重新探讨其中的情况，以资将来参考。

以上的引文，就是贯穿着“纪念明治100周年”国家大典的中心思想。对于当前日本的统治者来说，“明治”这个

时代，是与现代紧密相连的统治机构及垄断资本的雏形开始形成并实现了“海外扩张”的时代，因而是值得“怀念”的时代。《纲要》中说：“在这100年间，对我国国民来说，既有鼓舞世界的壮举，但也不能说没有值得回顾而加以纠正的过错。”把近代日本的历史上，一个近代国家史无前例地牺牲国民的权利和生活的事实，以及不断对朝鲜、中国等近邻国家进行的侵略，竟然极其简单地说成是“不能说没有……过错”。前面引述的观点就是在这种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无视了过去历史中最应当反省之处，而企图不加批判地继承应当批判之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态度。

本书的出发点就是要与上述的历史观针锋相对，从历史的过程中得出真正的教训。而在史料研究的过程中，不由得使我强烈地感到，近代日本的历史与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政策及殖民地统治的问题紧密相连，其紧密的程度超出了我原来的想象。尽管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对象的研究，过去有着相当长期的历史，也做出了一些重大的成就，但应当说，主要是研究了国内体制史和国内经济史。而战前所谓的“大日本帝国”，是建立在对台湾、朝鲜、桦太^①、南洋群岛及后来对中国的东北（满洲）进行殖民统治，对中国及南洋的占领区进行统治，以及“满铁”、“在华纺织业”等进行资本输出基础上的；日本国内政治也总是同侵略战争、殖民地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离开这个问题（或者浅尝即止），就不可能掌握近代日本史。因此，我决定在本书中，以这些问题

① 即库页岛。——译者

为主轴，来叙述截至战败为止的近代日本的历史。所以在叙述上也尽量多运用史料，采取让史料说话的方法。如上所述，这是因为考虑到，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对殖民地的统治；考虑到史料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自白书，就是揭发的文献。

本书就是从上述的观点出发的。在开始执笔以来的数年期间，日本以及围绕日本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日本近代史中应当汲取的教训又增添了新的东西。

由国家大典“纪念明治100周年庆祝典礼”所代表的方针，在1969年11月把南朝鲜及中国的领土台湾的“安全”与日本的“安全”同样看待的日美联合声明中达到了顶点。但是，以1970年4月的第一次中朝共同声明与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等亚洲革命力量的团结为转折点，当东亚的革命斗争一旦迅速转向胜利，就不得不修改上述方针，其结果，于1972年9月实现了历史性的日中邦交正常化。

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所发表的日中联合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过去100年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一直采取侵略和蔑视的政策。这个声明是日本对过去的事实正式表示反省的第一个文件。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并且是应该出现的转折点。因此，现在对我们来说，战败以前的日本近代史应当成为将来的一个警戒。而且，日本过去夺取的中国领土台湾还没有回到中国的怀抱，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所保证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也还没有缔结^①，曾

① 该条约已于1978年8月正式缔结。——译者

被日本长期当作殖民地的朝鲜至今仍南北分裂，还没有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这些我们都不能忘记。还必须指出，在日本的统治者中间，仍在不断地制造“两个中国”和永远分裂南北朝鲜的阴谋。

另外，在我们的面前，又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现在帝国主义的情况比过去更加复杂，新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霸权的问题，以及过去曾是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反对霸权的核心力量而登上政治舞台等。在这些动向中，今后的日本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将关系到日本的命运。其方向，首先应当是加强与中国、朝鲜等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与团结。过去的日本是亚洲唯一达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国家，是亚洲唯一向近邻国家称霸的国家。在当前的世界上，霸权已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深刻揭露过去日本霸权的实质，并把它作为将来的警戒，是十分必要的。

依田憇家

1976年10月4日

目 录

译者的话

前 言

第一章 走向富国强兵的步骤	1
一、日本的近代化与亚洲.....	1
二、天皇与军队.....	11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	15
四、变台湾为殖民地.....	24
第二章 加入殖民主义列强的行列	42
一、工人阶级的成长.....	42
二、帝国主义及其对殖民地的统治.....	50
三、侵略朝鲜.....	61
四、成为侵略中国的尖兵.....	63
第三章 向大陆扩张的跳板	71
一、反对日俄战争.....	71
二、无止境侵略的序曲.....	78
三、“关东州”和满铁.....	86
四、朝鲜的殖民地化——“日韩合并”.....	100
第四章 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起点	112
一、日益扩大的日本权益.....	112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飞跃发展.....	124
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	133

四、三一独立运动和五四运动·····	140
五、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生活日益困苦·····	151
第五章 军国主义国家基础的建立 ·····	158
一、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158
二、中国的反帝斗争·····	161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168
四、万宝山事件和满洲事变·····	185
五、《二七年纲领》和《三二年纲领》·····	211
六、朝鲜与台湾的作用·····	217
七、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230
第六章 走向灭亡之路 ·····	265
一、纳粹掌握政权·····	265
二、中国革命的发展·····	271
三、侵略华北计划的完成·····	275
四、全面侵略中国的准备——芦沟桥事件·····	293
五、日军的暴行——南京屠杀事件·····	303
六、中国、朝鲜斗争的蓬勃发展·····	308
七、宣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333
八、难以形容的屈辱和痛苦——被强行抓走 的朝鲜人·····	352
九、被强行抓走的中国人的反抗·····	366
十、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	377
后 记 ·····	396
中文版附言 ·····	399

第一章 走向富国强兵的步骤

一、日本的近代化与亚洲

日本资本主义与亚洲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到20世纪初已成为亚洲唯一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达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使日本人民长期陷于低工资和无权的状态，而且对朝鲜和中国等亚洲国家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对亚洲人民称霸，给亚洲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我们日本人民要探寻今后日本前进的道路，首先必须弄清过去日本霸权的实质。

过去日本的动向一直是同各个时期的世界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对国内人民的剥削及对人民斗争的镇压，又与侵略战争及殖民地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要了解近代日本的历史，就必须看到这些因素的实际状况和相互关系。

欧美各国在19世纪以前已经经历了产业革命，进入19世纪便开始了对亚洲的侵略。1818年，由于英国产业资本家的压力，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商业垄断，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产品、尤其是棉纺织品像潮水般地流入印度，破坏了印度的手工棉纺工业，使印度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英国的产业资本家接着把目光转向中国，于1834年废除了东印度

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垄断，进而以1840年与1858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了港口。欧美的资本主义势力还把目光转向日本，由1853年的培利^①来到日本开始，以军事的压力迫使日本开放了港口。

日本与中国的开港，使这两个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并使它们内部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正式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随之产生了变为欧美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日本和中国都展开了推翻封建统治、反对欧美各国侵略的广泛的人民斗争。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日本的幕府末期和维新时期的人民斗争（稍后的朝鲜甲午农民战争）^②，都是反抗封建统治和殖民地化，以走向近代化为目标的。尤其是为了扼杀太平天国革命，欧美各国忙于进行干涉，从而减轻了对日本的压力；日本在牺牲中国的基础上，获得了实现近代化的有利条件。

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与朝鲜的看法

当时日本与中国都被迫同欧美各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处于半殖民地的状态。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人民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因而在掌握了政权的日本的统治阶层中，根深

^① 培利(Perry)是美国海军少将，1853年(日本嘉永6年)曾率领4艘军舰开入幕府的咽喉浦贺港，强迫幕府接受他带来的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设通商口岸的国书。幕府受美国舰队的威胁，被迫接受了这个要求。——译者

^② 见本章第3节“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个小标题“甲午农民战争与修改条约谈判”。——译者

蒂固地存在着这样的想法：企图通过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侵略，以求得本国的发展，进而充当欧美各国在亚洲的尖兵，以提高“国际地位”。吉田松阴是明治“元勋”们的导师，对明治以后的日本统治阶层曾有过巨大的影响。他在1855年说：

俄美肯定讲和，我等决不能违此而失信于戎狄（欧美各国）。唯应严章程，笃信义，乘其间培养国力，换取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使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鲜、满。

他们就是这样地对欧美各国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则企图在牺牲中国与朝鲜的情况下，以扩充国力。这种倾向在日本近代历史的初期就已经存在。

与吉田松阴关系亲密的木户孝允，是1868年新成立的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希遣使节赴朝鲜，问彼无礼。彼如不服，则责其罪，攻其土，大张神州之威。”

明治初期，在日本国民中还相当浓厚地存在着尊敬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所以1877年来日的中国人王治本竟能依靠文笔活动过着富裕的生活。当时对朝鲜人也是尊敬的。但日本统治者的政策逐渐改变了日本国民这种亲近中国和朝鲜的观点。

欧美各国曾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朝政府。日本政府也于1871年要求清朝政府缔结同样的不平等条约，但遭到了失败。被欧美各国强加了不平等条约的日本，现在又反过来企图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日本政府同时还要求朝鲜开放门户，骨子里就包含着上述木户孝允的日记中所表示的那种

意图。日本的此种心怀叵测的与朝鲜建立邦交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朝鲜方面的拒绝。而至今仍有许多日本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朝鲜拒绝建立邦交，是由于当时的朝鲜政府过于顽固，热中于封建的排外主义，不喜欢日本的欧化政策。其实根据当时东莱府使节的告示等朝鲜方面的史料，认为“彼（日本）之变形、易俗，非我所管”，并未把日本自己的欧化政策当作问题，而问题是“名为倭人，实为洋贼”、“倭洋一体”。当时朝鲜已经遭到欧美各国多次的入侵，所以它对日本日益起着欧美各国的尖兵作用已有所警惕。

日本政府的建交要求遭到了朝鲜方面的拒绝，明治政府内部的第一次意见分歧因此而尖锐起来。但是，一方面，在这以前强硬主张征韩论的木户孝允，这时转向反对征韩。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在西乡隆盛等征韩派离开政府之后，反而挑起了江华岛事件，进攻朝鲜，并以此为借口，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由此可知，征韩派和非征韩派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在实行的时机上有所争论。另外，在西乡隆盛离开政府半年之后，日本政府为了转移对征韩论的注意，于1874年4月，以杀害冲绳渔民事件为借口，出兵中国的领土台湾。这是近代日本首次向国外派出军队，而且对于后来日本把台湾当作殖民地，向那里派兵，也是一次重要的事件。征韩论与出兵台湾的关系表明，日本的对华和对朝政策早从那时候起就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

尽管日本政府采取这样的侵略政策，但当时的人民受排外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思想毒害还不深。当时全国各地曾发生所谓“血税暴动”（反对征兵暴动）。1873年2月12日《东京日日新闻》说：“据市井流言，日本与朝鲜一旦发生冲突，

将征寅年出生之男子为兵，派往朝鲜服役。于是，其年生之男子皆为之惧。……”可见“血税暴动”的原因并不是如过去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因为从文字上把“血税”误解为抽取血液；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民害怕征韩论的抬头会造成把他们赶到朝鲜去打仗的结果。

自由民权派的亚洲观

当时日本已经产生了自由民权运动。这个运动以幕府末期和维新时期以来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要求社会近代化的斗争为动力，同时也是资产阶级企图取得一定的发展、挤进统治阶级行列的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表明，参加这个运动的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革新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在政府的怀柔政策面前不断地妥协。参加民权运动的日本资产阶级的重大弱点也表现在他们对朝鲜和中国的看法上。

日本政府于1875年派遣军舰“云扬号”对朝鲜的沿海进行测量。当“云扬号”接近朝鲜首都的咽喉要地江华岛时，遭到了朝鲜方面的炮击。这时，日本政府立即命令陆战队在江华岛登陆，并占领了那里的炮台。在这次事件之后，日本政府派出军舰，对朝鲜提出了强硬的要求，并于第二年缔结了“日鲜修好条规”（江华岛条约），迫使朝鲜开放了港口。在这个条约中，日本不仅把在朝鲜开辟日本人居住区、获得治外法权等欧美各国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的同样条款强加给朝鲜，甚至还包括了免除日本商品的关税、在朝鲜使用日本货币（包括纸币）等欧美各国未能强加给日本的条款。迫使朝鲜开放港口，对日本的统治者来说，目的在于把

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外，以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而欧美各国开拓世界市场的强烈要求，则是发生这一事件的潜在原因。这从下面的事件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在“云扬号”事件发生之前，美国驻日大使宾格姆曾拜访日本外务省，提供了培利逼使日本开放港口时的资料，把培利的经验传授给了日本。

江华岛事件发生时，在自由民权派内部有人认为：“欲使亚洲国家振兴亚洲，应先使我国国内强盛；欲使我国国内强盛，必先唤起人民之自由精神”（《爱国新志》第6期）。主张发扬民权应优先于伸张国权，谴责增加军备负担。但对条约本身则认为“我国政府体察该国（朝鲜）未通万国之情况，派遣使节，缔结相互对等之条约，承认其独立，在全世界为朝鲜增添莫大光荣。我日本之恩遇亦可谓厚矣”（《近时评论》1876年6月19日）。而且以后的情况表明，那种“民权优先于国权”的主张也逐渐转化成了把国权放在首位。

《日朝修好条规》的内容包含着日本要把朝鲜变为殖民地的重要因素。条约中把朝鲜当作“自立之邦”，其目的是日本要向朝鲜扩张，使朝鲜摆脱一向行使传统的“宗主权”的清国的影响。而当时民权派的机关报却说什么“甚矣哉，朝鲜人之野蛮也！”（同上）还把朝鲜说成是“沉沦于东海僻隅之一野蛮国。”（同上，6月24日）可见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已经产生了对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偏见和蔑视。这一点必须予以注意。民权运动正是由于这种对朝鲜等亚洲人民的偏见和蔑视以及对天皇的幻想才遭到了失败，才容忍统治者继续实行专制统治。这给日本以后的解放运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危害。

如上所述,当时,在自由民权思想中也同样包含着对亚洲人民的偏见和蔑视的思想。这是因为这种思想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日本资产阶级的立场。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自由民权思想中的国权意识是来自封建士族的思想。其实这种思想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中也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上述民权派的思想是以“东洋文明开化的先觉”这一优越感为基础的。这一事实表明,在把欧美化作为至高无上使命的近代主义中,也是同样存在着上述对亚洲人民抱有偏见和蔑视的思想的。日本的这种优越感是这样产生的:日本面临着沦为欧美各国殖民地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带来了民族意识的高涨,日本的统治者把它引向了排外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产阶级逐步挤进统治者的行列,这种倾向进一步获得发展。

自由民权运动的弱点

自由民权运动在西南战争之后才获得真正的发展。最初它是由要求“士族的民权”而开始的,接着把要求“纳税者的参政权”的富农豪商阶层卷了进来,进而又与幕末以来反对封建统治与专制统治的农民斗争结合起来,逐渐加深了人民斗争的色彩;1881年发生了北海道开拓使出售国有财产等违法贪污事件,由此又引起了空前高涨的反政府运动。这样,明治政府为了保住统治的宝座,宣布在10年后颁布宪法和召开国会,改变过去以国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为主的政策,把国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以附加补助费的方式出售给民间,企图按照政府的意志一举建成对政权恭顺的大资产阶级,把一部分统治权益分给这些大资产阶级。

明治政权一面完成了这些变革,一面彻底镇压了以要求

民主革命的农民阶层为中心的人民斗争。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召开了国会，从而建成了它的统治体制。在此以后，新兴资产阶级势力就背叛了人民，挤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政策。

1884年发生了中法战争。这次战争使法国对越南的统治成为定局，并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法国在这次战争中曾经一度占领了台湾。当时曾是自由民权运动家的尾崎行雄作为报社的特派记者视察了这次战争。他在其通讯中说：

以今日之形势推之，台湾岛终将为清国所有。

……取之者将控制东海而在东亚拥有非常之势力。台湾岛之取舍，我政治家决不能等闲视之。

尾崎的主张表明，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在内的日本统治阶层已产生了对台湾的领土野心，认为这是成为亚洲强国的条件。同年，自由民权家，并曾是最激进的民主宪法草案的制定者植木枝盛，在为长野县饭田地方的人民起义所草拟的檄文《告三千万国民书》中这么说：

明治6年（1871年），朝鲜愈加对我无礼，当应发问罪使节之际，却托言他事而不实行之，反而远征无异于禽兽之台湾蛮民，杀人耗财不计其数。结果派代办大臣赴清国，等待一区区外国使节之调停，仅得赔款50万，而蕃地则不为我所有。呜呼！朝鲜为世界之一国，有政府，有法律，而台湾系一蛮岛，非有国有政府以构成国家者也。而朝鲜无礼于我，此乃朝鲜之国家与我日本国家之关系也。至于台湾事，仅为其山野之蛮民偶杀我国数名漂流民，非国家与国家之关系也。孰轻孰重，不言自明。然政府之措施竟然如斯，此不谓误大事又何焉？！

15年（1882年），朝鲜乱民暴起，焚毁我公使馆。政府虽非不问其罪，但清兵无故来朝鲜，明言朝鲜为清国之属邦，于京城广揭告示，拨弄大院君马达忠于掌上，并将其骗归本国。清国辱日本之盟国甚矣，而政府未能向清国试作一次之质问。此不仅使清国对我之侮辱变本加厉，而且必将貽笑天下万世，为后世之历史遗留极大之污点。诚为切齿之恨，岂堪忍哉！？

在这篇檄文中，表现了当时日本人对朝鲜和台湾看法的一个方面。它看起来好象是谴责政府征讨台湾，但它攻击的是政府出兵征讨“无异于禽兽”的“蛮民”、“蛮岛”而未能把它变为日本的领土。也就是说，它认为“朝鲜”应攻而未攻，蛮岛台湾攻了也未能占有”，批判的是政府的失策。后面将要叙述，台湾决不是未开化的野蛮地区，在制糖方面，一部分已达到工厂的水平；而且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植木的主张中根本看不到有这样的认识。而且这篇檄文宣扬了日本对朝鲜、台湾的优越感。这些都构成了以后主张对这些地区进行侵略的根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竟然产生在民权派当中。前面已经说过，当时人民听到要被拉去同朝鲜打仗曾感到恐惧，为了逃避被征去当兵而进行过反抗。而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内部却滋长了一种蔑视朝鲜、台湾并企图使其屈服的思想，这表明了这个运动的一个最大的弱点。

对亚洲人的偏见和蔑视

⑤ 1885年，自由民权运动家大井宪太郎看到日本的革命形势转向低潮，曾想执行这样一种错误的方针：到朝鲜去，变革朝鲜，然后依靠其势力再来变革日本。但计划未实行就

被发觉，遭到了失败。当时大井说：“朝鲜之风俗如极其野蛮之非洲人”，自称他将“帮助彼国（朝鲜）富强”。而且另一个自由民权运动家樽井藤吉，当时也写了一部著作叫《大东合邦论》。这部著作看起来似乎是主张日本与朝鲜对等地实行合并，既不取日本国名也不取朝鲜国名，而采用一个新的国名叫“大东国”。但他把日本看作是文明开化的“先觉者”，认为朝鲜不论是政治上、经济上或风俗、智能方面都是劣等的国家；而这样的两个国家应当合并的理由是：“韩人身躯大、膂力强，故若习我兵制，用我武器，则足以防俄寇（俄国的侵略）。”

这种对亚洲人民的偏见和蔑视后来逐渐转化成了对外侵略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并不单纯是封建的侵略主义，它在新兴资产阶级当中也存在，也扎根于把欧美化当作至高无上使命的近代主义之中。

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一文中认为，日本较中国、朝鲜优异之点在于“摆脱亚洲之陋习”，引进西洋之文明”；他说：

今日如欲成事，则我国不应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文明开化，共兴亚洲；而应脱离其行列，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式，亦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和善，应按西洋人对待之法予以处置。

福泽是个思想家，曾对日本近代思想的成长给予过很大的影响。但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认为日本比亚洲其它国家优越，主张日本要当欧美国家的尖兵。日本以后的发展起了充当欧美国家在“亚洲的宪兵”的作用。而这种思想就成了它的精神支柱。另外，与福泽关系密切的《时事新报》于1892

年7月20日说：“我国当前之政略，要使人心向外，其方向在朝鲜。”这表明，为了把国内矛盾转向国外，资产阶级也认为侵略是必要的了。

二、天皇与军队

天皇制统治的形成

1889年2月1日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日本终于建立了近代国家的体制。

由1881年（明治14年）的政变^①开始，国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全部下放，抛售给民间，按照政府的意志，造就了一个对政权恭而顺之的资产阶级。与此同时进行的是，1884年制定了《华族令》，把旧公卿、大名和高级官僚当作“皇室的屏藩”列为华族。皇室的财产在此期间也飞跃地增长，1885年为4374900日元，1888年为7885800日元，1891年增长到12957800日元。皇室土地更是飞跃地增长，1882年为1110町步，1886年为31574町步，1889年为113万町步，1890年达365万町步。再加上公债以及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日本邮船公司的股票等，皇室财产的总额达到无法想象的数字。这样就为天皇制准备了物质基础。

明治宪法是以天皇赐与国民的形式颁布的。它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

^① 指明治政府的内部斗争，最后将参议员大隈重信逐出政府的事件。——译者

犯”。这就是说，天皇可以在“神圣”的名义下不必负政治上的责任，而天皇拥有的权限却是极大的。国务大臣的任免，法律的公布、执行和裁判，议会的召集、闭会、停会和解散，发布紧急敕令，以及宣战和媾和等权限都集中在天皇的手里。而且规定军队的统帅权与议会及大臣的权限无关，仅属于天皇个人。权力的如此集中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议会则被当作“翼赞”天皇统治的机关，尤其是贵族院由华族、多额纳税者（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等特权阶层互选产生，其权限很大，而众议院仅在形式上采取民选（最初规定25岁以上的男子、直接缴纳15日元以上国税的人才才有选举权。这相当于上中农以上），其权限几乎仅限于审议预算。

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它把国家、天皇制和道德化为一体。上述的体制因此又在精神上获得了支持。

颁布宪法的第二天——2月12日，当时的首相黑田清隆在地方长官（由政府任命的知事）会议上说：“政府要始终采取坚定不移的方针，超然于政党之外。”并把此当作施政方针。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是当时最大的实权人物、明治宪法的实际制定者。他也说：“君主位于臣民之上，立于各政党之外。”当时的统治者害怕下层的声音多少会反映到议会里来，企图在“超然主义”的名义下，无视议会，推进军备扩张。

举行第一次大选的1890年，日本资本主义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而经历了首次危机。生丝工业因此不得不缩短开工时间达3个月。棉纺工业当时还不能完全满足国内需要，但由于危机而造成国内需要骤减，因而从这一年起开始向朝鲜和

中国出口棉纱。另外，因全国性的稻米歉收，大选这一年，各地发生饥馑，部分地区发生了暴动。

在第一届国会选举时，政府公布了《集会及结社法》，企图制止人民的要求反映到议会里来。但是，尽管对有选举权的人进行了种种的限制，在众议院300个席位中，民党（在野党）仍占173个席位，对官党（执政党）的势力取得了占绝对多数的胜利。

日本军国主义的起步

在11月25日召开的第一届议会上，民党提出了“休养民力”、“节减经费”的口号，批判了官僚体制，把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由9400万日元削减到8612万日元。对此，山县首相说：“这会影晌预算所涉及的范围”。可见这对于企图推进扩张军备的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由于政府进行了收买工作，民党方面的大江卓、植木枝盛等29人脱离了民党，致使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只削减了631万日元，军事预算得到了保证。当时中江兆民评论说：议会“已变成了冷血动物的陈列馆”。

在1891年的第二届议会上，政府与民党又围绕着预算草案的审议发生了对立，民党要求削减军舰建造费、钢铁厂建设费等大量军事费用，议会因此而被解散。1892年第二次大选时，明治天皇说他希望能多多地选出“忠良的议员”，内务大臣品川弥次郎动员了全国的警察，对选举进行了空前的干涉。当时民党方面全国死亡25人、负伤388人。由此可以了解其干涉是多么地激烈。不过，尽管有这些干涉，选举还是以民党取得巨大胜利而结束。

在接着召开的第三届会议上，民党方面提出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并获得通过。但政府无视这一决议，仍然赖着不动。民党方面企图再次削减军舰建造费和钢铁厂建设费。政府虽然利用分裂活动渡过了难关，但由于同贵族院及元老对立，松方内阁终于垮台。代之而成立的内阁是伊藤、山县等实力人物亲自出场的“元勋内阁”。关于对立的核心问题——军舰建造费，政府的井上馨说：“即使被否决了，也要在宪法的范围内干。”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使用了所谓的“诏敕的子弹”，迫使民党停止了抵抗。其经过是这样的：明治天皇根据元老的请求，发布了诏敕。诏敕中说建造军舰是必要的，认为可以从宫廷费中抽出一部分钱，6年期间每年拨出30万日元，同时削减官吏的薪俸1/10，以此来充当军舰建造费。这样，民党与政府妥协，议会通过了军舰建造费。

政府与民党的尖锐斗争以这样的结果而告终，是有一些原因的。其原因之一，是当时民党方面对天皇制的幻想极大，认为天皇的诏敕绝对正确的思想极其浓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民党的局限性。当时的民党是由过去的自由民权运动中的部分革命力量组成的，它只不过是在议会和明治宪法范围内活动的反对派，根本不是革命人民的政党。1893年，自由党的干部江原素六在党主办的讲演会上说：“日本舰队如能扩充，一举击败英国的东方舰队，那末，就会很容易地使中国和朝鲜感到害怕”。（党报第31期）民党以后果然迅速地倒向了国权论。

围绕军事预算的攻防战就以这样的结果而告终了，它决定了日本以后的方向。早在1890年12月，当时的首相山县有朋就在施政方针的报告中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

第一为保护主权线，第二为维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是谓国家之疆域，所谓利益线乃指与其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地区。”同年3月，山县在给外务大臣的指示《外交政略论》中说：“我邦利益线实在朝鲜。”这表明当时日本的统治者所主张的不单纯是保卫国土，而是为侵略朝鲜，迅速扩张军备。山县在这个文件中还主张要鼓吹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思想在同年10月末发布的《教育敕语》中表现出来了。发布这个敕语时还更换了反对发布的榎本^①文相。于是，因为军事化的倾向未被阻止，导致了容许日本军国主义化的结果。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

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日本资本主义是从1881年的政变而正式起步的，它在明治宪法的体制下加快了发展的速度。组成公司的企业由1886年的702个发展到1890年的3092个；同一时期，入股的资本由1341万日元猛增到18936万日元。使用机器的棉纺织业发展迅速，1882年成立了拥有1.5万个纱锭的大阪纺织公司，1887年全国有7.6万个纱锭，1891年增加到35万个纱锭，1894年发展到50万个纱锭。在此期间，1882年成立了资本家的团体——纺织联合会，1890年国产棉纱在数量上已超过进口棉纱。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对亚洲各国的贸易在日

① 即榎本武扬。——译者

本的经济之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1886年的日本出口总额5000万日元中，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就占1000万日元；而1894年出口总额1.1亿日元中，对亚洲的出口竟占3000万日元。对朝鲜的出口由1887年的36万日元猛增到1892年的123万日元，分别占朝鲜全部进口的65%和87%。日本与朝鲜的经济关系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原来日本对欧美各国的贸易，由于幕府末期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和欧美机器制品比日本先进，竞争力强，再加上要从欧美购进钢铁和机器等工业资材，因而经常被迫出现大幅度的入超。对亚洲贸易的黑字起着填补对欧美各国贸易赤字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朝鲜，除了利用免除关税的特权进行贸易之外，还利用江华条约关于强制在朝鲜通用日本货币（包括纸币）的规定，用日本纸币在朝鲜兑换了大量的黄金拿回日本，用它作为对欧美各国结算的本位货币，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从朝鲜进口廉价的大米，也成为维持日本低工资劳动的保证。这种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进行的掠夺性的贸易，给朝鲜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朝鲜1882年发生的壬午军变，就是因粮饷被贪污而起义的朝鲜士兵和因米价暴涨而生活困苦的贫民汇合在一起的一次斗争。其原因都是由于日本掠夺和运走了粮食。因此，朝鲜军民斗争的锋芒既对准朝鲜的封建统治者，也朝向日本公使馆。日本利用这次事件的机会，强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济物浦条约），获得了在汉城驻扎军队的特权。

1884年12月，朝鲜发生了“开化党”发起的“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朝军队的援助下镇压了这次行动。日本又借这个机会出兵朝鲜。第二年，伊藤博文在天津与清国的

李鸿章举行了会谈，缔结了《天津协约》。这个协约规定：（1）日清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2）对朝鲜的军事训练，日本与清国都不派遣教官；（3）将来朝鲜发生动乱或重大事件需要两国出兵时，应当互相通知。根据这个条约，日本获得了向朝鲜派遣军队的权利。

在这以后，日本仍然继续掠夺朝鲜的大米，从1889年到1890年，掠夺大米的价值由100万日元一下子猛增到400万日元。咸镜道观察使对大米这样大批外流看不下去，于1889年发布了禁止大米出口的《防谷令》。这是根据日鲜修好条约所承认的权利而发布的。而日本政府却根据旅居元山的日本商人及被其运动的日本议会的要求，就这个问题对朝鲜施加压力，并于1893年提出了“赔偿”11万日元损失的要求。

甲午农民战争与修改条约谈判

朝鲜农民由于日本掠夺性的贸易而日益贫困，终于在1894年爆发了甲午农民战争。斗争中心的全罗道古阜郡是著名的产米地区。起义的农民提出了“斥倭洋倡义”的口号，具有抵抗日本与外国，伸张正义之意。起义农民受主张“东学”的集团领导。“东学”是为了对抗西方的基督教（西学）而提出的，它反映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要求。东学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提出“除暴救民”的要求，接着还提出了“驱逐洋倭”的口号。起义一开始，南朝鲜的全罗、忠清和庆尚3道的统治机构立即土崩瓦解。李朝政府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镇压农民军，要求清国出兵。日本政府借此机会投入了超过清军的大批兵力，企图控制朝鲜。日本出兵后，农民军考虑到日本和清国等的干涉，与政府军一度曾经订立

《全州和约》；这样，外国就没有出兵的借口了。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却出主意说：应当“提出琐碎之难题，通过强制手段以达到目的”（《日本外交文件》第27卷第1册第568页）。

日本当时正与英国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并根据谈判的进展情况，筹划与清国的战争。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动向对远东的形势有很大的影响。山县有朋接到俄国动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报告，立即产生一种不安的情绪，认为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就是“俄国向朝鲜发动侵略之时”。英国也感到很不安。因为当时它与帝俄围绕亚洲的霸权一直对立着。从地理上来说，英国要迅速而长期地向远东地区派遣大批军队是困难的，因而愈来愈感到要在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前在远东地区找到合作者。英国同意与日本修改条约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曾经与欧美各国进行过几次有关修改条约的谈判，但在这之前都未能实现。其原因或者是因为欧美各国不同意改修；或者由于日本政府的修改方案把重点放在恢复关税自主权上，而对废除领事裁判权采取妥协的态度，因而使国内的反对运动激化。但到日清战争的前夕，谈判已接近于尾声。1894年7月16日制订了以下的最后方案：（1）条约批准后5年生效；（2）开放日本本土（土地所有权不包括在内，废除治外法权；（3）相互平等地享受最惠国待遇；（4）有效期限为12年。虽然还留下关税自主权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在当时的亚洲各国之中，日本是第一个在法律上获得了同欧美国家对等地位的国家。

在展开修改条约活动的同时，日本制订了对清国开战的

计划。用外相陆奥宗光的话来说，这是怀着在“百尺竿头”上演杂技的心情来进行的。另外，当时日本的军部与外务省的干部为了把国内矛盾引向国外，以对外战争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早已协商好“与清国之关系，不应是商谈如何和平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发起战争，如何取得胜利”（当时的外务省次官林董的回忆录《往昔记》）。在修订条约签字后的第九天——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清国舰队，揭开了日清战争的序幕。第三国（英国）对尖锐对立的两国（日本与清国）中的一方，在极其重大的外交问题上给予好意的照顾（废除不平等条约），这等于在外交上表明支持这一方。英国帝国主义为了对抗俄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在远东需要日本的协助；另外，它可以根据最惠国条款，得到比日本击败清国而获得的更加有利的“权益”，所以它支持了日本。

日清战争与台湾

由于7月25日的丰岛海面的海战和29日的成欢、牙山的战斗，战争正式打起来了。日本于8月1日对清国宣战。9月16日的平壤之战与17日的黄海海战都是日军获胜。日军于10月25日渡过鸭绿江，侵入了中国的东北。11月6日占领金州，21日占领了旅顺。从这时开始，英国就积极开展媾和的调停活动。在此期间，日本在朝鲜建立了傀儡政权。日军于1895年2月占领山东省威海卫，3月侵入了澎湖岛和台湾。在这次战争中，清国因受封建制度的祸害，不能有效地动员兵力，只有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在作战。这个军队的本质也极其腐败，而且还受到清廷内部斗争的干扰。李鸿章本身就压制

人民起来抵抗日本军队，企图依赖英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结果遭到了失败。于是李鸿章终于屈服，于4月17日签订了日清和约^①。

根据日清和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但是在和约签订后，在台湾的战斗仍在继续。和约签订的那天正是科举考试期间，台湾的考生大批来到北京，他们反对割让台湾，声称“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当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人民涌到巡抚衙门，高呼“誓死守御”、“义与存亡”，并发出了檄文说：“我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财、身家性命非丧于倭奴之手，实失于贼臣李鸿章之手。”台湾巡抚唐景崧等人在这时建立了以清国为宗主国，号称“台湾民主国”的共和政府。这一措施是以清国的宗主权为前提的，这就表明了其首要目的是为了不受日本与清国所缔结的、规定台湾为日本领土的日清和约的约束。台湾人民坚决不愿意受日本的统治，而要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生活下去。所以日军于5月29日一登岸，台湾人民就勇敢地同日军进行战斗，在唐景崧逃跑之后，台湾人民仍在各地进行抵抗，大规模的暴动一直延续到1901年。仅据正式公布的当时日军损失的数字，包括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内，战死、负伤和疾病共达32315人（在正式的统计中，故意缩小战斗造成的伤亡，增大疾病的数字）。这是由于遭到台湾全体人民的抵抗而造成的。日军对台湾人民抵抗活动的攻击是极其猛烈和残酷的，台湾的重要产业甘蔗园因此而遭到严重的破坏。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就是在这种镇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① 即马关条约。——译者

日清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在英国的支持下进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日本起了欧美帝国主义的尖兵作用。在这次战争的和会上，日本把完全不平等的条约强加给了中国。日本抢在各国的前面，夺取了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权利，可以在中国主要的开放商埠建设工厂。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产业、资源和劳动力的基本手段。当时日本自己的资本积累还没有达到向国外输出的程度，连国内的资本也感到不足，要在很久之后才能行使资本输出的权利。因而根据最惠国条款而获得这种权利的欧美帝国主义，首先行使了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权利。这表明日本起了欧美帝国主义的尖兵的作用。

另外，因为这次战争，在日本产生了“战争可以发财”的思想。日本乘胜宣布钓鱼台群岛（即所谓的尖阁列岛）为日本的领土，夺取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和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因与俄、法、德帝国主义有利害关系，不久被迫归还了），获得了高达3.45亿日元的赔款。这笔赔款是以有黄金作保证的英镑来提取的，它为日本建立金本位制打下了基础，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开端（不过大部分都用作了军费和变成了皇室的财产）。但是对中国来说，赔款全部要向欧美各国借贷，成为加速经济衰退和从属于外国的原因。

日清战争与日本人思想的变化

发动日清战争起主导作用的是天皇制政府，但政党和新兴资产阶级也大力支持了战争。《自由党党报》认为“对朝鲜要在兵略、政略、商略上大力占有权力”。《立宪改进党党报》

发表尾崎行雄写的社论说：“不管事情大小，我都应经常保持威严，而不妄谈宽恕之道。”代表工业资本家说话的《东京经济杂志》也在1893年6月的一篇社论《如何惩处防谷令事件》中主张说：“唯有诉之于干戈一途。若果如此，中国政府也必然不会袖手旁观，则唯有向天津亦进行一击。”福泽谕吉在战争一开始就说：日本“能否成为东洋文明之领袖，取决于此一战”。并向政府捐献了当时的钱1万日元；战后称这次胜利是“官民一致的胜利”，说：“幸获长生，得此见闻，既感愉快，又是庆幸。”福泽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早就提倡“脱亚论”。他对日本终于能够跟欧美一样挑起对中国的战争感到无比的高兴。

尾崎行雄是福泽的弟子，先前也曾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他于日清战争期间的1895年，也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并说：

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为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如此狂暴无道之国，宜等闲视之，断行我之天职可也。今虽等闲视之，他日中国果能踏上开明革新之途，列国皆能分享其福利，则会豁然感悟，唯感谢我之恩泽而不遑也。

这说明了“脱亚论”方针的结果必然导致对中国的侵略。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为了中国的进步，由日本使其殖民地化”，而这正是导致后来的日中战争的思想的萌芽。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从这次战争前后开始，大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已渗透到日本国民当中；另一方面，蔑视

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思想日益增强。日清战争期间，《女学杂志》在1894年8月号的社论中歌颂举国一致的军国主义体制说：日本之“全国同胞，如乘铁甲之舰，悠然傲游于日本海上，此即为大日本之现状也”。这篇社论还说：

勿言中国为大国。因何而知其为大国焉？答曰地理！——面积3497700平方里、人口42388万！可悯可笑！此面积至少将分裂为六、七国，乃自然之趋向也。如瘫痪，如残疾，如中风之病人，苟血液不循环周流于全身，则五肢虽大，岂能谓身躯高大焉！？中国亦如斯。其人民无统一之语言，其帝王频繁更迭，君不见，正有数万之同志正覬觐当今之帝位焉！？如此之邦，何谓大国！？

反过来说，就是主张日本才是大国。这个杂志的1895年2月号发表的社论《大国民之气概》说：

悲乎！中国400余州，广袤万里，民千亿，千古夸称中华，然当前之末路竟已如斯。神州之民决不可以此为荣矣。欲征服、启导中国之日本国民，本不欲其如斯也。

如上所述，由日清战争开始，军国主义和大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风气在日本人当中已经相当浓厚了。这主要是国家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在这样的政策的基础上，一种蔑视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思想在国民中间蔓延，并自下而上地维护了军国主义体制。当时幸德秋水正成长为社会主义者，他看到日清战争后军国主义潮流的高涨，曾批判这种现象是“唯以杀敌多为快、割地赔款多为快”，对蔑视中国人的高潮提出了警告。当时，这样的呼声并不是没有，但就一般来说，

“啊，高兴呀！可喜呀！打了胜仗啦！”这一类歌颂战争的声音却充满了社会，连小学生也唱起了这样的歌谣：“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四、变台湾为殖民地

日本占领台湾的情况

台湾是日本攫取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不论从它以后成为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典型来说，还是从它成为使日本发展为殖民国家的基地来说，它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9世纪后半时，当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开始侵略亚洲时，台湾就已经成为它们侵略的对象，引起它们强烈的关注。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就考虑过占领台湾。1858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根据天津条约，台湾的安平、淡水、打狗（后来的高雄）、基隆开辟为商埠。另外，1860年普鲁士船炮轰台湾，1867年美国军舰炮轰台湾，以及1869年英国商会与清朝官宪倾轧时英国军舰炮轰安平镇等事件，都表明了欧美各国对台湾抱有浓厚的兴趣，想把它当作侵略亚洲的跳板。这种兴趣还表现为，1874年（明治7年）日本近代的第一次海外远征——“征讨台湾”，以及1884年清法战争时法国舰队对基隆、淡水及澎湖岛的封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以对台湾产生这样浓厚的兴趣，主要是因为从中国本土及对东南亚来看，台湾处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而且它盛产砂糖、茶叶和樟脑等热带性的国际商品。特别是旨

在掠夺台湾特产的活动，不仅在发动军事进攻的时候展开了，而且在军事进攻遭到失败后也仍然继续着。

对砂糖的掠夺始于1858年美国的诺毕莱特商会来到台湾的打狗购买砂糖的时候。1873年澳大利亚的梅尔波伦砂糖公司在打狗以巨款购买砂糖。后来，很多外国公司通过买办之手，预先贷款给制糖业者，将全部砂糖制品一手包购下来。据说随着台湾的砂糖这样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台湾的制糖资本也获得一定的成长，其中有的达到了工厂的水平。但是，由于贸易本身受不平等条约控制，而且如前所述，在资金上又受到外国资本的大力控制，所以台湾制糖业中当地资本的发展大大地受到了限制。另外，砂糖的装运，除依靠帆船外，如用轮船装运时，则受设在香港的英国道格拉斯商会的控制。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台湾的砂糖贸易就是这样地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的。

茶叶是台湾的仅次于砂糖的重要物产。自从1869年英商德特把21万斤台湾茶叶运往纽约市场以来，台湾的茶叶大量向外输出。茶叶市场也和砂糖一样，很快被外国资本所控制。从厦门的外国银行和英国系统的香港上海银行获得资金的外国贸易公司，把资金贷给叫作妈振馆的买办，这些资金又通过茶馆预先贷给了生产者。这样，台湾的制茶业和茶叶贸易就被牢牢地控制在外国贸易公司的手里了。

樟脑是台湾的特产，早就通过走私运往英国。特别是像英国的查顿-马地臣等从事鸦片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实力雄厚的贸易公司，在台湾开港通商以前就与清朝的官吏勾结，获得了巨利。在开港通商以后，由于樟脑的出口仍受这些外国贸易公司的控制，当清朝两次想实行专卖时，均因外国商人

及其代理人——外国领事——的抗议而未能实现。此外，如大米、鸦片等重要商品受外国商人的控制也很严重。也就是说，台湾随着中国本土沦为半殖民地，也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道路；而且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其殖民地化的速度可以说比中国本土更快。

对台湾人民的镇压

日本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对台湾实行占领的。桂太郎继桦山资纪之后担任第二任台湾总督，他在就任时的训示中说：

将努力一面以指导教养使之服于皇国教化，一面以刑罚严明以示威信；尤其对蒙昧无知之生蕃人，以恩待之太过则狎，以威待之太过则惧，其结果均不能达到抚育之目的。

这些话里清楚地暴露了殖民地统治的意图。在1898年以前，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是忙于镇压台湾人民的起义；1898年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分别就任台湾总督和民政长官后，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则进入了新阶段。后藤在其民政长官的训示中说：

曰同化，曰压迫，毕竟不过是著述家任意所加之名词。不能不看到其内容互有复杂之关系。考虑如何实行怀柔或同化时，吾认为镇压主义亦有实际之需要。

另外，据传后藤对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学生训示说：

汝曹（你们）欲求与3000年来尽忠皇国之母国人同等之待遇，则应于今后80年努力同化于母国人；在此之前，遭受歧视，乃亦无奈，勿鸣不平，而应成为全体岛民之模范。

这些话坦率地说出了同化政策与镇压政策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同时也表明了对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的统治，成了日后对朝鲜等地统治的殖民政策的基础。

儿玉和后藤实行的政策，首先是从恢复旧的保甲制度，利用连带责任加强统治开始的。与此同时，还利用起义的台湾人民的内部矛盾，实行“招降”政策来收买领导人。另外，还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发动“大扫荡”，实行彻底的镇压。鹤见祐辅著的《后藤新平》谈到当时的情况说：

回顾起来，政府在明治30年至34年（1897—1901年）期间俘获的土匪（起义者）数为8030人，杀死的达3473人之多。另外，在明治35年（1902年）的大扫荡中，俘获之后判处死刑的为539人，作为临机应变处理而杀死的实达4043人之多。

在这期间，于1898年制定了《匪徒刑罚令》。其第一条说：“不问何等目的，凡以暴行或威胁为达其目的而结伙聚众者，均构成匪徒罪，……”并规定要处以严刑。根据这样内容的法令，若干台湾人民聚集一起对日本人进行抗议，就可以统统作为“匪徒”而处以严刑。这个法令一直到日本本国制定了《治安维持法》，并扩大运用于殖民地之后仍未废除。它是镇压台湾人民的凶恶的武器。

日本资本主义对台湾的经济统治

在上述情况的基础上，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在经济方面也进入了新阶段。如矢内原忠雄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和细川嘉六的《殖民史》等著作，一般认为对过去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还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就是这些著作也认为台湾

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是“由于平定了土匪而开辟了台湾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实际上，那是对台湾人民的民族反抗的镇压，并把当地资本发展的萌芽扼杀了。

日本资本主义对台湾的经济统治，首先是由日本资本掌握一向为外国商人所控制的台湾特产的买卖而开始的。在儿玉和后藤上任的1898年，三井物产公司禀承日本政府与台湾总督府的意图，在台北开设了分店。三井物产从1893年开始收购红砂糖，投下了大批的资金，收买了专门为外国贸易公司服务的买办，通过预先贷给他们资金，取代外国贸易公司，从而控制了买办—茶馆—生产者这个系统。1900年，以三井为核心，设立了以皇室和华族毛利家为大股东的台湾制糖公司。如上所述，日本资本在一段时间内也是利用了买办的。但是，由于从1905年进入台湾的横滨的增田屋商店，开始直接与制造业者交易，这就挖掘了外商与买办的地盘。接着三井物产也加以效法。在这个过程中，外商、外国轮船公司与当地制糖业者之间所订立的特约合同，妨碍了增田屋商店和三井物产公司的行动。于是，它们一方面通过台湾总督府施加压力，同时在接受总督府的补助金的大阪商船等日本船舶公司的协助下，排除了这些障碍。一向垄断台湾海运的道格拉斯商会因此于1905年前后撤退。另外，1907—1908年，神户的铃木商店、汤浅商店和大阪糖业公司等也进入台湾，进而到1909年日本成立糖业俱乐部这一卡特尔组织，外商在这样的压力下，就全部从台湾撤退了。一部分外商虽然转为制糖业，但到1912年也为台湾制糖公司所收买，外国资本在糖业中终于彻底被驱逐出去了。外商在台湾通过买办进行的统治，是一种间接的统治，本来就不可能对

抗占领台湾的日本资本的直接统治；而且过去受外商和买办统治的台湾的制糖业者，因为要摆脱外商的统治，也愿意直接与日本的商社结合。这是日本资本在台湾能够摧毁外商地盘的重要原因。不过，日本资本为摧毁外商的地盘，虽然暂时利用了当地的制糖业者，但随着外商的撤退，当地制糖业者也就进入了日本资本的统治之下，进一步加快了它们的没落。

下面谈谈茶叶的情况。茶叶最初占台湾出口总额的50%。三井物产公司与野泽组从1907年前后开始从事茶叶贸易，大体通过上述同样的过程驱逐了外商。台湾银行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该银行从英国资本的香港上海银行夺取了茶叶的买卖权，把茶叶交易的中心地由厦门移到台湾。尤其是以三井物产为首的日本资本，利用总督府提供的土地，利用台湾的半封建的农业制度，采取庄园的方式，直接经营茶园，因而缩短了把外商驱逐出去的过程。

关于樟脑，日本在占领台湾后不久，于1895年制定了《樟脑制造管理规则》，第二年制定了《樟脑税则》，对樟脑抽取一定的税金。樟脑是世界其它地区罕见的特产，所以外商的抵抗也很强烈。台湾总督府最初与外国的谈判大部分是关于樟脑的问题。日本政府于1899年决定实行樟脑专卖制度，并举行竞争投标，但又不得不采取全部由英国沙密尔商会得标的形式，与外商妥协。樟脑的贩卖权完全转移到日本的手中，是从1908年（明治41年）台湾总督府把贩卖方式改为直接经营和委托三井物产公司贩卖以后开始的。以后，赛璐珞工业在全世界获得发展，樟脑的需要增加了。台湾是世界最大的樟脑产地，出口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1322700英

镑。此外，盐和烟草等也很快实行了专卖。专卖收入在1905年占总督府收入的49%，1910年占36%，1916年仍占22%。

如上所述，日本资本主义对台湾的统治，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后，首先是从垄断特产品的贩卖权着手建立的。但是，从确立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体制这一点来讲，最根本的措施是“土地调查”。通过这次土地调查，为建立日本对台湾的土地和人民的统治，确立日本人的财产权以及对台湾的资本输出打下了基础。

在台湾进行的“土地调查”

清朝统治的末期，在台湾封建的土地制度占着统治地位。在台湾，对土地的封建性统治，是通过从清朝统治者手中得到对官有地的开垦权而建立起来的。取得这种开垦权的人，称为“大租户”，规定由他们向政府交纳土地税。这些人实际上相当于日本过去的领主。大租户把所得到的准许开垦的土地分割成若干小块，交给下一级的经营土地开垦的人去经营，从他们那里收取大租。“大租户”这个名称就是“收取大租的人”的意思。向大租户交纳大租的下一级的经营土地开垦的人，被称为“小租户”。小租户进一步把这些土地交给直接耕种的“现耕佃人”（中文里的“佃”相当于日本“小作”的意思）耕种，收取“小租”。“小租户”这个名称也就是“收取小租的人”的意思。大租户—小租户—现耕佃人的关系，可以说与日本幕府末年的那种领主—地主—佃农的关系很相近。据说大租水田大多交纳实物，旱田大多交纳现金。交纳地租的方式，有相当于日本定免制（规定每年交一定数量的佃租）中的定额租和日本检见制（根据

每年收成的多少决定交纳的数量)中抽的租等。

上述这种土地制度是一种封建性的对土地的多层统治制度。大租户和小租户原先被称为“一地两主”，后来小租户的力量相对地增强了。这是由于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领主权力逐渐削弱了的缘故。为此，清朝统治的末期担任台湾巡抚的洋务派官僚刘铭传，从1885年起进行了“清理田赋”的工作，企图整顿过去的多层的土地所有制，减少大租户，把负责交纳田赋的人从原来的大租户转为小租户。这一尝试由于遭到大租户的反击而失败了。但是小租户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理的权力却变得越来越强了。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的。

日本资本主义要在台湾发展，就得改造原有的土地所有制，使之适应资本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还要在对于殖民统治所需要的范围内保留某些旧的制度。从1898年9月到1903年6月，共花了约540万日元对台湾的土地进行了普查。土地普查工作的目的，除了确定交纳地租的人和土地的所有权，稳定土地的买卖之外，也是为了调查隐田，增收土地税，以及为了治安的目的而“调查地理、地形”。所谓“稳定土地的买卖”，实际上是为了有利日本人购置土地和加速使台湾的农民破产。

土地普查工作采取的办法是，基本上承认大租户的大租权，但禁止新的大租户产生，同时用公债和现金收买的办法消灭大租户的大租权。经过调查，弄清了这一笔赎买费为377.9万日元。这一笔款项是通过券面总额408万多日元的公债券和10.7万日元的现金支付的。这样就消灭了大租权。其结果，小租户完全成了单一的土地所有者。于是，原来的小租

户和现耕佃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地主和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佃户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赎买，领主权虽然消灭了，而半封建的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却依然被保留了下来。这个过程从表面上看可以说与成为日本近代土地制度起点的调整土地税和处理俸禄很相似。然而，台湾的土地普查工作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起点。通过土地普查，台湾登记的耕地面积从361447甲（1甲相当于日本的9反7亩24步^①）增加到777850甲，增加了一倍多。而其大部分是通过揭发隐田而增加的。由于揭发出了大批隐田，所收取的土地税也从原来的860706日元增加到2989287日元，整整增加了两倍半。明治政府在日本调整土地税的时候，曾以“不减少原来的岁入”为目的，企图继承幕藩统治体制之下的封建剥削。但是，就是这样也导致了明治9年（1876年）反对调整土地税的全国规模的农民暴动。结果正如民间所说的那样：“竹枪捅一捅，捅成了二分五”^②，明治政府不得不多少降低了一点土地税。换句话说，在日本本国，企图继承原有的剥削反而失败了，而在台湾却把地租提高了两倍半。

台湾人民也以民族起义的形式广泛地进行了反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本质以及占领台湾初期发动武力剿伐的真正原因。另外，台湾的土地调查工作原

① 1反约等于10公亩；1亩等于100平方公尺；1步等于1坪，约合3.3平方公尺。——译者

② 指由于农民的反抗，政府1877年1月4日将土地税率降低到地价的2.5%，即2分5厘。其附加税率则从 $\frac{1}{3}$ 减到 $\frac{1}{5}$ 。（总的来说从4%降低到3%）。——译者

则是根据土地所有者的申报进行的。这对那些目不识丁，不知道申报方法的农民是极其不利的。甚至连有关的布告也是通过以小租户为中心的村里的实力人物和土豪传达的，因此，一般农民没有得到通知的情况甚多。就这样，在台湾也保存了半封建的社会关系。被确定为新的土地所有者的小租户，被迫承担了支撑殖民地体制的角色。而农民对地主的半封建的从属关系，正如在后文将谈到的那样，也被日本的大型制糖公司经营甘蔗园时所利用。

在台湾进行的“山林、原野调查”

日本帝国主义确立对台湾的山林、原野的控制虽然比对农地的控制要稍晚一些，但是通过国家政权所进行的掠夺却更加彻底。日本当局对待山林、原野的原则是“无主地国有化”，于1895年规定“凡不具有可以证明为自己所有之地契或其他确证之山林、原野均作为政府所有”。农地调查于1910年告一段落。从这一年起至1914年，进行了对山林、原野的调查。这一调查是在“确定对山林、原野的所有权”的名目下进行的。在进行这一调查时，台湾总督停止了一般的政治活动，担任一支由1.2万人组成的军队的总指挥，出动镇压山地的居民。经过“对山林、原野的调查”，取消了过去村庄或个人可以利用附近山林的传统习惯，把这些山林都掠夺到国家的手里。山林原野调查的结果，官有地增加到752091甲，而确定为私有地的山林只有31179甲。这表明国家对山林、原野的掠夺是何等厉害。上述这批面积广大的山林、原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整顿官有山林、原野”，其中大部分都廉价抛售给了日本的垄断资本。“官

营企业及官有财产收入”在台湾总督府的经常岁入中所占的比重，跳跃式地上升，并占了绝大部分。具体情况如下：

1898年	20%
1905年	64%
1910年	53%
1916年	70%
1927年	78%

而在“官营企业和官有财产的收入”中，来自山林、原野的收入占着很大的比重。这一点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了台湾人民的山林、原野一事，对它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开始于1895年。这一年台湾总督府的岁入为965万日元。而其中的694万日元是由日本本国支出的，这相当于台湾总督府岁入的72%。1897年，在总共1128万日元的岁入中，来自日本国内的补助费达596万日元，占了总岁入的53%。但是，一方面由于1897年发生了经济危机，在日本国内开始实行紧缩财政的政策，另一方面为了准备日俄战争而加紧进行扩军备战，为此，1898年日本本国给台湾的补助费减少到398万日元，在台湾总督府岁入1280万日元中占32.5%。紧接着在1899年，这一补助费又削减到300万日元，在台湾总督府的1743万日元的岁入中仅占12%。通过土地调查工作极大地增加地租收入，其目的也是为了弥补补助费的大幅度削减。

成立帝国主义的行动机关——台湾银行

对台资金的筹措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1897年，日本政

府曾经公布了一项要成立台湾银行的法令，这家银行乃是台湾金融机关的核心，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基础。但是由于资金不足而未能开张。为此，日本政府于1899年制订了《台湾银行补助法》，并作了如下决定：在银行所需的500万日元的资金中，由政府承担100万日元；从成立以后的5年时间里，将政府所分担的股金作为填补亏损的储备金；在这期间内，政府将不出售所持有的股票；另外再给银行提供200万日元的为期5年的无息贷款。这样做的结果，台湾银行终于成功地募集了股票，于1899年开张营业。另外，于1900年12月成立了台湾制糖股份公司，这也是靠了井上馨的政治影响，推动了三井财阀，并由宫内省承担了1000股股票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资金的筹集为什么如此困难呢？其原因正如1898年台湾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所说：“日本国内的高利率使资金难于下放到殖民地。”就是这样，在当时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上，愈是向海外输出资本就愈是积累不了充足的资本，这就形成了高利率。为此，当时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主张：以1亿日元的价格将台湾卖给别国。尽管有人提出了把台湾卖掉的主张，然而日本仍然保持了对台湾的统治，这是因为为了把台湾变成向中国大陆及向南洋扩张的跳板。1897年，松岛刚和佐藤宏等人在他们所著的《台湾情况》这本书中，曾经这样写道：

而今台湾落入吾手。此恰好予吾大日本以扩张之机会。一旦治理就绪，开发见效，则台湾将成为吾大鹏展翅之根据地。此乃势之必然耳。向南望，菲律宾已近在咫尺，南洋群岛犹如踏石，间隔相连。香港、安南、新

加坡亦相距不远矣。此皆是吾人可以雄飞之地也。然则此等道理唯有让将来之事实本身来证明之。

上面这段话表明统治台湾对于日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另外，统治台湾对于当时日本的经济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时，砂糖和羊毛同是日本重要的进口商品。为了购买这两种商品，致使日本每年都有大量硬通货外流。砂糖和樟脑是台湾的特产，也是国际商品，它们改善了日本的外贸收支情况。这件事无论是为了加紧扩军备战，还是为了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此外，廉价的台湾大米流入日本，为对急速增长的日本工业人口实行低工资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台湾银行在日本政府的悉心保护下开张营业，这也是因为统治台湾对于日本向中国以及向南洋扩张具有密切关系的缘故。台湾银行在其成立缘起书中说道：“本银行以协调金融为目的，以便开发台湾之资源，求得经济上之发展，进而把营业范围扩大到华南地方及南洋各岛，成为与上述各国进行通商贸易之机关。”台湾银行早在1905年就单独答应了福建布政使提出的借款要求，自那以后，有时单独，有时与日本兴业银行、朝鲜银行等联合，或则组成贷款团，或则加入海外投资银行团，参加了对华投资。这种场合，台湾银行往往通过它的日中合办的子公司进行投资。而在这些日中合股经营的公司之中，中日实业股份公司、中日银行以及中华汇业银行等在以后对华侵略方面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台湾银行虽然把总行设在台北，但银行的掌权人却驻在东京，连全体董事会议也在东京举行。这一事实表明，台湾银行完全是一个对殖民地实行统治的金融机关。《台湾银行20年志》写道：

毋庸讳言，本行与普通银行不同，负有特别之重任，因之在有关其营业方面，有时亦不能单纯考虑损益，常常要不忘国运之伸长和国威之发扬，在万不得已时，需有作出若干牺牲之决心。

由此可见，台湾银行担当了向海外扩张的尖兵的作用。在1927年的金融危机中，由于台湾银行对铃木商店滥放贷款，致使它自己也陷入了危机。这时候，矢内原忠雄曾作过这样的评论：

彼乃帝国主义以台湾为基地之行动机关。惟其所作为过于采取帝国主义方式之故，遂导致其自身之失败。

日本资本对制糖工业的控制

继成立台湾银行和由日本资本操纵台湾砂糖的贩卖权之后，台湾的制糖工业也为日本资本所控制。1902年，日本的台湾制糖公司在桥仔头建立了工厂，据说当时是在军队和荷枪实弹的公司职员的警卫之下进行生产的。在日本占领之前，台湾的制糖业是以小规模制糖作坊为主的，这些作坊叫做“糖坊”，用人力和畜力进行生产。其中的一部分糖坊据说已经发展到了制造工业的阶段。一部分糖坊为了摆脱买办资本的控制，曾企图与三井物产等日本的商行结合，这看来和它们的生产的发展程度有关。在日本的大资本侵入台湾之前，从1906年至1910年期间，“改良糖坊”的总的制糖能力超过新式企业。但是，由于日本资本的侵入，这些改良糖坊也完全被迫停止了发展。

在儿玉任台湾总督的时期曾被聘担任殖产局长的新渡户

稻造，于1901年5月提出了一份《糖业改良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成了建立殖民地制糖工业的一个新起点。新渡户在这份意见书中列举了当时台湾制糖业减产的6个原因：

- (一) 日本占领台湾时台湾的武装抵抗和地方上的富豪人家逃往中国大陆而造成资金外流；
- (二) 台湾人的抗战而造成蔗园荒芜；
- (三) 日本军队的清剿造成台湾人的死伤，以及去铁路建设工地当临时工的人增加，造成蔗园缺少劳力；
- (四) 为建造军用公路而征用土地以及为了防止抗日游击队潜伏而禁止在公路两旁的一定区内种植甘蔗，造成蔗园面积减少；
- (五) 税收太重；
- (六) 糖商垄断利益。

针对这样的情况，新渡户提出了3条恢复制糖业的办法：

- (一) 开设由大资本经营的新式的机械化大工厂；
- (二) 发展配备有小型机械的中小型工厂；
- (三) 奖励蔗农们合作经营制糖厂。

新渡户的这些意见，虽然可以说在主观上除了考虑大资本经营的新式工厂之外，还考虑到了要发展小资本经营的糖业，但是，在殖民地统治的情况下，机械化的大工厂必然要造成当地的资本和农民阶层的破产。因此，新渡户的意见书可以说是一份对殖民地工业的统治大纲。原有的糖坊在日本资本全面侵入台湾之前，曾经采用小型机械，改造成了改良糖坊，在一个时期内曾有所发展，然而后来却迅速破产了。由蔗农们合作经营小糖厂的设想，根本没有实现。

从1900年度起，台湾总督府通过将土地抛售给日本资本家和发放补助费的办法帮助日本资本经营的制糖工厂，从1905年开始，制订了新式工厂分区采购原料的制度，规定不

许在所划定的区域内新建旧式糖坊。而且一有机会就用给补贴费的办法，取消改良糖坊。进而在1910年，成立了由各大制糖公司联合组成的卡特尔组织——台湾糖业联合会。由于该组织限制了各工厂的生产量和糖的销售价格，控制了把原料和生产量分配给参加该组织的各企业的权利，从此以后，改良糖坊完全走向没落，并相继被垄断公司所合并和收买。第1表是各种制糖企业的盛衰情况。从此表可以看出，由于日本资本的侵入、台湾当地的资本是如何受到阻碍和走向没落的。就以昭和初年的情况来看，当时帝国制糖公司90%的股票掌握在居住在日本的日本人手里，3%掌握在居住在台湾的日本人手里，台湾人持有的股票仅仅只占7%。另外，台东制糖公司的情况也一样，该公司的80%的股票掌握在居住在日本的日本人手里，2%掌握在住在台湾的日本人手里，台湾人仅仅拥有18%。

不仅如此。日本资本经营以台湾为根据地的制糖公司，还同时垄断了日本国内的砂糖市场和制糖工业，并侵入到了各殖民地。1916年至1919年期间，东洋制糖公司和台南制糖公司收买并合并了冲绳的制糖业；北海道的甜菜制糖业也一样，1919年，帝国制糖公司创建了北海道制糖公司；1923年明治制糖公司收买了北海道的日本甜菜制糖公司；在朝鲜，大日本制糖公司创建了朝鲜制糖公司(后将其合并)；在中国的东北，作为盐水港制糖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建立了南满洲制糖公司；在上海，明治制糖公司在那里建立了明华糖厂。另外，大日本制糖公司和作为其直系公司的南国产业公司都在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建立了自己的制糖工厂。如上所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各地区的侵略扩张，台

第1表 台湾各类糖厂的变迁

(自11月至翌年2月的统计)	新式糖厂			改良糖坊			旧式糖坊		
	厂数	生产能力 /英吨	产量/担	厂数	生产能力 /英吨	产量/担	厂数	生产能力 /英吨	产量/担
1901~2年	1	300	18502	—	—	—	1117	11170	890202
1905~6年	8	1539	127652	52	3276	183699	1100	11000	962533
1909~11年	21	16526	3237461	74	6130	679232	499	4990	588954
1915~16年	35	26090	4876193	32	2460	277251	217	2170	197627
1920~21年	42	31870	4019482	22	1900	86955	171	1710	105799
1926~27年	45	35209	6710184	9	600	55719	115	1150	86437

注 ①根据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台湾糖业统计及日本糖业调查所日本糖业年鉴。

②所谓生产能力是一昼夜压榨甘蔗的能力。表内旧式糖坊生产能力的“吨数”是估计数字。
(引自矢内原忠雄著《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一书)

湾的日本资本所经营的制糖垄断企业控制了该地区的重要日用品——砂糖的市场和生产。明治制糖公司还通过它直系的苏门答腊兴业公司经营过种植橡胶的事业。

另外，由于以制糖业为首的台湾日本资本经营企业在总督府的悉心保护下取得了发展，其结果使这些企业与总督府的官僚之间在人事方面有着大量的交流。台湾制糖公司的最高一级干部中，大部分是原总督府糖务局的官僚。另外，矢内原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甚至这样写道：“大至台湾电力、台湾蔬菜、瓜果等各公司的经理，小至地方上的农会、农业仓库的干部，台湾的事业界中充斥着退職官吏出身的人物，实在令人惊讶”。这样一种官僚和企业的紧密勾结必然产生丑恶的关系，它们狼狈为奸、互为一体地对台湾人民实行统治。

第二章 加入殖民主义列强的行列

一、工人阶级的成长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压迫

日清战争胜利之后，日本资本主义以从中国得到的赔款为杠杆，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推行扩张军备的政策，其代表性口号是“卧薪尝胆”。在日清媾和条约中，日本强迫中国割让了辽东半岛，但由于和俄、法、德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发生冲突，日本被迫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日本的统治阶级利用了这一件事来加紧推行军国主义和扩充军备。在整个日清战争中，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的经费都有了飞跃的增长。接着，在战后，从1896年的约7300万日元，至1903年增长到1.5亿日元，仅仅几年之内，陆海军军费增长了一倍多。每年，国家预算的40%直接用于军费。在从中国得到的3.45亿日元的赔款中，除了2000万日元作为皇室财产外，其70%用作战争的善后费和扩充军备的费用，其中用于陆军的有7895万日元，用于海军的有13925万日元。从日清战争前一年的1893年起到日俄战争前一年的1903年为止，在这期间，整个民营工厂的马力数增长了2.4倍，工人人数增长了

70%；而在这同一期间内，陆军工厂（在东京、大阪）的马力数则增长了5.7倍，工人人数增长了3.6倍，有了飞跃的发展。当时制订的扩军目标是：陆军从7个常备师团，兵员8万人（战时20万人），扩充到13个师团、15万人（战时60万人）；海军从5万吨扩充到25万吨。为此而新设了各种税收，如营业税、登记税、酒税以及烟草专卖制度等，压迫了国民的生活。

第2表 日清战争前后公司资本的变化情况

（单位千日元）

年次	总计	农业	工业	其中纺织业	商业	金融保险	水陆运输
1894	148353	1188	44590	13308	20015	100697	82560
1897	532522	2230	105381	30686	260227	196017	164684
1900	779251	2615	158852	34331	389052	315087	228734
1902	878763	2551	173233	32558	440303	344409	262676

注 引自1958年日本统计研究所编《日本经济统治集》。

与此同时，由于以从清国得到的赔款为基础建立了金本位制并扩充军备，日本的资本主义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从1894年至1903年期间，公司的实收资本额增长了2.3倍。1896年，政府设立了劝业银行和农工银行，为将农村的资金调拨给工业起了沟通的作用，并使地主和资本家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公司的资本总额有了急剧的增长，1887年是6785万

日元（其中工业和运输4569万日元），1897年增长到53252万日元（其中工业和运输27006万日元），至1902年，增长到87876万日元（其中工业和运输43590万日元）。铁路从1893年的2039英里，至1901年增长到4000英里；轮船从1893年的11万吨，至1903年增长到656000吨。轮船和火车作为扩军的一部分在政府和军部的保护下，取得了迅速的发展。1892年召开的铁道会议，曾有军部的代表参加。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3表 官营的军事工场、民营的机器制造
工厂发展情况比较**

年次	陆海军工厂			民营机械工厂		
	职工数	动力机械 马力数	每一职工 平均马力 数	职工数	动力机械 马力数	每一职工 平均马力 数
1899年	25073	8438	0.337	20872	4054	0.194
1903	53593	19843	0.370	32029	5494	0.172
1906	93704	68403	0.730	55829	15464	0.277
1909	68605	97063	1.415	46834	29904	0.639
1912	76526	129590	1.693	69810	53515	0.767

注 ①上表根据相应各年的《农商务统计表》、《帝国统计年鉴》等制作而成。

②机械工厂包括武器、造船、车辆、机械器具等工业部门。（引自小山著《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

是，1893—1904年期间，使用动力的工厂增长了4.9倍，日本资本主义在此期间经过产业革命，建立了工业资本。日本产业的中心从农业过渡到了工业。当时，最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和熟练工人集中在以炮兵工厂和海军工厂为中心的官营工厂里。民营工业的核心是纤维业。使用机器的棉纺织业从1889年的10万纱锭，至1897年增加到100万纱锭，占同期日本工厂总数的73%，马力数的46%，工人人数的67%。

上述这种军备的飞快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依靠了极端的低工资制度以及使农民阶层破产而取得的。1897年对大阪1.2万名纺织工人进行的调查表明：在白米每升1角1分至1角8分钱的当时，每天所挣工资在3角以上的有381人，每天所挣工资在1角7分钱以下的则占1万人。根据同一时期，亦即日本商品的倾销在美国引起了矛盾时所作的调查：在每个工人所操纵的机器台数方面，美国是每人10至15台，而日本是每人两台，生产效率远比美国要低。但是由于日本的工资只有美国的1/10，因而结果是日本商品的生产成本比美国低。根据农业和商务部所编的《职工情况》，当时女工在各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纺纱业占78%，织物业占86%，缫丝业占93%。根据1899年对当时雇佣10个以上工人的工厂进行的调查，当时的工人总数是34万人，其中纤维工业21万，占工人总数的60%。另外，工人中女工占22万人，相当于工人总数的60%以上。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日本工人中女工所占的比重是非常高的，而女工的50%日薪都在2角钱以下，其中年龄在14岁以下的占女工总数的11.4%。据《女工哀史》、《职工情况》等书籍对当时情况的记载：她们的劳动时间每天长达十七、八小时，做夜班时是12小时，但是另

外还要化4小时来打扫机器。以种种理由对她们进行体罚、罚款、减食、监禁等则是家常便饭，甚至有将她们剥得一丝不挂之后再殴打的。由于受到这样的非人待遇，女工逃跑的很多。在当时的纤维工业中广为实行的工人寄宿在工厂的制度，就是为了维持上述这种残酷的劳动条件，防止工人逃跑而建立的一种劳务管理制度。1899年，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当工人宿舍发生火灾时，由于厂方为了防止工人逃跑而在门上加了锁，致使工人无法逃出，有31名女工被烧死。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民们迅速破产。由于城市中非农业人口的增长，以及用货币交纳租税办法的实行，农民被强制地纳入了商品经济的轨道。另外，由于经济作物栽培情况的变动，农民们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由于石油的广泛使用，油菜的种植业衰落了，又如，因为1896年取消了棉花输入税，棉花种植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等等。只有养蚕业迅速扩大了。这是因为养蚕能获得大量的现金收入。当时每反^①水田的收入为1.69日元，而每反桑田的收入是5.12日元。然而，这是以消耗远比水田多得多的劳动力为基础的，而且由于养蚕业主要依靠美国市场，因而其经营也是很很不稳定的。

这样，农民阶层迅速走向破产。由于出租土地可以征收高额地租，因而集中了大量土地的地主放弃过去那种依靠雇佣长工和短工大规模经营农业的方式，向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寄生化方向发展。1892年，在日本的全部耕地面积中，自耕地约为304万町步^②，而租地是203万町步（租地占总耕地

^① 一反约等于10公顷。——译者

^② 一町步约等于1公顷。——译者

的39.99%)；而至1903年，自耕地减少到292万町步，租地增加到234万町步（租地占总耕地的44.48%）。如此广泛的农民阶层的破产起到了支持在工业方面实行低工资的作用。

工人阶级的成长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它的掘墓人——工人阶级的成长。明治时期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样的话：日清战争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舞台。1894年1月，在大阪的天满纺织厂，工人们为了反对监工而爆发了自发性的罢工，这次罢工以妨碍工业发展的罪名而遭到了镇压。1897年，在岩手县的大桥矿山、兵库县的神子畑矿山、福岛县的磐城煤矿、群馬县的新町缫丝厂等都爆发了工人的斗争。据警察当局的统计，这一年里在全国爆发的工人斗争有32起，参加人数为6300人。但据现在的研究，实际上爆发的工人斗争和参加的工人人数估计比上述统计数字要多1倍以上。这一年对于日本的工人运动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代。

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成长带来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在侨居美国的日裔移民中间爆发了日本的工人运动，它进而影响了日本。这期间，渡海来到美国的城常太郎、高野房太郎等人在旧金山成立了名叫“职工义勇会”的研究会。1897年7月，城常太郎、高野房太郎等人与片山潜等一起在日本成立了“劳动组合^①期成会”，发行机关刊物《劳动世界》。通过劳动组合期成会的活动，成立了“铁工组合”，至1900年，

① “劳动组合”即工会之意。——译者

支部发展到42个，会员达5400人。这些支部都建立在当时具有先进的机器设备的工厂里，例如炮兵工厂、甲武铁路、横滨铁工厂、日本铁路大宫工厂、石川岛造船厂、横须贺造船厂等。在这期间，1898年2月，在私营铁路公司日本铁道线（即现在的国营铁路东北线）工作的400名工人在劳动组合期成会的领导下，为了反对解雇工人和改善待遇，进行了罢工，使这条铁道线完全瘫痪。这次罢工迫使资方撤回了解雇10名工人的决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901年4月3日，同样在劳动组合期成会的策划下（表面上采取了由《二六新报》主办的形式），举行了模仿“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工人运动会”，有数万工人参加。会上通过了决议，要求政府：（一）保护劳工；（二）实行普选；（三）保护女工、童工；（四）对工人实行完全的免费教育等。当时的工人运动正处在片山潜在他的《自传》中所描述的那种状态中：“要问演说的基调是什么？那就是劳资协调的理论，……对工人则宣讲成立工会的必要性，特别把参加工会的会员之间可以相互接济一事作为成立工会的唯一的理由”。这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成长在当时所处的阶段。但是，正由于工人阶级已经成长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才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勃兴以及日俄战争时期的坚决的反战运动。

自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初期至自由民权运动，在这期间的日本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起义。但是，在1884年前后的农民的斗争遭到镇压之后，农民的这种起义斗争也进入了低潮；在资本主义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如今，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的斗争以佃户向地主斗争这样一种新的形式又开始重新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广大农

民破产了。足尾铜矿的有毒的矿水危害附近农民，这事早从1890年前后起就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在1897年至1900年期间，以田中正造为首，大批农民连续4次上京请愿，遭到了当局的严厉镇压。1899年，栃木县足利町近郊的佃农们组织了“贫民共党会”，这是日本历史上佃农的最早的组织。自1897年至1907年，全日本诞生了大约22个农会组织。

日清战争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日清战争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进展，这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基础的。为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曾经竭尽全力的片山潜、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人，于1898年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对社会主义进行有组织的研究。通过上述研究活动，结果于1901年5月由片山潜、幸德秋水、安部矶雄和西村光次郎、木下尚江加上小石川炮兵工厂、日本铁路大宫工厂的工人，创建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这个党的建党宗旨是“废除阶级”、“人类平等”、“土地和资本国有”、“彻底取消军备”。在实际运动方面，提出了废除贵族院、废除治安警察法、裁减军备、实行普选、制订工会法、保障工人团结斗争的权利、保护佃农、废除女工、童工的夜班作业等口号。当时的日本社会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包含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乃至基督教人道主义等的各种成分，还没有完全理解革命与改良的区别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因此，这个党认为要通过选举来实现上述各项要求，对于当时日本阶级统治的实质以及天皇制的本质还抱有浓厚的幻想。由此可见，日本第一

个社会主义政党在思想上也是极不成熟的。然而，在工人阶级一定程度成长的基础上诞生了一个要求实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当时的统治者一个重大的威胁。为此，政府在社会民主党成立的当天就发布了禁止它建党的命令。但是，当时的好几家报纸报道了社会民主党成立的消息以及它的奋斗目标。这给了社会以相当大的影响。正是在上述运动的基础上，日本人民才在日俄战争时期掀起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

二、帝国主义及其对殖民地的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围绕着亚洲的国际动向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资本的积累和垄断高度发展，金融资本对经济的控制形成。其结果，造成了国内矛盾的激化，攫取海外市场具有了重要的意义，不仅商品输出，连资本输出也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国内的阶级矛盾尖锐化了；在对外方面，为了保证资本输出和掠夺资源，各帝国主义之间展开了确保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竞争，作为这种竞争手段的扩充军备竞争更加尖锐化了。这样，就会爆发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亚洲形势，也是在上述这种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上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也将向帝国主义发展。

帝国主义战争始于1898—1899年的美西战争（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和菲律宾）和1899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英国为统治南非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①）。日本在日清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得到了殖民地台湾并获得了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权利，这使它充当了帝国主义各国侵略中国尖兵的角色。

1898年3月，德国强迫清朝政府接受了租借山东省胶州湾的条约。在同一个月，俄国又租借了旅顺、大连。英国于同年6月租借了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7月租借了山东省的威海卫。第二年，即1899年11月，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在以这种“租借”的形式对中国领土进行瓜分的同时，欧美各国通过金融来控制中国并获得权益的活动更为频繁了。例如1895年，俄法两国共同给清朝政府以4亿法郎的贷款，成立了俄清银行等。从这时期起，中国的对外借款急剧地增加，这也是起因于日清战争。日清战争媾和时，清国的对日赔款竟相当于清政府全年收入的4倍。为此，清朝政府不得不于1895、1896、1898年分3次向俄、法、英、德等国借钱。日清战争之前的20年间，中国每年所付外债的本利只不过是白银300—400万两，而在日清战争之后每年所付的外债本利则达到了2300—2400万两以上。当时中国每年的总收入大约是8800万两左右，因此这等于将年收入的1/3以上用来支付外债。仅此一点亦可看到，日清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对日赔款是如何给中国带来经济困难，并成为加速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

^① 英国为争夺南非的德兰斯瓦(Transvaal)而向布尔人(荷兰殖民者的子孙)挑起的战争。——译者

原因的。此外，帝国主义各国通过以建设铁路为中心而获得权益的活动，加紧了对中国的控制。1896年，俄国从清政府手中夺得了铺设中东铁路的权益，这条铁路将与已从1891年起动工兴建的西伯利亚铁路相联结。中国的铁路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各地的种种权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起着使中国更进一步沦为殖民地附属国的作用。目睹帝国主义各国的上述动向，美帝国主义于1899年12月要求中国对列强实行“门户开放”。在这之前，美帝国主义在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方面落在其他列强的后面。为此，美国曾经要求早已在中国建立了势力范围和利益范围的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商业活动不加歧视。这就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将向亚洲扩张并挤进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各帝国主义行列。

日本资本主义在与围绕亚洲的国际动向的复杂联系中过渡到了帝国主义。这种动向是指英、俄两国围绕统治中国而展开的争斗和日、俄两国围绕统治朝鲜而展开的争斗，以及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进行的斗争。

日清战争之后取得了迅速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以1900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为转机，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了渡过这次经济危机，在政府的奖励下，纺织、银行等产业部门相继进行了合并。其结果，虽然在统计上企业的数目减少了，但每一企业所具有的资本却增加了。三井资本除了原有的三井银行、越后屋吴服店（三越）以及三井物产公司之外，还将三池煤矿、钟渊纺织厂、芝浦制作所（东芝^①的前身）、新町

① 即东京芝浦电力公司。——译者

丝织厂、北海道煤矿铁路公司等纳入自己的属下，初步具备了垄断资本的规模。三菱也一样，除了原有的日本邮船公司、高岛煤矿、三菱合资公司之外，还经营起生野等地的矿山、大阪冶炼厂、长崎造船厂、东京仓库、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明治人寿保险公司等企业，并以三菱合资公司为中心，同样奠定了财阀的基础。

另外，在资本输出方面，1897年开始在朝鲜动工兴建汉城至仁川之间的京仁铁路，并于1900年完工。在这期间，1898年，日本从朝鲜夺得了铺设自汉城至釜山之间的京釜铁路的权利。1902年，三井资本出钱买下了上海的兴泰纱厂，并加紧对殖民地台湾的制糖业进行投资。这样，日清战争之后的日本资本主义，在建立垄断和金融资本以及输出资本方面，跨出了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另外，在棉纱的输出方面，对中国的华北和东北已达到了相当的数量。特别是对华北，这时期已经达到了垄断棉纱市场的地步。除了上面叙述到的那些日本国内的因素之外，加上策划旨在统治朝鲜的阴谋，以及参加了干涉中国义和团事件的侵略战争，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就逐渐形成了。

关于统治体制的分析

关于这一时期的日本的统治体制，日俄战争期间即1905年3月26日发行的社会主义报纸《直言》第2卷第8号所载社论《日本绅士阀的解剖》一文，对此作了重要的分析。在《直言》之前，致力于工人运动并建立过社会民主党的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曾经发行过《平民新闻》。《直言》是《平民新闻》的后继刊物。虽然《平民新闻》因发表了题为《告小学教师书》的社

论，在上年的11月遭到了当局的取缔，但是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通过《直言》继续进行活动。这篇题为《日本绅士阀的解剖》的社论可以看作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对日本统治体制的剖析。

这篇社论首先举出的是“藩阀”。特别在当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属于萨、长两藩系统的人“提拔其亲友，自中央政府至地方官厅，悉数配置其亲信”，“无论陆军、海军或内阁，无论中央各部、地方厅或警视厅，萨、长二藩之势力宛如蛛网。如是，日本国家之权力、日本社会之权力一时全掌握于此萨、长藩阀之手。”这一势力成了当时统治体制的核心。这篇社论接着举出的是“党阀”。文章认为，这是些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属于地富豪绅等地方上的实力派一类的人物。但是，这篇社论在谈到“党阀”时说道：

彼等虽或则高唱自由民权，或则主张国家政治，然其实一旦彼等自己进入议会，分得若干权势利禄，则渐渐弃其主义，曲其主张，完全离平民而去，另外形成一纯然之政党阀。如是，随党阀势力之增进，藩阀终亦不能无视之，于是形成藩阀与党阀之结合。以侯爵伊藤氏为总裁之政友会之成立是其结果也；盲从桂内阁之举国一致议会之诞生是其结果也。

如上面所指出的，在当时，政党也不是人民的代表，藩阀也不能无视党阀的力量，两者相互勾结而组成了统治体制的一翼。另外，关于“财阀”，这篇文章认为：

这是随着明治社会之进步，随着产业制度、资本家制度之发展，自然产生于藩阀与党阀之间的一大势力。其中有从原来的商人脱胎而来，因与政府有密切关系而骤然

成为百万富翁的（如岩崎），也包括华族和豪农。文章认为：

此等富豪一旦变得强大，则藩阀亦终于不能无视之。岂但不能无视，且要勾结之依赖之，致使自己也成其一部，共同拥护其中之大财阀。

于最近日俄战争之际，大有政府获经银行家之允诺才开战之势，如是情况皆显示藩阀与财阀之结合。

如上所述，在与藩阀结合之后，财阀也成了当时日本统治阶级中一个有力的构成因素。此外，文章写道：

观察将来之形势，无论藩阀或党阀，都将渐渐熔铸于财阀之中，最终将构成称为富豪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一大绅士阀。

这篇社论认为，诸如“藩阀”、“党阀”之类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势力，其真正的主人是上述财阀。

除此之外，构成统治体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学阀”。上述那篇社论指出：“彼等多数人虽尚未与党阀相勾结，然而处处与藩阀、财阀相勾结，成了整个绅士阀之爪牙。世人抑或知学阀与藩阀相结之坚，而不知其与财阀相结之深”。如上所述，学阀是管理当时的统治体制的官僚势力的核心力量，它不仅支撑藩阀，而且已显示了开始厕身财界的迹象。除了上述“藩阀”、“党阀”、“财阀”、“学阀”之外，还有“宗阀”和“门阀”。“如真宗（佛教净土真宗发源地之山寺）那样，作为世袭华族，它显然早已在门阀之中。即便将其看成财阀，亦不失为一有力者也。”“如大名、公卿之遗族，虽其大部已微不足道，然若彼等与财力相结时，则亦不能不成为一偌大之势力。”如上所述，文章认为

“宗阀”、“门阀”虽也是构成统治体制的因素之一，但它们将不会成为一支独立的势力。

分析的不足之处

以上，是通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的分析所看到的日本统治体制的面貌。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两大政治势力“藩阀”、“党阀”也早已为大资产阶级所操纵。如果把这篇社论看作是对当时的统治体制的分析的话，那末不能不说缺少对地主的评价和分析。由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把“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一词译作“绅士阀”，因此可以认为这篇论文的目的仅仅把资产阶级作为分析的对象。但是由于文章的内容涉及到对统治阶级和整个统治体制的分析，所以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只是在一些地方谈到了“豪农”，那显然是不充分的。当时的地主是半封建的势力，它和资产阶级同是统治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地主产生于江户时代。在实行调整田赋之后，“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仍然被认为是合法的。他们一方面继续对佃农进行半封建的统治，同时由于大米越来越变成了商品以及农民阶层的破产、流通机构的完善等原因，出现了拥有一千町步土地的大地主，地主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他们拥有全国农地的将近一半。他们与大资产阶级一起同是支撑天皇制统治的两根支柱。在贵族院和众议院里也有他们的许多代表，但是对大资产阶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日本绅士阀的剖析》一文，虽然对当时的统治体制进行了出色的分析，但是可以说它对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所起作用的分析则是不充分的。

同时，正如这篇论文所指出的，当时日本的统治体制，

虽然其内部包含着复杂的因素，但是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以大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权力。作为两大政治势力的“藩阀”和“党阀”，虽然各自具有独立性并在其内部包含有官僚、地主等成分，但是他们相互勾结着，总的来说代表了“财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不顾地主势力的反对，强行增收土地税一事就表明了这一点。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弱点的论述

在上述这种统治体制之下，日本资本主义正在向着帝国主义过渡，然而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远比欧美各国要晚得多的日本，那时还有许多弱点。1901年，幸德秋水写了《帝国主义》一文。这篇文章是在全世界都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形势下写成的，正如文章所说：

盛乎哉，所谓帝国主义之流行者，其势如燎原之火也。世界万邦皆折伏其膝下，无不赞美之、崇拜之、奉持之。

幸德秋水在这篇著作中说到了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他指出：

欧美之贫富愈发悬殊，财富与资本愈发堆积于少数一部分人之手，多数人民之购买力达到了衰微之极的地步，此种现象实乃现时之自由竞争制度之结果，是为彼等资本家、工业家垄断其对资本之暴利所致。

也就是说，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发展，苦于“资本之饶多与生产之过剩”的结果，遂使资本家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家采取了这样的方针，亦即“为达到永远实行垄断之目的，而向海外扩张领土，投入莫

大之资本，滔滔而不知止境。”幸德秋水认为，为了消灭这种帝国主义，“不能不根本改造现时之自由竞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秋水的分析虽在自由竞争与垄断和金融资本的关系、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的区别等问题上，有不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正确指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一点作为对列宁之前的帝国主义的分析来说，是极其出色的。另外，幸德秋水在这篇著作中指出：

而今我日本亦热中于此主义而唯恐不及。陆军扩至13个师团，海军扩至军舰30万吨。领土扩张至台湾，北清事件^①时则派遣军队，国威与国光为之张扬，军人之胸前装饰了多枚勋章，议会赞美之，文士诗人讴歌之。秋水把日清战争后军备的飞跃性扩张、占有台湾，以及参加以义和团事件为起因的欧美各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等现象，看成日本迅速走向帝国主义的表现。同时，他写道：

我日本拥有武力，遂得以将国旗树立于海外。而我国民则能有几多资本投于此国旗下、能制造几多商品投于此市场乎？领土一旦扩张，则武人势必益发跋扈、政费势必益发增加、资本势必益发缺乏、生产势必益发萎靡。我日本若走帝国主义之路，其结果唯如此耳。原为每年8000万日元的总预算，不到数年即增至3倍，为经营台湾，占领以来已从内地夺去1.6亿日元经费，2亿日元的赔款^②如梦般消失，财政日益紊乱，外贸入超日增，政府接连增税，市场日益窘困。

幸德秋水指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上述弱点之后写道：

① 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译者

② 指日清战争后所得34500万日元赔款中的一部分。——译者

欧美各国之帝国主义者开口就谈资本之饶多和生产之过剩，而日本之经济情况则完全与之相反。虽说欧美各国建设大帝国之事业，毫无疑问必将走向腐败和衰落，然而抑或在今后之若干年间，尚得以夸耀其国旗之虚荣。而至于我日本，则岂得维持其建设之帝国于一日乎？因拥有多数之军队与战舰而擅呼自己为帝国主义。

我日本帝国主义，真乃愚不可及也。

如上所述，幸德秋水正确指出了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尚很虚弱，他在其他的著作中也曾把当时的日本称之为“军事的、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

列宁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论述

后来，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写道：“在日俄两国，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可以说，日俄战争前夕幸德秋水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论述很好地抓住了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同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它的虚弱性，由于它的矛盾的深刻性，因而比别的帝国主义更富有侵略性，热中于不断扩张军备和发动侵略战争。这时期的日本在垄断和金融资本的成长方面以及资本输出方面，还有许多弱点。列宁曾经历数帝国主义的种种特性，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一点之外，他还说：

同兼并密切联系着的那种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民族身上的寄生虫。（《帝国主

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从这方面来说,日本参加了对朝鲜和中国等殖民地的统治和瓜分,并在义和团事件时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还结成了帝国主义的同盟——日英同盟。从这一点来说,20世纪初的日本已经参加了帝国主义阵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首先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个国家是否可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根源;在围绕帝国主义统治的问题上,它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侵略者和压迫者的一边,还是站在被侵略和被压迫者一边。因此,列宁在谈到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时说:

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露了身手,但是一般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引自《社会主义与战争》)

可以说,列宁在这里所用的“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一词也并不是讲那个国家处在成为帝国主义之前的阶段,而是说一个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所执行的对外政策中的某个方面。(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那个国家在历史上和经济上还存在着落后的因素。)

日俄战争前夕的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尚有许多弱点和落后的方面,但特别是通过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它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国家。

三、侵略朝鲜

日清战争的主要目的

对日本来说，日清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统治朝鲜。日清开战的时候，外相陆奥就日本对朝鲜的政策提出过如下几种方案：（甲）把朝鲜作为真正的独立国而不加干涉；（乙）给朝鲜以名义上的“独立”，而事实上则将其作为日本的“保护国”；（丙）由日清两国瓜分朝鲜；（丁）让朝鲜成为永远的中立国。内阁会议考虑到各列强的动向，决定采用（乙）案。另外，日本从朝鲜夺得了在汉城和釜山之间以及汉城和仁川之间建造铁路和架设电讯线路的权利。为此，在日清战争之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有了进一步的加强。1896年，在朝鲜的258家外国商行中，有210家是日本商行。在各国对朝鲜的贸易方面，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同时，清国在朝鲜的势力已经清扫干净，由于“三国干涉”，日本在外交上吃了个大败仗，其结果使沙俄对朝鲜的扩张活跃起来。

在整个日清战争期间，日本对朝鲜的内政进行了露骨的干涉，这使朝鲜人民群情激愤，怒火万丈。另外，在“三国干涉”之后，在朝鲜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一派亲俄势力，他们想借俄国的力量摆脱日本的控制以谋求独立自主。由于上面这些原因，日清战争之后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山县有朋曾在这时期写道：“数十年来之素志，亦有一

朝化为泡影之虞。”1895年10月，日本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等人制造了杀害朝鲜国王的妃子闵妃的事件。这也是由于日本方面的焦急心情所产生的。

杀害闵妃事件

三浦指挥日本驻朝鲜的守备队和“大陆浪人”等，于1895年10月7日夜里，侵入王宫，杀害了被称为亲俄派官僚的后台的王妃——闵妃，同时杀死了王宫的侍卫长和宫内大臣等人。他们在对闵妃的尸体进行凌辱之后，再倒上火油焚烧，行为极其野蛮。三浦等人制造假象，企图把这次事件说成是朝鲜内部发生的事件，以便清除亲俄派势力，抬出大院君李昰应，建立一个亲日派政权。三浦在事件之后说道：“这下可以放心了，朝鲜也愈来愈是日本的了。”

但是，事态完全没有按三浦等人所期望的那样发展。三浦等人虽然处死了被说成是事件凶手的朝鲜人，但事件的真相不胫而走，迅速传开。听到这一消息的朝鲜人民纷纷举兵起义。先是1896年1月，在江原道的春川地方爆发了人民的武装起义，接着在忠清、庆尚、江原三道以及朝鲜各道，广泛地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起义。闵妃事件所引起之事态，正如当时日本方面所记录的那样：“韩国上下，人心全背离帝国，与此同时，所谓的日本派势力也大有一扫而空之势。”（引自《日本外交文件》31卷2册）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的亲俄派官僚于1896年2月11日，从当时停泊在仁川的俄国军舰上增加了海军陆战队，将国王移到俄国公使馆，组织了亲俄派内阁。在这届内阁执政期间，至1898年，俄国获得了矿山专利权和森林采伐权，朝鲜向俄国聘请了军事顾问

和财政顾问等，并开设了俄韩银行。日本与俄国之间于1896年5月缔结了《小村·惠勃备忘录》，同年6月缔结了《山县·罗巴诺夫协定》。在这些谈判中，日本被迫承认了俄国在朝鲜驻军的权利以及对朝鲜财政的干涉。

但是，朝鲜国内的亲日派势力的这种败退和亲俄势力的扩张，给朝鲜带来了有使它沦为俄国殖民地的危险。为此，继承了急进开化派思想的民主主义者，都参加到独立协会里，发动了要求独立和民权的运动。这样，在独立协会的领导下，1898年3月，汉城的1万市民在钟路集会，高呼要俄国撤出顾问团的口号，强烈要求独立和民权。在朝鲜人民的这种强烈的要求下，俄国撤除了在朝鲜的顾问团，关闭了俄韩银行。

在上述形势下，1898年4月，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协定（西·洛暂协定）。虽然这一协定规定日俄两国都不干涉朝鲜内政，双方在没有得到对方同意时，都不得向朝鲜派遣军事、财政顾问。但是，这却意味着俄国在朝鲜势力的一次败退。另外，在这一协定中，俄国被迫全面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经济地位。在当时日本的占压倒优势的经济扩张面前，俄国也不得不作了让步。从那以后，俄国虽曾于1899年4月仍想占领朝鲜的马山浦一带，但它把俄国军队的主力投入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其结果是1898年3月，俄国租借了旅大地区。

四、成为侵略中国的尖兵

中国的进一步殖民地化和人民的起义

由于在日清战争中吃了败仗，中国进一步走向殖民地

化，被瓜分的危机加深了。日本通过日清媾和条约从中国夺得了资本输出的权利，而这一特权立即被早已通过不平等条约而享有最惠国待遇的欧美各国所利用。从1895年至1896年期间，英国资本在中国开设了怡和纱厂和老公茂纱厂，法国资本开设了瑞记纱厂，美国资本开设了鸿源纱厂，其他在面粉、榨油等行业也有外国的投资。中国为了支付对日本的赔款，被迫从欧美各国借债，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外国的依赖。例如，英国利用这时给中国的贷款，得到了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的要职。另外，在这一时期里，俄国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等都在中国开设了分行，英资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联合成立了中英银公司。这些外国银行成了中国从外国借款的窗口，不仅对清朝政府的财政政策拥有巨大的发言权，而且通过发行纸币和操纵金融等手段搅乱了中国经济，进而投资铁路和矿山，控制了中国的资源、交通以及经济。外国帝国主义的上述这些活动，加上与此同时进行的获得租借地和划定势力范围的行动，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走向殖民地的步伐。

中国的这种进一步殖民地化，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苦难，促使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群众奋起斗争。当时的中国人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是由于有帝国主义才使生活陷于贫困，从而开始向当时起着帝国主义的走狗作用的教会势力发动进攻。自1896—1897年，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江苏、山东各省都掀起了反对洋教的斗争，1898年的广西、四川两省的农民起义也包含有反洋教的因素。

在这种形势下，属于华北地区的山东省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日清战争期间，日军占领了

威海卫。这支军队一直在当地驻扎了3年，直到清政府完全付清对日本的赔款为止。日清战争结束后，英国租借了该地，而德国租借的胶州湾也是在这个省。英、德两帝国主义计划铺设的铁路在该地相距甚近，因而两个帝国主义当时都想在这个省扩张势力。再加上由于清政府的腐败，1898年，山东的许多州县都发生了水灾和旱灾，许多人死亡，大批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

义和团的起义

山东省也和其他各省一样，从1896年以来各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洋教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义和团在农民中间的影响增强了。起初，义和团是一个颇有神秘色彩的民间组织，19世纪初曾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进行反清活动。尽管屡遭清政府的血腥镇压，然而义和团却坚持活动。在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义和团作为一个农民的组织又迅速地发展起来。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其中也有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水陆运输工人和小商人。义和团的组织以10人为1班，每10班为1大队，大队的领导人称为百长，用旗语指挥作战。

1899年秋，义和团以“灭洋人、杀赃官（杀贪官污吏）”的口号，在山东平原县发动了武装起义。义和团击败了前来镇压的清朝军队，很快在山东省一带扩展开来。进入1900年后，帝国主义各国要求清政府“全面取缔”义和团。这年春天，义和团的主力离开山东向京津地区进发，一路上捣毁教堂，破坏铁路，夺回政府从农民那里夺去的税金和粮食。至5月，整个华北地区，不管农村还是城市都被卷到了

这场革命斗争中去。至同年夏天，席卷了京津地区的义和团开始袭击教会、铁路、洋商、买办、租界及公使馆等，并抵制洋货。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人民斗争，清朝政府早已变得一筹莫展了。

帝国主义各国的入侵

在这样的事态面前，帝国主义各国开始亲自出马对义和团进行直接的镇压。5月28日，各国公使馆要求本国出兵。31日，英、美、俄、法、日、意等国的军队数百人在清政府的同意下从天津进入北京。6月16日，侵略军要求大沽炮台的清军司令交出炮台，理由是“为了便于镇压义和团”。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时，17日，侵略军在炮舰的支援下占领了大沽炮台。

当人民的起义已经发展到难以对付的时候，清朝的统治集团动摇了。宫廷内的核心势力西太后及其亲信在6月以后开始认为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或许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6月6日，西太后的亲信曾去保定、涿州调查研究义和团的实力及其对策。

6月17日帝国主义联军对大沽炮台的占领，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国的统治者们开始动摇了，他们说：“昔与日本一国作战尚且未能取胜，今与各国作战，何以能胜？”在当日下达给李鸿章等人的上谕里也有这样的话：“朝廷将谨慎进行外交，不想轻易开战。”洋务派的巨头反对开战，他们说：“乱民（义和团）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外战不可开。”但是，北京当时已处在20万以上的义和团的包围之下，西太后无计可施，于21日宣布对帝国主义联军开战，妄图转

移人民斗争的矛头所向。29日，清朝政府在给各国公使的电报里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山东、河北的乱民的力量过大，本想加以剿灭，但如操之过急，将会发生大患。”可见统治者的本意是敌视人民的。因此，当义和团与侵略军的战斗开始时，清朝的统治者只在名义上派了一部分清军而实际上却牵制了义和团的进攻。地方上的洋务派中的一派人和英国之间缔结了“东南互保条约”，置宣战的诏敕于不顾，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企图保护帝国主义的权益，防止义和团的影响波及自己的地盘。

8个帝国主义国家亲自上阵，派出大军组成了“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的这场大规模的斗争发动了直接的进攻。以义和团为核心的中国人民以火热的反帝斗争意识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但是，到8月14日，北京终于被“八国联军”占领。清朝的守旧派统治者逃往西安，向各帝国主义赔礼道歉。为了表示“诚意”，发动了对义和团的进攻。

日本是国际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宪兵

这次事件的结果，帝国主义各国与清朝之间缔结了《辛丑和约》。这个条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但是，中国人民斗争的结果使得早已在推行的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瓜分计划不可能很快实现了。正如八国联军司令罗伯特·赫脱所说，此时帝国主义各国之所以未能瓜分中国是由于：“即使中国的任何一个部分被割让，都要用武力才能实行统治，而所割让的领土越大，则进行管理时就相应地需要更多的士兵。而且骚乱和暴动一定会更频繁地发生。”另外，由于“在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方面，没有一个可以为全中

国所接受的值得注目的人物”，因而帝国主义各国放弃了废除清朝的念头，打算始终支持清朝，使其进一步变成买办，把它作为统治中国这块半殖民地的工具。

日本军队在“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是一支主力部队。开战当初侵入中国的“八国联军”共3.2万人，而其中日本军队就有1.2万人，和其他各国相比，占压倒优势。日本比欧洲其它任何国家都离中国近，这一地理位置，使日本扮演了国际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宪兵的角色。日本军队仅在天津一地就掠夺了200万两白银。而这件事甚至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对军队纪律问题的议论，这就是所谓的“马蹄银”问题。

另外，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这场战争使朝鲜进一步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并推进对中国的瓜分。当时的首相山县有朋在帝国主义联军侵入北京时所写的名为《北清事变善后策》的一份意见书中认为，这场战争是日本实现统治朝鲜的良机。他写道：“取朝鲜为何须于今日？”“自然，此乃为了谋图将来瓜分之时无估计之错误”，“为了在福建之外再将浙江纳入我之势力范围。果能如此，则将来与台湾可成犄角之势。于平时可作为在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建立工业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之侵攻。”就在写这份意见书的两天之后，即8月22日，参谋总长大山岩给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发出了一道经天皇批准的训令，要他伺机占领厦门。同月27日，以24日厦门的本愿寺被烧为借口出兵厦门。就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义和团事件的高潮中占领了厦门，企图参加对中国的瓜分。但是，日本的这一行动由于受到英国的强硬抗议而宣告失败了。英国当时担心日本在中国的迅速扩张。

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通过义和团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一角崛起了，而帝俄则乘机派大军进入并占领了中国的东北，自此以后，俄国帝国主义加深了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1900年7月，当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在东北广泛兴起的时候，沙皇以保护正在建设的中东铁路的名义，派遣了17.7万人的大军进入东北，至同年10月占领了东北全境。在这期间，在瑗珲、珲春、三姓、海拉尔、漠河等地被杀害的中国人达数万人之多。甚至在1901年9月清朝政府和各国之间签订了《辛丑和约》，各国从北京、天津撤军之后，俄国的这支大军仍然继续赖在中国东北。在此期间，东北的中国人民和义和团，组织了“忠义军”（最多时达20万人），与俄国占领军进行了斗争。

这样一种形势也使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化了。写于义和团事件高潮时的山县有朋的意见书说道：“欲将朝鲜纳入我之势力范围，首先须有与俄开战之决心。唯有以此决心，方能达经营北方之目的。”由于朝鲜人民的抵抗，帝俄在朝鲜丧失了势力，遂将其主力倾注到中国东北。而俄国军队之所以占领中国东北，首先是由于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对它造成了威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初想与俄国协商解决。

去俄国参加日俄协商的伊藤博文，在其于1900年12月提出的一份草案中认为：“在有关政治、工业及商业方面，俄国应该承认日本在朝鲜有自由行动的特权，以及日本有为使朝鲜政府尽到一个好政府的义务而通过建议和援助，帮助朝鲜的特权。但是如果朝鲜发生内乱及其他与之相类似的、有可能打乱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和平关系的事变时，上述条款包含

着日本有为平定此种事变而提供必要范围内的军事援助的权力。”这份草案同时认为，与之相交换“可以承认俄国在早已站稳脚跟并在事实上已拥有行动自由的满洲，有较为广泛的行动自由”。上述这些文件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互相对立而同时又互相勾结的关系。日俄两国在统治殖民地人民这一点上，它们的利害是一致的，它们也想通过瓜分“势力范围”来避开冲突。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环绕争夺霸权的对立最后将不得不走向战争。俄国再次窥伺朝鲜以及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成了对英帝国主义的威胁，当时的英帝国主义正同样想推进对中国的控制。由于日英两帝国主义的靠拢，事态向着日英同盟的方向发展了。另外，英帝国主义根据义和团事件时的经验，感到在爆发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时候，需要日本的合作。1902年1月缔结的日英同盟条约，使英国承认了“对于日本国，除其在清国具有之利益外，于韩国之政治上、商业上以及工业上亦具有特殊之利益。”条约还写道：“列国之侵略行动”及“于清国或韩国……因发生骚动而致使（日英两国利益）受到侵犯之场合，两缔约国都得为维护该利益而采取必不可少之措施。”如上所示，日英同盟条约的目的在于在日英两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维护远东之和平”，是日英两帝国主义为谋求“均等之机会”以便确保各自在朝鲜及中国之权益。同时也是为了在中朝两国人民掀起反帝斗争的时候，日英两国联合起来进行镇压。就是这样，日英同盟条约是在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进行侵略，两国人民掀起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对立而又互相勾结这样一种形势下缔结的。这一同盟条约的本质在于：日英两国互相勾结以在远东地区建立霸权。

第三章 向大陆扩张的跳板

一、反对日俄战争

主张和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言论

日英同盟缔结之后，日俄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化。1902年5月，俄军侵入朝鲜的龙岩浦，把该地作为军事基地，直至同年10月。另外，在中国的东北，在规定的撤军期限满了之后，俄军不仅没有撤退却反而增加了。1903年4月，日本政府首脑决定把对俄谈判的基点放在日俄两国互相承认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所拥有的特权，要求俄国军队从中国东北撤退这两点上。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首脑坚定了与俄国作战的决心。1904年2月8日，日军在朝鲜的仁川登陆。第二天，日本舰队在仁川海面向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开始了。

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统治者极力支持这场帝国主义战争。1903年11月，田口卯吉主办的《东京经济杂志》写道：“今之民间实业家，有关满洲问题，大多为开战论者。”吉野作造是后来提倡民本主义，并是大正民主主义的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在当时虽然认为：“以吾人正要经营之地为由，而欲退先入之俄人，然此等开战之理由，是吾人所不能承认者也。”但同时却又认为：“想来满

洲之地，于现在是我国商工业之巨大市场，于将来亦是一有无限希望之市场，此点自不待言。若于此方面失势，则我商工业之大半不仅将停止进步，而且不能不陷入非常之困境。”并且还说道：“吾人原应早制俄国之先机，于满韩确立贸易之权利。而因邦人^①无志气，着目于此而欲作壮游者不多，遂为俄所乘。时至今日，嗟叹俄之势力，为时已晚。要而言之，带来如是之状势者不能不说是邦人自身之罪也。”上述这些言论反映了日本的资产阶级对中国东北关心的深度，以及所抱有的想把这块地方变成势力范围的强烈欲望。金井延是强硬主张日俄战争的“七博士”之一，他在1900年说道：“日本之利益线直至大陆。若要充分保卫此利益线，则必须防止外来侵入之势力。吾以为，为将来我日本势力之膨胀计，即便诉诸兵力进行战争亦乃不得不为之也。”在日俄两国开战之后的1904年4月末，神道界的千家尊弘、平田盛胤，佛教界的岛地默雷、前田慧云，基督教界的海老名弹正、小崎弘道等人，外加哲学界的井上哲次郎，姉崎正治等人，由29名有关宗教的人士作为发起人，发表了一份《召开大日本宗教家大会宗旨书》，它认为：“值此日俄交战之际，我等应以举国之力量对付和平之敌人，与此同时，对内则要自己培养作为一大国国民应具备之正大光明之雅量，以此向外发扬。”

以社会主义者为核心所开展的反战运动

在主张并坚持这种帝国主义战争的“举国一致”的狂热

^① 邦人即日本人。——译者

气氛中，以社会主义者为核心，在当时已取得一定发展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了坚决的反战运动。但是，即使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者中间，也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了反战、反帝立场的。当时由片山潜等人发行的工人运动的宣传杂志《劳动世界》，当1898年俄国租借中国的辽东半岛的时候，在它的10月号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说道：“吾等工人寄语，坚决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政策，支配东洋之大势，为日本之福利计，以雪还辽东半岛之耻。”另外，幸德秋水也在1901年4月出版的《万朝报》的社论中，把法国面对英国占领埃及一事无所作为的例子和当时的俄国占领中国东北一事相比较，说道：“吾人深恐占领满洲成为占领埃及之重演。法国曾对英国占领埃及一事忍气吞声。吾人深恐我日本成为法国第二。”主张日本不能忍气吞声。但是，在日俄战争时期，团结在《平民新闻》周围的社会主义者不顾生命危险开展了坚决的反战运动。社会主义者当初虽曾提出过拥护统治阶级立场的主张，但这一缺点迅速地得到了克服，这件事一方面表明当时日本的工人阶级尚处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同时也表明在战争的危机中工人阶级很快地成长起来了。《平民新闻》的社论写道：

战争的首要原因在于财产的不平等。贵族为保护自己的财富而建立军队，这是财产不平等带来的结果。他们虽然开口外敌闭口外敌，而实际上他们经常向穷人开战，与其说是为了对付外敌倒不如说是为了对付内敌。从而指出了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平民新闻》的这篇社论还写道：

被俄国侵占之满洲，实为他人之领土。日本所取之

台湾岂非他人之领土？掠夺和虐杀，俄人确实为之，日人难道就不曾为之么？难道惟有日本才是仁人君子么？如上所述，当时最彻底的反战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揭露俄国占领了中国的东北，而日本也掠夺了中国的领土台湾；指出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进而，《平民新闻》还批驳主战论者，它写道：

彼等（主战论者）曰，俄既取满洲，则必将取朝鲜。一旦取朝鲜，则必将取对马、取九州、取日本全土。主战论者之恐俄病可谓甚矣！若可以此说法为据，则欲防卫日本首先不可不防卫朝鲜，欲防卫朝鲜，首先必须防卫西伯利亚；欲防卫西伯利亚，先须防卫乌拉尔以东，防卫俄国本土，不可不灭尽俄国国家。否则，日本终将不能永久安全。

《平民新闻》指出了这场战争归根结蒂是一场无止境的战争的序曲。当时，以打倒反动统治、消灭战争根源为目的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尚不成熟，同时也还没有一个可以领导这一运动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协会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举行了反对战争的演讲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300多名听众对反战演说报以掌声和喝采。这在当时虽说是一桩前所未有的事情，然而这些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声音也被主战派们狂热的呼喊所淹没。

团结在《平民新闻》周围的人们的活动

但是，社会主义者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3月13日出版的《平民新闻》第18号上，发表了一篇《致俄国社会党书》，呼吁国际团结。这篇社论写道：

诸位，今日日俄两国政府，为达到其各自之帝国主义欲望而乱开兵火之端。然于社会主义者眼中，无人种之别，无国籍之别。诸位与我等乃同志也、兄弟也、姊妹也，断无可斗争之理。诸位之敌人非日本人，实为今之所谓爱国主义也、军国主义也。我等之敌人非俄国人，而亦实为今之所谓爱国主义也、军国主义也。如是，爱国主义与军国主义乃诸位与我等之共同之敌人也。诸位与我等及全世界之社会主义者，向此共同之敌人，不可不作勇敢之战斗。而今日岂非是最紧要之时机，亦实为其最好之时机乎？我等知道，诸位决不会放弃此最好之时机。我等亦应尽我等之最大力量。

这封公开信译成英文，发表在《平民新闻》第19号上，并在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机关报上转载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火星报》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上面这封信作了回答。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由于当时在受到更加严厉镇压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困难的地下活动，因此没有能够回答《平民新闻》的呼吁。7月24日发行的《平民新闻》第37号登载了《火星报》的这封公开信。信中说：

于日俄两国之好战叫声之间，闻彼等日本同志之声音，实有如闻来自彼之善美世界使者的妙音之感。而彼之善美世界，若说今日仅存于有阶级觉悟之下层国民之心，则明日必将实现之。彼等虽不知此明日何时会到来，然我等全世界之社会党皆在为使此明日早日来到而努力。我等正为此悲惨之“今日”，亦即为一时之社会组织掘墓，正为最终埋葬此一时之社会组织而组织力量。

《平民新闻》在上面那封公开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然我等不可不进一步。诸位与我等非虚无党，非暴力主义者，乃社会民主党也。社会主义者奉持万国和平之理想。社会主义者之战斗手段，不可不坚决排除武力，不可无有和平之手段，不可不为道理之战，不可不为言论之争。我等知道，在既无宪法又无国会之俄国，言论之战斗、和平之革命极其困难。而以和平为主义之诸位，岂能为急于成其事而时动干戈，欲出一举颠覆政府之策乎？我等深知其志。然此岂非求和平而反搅乱和平乎？

但是，对于《平民新闻》所说的这一点，孟什维克的机关报《火星报》回答道：

不得不以力还力，以暴还暴。我等自先前建立俄国社会党以来，一向以暴力主义为不适当之运动方法，从未停止过与之作斗争。然可悲的是，此国之上流阶级，未曾有过服从道理力量之事，亦找不到些少理由，可以相信彼等将来会服从之。

当时团结在《平民新闻》周围的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还没有能够摆脱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影响。而在当时的俄国，则早已积累了革命运动的经验，国内又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并且已经处在爆发1905年革命的前夜，因此即便是孟什维克也已经对和平不抱幻想。虽说《平民新闻》的有关和平的理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有着许多缺点，而且接受它公开信的又不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修正主义的孟什维克，然而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两国的社会主义者表示要团结起来，这件事在当时是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同年8月，片山潜代表日本出席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

国际的代表大会。他与俄国代表普列汉诺夫一起被选为大会的副主席，两人曾在主席台上紧紧握手。后来，《平民新闻》由于同年11月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告小学教师书》的社论，而被当局禁止发行。然而日本的反战运动却通过《直言》等后来出版的报刊继续进行了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日俄战争的目的

如上所述，团结在《平民新闻》周围的社会主义者们，在思想上还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当时日本的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还具有种种局限性的缘故。然而他们却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了坚决的反战活动。另外，在日俄战争中，日本的统治者的直接统治目标是朝鲜，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待朝鲜的态度还不成熟，他们没有能完全摆脱日清战争后日本的统治阶级在人民中间灌输的蔑视朝鲜人思想的影响。但是，日俄战争期间，即1904年7月17日的《平民新闻》在其社论中说：

“看吧，所谓保全朝鲜领土，所谓日韩联合者，其结果乃只不过是建立庞大之日本帝国也。”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野心。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日俄战争的目的首先在于统治朝鲜。在日俄战争爆发的3个月前，即1903年11月，朝鲜的李学均少将拜会当时日本的副总参谋长后任驻满洲军队总参谋长的儿玉源太郎的时候，曾问儿玉说：“在日俄开战时，日本将如何作战？”对于这个问题，儿玉回答道：“日本军将经由朝鲜进行作战，而朝鲜允许与否可由其便。总之，我将冒与朝鲜兵作战之危险而在所不惜。”另外，儿玉在日俄开战后不久举行的军首脑会议上说，今后应向国内外宣传

“保全朝鲜领土”，但是不要谈及“朝鲜独立”的问题。

二、无止境侵略的序曲

从日韩议定书到日韩协约

日俄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军队无视朝鲜发表的局外中立宣言，占领了朝鲜，把它进一步变成了殖民地。日俄开战后不久谒见朝鲜国王的日本公使馆副武官伊知地少将，认为朝鲜国王对日本不是采取合作的态度，建议日本政府或者废除国王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或者至少应夺取朝鲜的军事、外交、财政三种权力。

日俄开战后的第二个星期，日本政府把《日韩议定书》强加给朝鲜政府。这份议定书规定：

大韩帝国政府确信，大日本帝国政府有关施政之改善，应采纳其忠告。由于第三国之侵害或内乱，当大韩帝国之皇室安宁或领土保全有危险之场合，大日本帝国政府应速采取临机必要之措施，而大韩帝国政府应充分提供方便，以使大日本帝国政府之上述行动容易实现。为达前项之目的，大日本帝国政府可临时取用军事战略上必要之地点。两国政府未经双方承认，不得在此后与第三国之间订立违反本协约宗旨之协约。

通过上述条款，朝鲜之内政、外交事实上已为日本所掌握；同时，日本把日军的军事行动的自由以及设置军事基地的自由强加于朝鲜。此外，日本政府于5月决定了《帝国之对

韩方针》，其中写道：“对待韩国，于政治上及军事上，要取得保护之实权；于经济上，则要日益谋求发展我之权益。”随后决定的《对韩施政纲领》，把上述基本方针具体化了。通过这一纲领，从朝鲜的军事、外交、财政、交通、通讯直至工农业生产几乎完全为日本所掌握。同年8月22日，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第一次日韩协约》，朝鲜被迫承担了如下义务：朝鲜在外交、财政方面，应招聘日本政府推荐之“顾问”；有关财政、外交方面的重要事项应在与日本政府商定之后再作决定。

这样，朝鲜事实上为日本政府所派遣的“顾问”所控制。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以此为满足。1905年11月，又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根据这一条约，朝鲜被剥夺了外交权，被置于统帅驻朝日军的具有元帅资格的“韩国统监”的统治之下。当时，朝鲜国王对作为日本特使来到朝鲜的伊藤博文提出，恳切希望至少能保留某种外交上的形式。但是伊藤对此严加拒绝。朝鲜国王为了拖延时间，避免立即答应，提出希望了解一般人民的意向。对于国王的要求，伊藤威胁说，在并非立宪政体之朝鲜无此必要。既无此必要而竟加以谈论，则恐有煽动人民，使其反抗日本提案之意图。以往，日本人在朝鲜占有土地都是非法进行的。由于有了根据《第二次日韩协约》于1906年公布的《土地建筑物证明规则》、《土地建筑物典当执行规则》等，这也在法律上得到了保护。接着，通过1909年签订的《第三次日韩协约》，日本完全掌握了朝鲜的内政、交通、通讯机构以及司法权和警察权。经济上的统治也与政治上的统治并驾齐驱，通过派往朝鲜的日本“财政顾问”之手，强迫朝鲜进行“货币整理工作”，硬把

朝鲜的货币制度和日本货币制度合并。另外，日本的第一银行汉城分行被定为朝鲜的中央银行，拥有发行通货的权利，从而控制了朝鲜的经济命脉。就是这样，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稳步推进了在1910年通过“日韩合并”使朝鲜变成完全的殖民地的准备工作。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日俄战争的直接目的在于统治朝鲜。但是，当日本的大军进入中国东北之后，那就不单单是确保朝鲜的问题了。1904年5月，外相小村寿太郎在提呈给首相桂太郎的意见书中写道：

在战争之前，我帝国原以将韩国变成我之势力范围，于满洲则单以维持既得之权利为满足，然不幸此温和之要求，未为俄国所容，遂至开战端。以此，据其结果，帝国之对满韩政策自不得不比日前更进一步。亦即，为使韩国事实上纳入我之主权范围，按既定方针及计划确立保护之实权，并为谋求我帝国权益之日益发展计，不得不使满洲亦于某种程度成为我之利益范围，以期维护并扩展我之权益。

山县有朋也在同年8月的《战后经营意见书》中写道：

我帝国于和平恢复之后须想方设法，通过与清国之条约，占得有关开发满洲财源之权益，以补偿驻屯军队及其他所需之经费。

先前，《平民新闻》曾经指出，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无止境的侵略战争的一个序曲。这一预言已经变成了事实。

台湾人民对日俄战争的看法

过去一直强调，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了胜利一事，促进

了亚洲各民族之“觉醒”，这仿佛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功绩”。但是，已经处于日本统治之下的台湾人民那时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呢？根据《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的记载：

明治37—38年日俄战争期间，本岛各地之绅士及其他有势力者，有秘密结盟、缔约，制作集体签名盖章之公约之倾向。据闻，有人缔结了内容如下之密约：于本次战争中如若日军最后败北，则应在与日本政府之建设有关之官衙内浇上火油，将其放火烧毁，与此同时，应将台湾之日本人斩尽杀绝。

另外，据说各地都有人“于私下宣扬，不久之将来，台湾将复归清国之版图。”日俄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如上所述，处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当时希望借日本战败的机会，推翻日本的统治，回到中国的怀抱。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希望统治者失败，他们认为这才会给自己的解放带来有利的条件。

日俄战争的负担

从生产力和财政方面来说，日俄战争对于日本资本主义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日清战争之后，日本大规模地扩充了海军，然而其中90.6%的装备是外国造的。至于陆军所用的野山炮以及新式大炮，则全部是外国造的。而且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常为炮弹不足所苦恼。用于日俄战争之经费，总共是17.21亿日元，其中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增税等所得为3.2亿日元（占22%），发行国债6.44亿日元（占38%）、余下的6.9亿日元（占40%）是靠伦敦、纽约所募集的外债解决的。由于这个缘故，1905年日本的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所引

进的外资总额，包括政府所借的11.42亿日元外债在内，共达14.14亿日元。这一数目大大地超过了同年年底日本的银行、公司的股金总额93129万日元。而且，奉天^①会战之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北部仍拥有大军，在兵力方面保持着优势。山县有朋在1905年8月所写的一份意见书中写道：

此次战争，乃开始于对我非常有利之时机，俄方无充分之战争准备，毋宁说有蒙受突然袭击之态势，此乃无法掩盖之事实也。然而，随着战争之进行，彼以惊人之力，增进其运输能力，不断增加其兵力，岂非使我常为兵力之寡少而担忧乎？为此，致使我用尽现役及预备役之兵而仍感不足，更急造数师团，并悉数将其派往战地。相信余等此际之苦心终非局外者所能推知。

签订日俄媾和条约的背景

尽管处于上述这样的困境，而日本却能在有利的条件下与俄国媾和，这是由于下面几方面的原因：①从欧洲启航的俄国舰队在对马海面被全部歼灭；②俄国国内爆发了1905年的革命；③更重要的是，英国和美国两个帝国主义在财政和外交上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等等。英、美帝国主义之所以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这是由于一方面英国在关于统治中国的问题上与俄国有矛盾；另一方面英国为了反对亚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希望日本担当“远东宪兵”的角色。而美国则一方面希望防止俄国独占中国的东北，希望把东北变成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共同殖民地，同时也是为了在它并吞菲律宾问题上得到日本的支持。为此，1905年7月，在日俄媾和会议之前，

① 今沈阳。——译者

来日访问的美国陆军司令塔夫脱与日本的首相兼外相桂太郎之间，签订了《桂·塔夫脱备忘录》，美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日本则承认了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接着，于同年8月，日本与英国之间签订了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将为英国统治印度之安全提供援助；与此相交换，英国则承认日本“于韩国有军事上及经济上之特殊利益”；承认日本“可于韩国采取指导、监理及保护之措施。”这样一来，日本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一事就得到了英美的承认。另外，不用说，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的目标在于对付俄国。而另一方面，这一条约也是以中国为目标的，正如山县有朋在1906年10月上奏的《关于帝国国防方针之我见》中所说：

虽说我制订作战计划之际，首先应作为敌人者，则唯俄国也，其他之欧洲强国无作为敌人对待之必要；然而次于俄国而应作为敌人者，尚有清国，此岂非一刻也不应忘记者乎？

日俄媾和条约之内容

在《日俄媾和条约》中，日本强迫俄国承认了它对朝鲜的统治以及对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南部和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俄国“权益”的接管。库页岛南部后来被置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岛上的森林占该岛全部面积的73%。这些森林几乎全部被划归国有，日本造纸业的垄断资本向这里扩张。1927年，库页岛和北海道两地所生产的纸浆、纸张占全国同类产品的2/3。

关于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日俄和约规定，

俄国帝国政府在获得清国政府之允诺之后，愿将大连及其附近领土、领海之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帝国政府。俄国帝国政府在获得清国政府之允诺之后，愿将长春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及其所有的支线，以及于同地方所附属之所有权利、特权、财产，于同地方属于该铁路或为其利益所经营之所有煤矿，无偿地转让给日本帝国政府。根据这一规定，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被划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在上述《日俄媾和条约》的基础上，自同年11月起，在北京开始了迫使清国承认上述条约的谈判。对于自己国家的领土和权益由上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任意交易而转让一事，连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显示了最大限度的抵抗。被认为谈判进展迟缓的日俄媾和会议，在27天里共举行了12次会议。但是日清谈判却举行了22次，从谈判开始到签订条约，花去了42天时间。这表明了中国方面进行抵抗的顽强程度。但是，在日本的强硬态度面前，中国不得不于12月22日承认了《日俄媾和条约》。

尽管中国方面进行了如此顽强的抵抗，而日本之所以能采取强硬的态度，这是因为当时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日本。美国总统曾给本国的驻华公使发出训令说：“中国对日本接受俄国之转让一事表示异议。对此，应强硬提醒中国。”英国政府也给本国驻华公使发了同样的训令，充当日本的后盾。美英两国希望日本接管俄国的权益，并希望进而共同分享这种权益。

侵入“关东州”

《日俄媾和条约》签订后不久，于1905年9月26日制订了

《关东总督府勤务令》。关东总督府一手掌握着统治东北南部的权力，这包括统制“关东州”地区的军队和各机关，监督该地区民政以及统辖该地区的军需、卫生、兵站业务。根据《日俄媾和条约》的附加条款，可在南满铁路沿线每公里配置15名守备兵（总计14419名），这是以后的“关东军”的前身。正如信夫淳平后来所说的：“铁路附属地问题，如说纯粹用于铁路的土地，那倒也没有多少，而它的大部分是市街用地，它们大多位于南满洲最富饶的地区。”就是这样，“南满铁路的附属地”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租借铁路不同，它不仅占有用于线路、停车场，车辆调度场的土地，而且还占有铁路工作人员居住、商人营业等所使用的大片土地。日本帝国主义凭借驻扎在铁路沿线的守备队的军事力量，在这一地区内甚至还向当地居民摊派日本驻当地的军队和各机关所需之经费（实质上是租税）。“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都曾是日本在中国领土内的完全的殖民地，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

侵入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帝国主义，其意图不仅在于继承俄国的权益。《日俄媾和条约》签订后日清两国进行了谈判。听说事后中国方面曾说过这样的话：“抽烟时，俄国拿走了两根火柴，而日本则拿走了一盒火柴。”山县有朋在1909年5月所写的《第二对清政策》一文中写道：

● 应以关东半岛为我之永久领土，并为之建立牢不可破之基础，此事固然毋庸置疑。若不如此，如有意待租借期满时将此归还清国，则倒不如在期限到来之前，速将此抛弃为好。原本此半岛之地，乃可谓我花费近2亿之资，死伤近20余万之众所获得之战利品也。纵令租借

期满，也决非能实际立即迂归者。况且半岛之抛弃岂非将对我之保护国韩国民心有极可怕之影响乎？

就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曾企图把中国的东北变成自己的永久的殖民地。而这一点，对于日本统治包括朝鲜在内的整个殖民地来说关系重大。日本军队在日俄战争期间在安东^①、奉天之间建造了一条简易铁路，用于从朝鲜到中国东北之间的军事运输。而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方面想把这条简易铁路改成一条正式的铁路。为此，不仅作好了开工的准备工作，而且于1909年1月，要求中国政府给予承认。起初，中国政府不予答复，没有答应日本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还是强硬要求。中国方面在同年6月的答复中要求：安奉线的工程仅限于线路之改修，不同意加宽轨道，日本政府应立即撤退所派之守备兵及警察。但是日本方面于8月6日发出了最后通牒，并于第二天的8月7日开始动工。为此，中国方面也不得已于事实上承认了日本方面的行动，两国之间交换了《关于安奉铁路改修问题备忘录》。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权益比起从俄国手中接管的权益有了进一步的扩张。

三、“关东州”和满铁

垄断资本的成长和军部对政治控制的强化

由参加镇压义和团事件的侵略战争而成长起来的日本帝

^① 今丹东市。——译者

国主义，通过日俄战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06年组成了棉布输出卡特尔，1907年成立了由4大啤酒公司组成的卡特尔，1908年由帝国麻纺公司组成了托拉斯，纺织、制糖、面粉各公司分别成立了卡特尔，1909年，东日本和西日本的16家银行为了承兑年利5分的公债而组成了辛迪加等等，日本的垄断资本真正形成了，银行的发言权增强了。三井物产公司占有了全日本对外贸易的1/3—1/4。三菱除了在造船业方面占有压倒的优势外，还占有全国煤炭、金属生产量的10%以上。1908年，九州的煤矿生产了全国煤炭产量的79%，而其中的一半煤矿是由三井和三菱经营的。这一年，日本自己也已经能建造世界上第一流的军舰了。从这时起，开始积极地开发水力发电资源，并积极地和美英垄断资本相合作。另一方面，资本的输出也有了飞跃的发展。其中包括新成立的“南满洲铁道股份公司”以及台湾的制糖公司、朝鲜的“东洋拓殖公司”等。但是，在资本输出方面，日本仍然缺少资金。为此曾发生过由美国收买满铁的问题。日本对外输出资本的主力是兴业银行，这家银行把它的对外贷款的44%投向中国大陆；而它也是当时日本引进外资的窗口。一方面引进外资，同时又输出资本，这是当时日本惯用的手法。另外，在进行上述这种资本输出的同时，日本与朝鲜以及与中国东北的贸易有了扩大，进出口总额从1897年的3.8亿日元，到1906年增加到8.4亿日元，到1912年进而扩大到11.5亿日元。此外，由于1909年日本国内颁布了《耕地整理法》，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得到了加强，这时期出现了地主占有土地的全盛时期。而另一方面，利用农民使用人工肥料的机会（这时已经开始使用化肥），商人和工业资本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民

的剥削，农民们加速走向破产。

通过日俄战争，军部对政治的控制进一步增强了。明治宪法规定了“统帅权的独立”，从而使日本的军队浓厚地具有了它是天皇的军队的性质。而1907年又制订了《关于军令的文件》，把军队的组成、教育、人事、战时法规等都作为“关于统帅海陆军经敕定之规定”，亦即“军令”独立于国务之外。根据这一文件，所有上述军令都由天皇签署，除此之外只需由陆海军大臣副署，不需要总理大臣的副署。进而于第二年的1908年12月，修改了《参谋本部条令》，从而使参谋总长的地位比过去更加相对独立于陆军大臣，具有了比大臣和政府更为优越的地位。上述这种更动也同样用于对殖民地的统治。1910年，通过“日韩合并”。设立了“朝鲜总督府”，出现了“名曰朝鲜总督府，实为陆军省之分身”的现象。可以说，走向殖民帝国的道路，相反也使日本国内的政治更加反动，军部的势力越发增强了。日本的统治者在日俄战争期间欺骗人民，让他们协助战争，并把过于沉重的负担强加到人民头上。但是，当《日俄媾和条约》发表的时候，人民认识到战争的结果并不像统治者过去所鼓吹的那么美满。在日俄媾和时，曾发生过“日比谷烧打事件”。这是国内矛盾的爆发。战争期间，人民被统治者把视线转向了国外。可是，这种国内矛盾的爆发却没有成为像俄国1905年那样的革命，这是由于当时日本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有一个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党。在日俄战争过程中加深了的国内矛盾，战后更加明朗化了。至1906、1907年，工人罢工的次数增多了。1907年，爆发了足尾铜矿、幌内煤矿、别子铜矿工人的罢工斗争和起义，政府出动了军队进行镇压。1910

年“日韩合并”的前夕，发生了“大逆事件”。这一事件也具有这样一种浓重的色彩：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而首先加强对国内的镇压。从这一镇压事件以后，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进入了“寒冬季节”。这些事件向人们清楚地表明：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对国内的反动统治，其根子是一个，它们是并行不悖、互为表里的。

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勾结和伊藤博文的活动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将取代帝俄而统治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正如前述的山县有朋的意见书所反映的，日本当时想把中国的东北变成自己永久的殖民地。而另一方面，美英帝国主义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不是别的，而是因为它们希望把东北变成共同的殖民地。为此，日俄战争一结束，就在新的范围内发生了围绕东北问题的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勾结。1906年5月，由“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为主召开并由当时的元老、阁僚13人组成的“满洲问题协议会”，压制了主张继续实行军政的儿玉源太郎等军队中一部分人的意见，通过了撤销在中国东北实行的军事管制的决定。这是由于英美两国相继对日本提出抗议，并以质询的方式就门户开放问题，对日本施加压力的结果。伊藤在这次会议上说道：“至3月前后曾发生下述一些情况：美国政府就满洲问题向我政府提出态度强硬之照会，在英国，此问题亦为议院所讨论。”此外，伊藤博文还公布了一封英国驻日公使寄给他的私人信件，信中说：

日俄战争之际，诸外国同情日本并曾为之提供军费，此乃是明知日本代表门户开放主义，并为此主义而

战之故也。然近据日本于军事方面所鼓吹之主张，则以俄国早晚想要复仇为理由，认为从今日起即应于满州建立对付俄国复仇之机构。此说抑或可信。然而，长此以往，日本定将失去友邦之同情，于将来开战之场合定将蒙受非常之损失。

接着，伊藤还指出：

据来自中国方面之报导，袁世凯对日本怀有不满之念，以为日本于满洲之行动违反北京条约（日清满洲善后条约）。

由于有上述几方面的原因，伊藤博文认为：

据闻，军事当局者解释说，以18个月为撤兵期间，至明年4月份可采取战时之军事措施。根据此种解释，则或将着手种种事业，或将征集租税等等。然而在须撤除军队、仅留铁道守备队、开放安东县和奉天之今日，尚作如是之解释，此点为余所难于了解。余信，满洲今日之现状与我之军事动作最终将抵触不合也。

另外，日本军队之所以不得不从中国东北撤退，是因为惧怕包括所谓“骚乱”在内的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激化，同时也惧怕其结果将使朝鲜人民的反帝斗争激化。这一点也正如伊藤博文在上述“满洲问题协议会”上所说的：

若放任今日之情形，则不仅北清，而且21省之人心最终将会反抗日本。依照敝人的看法，日本对于清国应立于指导者、劝告者之位置……。不论自何方面观察，对于日本，莫如于清国不发生骚乱，而于满洲亦应取清国人满意之方针。对日本于满洲之行动，若招致列国之物议，蒙受来自海外诸报纸之非难与攻击，目下韩国上

下之人心尚未全服日本，倘若背地里有欲通款俄国而反对日本之政略者，则如斯非难，将立即使韩人抱种种之空想，因之，余于职责上不能将此付之等闲。

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的统治中国东北的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在建立对中国东北南部的统治时，非常重视过去曾在台湾建立过殖民地统治的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这两个搭挡人物的殖民手腕，把他俩放在了核心统治者的地位。儿玉早在日俄媾和之前就写了《满洲经营梗概》一书，认为“战后经营满洲之唯一要诀在于阳里装出经营铁道之假面，阴里则建立百般之设施”。后藤新平在他的《满铁总裁就任情由书》中写道：

日俄之战争，恐不能以满洲之一战以了其局。第二次战争究竟将会于何年来到？为在稳操胜券之时先发制人，若胜算未立则自重以待时机，为在再战而不取胜时使我尚留有善后之余地，要之，我于满洲不能不常占有以主制客、以逸待劳之地位。为此之故，首要之点在于经营铁道之巧拙，……为达此目的，第一要经营铁路，第二要开发煤矿，第三要移民，第四要发展畜牧等事业，尤不能不以移民为其中之要务，……倘能依靠目前铁道之经营，于10年之内将50万之国民移入满洲，则俄国虽说倔强亦不敢与我乱启战端，和战缓急之主动权必落我手中。即使俄国一战而将我击败，我亦仍将不失掉卷土重来、东山再起之基础也。今假设第二次满洲战争所需之军费为20亿，而战期拖延期间内每年用于经营满洲之经费相当于上述军费之利息，因之可以说维持和平之

费用亦颇低廉也。若将经营铁道煤矿之费用也算在内，则不难消除殖民政策上屡屡发生之认为经济上不合算等主张之阻力。战争不可期待常胜，永久之决胜乃在于民口之消长，借鉴普法战争中的亚尔萨斯、洛林战役之例子亦足以看出其中之消息。

上面是由儿玉、后藤两人制订的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的计划。由于儿玉于1906年6月突然死亡，这一方针为后藤所继承。后藤在就任满铁总裁时，曾向西园寺首相道：“如果租借期满，满铁是否要归还中国？有没有不发生归还问题的保证？如果发生了归还问题时怎么办？有计划吗？”（见《日本殖民政策一斑》）西园寺对此回答说：“此事任凭各位推测。”然而，日本统治者的真意却是和前面介绍过的山县有朋的主张是一样的，这就是：“如果有意待租借期满之时将其归还清国，不如下于期满之前速将其抛弃为上也。”

满铁募集资金和国家加强对满铁的控制

从上面后藤新平的《满铁总裁就任情由书》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认为确保中国的东北首先是为了支持军事行动。它们认为，即便是从为了掠夺殖民地而进行资本输出的观点来看，经营东北所需之费用也比为支持军事行动而用于战争之费用要便宜得多。这是由于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仍然保留着许多“军事封建的”色彩的缘故。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东北的南部作为“势力范围”一事引起了日本资产阶级对这一地区权益的关注。南满洲铁道原计划把抚顺、烟台等地的煤矿作为自己的附属事业。而对此，三井矿山公司的理事高桥义雄却在1906年7月出版的《东洋经济新报》杂志

上发表文章说道：“铁道一般不可兼业，无论其为官营和私营，又不问兼业的种类为港湾、煤矿抑或其他产业。铁道兼业之弊害在于仅顾重自己所兼之行业而轻视作为铁道本质之一般交通运输任务。其结果最终将不能不阻碍产业之发展。”高桥在这里从企业效率的角度出发谈了多种经营的不利方面。但是，实际上他是在主张将煤矿从国家资本的满铁手里直接交给煤矿资本家去办。同年8月，在同一杂志上，资产阶级政治家大隈重信写道：“此公司（满铁）除经营铁道外，还兼营矿业，特别是抚顺及烟台之煤矿采掘、水运业、电气业、仓库业等，并经营水陆运输所需之机构，为此，其经营方式与杂货铺类似。……并欲将在国内深悟其妙味之专卖垄断业亦用于满洲，关于此事断然不能置若罔闻。”可以说，这是主张也让民间资本家分享经营殖民地的利益，代表了资产阶级希望输出资本的意愿。

关于满铁第一次募集股金一事，〈满铁十年史〉一书记述如下：

明治39年9月10日，首先开始募集第一批股金，共10万股，2000万日元（每股交证金5元）。10月5日，募股工作截止，此时，全部申请股数达106643418股，申请人数总计达11467人，而原计划招募股数为9.9万股（1000股为公司常务董事持股）……为此，依据募集公告之规定，将申请未满10股者合计402股全部削除；然而申请10股以上者合计仍有106643016股，申请人数合计11356人，相当于计划募集股数的1077倍多。

日本政府从俄国手中接管满铁及旅顺、大连地区时，为了让中国政府承认这一接管，在形式上将经营铁路作为日清两国的

共同事业。然而日本政府只是在满铁募集股金的两星期之前才形式上向中国政府报告要成立满铁公司一事，而且以应募非常踊跃为理由，无视中国政府的抗议，使所有股份全部为日本人所垄断。

满铁的大部分股份分散在小股东手中，这就使国家对满铁拥有了绝对的统治权。在满铁创立之初，它的资金是通过特殊的金融机关日本兴业银行，以公司借用外债的形式来调节的。专门研究帝国主义各国对解放前的中国投资情况的专家利马，在他的《各国对华投资》一书中写道：

这家公司（满铁）名义上的资本被认为是2亿日元。日本政府将铁道线路及其他财产转让给了公司；与此相交换，日本政府获得了满铁公司的半数股份。政府转让给公司的财产的价值，据公司帐簿的记载，为9280万日元。这笔财产是日本在战争中获得的……是过去俄国人用从法国人那里借来的资金支付的。……日本公众的投资到1914年年末为2400万日元。……满铁修复工程所需之资金，是公司通过向伦敦的借款筹措的。……由于上述借款而所欠之债务约为1.2亿日元，满铁公司从这笔借款中实得金额为10864万日元。

满铁的作用

如上所述，在满铁所募集的第一批资本中占主要部分的是通过政府所筹措到的外国资本。这批外资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陆将起极为重大的作用。1910年，日本把朝鲜变成了完全的殖民地。翌年，山县有朋写了《满洲、朝鲜铁道经营方策》，其中说道：

经营于朝鲜及满洲之铁道，不只在对付俄国之远东政策上是必要的，并且为了防卫并开发朝鲜，保护建立于满洲之势力以应付将来东西政局之发展，为了建成完整的交通网，首先要以纵贯朝鲜，中间经过安奉线至长春之铁道为战略干线，制订政策使之建成复线，与此同时要改进方法以使其运转之货物量增多，此乃军事战略上燃眉之急务也。另外，于此干线起点之马山附近建立适当之登陆设备，此乃不容忽视之要事。总之，经营朝鲜及满洲之铁道，首先必须着眼于军事上之要求，须从帝国长远之利益出发，勿只计较眼前之小利，忽略国家将来之大方针，并须逐步按计划实行之。必须做到毫无差错，以便在有事之日迅速机敏地显示最大之运输效率，常能集中战胜敌人之兵力。我相信，对于维护建立于大陆上之我帝国之主权，此乃最为紧要之事也。

由此可见，日本在朝鲜及中国东北之铁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不仅具有对付俄国的军事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统治朝鲜和侵略中国东北的基础。另外，从1906年前后起，满铁通过三井物产公司之手，将中国东北的大豆与德国的油脂工业结合起来，使它成了一种国际商品。这样做的结果也使东北的经济被改编成了殖民地式的单一的作物经济。运输大豆成了满铁掠夺中国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第4表所表示的是1933年的情况。满铁所掌握的水运和铁路运输费用在当时的大豆的售价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此外，满铁还掌握了抚顺煤矿等在当时的东方屈指可数的几个大煤矿。从1908年前后起，由于实行了包括铁路、煤矿的经营在内的合理化，改变了以往的优先录用日本人的方

针，采用了“雇用中国人代替”的方针。

第4表 在大豆交易中农民所得和满铁所得比例表

满铁所运输的一车厢大豆 在大连的大豆交易所的售价	日元	%
	2810.67	100.0
农民所得	919.60	32.3
粮栈所得	334.40	11.9
出口商行所得	167.20	5.9
松花江水运费用	362.70	12.9
铁路运费	837.87	29.8
麻袋及其他杂费	188.90	6.7

(参照近藤康男《论满洲的农业经济》。这是指1933年从佳木斯通过水运到哈尔滨后转运至大连的大豆。)

第5表 满铁的死伤人数比例

年度	日本人	中国人	年产煤量(以100万吨计)
1909	154	289	0.7
10	124	476	0.8
11	163	1083	1.3

续表

12	179	1685	1.4
13	205	2979	2.1
14	201	3449	2.1
15	231	3648	2.1
16	298	5115	2.1
17	18	3793	2.3
18	226	4678	2.6
19	211	4589	2.8
20	274	5003	3.2
21	144	3937	2.8
22	133	5189	3.9
23	117	7524	5.0
24	120	7155	5.7
25	112	8882	5.9
26	184	11819	6.6
27	194	11926	7.1
28	129	9265	6.9
29	74	4224	7.0
30	80	4629	6.8
31	69	2694	6.1
计	3806	114029	87.3

(引自《满铁统计年报》)

第6表 以中国人雇员平均月工资为1，日中
两国雇员的工资比例

年度	公司职员	日本人员	中国人雇员
1907	4.3	2.6	1
8	4.5	2.7	1
9	5.0	2.7	1
10	5.0	2.8	1
11	5.0	2.7	1
12	5.1	2.7	1
13	5.2	2.7	1
14	5.2	2.7	1
15	5.5	2.7	1
16	5.5	2.6	1
17	4.7	2.5	1
18	4.3	2.5	1
19	4.0	2.5	1
20	8.2	5.3	1
21	7.6	4.9	1
22	7.1	4.5	1
23	6.8	4.1	1
24	6.3	3.6	1
25	6.9	3.9	1

续表

26	7.6	4.2	1
27		4.1	1
28		3.8	1
29		4.1	1
30		5.1	1
31		4.1	1
32		3.6	1
33		2.8	1
34		2.7	1

(引自安藤彦太郎编《满铁》)

关于这一点，《满洲十年史》写道：

所用之中国人数常占雇用人数之过半。此事不无违反一部分论者主张之嫌。他们认为，在满洲经营事业者于殖民政策上连工人亦应使用日本人。然而毋庸赘言的是，在满洲经营事业者能够利用早有定评之中国人之廉价劳力。满铁公司更进一步，根据经济上的理由，采用了在公司雇工时大量使用中国人之方针。如今不仅是矿工、下级职工、电车工作人员，而且连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培养中国人，使其担当此种业务。为此，公司不仅能节约薪金，而且其间接获利之处亦很不少。

如上所述，满铁使用中国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根据统计，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及日本工人的四分之一，而煤矿里的工伤事故则增加到原来的几倍。这样，

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满铁不仅起到了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的作用，而且这种经营的本身也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血汗之上的。

四、朝鲜的殖民地化——“日韩合并”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通过日俄战争，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交易，朝鲜进一步殖民地化了。这时，朝鲜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也日益高涨。在日俄战争期间，当日本加紧侵略朝鲜的时候，江原、忠清、京畿、庆尚等地方的人民展开了蓬蓬勃勃的武装斗争。赞成《第二次日韩协约》（乙巳条约）的五个大臣被称为“乙巳五贼”。反对“乙巳五贼”的抗议运动也是此起彼伏，这一运动包括了愤而自杀、商人罢市、武装起义等各种形式。武装起义逐渐成了群众性的行动。另外，这时候，鼓吹独立、自由、民权的宣传活动也高涨起来，它对于朝鲜的历史、文学领域里的民族传统进行了重新的评价。而这在当时在提高民族的自觉性和宣传进步思想方面起了支持反对殖民地化的群众性运动的作用。

随着反对殖民地化的斗争变成广泛的群众性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朝鲜人民的镇压。从1907年以后，开始对成为起义军根据地的村庄，进行了疯狂的“扫荡”。自1909年9月起进行的历时两个月之久的“南韩大扫荡”，为“日韩合并”作了重要的准备。1907年7月，向朝鲜派送了

26名日本警官和600名巡警。同年10月，开始规定将韩国的警察官放在上述日本官宪的指挥监督之下。至1909年7月，朝鲜的司法权完全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篡夺。日本帝国主义如此加紧地把朝鲜变成自己殖民地的行动激怒了朝鲜人民。同年10月，“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为与俄国谈判而到达哈尔滨时，被朝鲜的革命家安重根刺死。安重根在法庭上陈述如下：

问：你平素敌视的人是谁？

答：以前并没有敌视什么人，但近来有了一个人。

问：那是谁？

答：伊藤博文。

问：你为什么要敌视伊藤公爵？

答：造成敌视他的原因甚多：

1. 10年前，在伊藤的指挥下杀害了韩国的王妃。
2. 5年前，伊藤凭借武力迫使朝鲜签订了5条条约，那都是对朝鲜非常不利的条约。
3. 3年前伊藤强迫朝鲜签订的12条条约，每一条规定都是对朝鲜的军队非常不利的事。
4. 伊藤曾企图强行废除韩国皇帝的皇位。
5. 韩国的军队被伊藤强行解散了。
6. 每当缔结条约时，韩国国民都愤而起兵，由于这件事，伊藤杀害了大批韩国良民。
7. 伊藤剥夺了韩国的政治及其他方面的权利。
8. 在伊藤的指挥下焚毁了原在韩国学校所使用的良好的教材。

9. 禁止韩国人民讲读报纸。

10. 尽管没有一点保证金，日本第一银行却在韩国发行银行券。这是在出钱买通品质恶劣的韩国官吏，什么事情都不告诉韩国国民的情况下干的。

11. 另外，还听说募集了应由韩国国民负担的国债2300万日元，并瞒着韩国国民将这笔钱任意分发给官吏，听说是为了让他们购买土地。此事对于韩国是极其不利的。

12. 伊藤扰乱了东洋的和平。因为，在日俄战争当时，伊藤曾宣称维护东洋的和平，然而却废除了韩皇的皇位，从而产生了与他的宣言全然相反的结果，这使2000万韩国国民无不义愤填膺。

13. 尽管韩国并不愿意，伊藤却借保护韩国的名义，和韩国政府内的一部分人相串通，施行对韩国不利的政策。

14. 距今42年之前，伊藤杀掉了当代日皇的父亲，这件事是韩国国民家喻户晓的。（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有在明治维新之际被人暗杀的嫌疑，此种说法在当时的日本国民中间曾广为流传，在朝鲜也曾传说杀害孝明天皇的凶手就是伊藤。）

15. 尽管韩国国民义愤填膺，而伊藤却说韩国太平无事，以此欺骗日皇以及世界各国。

由于上述原因，我杀死了伊藤。

上面是安重根在法庭上对审讯的回答。这一回答可以说反映了当时全体朝鲜人民的真实心情。连当时担任审讯的日本检察官也不得不说：“根据你的陈述，你的确是一位为韩

国奋斗的忠君爱国之士。”另外，刺杀伊藤的事件的发生地虽是中国领土，但当时是俄国经营的中东铁路的附属地，为此，安重根是被俄国宪兵逮捕之后引渡给日本方面的。看来这里有着俄国对日本的外交上的交易。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了朝鲜爱国者。在法庭上，安重根的律师曾提出：“应该援用韩国政府发布的刑法，而不应该援用日本帝国的刑法。”但是这一主张被驳了回来。其理由是：“日韩协约第一条的宗旨在于，日本政府在对其臣民所具有之公权作用之下，一视同仁地保护韩国臣民。根据此种应有之解释，在援引属于公权作用一部分之刑事法时，将韩国臣民置于与帝国臣民同等之地位，援引帝国刑法以处置其罪犯，此乃不可不谓最符合协约之宗旨。”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对朝鲜人也同样适用与日本人同样的刑法这种“恩惠”的名义之下，硬是把朝鲜的爱国者处以死刑。

朝鲜总督府对朝鲜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破坏

1910年8月22日“日韩合并”以后，原有的“韩国统监府”改为“朝鲜总督府”，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朝鲜的机关。朝鲜总督直属日本天皇，除了拥有行使在朝鲜的整个行政、司法这一极大的权限之外，还被任命为担任驻朝日军的指挥。为此，规定由陆海军的大将任朝鲜总督，而这一职务乃是当首相的一个重要阶梯。当初在总督的统率下有二个师团的日军常驻朝鲜，除此之外，还决定由日军宪兵队的司令兼任总督府的警务总长，朝鲜各道的宪兵队长任警务部长，少尉以上的军官兼任警视^①，下士官兼任警部。在朝鲜全

^① 警视：日本警察的职务级别名称，位于“警部”之上。——译者

国共设1624处警察所，共有16300名宪兵和警察。他们除了从事普通的警察业务之外，还担负从“收集情报”、“讨伐暴徒”直至“普及日语”、“改良农林业”、“奖励副业”、“普及法令”、“告示纳税义务”，从而控制了朝鲜人民的全部生活。在“日韩合并”的同时，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朝鲜的御用团体“一进会”在内的所有朝鲜的结社，全部被迫解散，朝鲜民族的言论机关也遭到破坏。“日韩合并”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还想方设法从教育方面抹杀朝鲜的民族文化。安重根举出了破坏民族教育这一条作为刺杀伊藤博文的理由之一。1911年8月所制定的《朝鲜教育令》，其首要目的在于要把朝鲜人培养成“忠于日本的良民”。在公立学校，限制了朝鲜语的教育，并废除了朝鲜的历史、地理课程，而被强制性的日语课、日本历史、地理课以及修身等课程所取代。这时候，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事情是：朝鲜的公立学校的日本人教员，腰里佩着宝剑站在课堂讲台上。为了限制和压迫朝鲜人自己进行的民族教育，于同年10月制定了《私立学校规则》。

日本帝国主义在把台湾变成殖民地时，采用了把日本的制度立即强加给这块昨天还是中国领土的土地的办法。而对待朝鲜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它在长期的干涉内政的过程中，把朝鲜原有的警察、金融、行政、司法等制度加以改造或与日本本国相合并，以使其适应日本对朝鲜这块殖民地统治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设立“朝鲜总督府”之前，已经有了它的前身“韩国统监府”了。为此，“土地调查”以及成立并发展“东洋拓殖公司”成了“日韩合并”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所从事的最大的事业了。

“土地调查工作”

在日本资本主义掠夺朝鲜的过程中，大批日本商人进入朝鲜，从事从朝鲜贩运出大米的掠夺性活动。从日本商人的上述活动中，日本人看到了在朝鲜以出租土地的方式经营农业的利益。根据“日韩合并”以前，日本驻朝鲜领事馆郡山分馆的调查，当时的土地收益率规定为10%—12%，而地主实际所得的土地收益率则达到23%—26%之多。

为此，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的1906年，就已经存在着下面这样的情况了：“本邦侨民在相距住地1日里^①以内拥有土地时，从韩人佃农处获得农产物之半数，土地税大多由地主负担；反之，在远离住处的村落里拥有土地的人则让佃农交纳1/3的农产物，而土地税则规定由佃农负担”（引自农商务省农业试验场《在韩国的农业调查》）。根据英国和韩国之间所签订的条约的规定，当时在朝鲜的外国人被允许在离住地1日里以内拥有土地。而从上述记录中可以看到，当时日本人已在1日里以外拥有土地，并已在收租。当时的记录对这一情况有如下说明：

虽规定有关于居住及拥有土地方面的限制，而实际上却未见有任何限制，即外国人在朝鲜内地建筑住房拥有土地者到处可见。而韩国政府以前虽曾屡屡要求撤退，然而如今不仅不再提出如斯要求，而且有的地方官衙已将土地税收据交给外国人，公然承认其对土地的所有权，本邦人则处于无论借住、购买或建筑住房都无任何障碍，可以自由购买土地的状况。虽然有人因有条约

① 约相当于8华里。——译者

的关系而担心此权利，然而实际上从未发生过带来不安的纠纷，不必有丝毫畏惧。（引自加藤未郎：《韩国农业论》）

朝鲜政府之所以不再对外国人非法占有土地提出抗议，是由于朝鲜的殖民地化已加深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的缘故。因此，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本邦人获得土地的办法有二，一是交出现金购买，二是用土地作抵押贷款给土地所有者，使其丧失赎回权而获得土地。资本较少的人大多用后面这种办法。贷款的利率甚高，以少量的资本，数年之后即能得到土地，……从这几年的发展趋势来判断，韩国的土地将会逐渐转入日本人之手。韩人以土地作抵押借款者，其最终结局大多把土地押死，否则就将其转卖他人以偿还债务（引自1905年，农商务省《关于韩国庆尚道、全罗道的土地、农业情况调查报告》）。

根据《第二次日韩协约》于1906年实行了《土地家屋证明规则》，其中说道：

韩国根据条约，从来不允许外人在其侨居地及其周围1日里以外拥有土地。但统监阁下认为，此种规定对于开发韩国，增进韩国臣民之福利甚不得策，要首先排除之。经极力向韩国政府教导训示之结果，遂使韩国政府认识到开放内地之利益，允许外人在韩国国内任何地方拥有土地。于是，才让韩国政府发布了《土地家屋证明规则》。据此规则，外人才得以在韩国国内任何地方拥有土地，并得到政府之承认（引自不动产法调查会《土地家屋证明规则要旨》）。

这样一来，就使事实上以往一直在进行的日本人控制朝鲜土地的事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在“日韩合并”以前，在朝鲜、特别是南部的大米产区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日本人地主。根据1908年的资料，侯爵细川让立已在朝鲜拥有1000町步耕地，三菱得到了3700町步耕地。其他扩张到朝鲜的日本地主中还有朝鲜实业公司（980町步）、石川县农业公司（736町步），原大阪的商人（贩买稻谷、棉花而与朝鲜有关系的不二兴业（914町步）、以及大阪以外的商人国武金太郎（900町步）、森六郎（1520町步）、金融资本家村井吉兵卫（4214町步）、大桥与市（499町步）等。

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的所谓“土地调查工作”和在台湾一样，是为了使朝鲜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适应日本资本主义的需要而进行的开路工作，也是国内的调整土地税政策在殖民地的翻版。此事从1910年一直进行到1918年，花费了2000万日元。调查的内容有：（一）调查土地所有权，（二）调查土地价格；此外还加进了具有军事意义的第（三）条，调查地形。调查规定“土地所有者应在朝鲜总督规定之期限内将其住处、姓氏以及所有土地之名称、所在地、土地之种类、编号、方位、等级、土地面积、土地总数申报临时土地调查局局长。”由于采用了这种申报主义的方式，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没有能够办理手续。而且这一法令本身是通过地方上的有权势的人物传达下去的，因而大多数情况下农民甚至不知道有这个法令，许多农民因为违反手续和证据不足等原因而被取消了土地所有权。这样一来，数目庞大的一大批土地被划为“国有地”。另一方面，日本人却通过这次调查成了完全的土地所有者。另外，朝鲜的贵族、

豪族将自己的封建领地以及同族、同村所公有的土地、山林、原野等作为自己所有的土地加以申报，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他们作为半封建的地主成了支持殖民地体制的一种力量。1918年土地调查进行完毕。那时，朝鲜的总耕地的一半以上集中到了占农户总数3%的地主手里，包括半自耕农在内，77%以上的农民都成了受地主统治的佃农。土地调查工作是国内的调整土地税政策在殖民地的翻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通过上述调查，耕地从272.7万町步增加到了433.7万町步（增加的大部分是由于登记了隐田），土地税也从664.8万日元大幅度地上升到1156.9万日元。原来是李王朝直辖地的9万町步以上的耕地以及拥有农民28.4万人的驿屯土地被编为日本的国有地，为此，在“日韩合并”的当时，朝鲜总督府所收的地租达139.8万日元，是仅次于税收的第二笔收入。总督府所掌管的出租土地至1925年增加到9.3万町步，佃农增到18.7万人。直至1929年仍有7.2万町步，所统治的佃农达15.1万人。

“东洋拓殖公司”的成立及其扩张

在朝鲜这块殖民地拥有大片土地的所有者中，除了朝鲜总督府，还有“东洋拓殖公司”（简称“东拓”）。东拓曾是与满铁齐名的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殖民地公司。东拓是1908年由“日韩两国政府”出资1000万日元所成立的半国营公司。资金中的300万日元原定由朝鲜方面提供，朝鲜方面以水旱田各5700町步（合计11400町步）来充当了这笔投资，其中包括了原属李王朝直辖地的“驿屯土”中的最好的土地。这批从“驿屯土”转入公司所属的土地，根据1913年的实地

测量，共为水田12522.8町步，旱地4908.7町步，杂地282.4町步，合计约有17741町步。另外，同公司还在同一年里“购置”了朝鲜总督府所有的国有地（通过土地调查工作掠夺来的）及其他土地4.6万町步。这样，总共就有了64860町步的土地。同时，日本政府在该公司成立以后的8年里，每年给它30万日元的补助费。东拓是与满铁齐名的殖民地公司，是以国家权力为后台的半国营公司。东拓公司完全不是靠自由地雇佣工人支付工资的方式来经营的，而是依仗半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从佃户人手里夺取收获农产品的50%—60%。根据1938年的资料，这一年东拓公司拥有土地145237町步，佃农78668人。引人注目的是，在东拓公司出租土地经营农业的过程中，所收缴之实物地租远比现金地租为多。

早在“日韩合并”之前扩张到朝鲜的日本人大地主，经过土地调查，取得了完全的土地所有权，所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另外，由于日本人的土地所有权进一步稳定，结果又新产生了一批日本人地主。在这些日本人地主中，有的是日本国内的大地主，他们在国内越来越陷入了经营的窘境之中，企图通过在殖民地经营出租土地的办法来摆脱这一矛盾；有的是大阪、长冈地区的商人，通过贩卖稻谷和棉布而与朝鲜有很深的关系，变成了大地主。除了上述两种以外，还有片仓拓殖产业公司（由片仓纆丝公司经营，1922年拥有2615町步土地）、安川、松本农场（由明治矿业公司经营，1914年购置了1109町步土地，并从总督府租借了543町步）、中部农业公司（由太洋渔业公司经营，1924年有375町步，1935年增加到2000町步土地）、大林组农场（1931年有2314町步）等等，这些大资本家是为了获得他们在经营的

工厂、企业所属的宿舍、食堂、渔船供应职工饭食所需的廉价大米而到朝鲜经营土地的。在朝鲜这块殖民地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不仅加强了日本国内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通过夺取朝鲜的大米，起到了维持日本资本主义的低工资制度的作用。

上述这些日本人所有的大型农场都采用出租土地收取一定比例的地租的方式，但也有不少农场实行根据佃农当年实收的农作物按比例收租的办法。被称做第一银行的别动队的朝鲜兴业公司在大正初期约有1万町步土地和5000名佃农（大正末年拥有土地1.4万町步，佃农19000人），它的地租从大正直至昭和始终征收实物，水田收大米，旱地收大豆和棉花等，收缴数量占收获量的50%到60%。同时，该公司规定“开除不良之徒”，采用5人1组的连环保制度，为了进一步保证地租收入并把佃农束缚在土地上，公司还强制佃农“义务储蓄”相当于地租2%的粮食。通过上面这些办法，朝鲜兴业公司得以保证所得收益率始终高达1成8分至2成5分（1934年为2成5分）。以出产优质大米著称的三菱的东山农业公司至1922年获得了1万町步土地，其地租为收获量的40%，外加“水税”20%，合计60%。公司给愿意迁入垦荒地的佃农事先贷款100日元，这笔钱每年要收20%的利息，另外在耕种之前所借的肥料也要利息。如果佃农在交纳地租之后口粮不够，公司用零售价格把大米卖给佃农。

日本帝国主义在把朝鲜变成殖民地的过程中，极力压制和破坏朝鲜民族资本的发展，妄图把朝鲜变成它的粮食和原料的供给地。在“日韩合并”之前，从1907年至1909年期间，朝鲜人提出申请，要求成立工业公司的共有117件，由

于“统监府”的阻挠，其中得到认可的只有11件。1910年12月，即在“日韩合并”之后不久，公布了一项“公司令”，这项法令给了朝鲜总督极大的权限，他有权停止、禁止、解散在朝鲜的各家公司、企业的权利。朝鲜的民族资本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压制，而日本资本家则乘机取代朝鲜民族资本以谋求扩张。从1911年至1919年期间，日本人经营的公司增加了180家，而朝鲜人经营的公司只增加了36家。1917年，在朝鲜的工业公司股金总额中，朝鲜人资金所占的比例为12.3%，而日本人所占的比例则高达79.6%。

就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独裁政治”压迫着朝鲜人民，强化了它的殖民地统治体制。

第四章 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起点

一、日益扩大的日本权益

日俄两帝国主义的对立和勾结

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把朝鲜变成了完全的殖民地，而且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当时日本的扩军计划是以统治上述这些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目的的。同时，虽然俄国帝国主义这时仍在东北北部拥有大批军队，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对峙，但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在统治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上却是利害完全一致的。为此，从1907年至1912年期间，日俄两帝国主义连续3次缔结了《日俄协约》，相互承认了势力范围。1907年缔结的《第一次日俄协约》以从朝鲜、俄国国境西北端起经中国的珲春至秀水站，从秀水站沿松花江到嫩江河口，再溯嫩江而上到托罗河与东经122度的交叉点为止的这条线为界，将中国东北分成南北两部分，作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另外，日本保证尊重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权益”。在1910年的《第二次协约》中，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不仅相互承认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有为保卫自身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自由，而且保证在这些“特殊权益”受到威胁时双方联合行

动，相互支援。1912年的《第三次协约》是在中国辛亥革命的高潮中缔结的。这次协约延长了日俄两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的界线，以北京的经度（东经 116 度 27 分）为准，将内蒙古分成二等分，相互承认了在各自区域内的“特殊权益”。这些行动清楚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互相争夺而又互相勾结的关系。

辛亥革命的胜利

当1911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乘机瓜分中国的领土，扩张在中国的权益。列宁在1912年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篇论文中，就孙文的政治纲领说道：

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日本海军当局制订了如下的方针：

此时我国之方针在于：暂时观望形势之变化，倘若可以扩张我之权益，则不要失去可乘之机。与此同时，既得之利益丝毫也不能丧失，且要避免招致清国之猜疑与列国之恶感。……大冶铁矿与我国之关系最深。因之，如有必要，可用兵力加以保护，进行事实上之占领。因此，为达此目的，此时该急派一军舰前往。

日本的陆军当局也在军务局内确立了如下方针：

……宜根据战略上之要求决定方针，以使战役取得最好之结果，即：我们以得到南满洲为满足，还是应该

占据直隶（河北）、山西地方，占有清国中部的资源？应该扼制扬子江口，占领该江之利益和资源及大冶等矿山，还是有必要迫使中国政府割让广东或福建省？应该确定这些政策上的要求，并使作战计划符合此总目标，以使对清之政策没有失算之处。

上述这些方针、政策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东北之后的侵略目标。根据这样的方针、政策，日本政府在1911年10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如下的方针：“今后要努力在中国大陆扶植势力，并设法使别国承认我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当其机会对我十分有利且具有十分之把握时”；“应延长满洲租借地之租借期限，决定有关铁路之各种问题，更进一步确立我帝国在该地区之地位，以使满洲问题获得根本之解决。”当时日本驻中国公使伊集院也提出了如下的主张：通过日本的扶植，在华中和华南建立两个以上的国家，分别使华北由清朝，华南由新政府控制，日本对它们都加以操纵，对中国实行分而治之。

至辛亥革命第二年，即1911年11月，清朝的灭亡已成定局，而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当时，欧美的帝国主义各国也早已看到清朝已经没有希望，正谋求与即将成立的中国新政府做交易。但是日本军部却认为，为了阻止在中国出现共和国，即使出兵干涉也在所不惜。明治维新的“元老”山县有朋在同年1月所写的《对清政府概要》中这样写道：

我国政府在保护满洲租借地及铁路方面，为预防社会秩序发生混乱，并确保人民之生命财产，应选择出兵满洲之适当时机（一个师团或两个师团）。……在出兵的决议作出之后，根据与俄国协商行事之原则，应当

前之情况明确照会俄国，以便日俄两国在南北满洲采取共同一致之政策，并想方设法使俄国不对我抱丝毫之怀疑。此事乃极为紧要。由于英国已大体上同意我之方针，因而估计不会有何异议。当满清王朝因事变而逃离皇官之时机迫近时，应预先制订给予救济之政策。总之，南满洲只有依靠我帝国政府之压力，方能使国内外人们放心。

值得注意的是，乘中国发生内战而妄图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其进行侵略时首先考虑的是和其他帝国主义勾结起来。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它打倒了统治中国长达约300年之久的满清王朝，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当时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曾在1912年11月说道：“看一下今日我新闻界青年们的评论，可以知道清国之共和论对我人心影响之大实已达到可怕之程度。”从寺内这段话可以知道辛亥革命的胜利给了日本舆论多么大的影响以及给了日本的统治者多么大的威胁。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统治全中国的动向

由于革命派内部的不统一以及欧美帝国主义各国的压力（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寻找自己的新的代理人），直到昨天还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个实力派的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依然处于完全的无权状态，不平等的对外关系也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了下来。从这以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处于新旧军阀势力的统治之下，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任务依然存在着。

袁世凯一上台，就清洗和杀害了许多反对他的人，建立了独裁体制。1913年，当中国各地爆发反对袁世凯独裁的起义的时候，日本的外务省内曾有过如下的主张：

南满洲乃是丧失了12万国民、消耗了18亿国财才为我所有，且于日俄协商中与内蒙古一起规定为日本势力范围之地。如此则日本在合并韩国之后应以处理南满内蒙作为大陆政策之原则。……随着中国战局之展开，将来满蒙之形势将发生如何之变化，是否会维持现状，依然处在中华民国之治下？不管其最后之归属如何，日本都应乘此机会在满蒙进一步发展势力，至少要不失时机地获得在该地居住之权利。如若连居住之权利都无法获得，则要在事实上强行移民，以取得势力范围之实。如不处理满蒙问题，则将无法在国防上保护朝鲜，无法与英俄等友邦之外来势力保持均衡，将永远无法对中国政治施加压力。更何况在日美条约中由于未规定有关土地所有权之事项，至使无法向美国移民，若以向满蒙大量移民来取代向美国之移民，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此岂有不可之理乎？（引自大竹贯一、冈部伊三郎《对中国意见书》）

这一主张不能说仅仅是一部分外务省官僚的意见。这一主张与前述辛亥革命爆发时内阁会议所作决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反映了已把朝鲜变成完全的殖民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下一步割取满蒙进而统治全中国提到了日程上来。这样一种主张出现在外务省内部，显示了日俄战争时期曾经进行过坚决的反战宣传的《平民新闻》所作的预言已经变成了事实。当时的《平民新闻》曾经预言过：“为了保卫日本必须确

保朝鲜的这种理论将会无止境地扩张下去。”

当时，主张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统治权的，不仅仅是军部、政府和官僚。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隈重信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这样说道：

要说作为销售日本产品的市场哪里最有希望？那么不用说是中国。因为文明程度低的国家要把所生产的物品销售到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去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只好把它销售到文明程度低于自己国家的地区去。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相距最近，文明程度又比中国高。……现在正在逐渐发展中的日本的各生产行业，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外，正把将近1亿日元的产品输出到中国。即便仅仅从输出工业产品这一点看，中国也是我日本重要的称心如意之市场。若中国因内乱而使商业陷于不振，交易被迫停止，则我日本经济上所受之损失将会十分巨大。革命（辛亥革命）发生以来，已经历时一月，即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大阪、神户的商店所受之打击已经非常巨大。如若此种情形持续一年以上，则以向中国输出为目的之企业主必将完全崩溃。

大隈重信的主张一方面表明中国已经成了对于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市场，同时也自我供认已经把确保中国这一市场作为日本的紧急课题。当时的大隈是主张依仗军事力量扩张经济的。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之后，上述这些环绕辛亥革命所暴露出来的对于大冶铁矿的野心，进一步把中国东北变成殖民地的动向以及确保中国市场的要求等等，就发展成了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如上所述，当时日本军部、政府和垄断资

本在中国问题上的意图基本上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对台湾人民的影响

辛亥革命也给日本的殖民地、台湾的人民以极大的影响。《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写道：

由于明治44年10月爆发之清国革命迅速而意外地取得了成功，清朝300年之帝政至此灭亡。若所谓中华民国建设之伟业一朝成功，则无庸置疑的是，革命思想将进而在本岛民众中弥漫渗透。由于彼等原是喜好骚扰，习惯于流血伏尸历史之民族，见此革命之成功，将很少有人不为之动心。此种情况乃自不待言。

据说是苗栗事件主谋的罗福星是一个曾在台湾和广东省之间几度迁居过的人（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台湾人民中为数很多）。罗福星也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于1911年重来台湾，与台湾本地人谢传香、传清风、黄员敬等人交往。他认为：

“本岛之施政蔑视并虐待本岛之居民。课以重税，掠夺产业，使之丧失生计，使之越发陷入悲惨之境地。若事至今日尚不觉醒，则前途莫测。尤其本岛之居民原本中国之民也，决无永远屈服于日本之道理。”罗福星“批评日本政府之施政，力说共和政治对于人民之幸福”，计划进行起义，为日本殖民地当局觉察而被捕。罗福星随身携带之手记，谈到了由11条组成的纲领。这份纲领劈头第一句就是：“在由五大洲六大洋组成之全世界中，占有其1/3之面积，同时占有最多之人口者，岂非我中华民国乎。”这份纲领谈到了日本在殖民地的统治的实际情形，其中有这样一些话：“凡有利可图之工商业，全部成为官营、专卖；对岛民谋取薄利之商业则

课以重税，压榨百姓，此乃吾人不胜愤恨之处也。”“仅有资本三、四百日元之小商小贩竟当作有1000日元资本之商人征税”“猪税每年要交2日元，屠宰税几角，营业税几元，养猪税1.5角，如在市场贩卖，则又得交纳贩卖税几分，如若支付前述各税税金费用，则必将入不敷出。悲惨之状实无甚于此者。”如上所述，当时日本在台湾之殖民政策破坏了台湾的民族工业，摧残了人民的生活。罗福星在他的手记中还说：“最可恶者乃地方警察官。彼等以收取保甲壮丁费等名目，从百姓处征收钱财，以饱私囊。彼等人物威风凛凛，凶如虎狼，实为村中之国王也。”“请看，征集讨伐台湾生蕃之人夫是何等不公平，何等残酷啊。在贫穷而又无男子之寡妇人家，不得不卖儿卖女雇用人夫以尽义务。被雇用之人夫不得不以四、五十日元价钱出卖自己之生命。”“特务、警察横行，此又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无辜百姓惨遭迫害含冤而无法申诉者，不胜枚举。”罗福星的记述说明了残酷的警察统治、保甲制度和讨伐将包括高山族在内的台湾人民抛入了怎样的苦难深渊。另外，罗福星的手记又说“作为地方名流之区长、保正、甲长之类也不实行公平之投票选举法，而违反民意之所归，录用适合警官自己心意之人。这表明了半封建的连保制度曾经是统治殖民地的有力工具。

罗福星在手记中要求废除上述封建性的殖民地统治，要求实行公平的选举，从这些要求中，以及前面提到的实行共和制的要求中，可以看到民主思想在台湾的成长情况。

此外，据台中警察厅的记录，据说南投地区有一台湾本地人沈阿荣也曾“有感于中国革命，曾计划伺机先在本岛中部进行暴动，袭击官衙，杀戮日本人，进而联络其他地方之

同志，相互协力，以摆脱日本统治为目的，从大正元年旧历8月起，组织革命党，纠集同志。”如上所述，中国大陆发生的革命，也给了处在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下的台湾人民以很大的影响，给了他们推翻殖民地统治和回到祖国怀抱的希望。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一贯敌视中国的辛亥革命，一方面是害怕在亚洲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同时也是因为害怕它会影响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特别是对台湾的统治。

日本的国内矛盾激化

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的政治势力成长起来，日俄战争又使日本背上了一身沉重的外债。因此，从日俄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日本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时期。日俄战争的军费中有6.9亿日元是借的外债，在这之后的1904年至1913年期间，包括东京、大阪等城市以及兴业银行、满洲铁道公司等半官方公司从国外所借之债务在内，日本导入的外国资本总共达17.67亿日元之巨。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的货币流通总量1.3亿至1.6亿日元的十几倍。由于引进了大量的外资，海运、造船、炼铁、机械、棉纺织业、矿业、对外贸易等工商业得到了发展。但是用来支付外资本利的硬通货，1912年仅与政府有关的就达7300万日元，海军方面的对外付款达2000万日元。除此以外，1912年的对外贸易有9200万日元的入超，1913年外贸入超达9700万日元之多，国际收支完全陷入了窘境。当时曾是正金银行首脑的井上准之助说道：“那时无钱支付所借外债之利息。想要再借点钱，却找不到名目。为支付所借债款之利息而征募外债，这种事情哪怕为面子计也是应该避免的。”（《我国的国际

金融现状及其改善办法》)

另一方面，日俄战争之后，政府按照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推行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其结果，出现了一大批工业资本家，同时，这些资本家在政治方面的活动加强了。根据上述这些阶层的要求，1908年，全国的商工会议所掀起了反对增税的运动。这些阶层所掀起的反对增税、要求实现普选的运动，进而把广大知识分子和城市里的小市民也卷了进去。于是，这一运动就和政府所推行的牺牲人民利益来处理战争造成的财政问题、增强军备、增加统治殖民地的费用等政策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双方的这一政治矛盾在“增设两个师团的问题”上爆发了。陆军之所以提出要在朝鲜增设两个师团，一方面是由于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这一新的情况，同时也是为了对付辛亥革命。这一点正如当时充当帝国主义论客的机关杂志《太阳》在其1913年1月号的社论中所说的那样：“增设师团以巩固帝国的所谓对华政策的立脚点。”这反映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及其对外的侵略政策导致了国内矛盾的激化。第二次西园寺内阁鉴于已经难于借到外债以及由于国内反对势力的抬头因而再要增加税收有困难，为此在内阁会议上否决了陆军的要求。对此不满的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单独辞职，致使内阁倒台。军部不仅这样专横，而且军阀巨头桂太郎从内大臣转而组织了第三届桂内阁。这时，要求“打破阀族，维护宪政”的政治运动扩大到了全国规模。运动的领导人是参加了商工会议所的工业资本家。桂太郎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忽而停止议会，忽而发表组成了以三菱为后台的新党的消息，企图搞垮护宪派。但是，1913年2月10日，几万群众将

议会团团围住，并和前来镇压的警察、宪兵发生了冲突。群众的示威游行发展成了大规模地焚烧和捣毁警察岗亭、袭击政府的御用报社等的政治暴动，并且也波及到了大阪、神户和广岛。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桂内阁终于倒了台。

前面已经谈到，这次运动的领导核心是想要扩展政治势力的工业资本家。由于参加这一运动的人民群众，在当局的镇压之下既无组织又无独立的政党，因而当桂内阁倒台，萨摩派军阀巨头山本权兵卫组阁之后，护宪派也立即和当局完全妥协了。但是，被称为“大正政变”的这次事件是一次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民主运动，它依靠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正如原敬在他的日记里所记载的：“如桂内阁再不辞职，估计非常有可能爆发革命性的骚乱。”

西门子贿赂事件

山本内阁成立之后，政局也并不稳定。军部大臣问题是“大正政变”的起因。以往，军部的大臣只有现役军人才能担任，山本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放宽限制，不仅现役军人，连预备役军人也能担任。但是“打破阀族”“反对增税”“实现普选”的运动继续在进行。1914年，暴露了一起“西门子事件”，这是海军中枢部门的大规模贪污事件。

西门子公司是世界上有数的几家生产武器的公司之一，它的总公司设在德国。这家公司将相当于合同款项3.5%至15%的钱赠给日本海军方面负责购买武器的人，从而一直垄断了与日本海军方面签订购买武器合同的权利。但是，海军当局却瞒着西门子公司和英国的维克斯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从该公司得到相当于合同款项25%的贿赂。西门子总公司知

道此事后追究该公司驻东京分公司的责任。这时，被解雇的分公司职员利比代尔偷盗了从总公司发来的追究责任的文件及其他有关证据，并对分公司经理进行恫吓，但没有成功，便将这批文件卖给了路透社驻东京记者布莱，随后回到德国去了。持有作为证据的文件的布莱也对西门子分公司的经理进行恫吓，为此，经理会见了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商讨对策，而海军方面却想把事情隐瞒起来。当时有关海军和陆军预算费用的使用情况，在“保守机密”的名义下是不公开的。

但是，1914年1月，利比代尔由盗窃文件罪在柏林被判处两年徒刑。1月21日的伦敦电讯报导了这一消息，其中谈到利比代尔所偷盗的文件中有与日本海军当局受贿有关的文件，日本的报纸也刊载了这一消息。在人民的压力下进行调查的结果，发现了比加斯公司及其代理商三井物产公司与日本海军当局之间，在关于建造金刚号战舰这件事上也有贿赂关系。受贿的人中包括舰队政治总部部长（发现时任吴市镇守府司令）的松本和中将、舰队政治总部第四部部长藤井光五郎少将等许多海军的高级军官在内。

西门子事件不仅反映了外国武器制造公司与日本海军之间的可鄙关系，而且从三井物产公司的干部也牵连在内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到，它也反映了日本的海军当局与垄断资本之间紧密勾结。以这一事件为契机，人民再次起来斗争。2月10日，3万群众包围了议会。政府原想通过镇压摆脱困境，但是，广大民众的奋起斗争引起了统治者内部的分裂。3月底，山本内阁倒台，4月，组成了第二届大隈内阁。操纵政治的“元老”们尽管很大程度上依靠垄断资本的支持，然而，他们却仍然不愿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自己的代表。为了

利用民众的幻想，以转移民众运动的目标，这次他们不得不起用了大隈重信。但是，“元老”们起用大隈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大隈保证解决增设两个陆军师团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在其他方面也保持了强有力的控制权。日本就是在上述这样的情况下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飞跃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在中国和朝鲜的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日本资本主义由于国内外矛盾的发展而正面临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首先反映在外债政策的破产上。这是由于日俄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扩张军备和强化对殖民地的统治所带来的结果。为此，政府过去一直采取为支付借款的利息而增加借款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也已经完全行不通了。大正初期的民众运动也是以上述资本主义的危机为背景，为反对帝国主义政策而展开的。正如前面谈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日本已经陷入了无法支付所借外债的利息的困境。

正面临着如此严重危机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当时的首相大隈重信在成立经济调查会的时候说道：

日本由于这次欧洲大战所得到的好处极大。其中好处最大的是军需品的订货。只要日本有制造能力，或者只要容易得到原料，就可以供应相当于今天3倍或5倍的

产品。另外，协约国将会乐意接受这种供应。由于我们不能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向其他中立国订货。

就是这样，日本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供应欧美各国的军需品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一次大战期间，日本的棉布生产增加了约15倍，铁增加了7倍，黄金储备增加了将近5倍。一般银行的存款总额1914年为15亿日元，至1919年增加到58亿日元，约比原来增长了3倍。特别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这期间飞跃地增长，奠定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基础。与此同时，在这过程中，还促进了垄断资本的发展以及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结合。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了从事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行业的大公司以补偿损失，发放补助金，免除营业税、所得税和输入税等方面的特惠待遇，通过上述这些办法来帮助垄断资本发展。1917年下半年与股金相比所得利润的比率是：海运业191%，造船业166%，棉纺织业98%。这样空前高的利润是在工人阶级尚未组织起来的前提下，通过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政策和加强劳动强度以及上面所说那种政府的补助而获得的。1917年，成立了日本工业俱乐部。这和以往的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商工会议所不同，完全是垄断资本家的团体，是垄断资本和政府进行交涉和联系的重要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欧美各国从亚洲暂时撤退所造成的空白向中国进行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大正2年），列强各国在中国的对外贸易的输出入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是：包括殖民地在内，英国占25.2%，日本占23%，美国占10.5%。在商品输出方面，日本接近第一位的

英国，占总数的将近1/4。而在当时，在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方面，英国达60750万美元（占各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37.7%，俄国约26930万美元（占16.7%），德国26360万美元（占16.4%），日本21960万美元（占13.6%），法国17140万美元（占10.7%），美国4930万美元（占3.1%）。日本虽然超过了法国和美国，但只相当于英国的约1/3。但是到1918年，在对华的商品输出方面，英国占17.1%，美国占16.7%，而日本则增加到了占43.5%，超过英美一倍以上，占了各国对华贸易的将近一半。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缺少对外输出的资本。正如1914年7月号的《中央公论》社论所述：“当往年我帝国乘百战百胜之威将势力范围扩大到满洲时，欧美各国颇露出羡慕之色，而在当今资本之战争中，帝国不得不大大输于列国。”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寺内首相背着外务省给了中国的军阀政府一笔达14.5万日元的贷款，称做“西原借款”，作为镇压南方的革命派的资金。以这笔贷款为基础，日本的对华资本输出也迅速地增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纺织工业的规模扩大到相当于原有的3倍（在华的纺织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继续扩大，1925年的纱锭和纺机的总数都比1913年增加了9倍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保住了诸如中国东北这样的坚固的势力范围，操纵了中国的棉纺织业和炼铁业（鞍山炼铁厂、汉冶萍公司）等重要工业部门，以及发动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等等。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成了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

同样，在对待朝鲜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把朝鲜的经济完

全改编成了殖民地经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朝鲜银行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由于乱发通货，造成物价飞涨。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内的米价高涨时，日本人就把朝鲜大米的收购加以垄断，并将大米运往日本，致使朝鲜的米价暴涨。这样的情况破坏了朝鲜人的生活，使朝鲜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拍卖家具什物”、“一家人东离西散”的惨景。在这样的基础上，于1918年修改了“公司令”，使得日本人经营的企业更加容易扩张。从此以后，拥有巨大资本的日本人经营的企业开始侵入朝鲜；另外，在朝鲜，逐渐出现了一批日本人的大土地所有者。

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矛盾的激化和俄国革命

日本帝国主义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局势，同时也将使日本帝国主义面临新的矛盾。这是由于下面三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环绕着向中国迅速扩张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加深了与英帝国主义以及和新加入扩张行列的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全面性的危机；（三）同时还由于日本国内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涨以及中国、朝鲜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蓬勃开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必然归宿。当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各国，由于环绕资本输出这一中心问题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争夺，由于以国内的工人阶级为主体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高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从而加深了矛盾。

而这种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发展成了以英法为中心的帝国主义集团与以德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争霸，并最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参战国家的国内矛盾并没有因为这次战争而得到解决，相反却随着战争的延续而变得更加尖锐了。俄国的革命人民于1917年3月（俄历2月）推翻了沙皇。其结果诞生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同年11月（俄历10月），在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进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从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不仅粉碎了国内外反革命的疯狂进攻，保卫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而且还在从革命胜利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内进行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了世界反帝斗争的中心。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在起着世界反帝斗争堡垒作用的同时，也为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揭开了新的一页。

抢米暴动与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1918年，日本国内终于爆发了抢米暴动。这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取得了迅速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进一步加深矛盾，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而进入总危机的结果。

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价飞涨。另外，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可是处在半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统治下的农业生产却停滞不前，加上大资本家囤积大米进行投机倒把，造成米价暴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升大米的价格是1角5分左右，

而到1918年初则已涨到2角钱，至同年7月涨到每升3—4角钱，同年8月每升大米的价格终于超过5角钱。当时，在劳动人民的生活费中，购买大米的钱是其中的主要支出。因此，米价飞涨直接危及劳动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在开始向西伯利亚出兵之后，囤积大米进行投机倒把之风更加盛行。

全国规模的暴动的起因是由富山县鱼津町的女工造成的。在此地，男人们夏天都去北海道方面的渔场打短工，留在家里的妻子则当港口搬运工人。米价的暴涨特别压迫了女工们的生活。7月23日，鱼津町的女搬运工们请求米商（也是她们正在搬运货物的货主）阻止将本县的大米运往外地，以使米价不再上涨。然而米商们却对此不加理睬。在上述请愿行动失败之后，从8月3日至8月6日，女工们在鱼津、滑川、东西水桥等地捣毁米商们的米店，甚至发展成袭击町公所、警察所的暴动。

这场斗争成了全国规模的人民起义的导火线。当有关事件的消息传开之后，从8月9日至8月15、16日，在东京、京都、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大城市，几万群众举行了市民大会，要求降低米价，进而发展成了捣毁和焚烧富豪人家和米商的暴动。爆发这场斗争的地区共有1道、3府、38县；暴动波及到36市，129町，146村；并和煤矿、矿山等地的工人斗争结合了起来。根据警察当局的估计，全国参加这次抢米暴动的人数达70万人，如果再加上参加过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的人数，则总人数将等于70万人的数倍，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全国规模的大暴动。特别在神户市，暴动群众烧毁了铃木商店。这是一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急剧地膨胀起来并和台湾的殖民地统治有着密切关系的商店。抢米暴动发展到如

此大的规模，显示了十月革命之后日本资本主义具有了新的矛盾，人民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统治者甚至出动了军队来镇压人民群众的这场斗争。据统计，政府共向 106 个町、村派遣了军队，被军队用刺刀戮死和用枪打死的群众共达 30 人之多。这清楚地表明了阶级统治的暴力性本质。

抢米暴动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的矛盾的发展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爆发的，它表明人民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通过这场斗争，诞生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

片山潜的活动和日本共产党的成立

1910年，政府以“计划暗杀明治天皇”的名目，将幸德秋水判处死刑。以此为开端，对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这就是所谓“大逆事件”。从那以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严冬时节”。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日本工人阶级的成长。另外，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时侨居美国的片山潜在1919年给名古屋的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俄国和匈牙利的革命给了世界的同志们以极大的教训。也使我们很好地看清了资本家的态度。他们通常是不肯交出自己的地位的”、“因而证明了社会革命在其过渡时期里同时需要建立由工人执政的政权。今天的左派即站在这一立场上。俄国和德国的经验使我们明白了依靠所谓的议会政策，事情并不顺利”。“我不是说要放弃议会政策，……今天我国的资本家也和俄国的资本家那样，他们既无爱国之心，又无爱民之

情，而是和外国资本家、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府相勾结，将自己国家的良民置于武装干涉之下而加以××（残杀？）。这些资本家既不爱国家也不爱自己国家的人民、自己的同胞。他们是一些为了保存自己的财产，而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不惜××（残杀？）自己的同胞百姓的人们。看来依靠议会政策，不可能使资本家放弃它的权力。俄国和德国的资本家证明了这一点。”

片山潜曾是一位在日本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巨大足迹的革命家。特别是明治末年，片山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但是，在1914年（大正3年）去美国之前的片山潜，由于错把当时正走着修正主义、议会主义道路的第二国际的立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因而抱有极其浓重的议会主义的幻想。但是片山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自觉地认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中，片山是早就看透了无政府主义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本质的人。当他从第二国际的影响下摆脱出来的时候，他迅速成长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列宁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道：

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进、最强大、最文明、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由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压迫、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屠杀、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那种具体的情况下，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的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

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用奴隶制的粉饰，对真理的隐瞒。现在的真实情况是：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自下而上地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破坏议会的、司法的、军事的、官僚的、行政的、市政的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拘禁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粉碎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役的尝试，只有这些措施才能保证真正使整个剥削阶级屈服。（引自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列宁提出的这一原则和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各国的解放运动以决定性的影响。不仅是侨居海外的片山潜，就是在日本国内，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对立也尖锐化了，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主义明显地取得了胜利。在上述这样的情况下，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民族大会上作出了建立日本共产党的决议。同年7月，日本共产党在东京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在这一年提出的党纲草案中把进行包括废除君主制（天皇制）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当前的目标，同时还提出了“从朝鲜、中国、台湾、库页岛完全撤军”的口号。这一纲领对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其他解放运动有着极为巨大的意义。（列宁在其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论战的过程中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下了这样的定义：“只承认阶级斗争的人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人有可能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思维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导致

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并且指出它将适用于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十月革命之后诞生的共产党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建立的。）

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

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出兵西伯利亚”，并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从而开始了它的对外侵略行动。这两件事是和在这之后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向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的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与帝俄政府的关系相当密切。这一方面是由于日俄两国都是保留有相当多“军事封建”色彩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有亲切感；另一方面也由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提高了民族觉悟，为了确保权益，日俄两国需要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为此，日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曾连着数次给了俄国以巨额贷款。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日本的统治阶级以巨大的冲击。十月革命虽然使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的假想敌人俄国军队土崩瓦解了。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统治阶级担心借给俄国的巨额贷款会因之不再偿还，同时也感到一种威胁，害怕在日本海的对岸出现一个工农的国家。日本的军部制订了这样的计划：占领贝加尔湖以东，在西伯利亚建立傀儡政权，控制西

伯利亚，并进而将满蒙置于日本的单独统治之下，同时在中国也取得压倒的优势。然而，帝国主义在扼杀社会主义革命和妄图把俄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这一点上虽然是一致的，但是它们之间又相互牵制，不愿意让自己国家以外的别的国家在俄国占据有力的地位。特别是对于地理上离得最近、军事上又处于最有利地位的日本占领西伯利亚一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极为警惕。另外，由于在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中间，一种传统的、主张和英美保持协调的因素在起着很大的作用。为此，连山县有朋等明治的元老和他们的忠实代理人——当时的首相寺内正毅也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而另一方面，尾崎行雄当时在征询了交询社系统的实业家和学者们的意见之后说道：“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时出兵西伯利亚实乃千载难逢之良机”（引自《号堂回忆录》）。交询社系统的资产阶级在“大正政变”的时候，曾经开展过“拥护宪政”、“打破阀族”的运动，代表了新兴的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意向。他们把出兵西伯利亚当作“千载难逢”的良机，这表明大工业资产阶级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成了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有力支柱。当时的民主主义分子在一部分工业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之下大发议论，认为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乃是军部的一个阴谋。而事实上推动出兵西伯利亚的不光是军部，还有大工业资本家，军部的出兵主张也是在大工业资本家的支持之下提出来的。从这以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在日本的部分统治阶级中间还残存着主张和英美协调行动的传统，然而在这期间的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都是由军部、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半封建的地主、官僚们所推行的。

干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战争也和日本的对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1918年年初，陆军迫使首相寺内正毅承认“为维持西伯利亚方面的秩序，日中两国军队有采取联合行动之必要”，并通过外务省向北京政府提出了缔结“共同防御军事协定”的要求。这一协定的内容是企图在“共同防御”的名义下，通过日本军队之手改编中国军队，由日本军队来管理、统制和控制中国军队。对于这一计划，即便是中国的军阀政府，也没有轻易地给予答复。日本陆军当局于这一年的3月派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宇垣一成到北京，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中国人民召开了国民大会，发表了反对与日本签订上述协定的声明。但是，宇垣等人强调“两国平等的立场”，强迫中国政府于同年5月签订了《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规定了有关供给武器、弹药、军需原料和军事费用，派遣军事教官，建立军事基地以及协同作战等方面的事项。其结果，中国方面用从日本得到的2000万日元的借款，建立了两个师的兵力，决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①方面出兵，但这一计划最后未能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计划将造成加强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并使中国军队成为日本的傀儡，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也未得到需要与其他帝国主义各国协调行动的日本政府的批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虽在于干涉俄国革命和控制西伯利亚，但这一行动同时又与妄图把中国变成附属国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在日本帝国主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期间，在西伯利亚的日军曾经南下，与北上的关东

① 即海参崴。——译者

军一起，对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为争取独立而展开武装斗争的根据地，进行了联合扫荡。从这一事件（珲春事件）中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出兵西伯利亚是和它对朝鲜这块殖民地的统治以及和对中国的侵略密切相关的。

欧美帝国主义各国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动向及日本人民对此所作的反应

对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开始时，欧美帝国主义各国采取了牵制日本的态度。但到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领导下与德国在布列斯特单独签订和约以后，帝国主义各国改而想采取由日、美、英、法四国联合出兵的方针。8月2日，日本政府宣布出兵海参崴。军部首脑乘此机会在3个月内运去军队7.3万人，占领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军事要地，出兵人数超过了商定人数1.2万人的几倍。但是，日本侵略军遇到了在革命中翻了身的苏联人的抵抗，从而陷入了苦战的境地，在各地所建立的傀儡政权也没有能够长期存在。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导致了抢米暴动的爆发，而且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一开始就遭到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东洋经济新报》在其社论中写道：

请看出兵之后的人心情况！即便仔细寻找，也看不到哪儿有战争气氛。我国同胞为什么正在西伯利亚作战？对于这件事，不要说身居战争后方的人民，就是出征的军队，上自司令下至士兵，恐怕也不理解。

另外，1922年，当时在苏联的片山潜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位日本的老革命家对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士兵的衷心劝告》的文章。

片山潜在这份劝告书里首先对日本士兵讲述了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意义，号召他们提高阶级觉悟，维护日苏两国人民相互之间的团结，他写道：

俄国的工人、农民在革命以后究竟有没有干过有损于日本或别的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事呢？当然没有。俄国的工人、农民过去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敌人是地主、资本家和反动的将军们。而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里，工人、农民都在向着这些剥削者作斗争。难道说日本的工人和贫农（佃户）不正在对资本家、地主和军国主义者作斗争吗？当你们自己回到家乡的时候，你们是站在哪一边呢？不用说，你们将站在自己阶级的一边，你们和你们的家属所属的那个阶级一边，也就是站在工人和农民一边。

片山潜在那篇劝告书中接着写道：

然而，日本的士兵兄弟们！在这里，在西伯利亚，你们却站在了俄国的地主、资本家、军国主义者一边！如果你们，也就是为了杀人而来西伯利亚的你们，即使不去积极地屠杀人民，你们来西伯利亚这件事本身，你们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军队出现在西伯利亚这件事本身，就是在帮助扼杀俄国革命的刽子手，同时也将给正在斗争的俄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增添越来越多的困难。片山潜指出，这场战争是旨在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帝国主义战争，他号召士兵向日本的统治阶级作斗争，他说道：

士兵同志们！请你们理解这一点，请你们回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反对日本的官僚、资本家、地主和军国主义者的斗争中，为了帮助你们的兄弟，为了帮助日

本的工人和农民而回到你们自己的家乡去！

接着，片山潜给日本士兵指出了行动的方向，他说：“通过日本的无产阶级的压力以及日本的革命的工人、农民的压力”促使日本帝国主义从西伯利亚撤兵，为此，“你们应该把自己的要求直接提到你们的军官面前，并把他们监视起来”，“你们应该成立自己的委员会，通过它来监视你们的军官们。”片山潜最后呼吁：“打倒军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士兵、工人、农民的联盟万岁！为日本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片山潜对日本士兵的号召无论从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这一点来看，还是从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呼吁日本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这一点来看，在当时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十月革命对出兵西伯利亚的日军的影响

十月革命同样给了出兵西伯利亚的日本军队以很大的影响。当时的首相原敬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军事当局的报告，报告说：“居住在过激派(布尔什维克)势力旺盛地区之我人民，有受过激派之感染者，彼等有向我之守备士兵述说其情况之虞。”另外，西伯利亚远征军宪兵队的报告说道：“由于上级对下级的言论和行为不当，或者由于下级缺乏克制的能力，往往会产生过激的倾向。”1921年曾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驻扎在朝鲜的步兵第73营的中尉高坂与“过激思想”发生共鸣，为了投奔“过激派”，和他原来的部下名叫泷泽的巡警一起从驻地逃跑，后来在逃跑途中被捕。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政治上迅速成长起来的日本工人

阶级也开展了反战运动，反对进行干涉俄国的战争。在1922年的第三届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要求承认工农俄国》的决议。日本劳动总同盟根据伦敦的不干涉俄国委员会的要求，于5月28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并将这两项决议提交政府，这两项决议是：

“一、我们反对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驻军西伯利亚，要求立即撤军。二、我们鉴于世界经济之现状，要求尽快开始与俄国通商。”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于6月22日成立了不干涉俄国同志会。不干涉俄国同志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写道：

“使全人类沉浸在血泊中的世界大战最清楚地证明了旧的秩序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证明历史要求创建一套新的秩序。工农俄国应上述历史的要求而生，它一边在与各种困难作斗争，同时正在努力巩固新秩序的萌芽。”这反映了不干涉俄国同志会认识到了十月革命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这份宣言谈到了这一运动所采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即“全世界无产阶级早就期望工农俄国取得发展，今天仍然这样期望”。宣言接着指出：“日本当局出兵西伯利亚，帮助反革命。在干涉俄国的各国中，日本是唯一的一个长期赖在那里不走的国家。”宣言要求日本政府：“一、立即无条件地撤退驻扎在俄国的日军；二、立即开始对俄国的通商贸易；三、对俄国的饥荒提供救济金和赠送物品。”日本政府和俄国的赤塔地方政府预定9月上旬在中国的长春举行有关西伯利亚问题的会议。这时候，工人运动领导人中的先进人士发表了一篇《无产阶级对军阀外交的抗议书》，内容如下：

一、反对对俄国的任何干涉行动，要求立即无条件地承认俄国；二、立即从俄国的全部领土上无条件地完

全撤军；三、坚决反对取得任何领土，不管是以收买的
名义或其他名义；四、立即开始对俄通商；五、反对秘
密外交，反对阻碍日俄两国民众友好的任何不合理要
求，反对任何旨在为少数资本家谋利益的取得权益的尝
试。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取得了迅速的
发展，它的出兵西伯利亚乃是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
取得了胜利的国家所进行的武装干涉和侵略战争。与此同
时，也是与加强对朝鲜和中国的殖民地的统治有密切关系
的一场战争。但是由于遇到了苏联人民的抵抗，遇到了朝鲜
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抵抗，更重要的是由于以抢米暴动为代
表的日本国内矛盾的爆发，由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
人民觉悟的提高，日本帝国主义的这场侵略战争以惨败告
终。

四、三一独立运动和五四运动

朝鲜人民的三月一日起义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对朝鲜这块殖民地的统治
加强了。与此同时，朝鲜人民也加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斗争。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朝鲜人民以极大的影响。
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运动和和平运动在全
世界蓬勃兴起。在这中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民族
自决宣言》，这一宣言也给了朝鲜人民以影响。虽然威尔
逊的这一宣言本身乃是美帝国主义的新的世界政策的基石，
其目的在

于使人民抱有幻想。

1919年2月8日，在日本的朝鲜留学生，在东京举行集会，并发表了独立宣言。另外，在朝鲜国内，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及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与宗教有关的人士推选出了33名“朝鲜民族的代表”，并由他们起草了一份独立宣言。宣言原订于3月1日在群众面前发表。然而到3月1日那天，这些代表却不敢在群众面前露面，而在一家名叫泰和馆的饭店里聚会，只是把宣言读了一遍，随即打电话给总督府警务总监部，自己投案进了监狱。他们不敢呼吁人民采取革命行动，企图依靠欧美各国的援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理性”，通过“请愿”来达到独立的目的。这件事证明朝鲜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不具备领导独立斗争并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的能力。但是当它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人民群众立即取代它们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在3月1日这一天，聚集在塔洞公园的群众宣读了青年们散发的独立宣言，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开始了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群众很快增加到几十万人。他们在日本军队、宪兵、警察的血腥镇压下并不屈服，一路上发表演说，同时，商店停业、交通中断。日本的统治秩序完全瘫痪。这一天，在平壤、南浦、安州、宜川、义州、元山等地都举行了高呼独立万岁的示威游行。即使根据日本警察当局的统计来看，从3月1日起到5月底的这段时间里，在全朝鲜218个市、郡中间，有217个市和郡爆发了1491次示威游行和暴动，参加的群众达200万人以上。三一独立运动发展成了一场名副其实地席卷整个朝鲜的大规模斗争。这场斗争在3月中旬以前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的，而特别在3月中旬以

后，由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所举行的暴动成了这场运动的核心。朝鲜人民袭击日本的官府、警察所等统治机构，撕毁税收帐目和土地帐目。朝鲜人民超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开始走上以工人、农民为主力并有知识分子和商人参加的民族革命斗争的道路。

对于朝鲜人民这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斗争，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即使从日本方面的统计资料来看，从3月1日起到5月底为止，朝鲜人民的受害情况如下：有7509人被杀害，15961人受伤，46948人被捕。在朝鲜的水原郡堤岩里，日本军队让村里人全部集合在教会里，然后开枪扫射并放火把全村人都活活烧死，类似这样的大屠杀事件到处都发生。其残暴程度，甚至连当时的朝鲜总督府内务总监山县伊三郎都在他的报告书里写道：“我对官宪方面对此次骚扰所采取的过火的镇压方法感到忧虑，并为自己无权就此事向各军官发布命令而叹息。”然而，不光军队采取了这样的残暴行动，就是在山县伊三郎直接负责的警察所里也是不断地对朝鲜人民施以酷刑的，例如把钢针插进肉里，用烧红的铁棍烫身体，往鼻子里灌水等等。然而，如此的酷刑和残杀也并没有能够阻止在这之后的朝鲜人民斗争的发展。朝鲜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从三一独立运动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5年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

1919年5月4日，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运动，这场运动对于以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1915年，日本的大隈内阁乘占领中国山东省青岛这一原先德国的殖民地的机会，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妄图统治中国。《对华二十一条》的内容如下：（一）把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二）延长旅顺、大连以及满洲铁路的租借期限；（三）将汉冶萍公司（经营长江中游的汉阳炼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转为日中共同经营；（四）招聘日本人担任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顾问，合并地方警察；（五）日本人可以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拥有土地，等等。

另外，日本的寺内政府为了援助北京的段祺瑞军阀政府，镇压广东的由孙文建立的革命政权，自1916年8月至1918年9月期间，提供了34起总额达2.4亿日元的贷款。其中包括：（一）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二）同一银行的第二次借款；（三）有线电信借款；（四）吉会铁路（自中国东北的吉林至朝鲜的会宁）借款；（五）吉会金矿森林借款；（六）满蒙四条铁路的借款；（七）山东省的两条铁路的借款；（八）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借款等，这笔总额达1.45亿日元的贷款被特别称作西原贷款，是首相寺内的“私人特使”西原龟三和藏相胜田主计决定的，此事连和外相都没有商量过。西原贷款和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两个方面，是互为表里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这一贷款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起来的资本大量输出到中国，以便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这笔贷款的大部分被挪用作为镇压南方革命派而进行的战争的经费以及段祺瑞的政治活动经费（这笔贷款的利息高达8分，为此遭到以五四运动为起点

的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1919年5月在美国的提议下成立了日、英、美、法新四国借款团以及由于召开了华盛顿会议，日本妄图一手操纵中国财政、经济的企图未能得逞。另外，由于这笔贷款的担保不可靠，其后在日本国内产生了对华贷款债务的清理问题。那时候，大藏省储金部动用了邮政储金等国民的零星存款来顶替对华贷款银行团的款项，为此而遭到了国民的强烈谴责）。

中国人民进行抵抗并呼吁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 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面对日本政府的强硬要求，北京的军阀政府本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然而中国人民坚决地进行了抵抗。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开始时是一个包括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运动，后来则发展成了有广大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经过这场斗争之后于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发表了一份《告日本国民书》。它指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只对日本的统治者有利，日本人民也将被推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北京学生的《告日本国民书》呼吁说：“日本国的国民们，你们不要以为我国人民什么事情都对日本抱猜忌的态度。”“要知道贵国国民的不利甚至可能比我们中国国民更甚。”“显然，日本政府要求在中国到手的特殊权益也都是掌握在贵国的军阀官僚巨头们手中的。对于这些特殊权益，贵国的普通百姓不用说是既不能加以议论

又不能触及的。对在中国的各种事业的投资所获得的利润也只是为三井、三菱等大资本家们所有，贵国的身无分文的普通百姓自然是不会妄想从中得点残羹剩饭的吧。”《告日本国民书》指出了人民的利益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接着它还指出：“如今贵国的军阀，一方面以侵略主义招致了世界各国对日本的怀疑，并把各位推进了危机；另一方面又想以爱国的说教诱骗各位牺牲生命财产去与别国作战。如果各位不是蠢人，总不会错误地附和贵国军阀们的爱国说教，甘心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和财产，以充当为军阀谋利益的工具的吧。”（筑摩书房出版《现代革命的思想·中国革命》）

就是这样，在五四运动中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和日本人民明确地区别开来的。中国人民还警告日本人民正处于危险之中，并呼吁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另外，如果我们回顾在这之后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民此刻对日本人民所提出的警告不幸而言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给中国、朝鲜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祸害，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日本人的反应

对于中国人民的五四运动，5月6日的《大阪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评论，其中说道：

以往本报曾不知多少次地批驳了中国人排日之错误政策，而今仍然如此。如患歇斯底里病的女人疯狂发作那样无可救药，中国人使国家陷入自缢式的狂态之中，此亦无可救药矣。

对此，当时主张“民本主义”的“大正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吉野作造发表了一篇题为《请勿谩骂北京学生们的行动》的评论，显示了对五四运动的理解。1915年当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时候，吉野曾对此发表过评论，他说道：

总而言之，我相信，此次的对华要求，从表面来看，或者有侵犯中国主权，使中国丢脸之处，然而从帝国的立场来看，则大体上可说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且抓住了与中国谈判此事的适当时机，另外从与西洋各国的关系来看，也是选择了一个颇为合适的时机。从加强我帝国将来之对华地位来看，确是一个极合时宜之举。从上文可以清楚地看到，吉野作造的这种立场是对“帝国立场”的全盘肯定。当时，欧美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从亚洲后退了。而这一时期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扩张的所谓“适当的时机”。吉野的这种思想来源于如下这种看法，他在1918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中说道：

总之，我们不失为东洋之先进国家。我们确在东洋各民族中占有最杰出之地位。我们最先输入了西洋之文明，用它整顿了国家，使国家之威力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仅从这一点而论也不能不认为我民族具有杰出之能力。我们只是希望，享有如此特别天赋之我日本国家，能进一步自觉其在文化方面之巨大使命，并将此作为今后发展国运之理想。

吉野在这里把日本民族看作“东洋最杰出的民族”。这是继承了福泽谕吉的看法。福泽认为日本之所以比朝鲜、中国杰出，是由于它摆脱了亚洲的顽固守旧作用，接受了西洋文明之故。吉野作造认为，日本民族是杰出的民族这种看法的

“正确性”已由帝国主义的发展所证实了。

吉野后来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发展所触动，曾力图理解这一斗争。这一点在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的那篇《请勿辱骂北京的学生们》论文里也有所表露，然而就在那篇文章中，吉野还说道：

邻邦中国的普通百姓恐怕并不知道，在我国除了有一个“侵略的日本”之外，还有一个“和平的日本”。

如果知道这一点，他们是会停止排日的呼声的。

但是，正如在前文所谈到的那样，在五四运动中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明确地加以区别的，他们当时洞察了日本国内矛盾的本质。也正是由于看清了这一本质，他们才加强了抗日斗争。仅仅对五四运动表现出一点“能理解”的态度是不够的，要与有这么高认识的中国人民团结斗争，首先必须推翻日本国内的天皇制统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体制。吉野作造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以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性，他的看法最终将完全允许帝国主义进行侵略。

日本共产党的立场和水平社的活动

正如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的那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于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在同年制订的党纲草案中提出了打倒天皇制以及“从朝鲜、中国、库页岛完全撤军”的目标，这反映了日本人民反帝斗争的要求。另外，与日共同一年成立的今天的部落解放同盟的前身——水平社，在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与朝鲜人合作的建议，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与反对歧视朝鲜的衡平运动取得联系的决议。

此外，水平社于1923年发表了一份《对国民教育的意见书》，谴责军国主义教育。当时，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政府强调在教育方面实行军国主义化。当于1917年9月设立的“临时教育会议”开会时，首相寺内正毅发表讲话说：

我帝国现在蒙受兵火之惨毒程度虽不如参战国之巨大，然关于战后之经营则前途多难。当代之际，乃只有进一步发展教育，宣扬国体之精华，培养坚实之操念，确立自强之方策，以完成我皇之上事业。

在同一个时候，陆军大臣田中义一说道：

无论是教育敕语还是明治15年皇上赐给军人之敕谕，其主旨均无二致。……军人之精神必须成为国民之精神。

这样一种教育方向被大为强调。在当时的小学教科书里，充斥了如下的词句“要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强大帝国的一个坚强的百姓”，教科书里还有这样的内容：

大日本、大日本，我们8000万国民，把天皇陛下奉作神灵，对天皇陛下敬若父亲。大日本、大日本，从神的时代到如今，我们从未败给敌人，我们的国光，与日月共明。

水平社的《对国民教育的意见书》写道：

自不待言，我们的一切主张都是为了打破因循守旧，为了解放世界上受虐待的人们，使他们生活在欢乐的天地里，都是以人类的平等、人类的爱为着眼点的。认为只有解放了被压迫者才能有真正的人类的爱。对于当时的国民教育，《意见书》认为：

今天的所谓国民教育其目的全在于建立一个虚伪的

国家，培养虚伪的国民。……试以小学教育为例，要说修身课所教的是什，一句话，是在教人杀人。利用斗争和权势，赞美垄断国家政治的所谓英雄豪杰，要不就是赞美互相杀伐的战争，进而把排外主义、种族歧视等方面的因循守旧作风当作国民应有的道德。”“日本的国民教育是一种闭关自守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只是为了使日本人具有在战争中必胜的思想。换句话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倡：日本要成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国家，对别的国家都要歧视。

《意见书》批判了这种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教育，并提出要求说：

请务必废除这样的教育：仿佛只有能征善战才是国民的义务似的。

从这份《意见书》，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国民教育的目的是把人民引向支持统治者的帝国主义政策，同时也使人了解到是谁认清了当时的国民教育的本质，并站起来加以反对。

1923年对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等进行的屠杀

不幸的是，连上述正确的主张在当时也没有完全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不仅如此，统治阶级的看不起朝鲜人和中国人，赞美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思想却通过国民教育在人民群众中间深深扎了根。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的时候，日本的统治者残杀了以共产主义者为首的大批“危险人物”，残杀了大批朝鲜人。河合义虎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和先进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在东京的龟户地区被杀害，另外，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被一个名叫甘糟的宪兵大尉杀害。根据当时是习志野骑兵团

的见习士官越中谷利一所写的回忆录，这个团曾于1923年的9月2日中午出动执行任务，除全副武装、荷枪实弹之外，还带了够两天用的干粮以及备用的马蹄铁，于当天下午2点左右到达龟户车站，把朝鲜人从超满员的火车上拖下来进行残杀。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景：“从日本人的逃难的人群中响起了高呼万岁的欢呼声，人们还高呼‘国贼！把朝鲜人全部杀光！’等口号。”（引自1963年9月1日出版的杂志《朝鲜与日本》）另外，在当时的许多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朝鲜的不法之徒疯狂捣乱，往食品和饮料里施放毒药和火油”（引自《北海时报》）、“因朝鲜的不法之徒为非作歹，东京市民为不安所笼罩。往水井里投放毒物，到处抢劫、奸淫、掠夺，为所欲为。”“约3000名朝鲜的不法之徒正从大森地区向东京方向移动。”（引自《河北新报》）为此，许多朝鲜人被日本的民众所残杀。这类谣言不用说是日本的统治阶层散布出来的。当时永井柳太郎在国会里揭露内务省的警保局长后藤文夫曾亲自给各地警保方面的长官打了一份电报，电报说：“朝鲜人利用东京一带发生地震的机会，在各地放火，以达到捣乱破坏之目的，现在东京市内正有人拿着炸弹，在房屋上浇上火油后放火烧房。已在东京府所属的部分地区施行戒严令。为此，希各地亦进行周密的侦察，对朝鲜人的行动严加取缔为盼。”下令打这份电报的是内务大臣水野鍊太郎，“抢米暴动”时负责镇压的也是内务大臣，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时，镇压的是朝鲜总督府的政务长官。内务大臣水野从“抢米暴动”和“三一独立运动”中，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他非常害怕这种斗争。为此，日本的统治阶级就欺骗人民，唆使他们去袭击朝鲜人民。日本的

民众之所以会受统治者的骗，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这说明通过国民教育等等方式，帝国主义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民众的头脑里扎了根。不用说，蔑视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思想在上述这种帝国主义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状态成了在这之后不久发动全面性的侵略战争的基础。

五、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生活日益困苦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以前东北的 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二十一条要求”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与此同时，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清朝政府曾长期把朝鲜作为“封禁之地”。而进入19世纪以后，清朝走向衰落，加上朝鲜放松了闭关自守政策，在这同时，朝鲜北部的农民为了逃避过于严酷的封建统治，从朝鲜移居到鸭绿江、图门江对岸，从事处女地的开垦工作。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的时候，俄国军队大举侵入东北，这时，居住在中俄边界附近的大批中国人逃往吉林避难，为此，朝鲜的移民有了增加。但是，即便在俄国军队撤退之后，中国也没有强迫朝鲜人归化，而是把他们当作佃户使用，企图借此在开垦处女地方面取得成绩。由于朝鲜人有耕种水田的特长，这时候朝鲜人是很受中国人欢迎的。

后来，经过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把朝鲜变成了殖民地。1906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设立“韩国统监府”之后不久，就在图门江对岸的间岛也设立了“统监府派出所”。后来，随着朝鲜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原有的朝鲜社会制度不断被破坏，许多朝鲜人开始移居到间岛^①。另一方面，当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之后，就把中国的东北作为它的下一步的侵略目标。由于这一缘故，中国地方政府把移居东北的朝鲜人看成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开始对朝鲜人警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间岛问题”。1928年2月，日本的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所编《满洲与朝鲜人》一书写道：

自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所谓二十一条之后，事态进一步恶化。朝鲜人在满洲将所得之土地所有权转让给日本人。对于这件事，中国方面极为重视。为此，在这之后，中国人开始对朝鲜人的行动进行监视。

而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不顾朝鲜移民的愿望曾经想让他们充当侵略中国的尖兵。

1932年5月，驻奉天的总领事赤塚曾写了一份题为《关于在满洲的朝鲜人问题》的报告，其中说道：

……发展水稻种植业，一方面直接有助于对朝鲜人的统治，而另一方面可把满洲变成大米产地。其结果，当一朝有事之时，将为国家带来莫大之贡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

另外，由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里的朝鲜总督府派遣官于1922

^① 间岛是我国东北与朝鲜接壤的图门江北侧的汪清、延吉、和龙、安图、珲春等县的总称，即今延边自治区。——译者

年5月所编的《居住在北满的朝鲜人的状况》一书指出：

总之，居住北满的朝鲜人，并没有如所传的那样受到中国官民的迫害，他们并不感到居住受到了威胁，他们过着比较稳定的生活。如能给他们提供相当数量的财政方面的援助，将来可望取得可观的发展，相信这将给帝国发展北满的事业带来极为有利的前景。

但是，居住在东北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关系，从这时候起直到很久以后，仍然是良好的。尽管这种关系是以中国的地方军阀和地主的统治和剥削为前提的。《居住北满的朝鲜人的状况》一书谈到：“移居北满的朝鲜人，其实际情况是，并没有受到社会上所谣传的那种中国官民的迫害，他们并未感到居住受到威胁。”1922年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里属于朝鲜总督府的派出官员林善十郎所写的报告《大正11年中的北满朝鲜人》也说：“中国警察大抵态度稳健，居住在北满各地的朝鲜人都大致表示满意。”“中国人民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有采取严酷的举动的，但看来并没有采取特别的排斥态度。”另外，1926年3月间岛的一位名叫末松的警视在他所写的《关于朝鲜人移居间岛、琿春及与上述接壤地区情况的调查》中也说：“中国不管归化与否一般都给予移居的朝鲜人以土地所有权。”“移居的朝鲜人实际上都拥有土地，大多感到生活稳定。”就是这样，即使在间岛这样的朝鲜人占居民大部分的地区，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之前，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良好的。尽管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二十一条把南满、东蒙条约强加给中国，然而中国人和朝鲜人之间仍然一直保持着一种独特而安定的土地关系。

居住东北的朝鲜人的处境恶化

上述这种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比较良好的关系，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具体实行，也逐渐恶化起来。

1920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让驻在间岛、奉天、吉林、长春、哈尔滨、海参威等地的领事或总领事兼任“朝鲜总督府的事务官”职务，并在满洲和西伯利亚等地派遣常驻当地的“朝鲜总督府派遣官”，从事收集情报的工作，但是未能取得充分的成效。为此，于1923年11月在汉城的中枢院召开了由外务省、关东厅、拓殖局、朝鲜总督府、驻满蒙领事参加的联合会议。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一次领事会议”，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会议上，主要讨论了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的国籍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根据《驻在满洲的负责朝鲜问题领事官员联合会议报告》，关于国籍问题，会议的主持者作了这样的说明：

……在朝中边境接壤地区，彼此往来频繁，所谓归化人（加入中国籍）与非归化人之间，不仅无任何实质上之差别，而且与居住在国内的朝鲜人也毫无不同，根本没有将其中任何一人作外国人看待之事。这不仅给帝国警察取缔朝鲜人之抗日运动方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而且如同间岛地方那样，帝国之特殊设施的根基有被破坏之危险。

如上所述，所谓国籍问题，主要是为了对付东北地区朝鲜人的抗日运动的。关于土地问题，前述资料里有这样的说明：

我们认为，土地的问题，不仅是朝鲜人的问题，而

且对于我日本国民在满洲之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必须与之解决的问题。倘若满蒙条约所规定之商租权^①得以实施的话……

由此可见，所谓土地问题，是企图利用移居东北的朝鲜人的土地所有权，获得日本所要求的商租权，把朝鲜人用作日本人进行扩张的开路先锋。

在这次会议上，环绕上述两个问题，间岛总领事与奉天总领事之间发生了意见上的对立。间岛总领事认为：

……如果让朝鲜人拥有日本国籍，则即使在他们（朝鲜人）去中国后有不法行动，由于他们有日本籍，我们也可以进行取缔。

他主张朝鲜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日本国籍，奉天总领事则认为：

诚然，如果不允许移居东北的朝鲜人归化中国，则由于他们是日本籍，我们始终可以按照日本的法律取缔他们的不法行为的名目与中国方面交涉，然而如果中国方面对此毫无诚意的话，那末也就只能对中国讲讲道理而已，并不能达到取缔朝鲜人不法行为的目的。

奉天总领事主张说：

我认为允许朝鲜人归化也好、不允许归化也好，结果恐怕是一样的。

会议最后决定，对于东北朝鲜人国籍的变动不予承认，朝鲜

^①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后，通过《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即民四条约）强行夺取了所谓商租权，即“日本臣民在南满洲为建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场）或为经营农业，可商租其需用地亩。”——译者

人的国籍在任何情况都由日本掌管。

另外，关于土地问题，间岛总领事认为，不应把在满洲的朝鲜人的土地问题和日本人获得商借权的要求分开来，应该利用东北的朝鲜人事实上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这件事，要求中国方面让日本人和朝鲜人都享有商租权。对此，奉天总领事认为，应把间岛地区的土地问题和日本人要求在东北南部享有商租权问题区别开来，只要求日本人享有商租权，至于朝鲜人的土地问题，只要在“事实上”享有土地所有权就行了。他们两人在如何谋取日本人在东北的进一步扩张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是由于间岛总领事所管辖的地区居住着大批朝鲜人，他想让他们充当侵略的尖兵，而奉天总领事则需要和中国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协调关系，为此，他们两人所主张的扩张方法多少有些差别。这次会议虽然未能就土地问题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作出了不同意朝鲜人变更国籍和加强取缔东北朝鲜人的不法行为、“防止赤化”的决议。此后，便强硬地主张日本对东北朝鲜人拥有“主权”。

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于1925年与中国的东北军阀缔结了《朝鲜与奉天省间关于取缔违法的朝鲜人的协定》，即所谓《三矢协定》，目的是给中国的东北军阀施加压力，让他们去镇压东北境内朝鲜人的抗日运动。这个所谓《三矢协定》，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由于朝鲜人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从鸭绿江、图门江对岸的中国境内向朝鲜出击；另外，过去在镇压这种出击时，日本的军队和警察往往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引起中国方面的反感，这一协定也是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协定是朝鲜总督府的政务长官下冈警察局长三矢出差去奉天（现在的沈阳），与奉天的警察厅长于珍会谈之后

缔结的。协定的内容有两点：（一）在执行边境警戒任务时，两国的警察和宪兵禁止互相越境；（二）对于属于东边道管辖范围内的朝鲜人的抗日努力，由中国方面积极清剿。但是，当上述协定生效、朝鲜移民的处境恶化时，日本方面却又提出了所谓“压迫朝鲜人”的问题。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有着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一方面想让中国的东北军阀取缔东北境内朝鲜移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又想把东北境内的朝鲜移民看作自己的“主权”。于是当受到日本方面压力的东北军阀加强了对东北朝鲜人的抗日武装斗争的镇压时，日本方面却又强调起“侵犯”它的“主权”来。这种现象是由下述情况产生的：当时朝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的东北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而东北军阀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地方政权。因此，从《三矢协定》“取得效果”时起，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强调起“在满洲的朝鲜人受中国警察和宪兵的压迫”来。从而出现了前面已经引用过的那本《满洲与朝鲜人》一书所记述的那种情况：“当朝鲜人与中国人之间万一发生问题时，日本领事馆立即插手这一事件，以朝鲜人享有治外法权为理由，使中国的警察、宪兵陷入极大的困境。于是，中国人说，要对朝鲜人进行限制。”“中国人解释说，朝鲜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日本人侵略满洲的尖兵。例如，只要朝鲜人移居到满洲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建立有一个村落，日本方面必定在那里设立日本的领事馆及警察署，并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而挑起种种问题，以达到侵犯中国主权的目的是。”就是这样，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原先情况较好的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的处境也逐渐恶化了。

第五章 军国主义国家 基础的建立

一、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的时代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矛盾的爆发，导致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此以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无可挽回的“总危机”的时代。随之而来的革命风暴，到1922年已波及到全世界。世界各国都成立了共产党，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有了发展，在亚洲则有中国的五四运动、朝鲜的三一革命起义和日本的抢米暴动。这些都成了在这之后的斗争的出发点。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也助长了垄断资本方面预防性的反革命运动。1922年，意大利成立了法西斯政权。后来，这种类型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就在世界各地出现了。日本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就是这种动向的一部分。

在1922年开始了反革命法西斯运动以后，从1924年到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表面上出现了“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稳定”。特别是美国，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得到的巨大战争利益为基础，在大战结束之后，它的经济仍然继续发展，尽管各国都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而在这时，美国通过以资本输出来支持欧洲各国复兴的办法，取得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但在当时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阶级对立也激化了。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危机。这场危机激化了帝国主义制度的各种政治矛盾，使资本主义各国内部工人、农民的革命运动高涨起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以这次危机为转机，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矛盾的激化，促使统治阶级疯狂地准备镇压人民斗争和发动侵略战争。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满洲事变，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1933年，在德国成立了希特勒政权。这两个事件，意味着帝国主义企图以法西斯主义和侵略战争来寻找摆脱空前危机的出路。世界大战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这样，在资本主义世界，随着矛盾的激化，镇压人民和准备战争的倾向加强了。而在这个时期，特别是由于德国希特勒政权的成立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策源地。

凡尔赛和约和纳粹的抬头

1918年11月，德国的工人和士兵在各地组织了苏维埃，通过革命推翻了帝制，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德国

军部和垄断资本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和修正主义者，害怕在德国出现人民政权，联合起来镇压革命力量。和约签订后，德国的殖民地被夺走了，军备受到了限制并付出了大量赔款，但另一方面，为了使德国成为对付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屏障，英、美、法等参加凡尔赛和约签字的各国把德国的垄断资本、军部、官僚等基本力量保存了下来。这就埋下了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复活的祸根。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则同这些势力勾结起来，为镇压国内革命力量效尽犬马之劳。

凡尔赛和约的结果，德国作为战败国，被要求偿付1320亿马克的赔款，相当于全年煤产量的1/3的煤炭和原有商船的90%被夺走，还被要求在今后的5年之内建造总吨位达100万吨的新船交付战胜国。著名的矿区萨尔，被置于国际管理之下。这意味着德国在作为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的凡尔赛体系下，陷入了半从属状态，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打算通过施加压力以便向德国进一步索取赔偿的法帝国主义，在1923年对德国的鲁尔地方实行军事占领，激起了德国人民的愤怒。

德国纳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抬头的。法西斯主义的实质，首先在于乘着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机会，反对国内革命力量的兴起，保护垄断资本主义，通过蛊惑宣传，把人民群众的不满，引向沙文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方向。在1920年2月制定的纳粹的党纲中，表面上提出了包括“否定贪污腐败的政治”，限制不劳而获和利息，托拉斯收归国有等内容的“社会主义”要求。一方面，企图通过这种欺骗宣传来拉拢农民以及由小市民等组成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则又宣传说，共产主义、苏维埃俄国、工人运动等全都是

“犹太人的”，提出通过“全德意志”（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各个地区）的统一来组成“大德意志”、反对凡尔赛和约，提出民族自治权和自卫权等口号，鼓吹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

这样，纳粹法西斯的实质，就是通过“反资本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蛊惑宣传，企图把国内矛盾引向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向。这种动向，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矛盾激化，而愈加明显。

二、中国的反帝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升为世界上头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开始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结果使它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同时，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工人阶级的成长，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解放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革命运动，也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而进入了新的阶段。虽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那以后仍处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但正如毛泽东

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中国革命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初主要是由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所参加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但是后来则发展成为包括了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通过这场斗争，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基本任务。从此以后，各地的工人运动大大地发展起来。毛泽东这时也精力充沛地参加了工人运动。1921年，以安源煤矿大罢工为开端，党领导湖南省的工人举行了十几次大罢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工人运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了。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建设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外，还通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但在大会的决定中，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土地革命等重要问题却没有提及。在这个时期，虽然工人运动继续取得很大的发展，但还没有同农民的斗争有力地结合起来。而这个时期大罢工的发展，招致了军阀的大屠杀，以此为转机，产生了必须武装人民并使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农民起义结合起来的思想。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分歧和围绕着土地革命的斗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国当前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点已经确定了，而在这次大会上，为了具体地实行这一革命的需要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导，同孙文领导的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成了中心的议题。在大会上，出现了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进行革命，否认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反对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等同这种“左”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斗争。既主张统一整个革命力量，又强调坚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和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大会的决议中，反映了这一观点。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在这次大会上，仍未解决毛泽东主张的土地革命和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这一点，即使在1925年1月于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同样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以五卅事件为转机，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使其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1923年9月，毛泽东就已经在湖南省衡山一带组织了农民协会，其后在湖南省各地发展了农民组织，开展了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1925年，根据这一斗争的经验，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农民运动的干部。这个讲习所，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年，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当时的中

国现状，同时也是一个把军事训练列为正课的指导土地革命的训练场所。在1926年3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只有农民，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最多、最可靠的同盟军，强调了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土地问题的重要性。1926年初，毛泽东视察了各地的农村，从事农民运动，在1927年3月，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本书中，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轻视土地革命的倾向和只依靠同国民党的合作，而不支持当时日益高涨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政策。

全国工人运动的激化

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革命形势处于高潮的时候实现的。孙文在1925年的3月逝世，但全国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继续高涨。同年5月1日，在广州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从1925年2月起，发生了上海日资纺织厂反对解雇和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罢工的浪潮淹没了整个上海，也波及到日资纺织厂集中的青岛。在青岛，日本海军陆战队及其支持的军阀张作霖屠杀工人。对此，当时的日本劳动总同盟也向政府提出了抗议。上海的罢工因抗议在青岛的屠杀发展到占领工厂。日本政府向上海增派了军舰。在这样的形势下，由于5月14日上海的日资工厂开枪打死中国工人，5月30日，就爆发了3000名工人和学生的抗议示威。英国警察向示威者开枪，死伤250人。6月7日，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组成了反帝斗争的统一组织工商学联合会，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军舰的包围当中，于11日召

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抗议集会。集会通过了17条要求，其内容是：（一）立即释放逮捕者；（二）审判杀人犯和日、英公使要谢罪；（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四）在租界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五）永远撤退日、英陆海军；（六）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这样的斗争，显示了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的迅速成长。

五卅事件引起了香港大罢工和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在这种革命形势的高潮中，革命力量统一了广东全省，在1926年7月开始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革命军在各地工人、农民革命斗争的支援下，很快就发展到长江流域。

在反革命的暴风雨中

另一方面，在这种革命形势的高潮中，中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活动也猖獗起来。孙文逝世后，同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地主等反革命势力加紧勾结的蒋介石，策划了几次反革命阴谋。当时日本若槻内阁的币原外相，早就对蒋介石抱有期望，在1927年3月，通过上海总领事矢田，要求“维持上海附近的治安”。他事先就知道了蒋介石的政变计划。然而，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没有警惕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拒绝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坚决进行反击的主张，一味醉心于同国民党妥协。其结果，1927年4月，当北伐战争达到高潮、在起义的工人支持下北伐军进入上海时，蒋介石就在4月12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工人进行了大屠杀。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提议实行土地

革命，建立人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主张要同反革命进行斗争，而陈独秀等人却一味同当时尚未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汪精卫等的武汉国民党政权合作。7月，汪精卫等也在武汉开始了大屠杀，革命完全以失败而告终。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由于蒋介石叛变而使革命失败的期间，中国人民的斗争，对于其后的中国革命的发展来说，提供了各种各样重要的经验和教训。首先是，这时的工人运动取得了飞跃地发展。全国大罢工的高涨，全国的工人组织的成立，在上海及其它城市中工人的武装起义等，这些活动即使在当时的世界工人运动中也是极为先进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够领导广大革命农民并使其参加革命。其次，作为同北洋军阀进行武装斗争的前提，已经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成为以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为打倒蒋介石而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统一战线等传统的出发点，它不同于欧洲各国的人民战线（这种人民战线只限于以阻止法西斯的抬头为目的）。但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还未能认识到人民自己的武装问题和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性，因此，终于使革命归于失败。同时，必须高度评价在这个时期不断强调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进行了实践的毛泽东的作用。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的斗争

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掀起的反革命风暴中，当时发展到5万多人的中国共产党减少到1万人，革命力量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在1927年的8月1日，共产党的影响很大的驻江西省省会南昌的北伐军部队3万人，在周恩来、朱德等的率

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作为对付反革命风暴的最早的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天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但是“南昌起义”没有在农村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是以城市为中心，并想依靠外部援助。要克服这些缺点，还需有一系列实践的过程。毛泽东等人在实践中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8月7日，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重要会议，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最主要任务。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1927年9月8日，毛泽东在湖南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10月，率领起义军进入井冈山，建立了人民军队和世界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第二年，便在各地建立了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斗争具有最早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意义。此后的中国革命，经常是以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以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为前提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并有着重要的意义。

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规定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布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十大纲领，指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的高潮中间这些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它有着未能认识中国革命的相当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的缺点。可以说，这些缺点都成了后来犯“左”倾错误的出发点。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表面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美帝国主义重新回到亚洲，日本帝国主义的美好时代已告结束。并且，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矛盾也激化了。日本资本主义，尽管财阀垄断资本高度发达，但因为在农业中广泛地残存着半封建的土

第7表 日本从中国东北进口的重要物资

	豆 饼	大 豆	煤和焦炭	柞蚕丝	铁 和 铁制品	以上5种 商品占全 部进口的 %
1917年	21647	2342	1011	1229	2817	75
1919年	43029	15295	963	4460	4871	71
1921年	45742	11699	2617	10576	2991	82
1922年	41820	11512	5264	7164	2480	85
1923年	46374	18135	7123	8726	2831	79
1924年	44284	19172	8620	6202	2921	82
1925年	40558	21743	9867	7600	2734	83
1926年	50843	14318	16065	7076	4066	83
1927年	37766	14614	16080	7861	5223	80
1928年	34003	28404	16231	7082	6391	75
1929年	33151	34529	18610	5984	6224	73

(引自细川嘉六：《殖民史》)

地所有制，国内市场的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日本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工人运动和租佃纠纷为形式的人民斗争的激化，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也以要求普选权的形式发展起来等各个方面。

日本资本主义的前途，显然有赖于中国的市场和从中国确保原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除生丝外，日本出口的80%是面向中国的。既然日本资本主义不能单纯依靠出口生丝过活，它的前途当然就有赖于中国市场。让我们看看日本向中国市场扩张的情形吧。1925年，在中国的进口总额中，日本占30%，美国占14.8%，英国占9.7%；在中国的出口总额中，日本占23.9%，美国占14.8%，英国占6.5%。这些数字，说明了中国市场对日本资本主义的重要性。

第8表 中国在日本贸易中的比重

单位：百万日元

年次	同中国的 贸易总额	占日本外 贸总额%	从中国 进口	占日本进 口总额%	向中国 出口	占日本出 口总额%
1914 (大正3)	308.4	25.9	90.5	15.2	217.9	36.9
1916	408.4	11.7	143.6	19.0	264.8	23.5
1918	922.3	25.4	383.1	23.0	539.2	27.5
1920	1,015.2	23.7	417.2	17.9	598.0	30.7
1922	788.4	22.3	317.6	16.8	470.8	28.8
1924	914.4	21.5	414.4	16.9	500.0	27.7
1926	972.3	21.9	397.9	16.7	574.4	28.1

(《日本统计》，引自利马：《各国对华投资》上卷)

第9表 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单位：百万海关两

年次	同日本的 贸易总额	占日本外 贸总额%	从日本 进口	占日本出 口总额%	向日本 出口	占中国出 口总额%
1914 (大正3)	191.7	20.7	127.1	22.3	64.6	18.1
1916	273.4	27.4	160.5	31.1	112.9	23.4
1918	402.3	38.6	238.9	43.0	163.4	33.6
1920	371.1	28.5	229.1	30.1	141.9	26.2
1922	391.2	24.4	231.4	24.5	159.8	24.4
1924	435.9	24.4	234.8	23.1	201.2	26.1
1926	548.7	27.6	336.9	30.0	211.7	24.5

(《中国海关统计》引自利马上书)

另外，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得到迅速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以纺织业为中心，向中国输出大量资本。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日本资本输出的90%集中于中国，日本资产阶级的注意力转向中国。以在华纺织业为例，如以1913年为基础，1925年的纱锭为11倍以上，纺织机为8倍以上。在1931年，纱锭更增加到15倍以上，纺织机增加到18倍以上。在中国近代化的纺织工厂中，日本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1922年为30.2%，1925年为30.7%，1927年为37.3%，1929年为39.3%，1931年为40.8%（在此期间，美国资本从1922年的7.3%下降为1931年的3.5%）。在山东、河北也可看到日本资本以“同中国资本合办工厂”的形式，有了相当大的扩展。这种情况与日本经济的脆弱性，驱使着日本对中国进行

军事侵略。同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转机，在中国也可以看到在棉纺织业等方面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表现出对日本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反抗。

敌视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

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敌视中国革命，企图使中国的反动军阀变成它的傀儡，反对中国的统一。1921年，中国军阀之间的内战——奉天派与直隶派的战争开始时，在日本军部内这样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即认为直隶派背后有美英帝国主义，便企图支持奉天派的军阀张作霖，使其变成傀儡，实现日本的野心。为此，北京公使馆的副武官和关东军的特务机关向军中央部门提出“为了打破英美的阴谋，维护帝国的地盘，必须采取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确信我国必须采取支持张作霖的行动，不是支持某一党派，实因会给帝国的存在带来重大的影响”等意见。这样，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统治中国的问题上，同美英帝国主义的对立加深了。使张作霖成为傀儡，以保障在东北“权益”，这种想法不只是在军部内存在。在1920年8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由田中陆相介绍而出席会议的佐藤少将，作了去西伯利亚和东北旅行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张作霖（一）对日本怀有极大的好感，为取缔间岛方面的朝鲜人，即使派遣日军也没有异议；（二）在东清铁路问题上，也表明有借我之力以维持其势力的意思”。在11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内田康哉外相说，奉天总领事送来报告的内容，与田中陆相及上述佐藤少将的报告是一致的。另外，内田外相谈到“他（张作霖）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常常不忘利害的打算”时，原敬首相说“诚如所言，然

我等亦并非不为利害打算”。经过这样的讨论，在这一天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应当使张安心，并给予相当待遇”的决议。在1921年5月16日到25日这段时间内，在原敬首相主持下召开的有朝鲜总督、朝鲜军司令、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青岛军司令、西伯利亚出兵军司令、驻中国公使、奉天总领事等出席的重要会议上，进一步作出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山东撤兵”、“在满蒙的管理上与张作霖保持友好”、“让满铁贷给东清铁路3000万日元，以此得到满铁车辆开进由长春到哈尔滨线路的条件，在彼之地方培植我方势力”等决定。

另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垄断资本代表的发言权也加强了。他们要求废除统帅权独立和裁减军备。这虽然是因为他们不能无视人民的要求，但他们的真正意图，是要完全掌握政治与外交的主动权，为准备即将到来的总体战，谋求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同重新登上国际舞台的美帝国主义协调，更有效地对中国进行扩张。大正末年的“币原协调外交”就是这种性质的外交。但是，币原外交的实质就在于要站在日本垄断资本的立场上掠夺中国人民。这一点表现在他当外相时，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五卅斗争，于1925年5月派军舰到上海、青岛，并把这看作“当然的措施”。

战争形式的变化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与危机的加深，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首先应该注意的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形式变成了国家总体战。在经济上，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也加强了。田中义一（他曾经是出兵西伯利亚时的陆相，后来成为首相，策划过出兵山东、召

开“东方会议”、采取侵略中国的政策，设立“特高警察”、进行“三·一五”大镇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说：“今后的战争将与以往不同。它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军队对军队、军舰对军舰的战争，而是全体国民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参谋本部为中心，为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准备未来的战争而设立的“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样说：

在亘古未有的这次战争以前，军备就国力而论，是保护和发展经济力量的要素，这是人所共知的。同样，关于经济力量是军备不可缺少的直接要素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也是事实。然而近世战争的趋势，特别是这次战争给这种观念带来了一个思想上的大革命，使人们认识到军备是维持和扩张经济力量所不可缺少的，同时，经济力量也是维持、培植和增强军备，特别是战力的直接要素。经济力量是军备极其有力的一大要素。实际上，这两者有唇齿相依的最密切关系。今天，一国军事力量的优劣强弱，不能仅以其兵员和舰艇的多寡而论，一定要把这些同经济力量加在一起来估计。（《论参战各国的陆军》，偕行社记事第547号附录）

另外，当时正在研究总体战的吉田丰彦中将，也在《欧战以后给予我们的教训》一文中说：“换言之，未来的战争不只是军队的战争，而是囊括了国家的各种素质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所谓国家总动员的概念”。还说：“军需品补给的要旨就在于：一、必须尽量谋求原料自给自足之道，即通过适当的措施使供给顺利进行；二、如获得所需之原料，将其放入一定的设备内，用适当的人员进行加工制造，再经运输部门交给军队。”这样，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总体战的思想就在日本军部的首脑中间产生了。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原料的自给自足”的重要性被认识了。作为当时日本国家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军方领导集团，从原来的藩阀不断过渡到士官校阀。而新上台的军方领导人，全都是以标榜总体战适合于国家统治而崭露头角的。这种新的军方领导集团的人物之一，当时为参谋本部第五课兵要地志班长的小矶国昭（当时是少佐，后成为首相），把从1915年8月到1916年9月在热河、蒙古（现在是地跨河北、辽宁的一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区）所作的视察旅行的结果，以《帝国国防资源》为题写了一个报告，向上级提出之后，经过批准公开散发了。这篇著作，正如小矶后来在其回忆录《葛山鸿爪》中所说：“我认为这篇《帝国国防资源》，阅读的人相当广泛，在公司、银行服务的有关人士和朋友，读的人不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篇著作的目的，如在《总论》中所说：“显然，持久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仅仅是由武器决定的，而是属于能够经营战时自足经济的一方”。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就在于探讨如何实现已成为当前课题的总体战体制。小矶在总论中认为，“吾人忧虑帝国及中国国势统一调查机关设立甚晚。这里，概观帝国国防资源的现状及未来，对将其进行必要补充之经济政策分数段简要说明之。既然近世战争非陆海军所专有，而是国家国民之战争，吾军人思考关系到国军之命运的国家经济政策，正是认识到吾人职责的结果”。他在关于总体战的设想中，常常把中国的资源考虑在内，因此，在总论中，除“帝国平时经济”、“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各章外，还列入了“大陆上帝国原料的动态”和“中国国产原料”的项目。

第10表 日本基本原料物资的自给率

(1936年)

品目	铁矿石	屑铁	生铁	钢材	铜	锡	铅	亚铅	镍	铁矾土
自给率	16.7%	—	93.8	62.2	63.2	28.8	8.2	38.9	—	—
品目	氧化铝	磷矿	原油	煤炭	橡胶	硫酸	盐	原棉		
自给率	40.6	12.0	20.2	90.9	—	14.1	31.3	—		

(据戈宾:《战时战后的日本经济》上卷)

小矶在“总论”中,还谈到了“鼓励设立民间工厂和对其进行保护”、“根据各民间工厂的能力,订立制造平时需要之物品及在战时进行扩大的合同”、“以战时需要的程度和民间工厂的能力为基础,调整国营工厂在平时和战时的能力”等的必要性。小矶在后来还说,当时的意图就在于明确“日本政府应该努力完成精确的调查,给民间企业家指明开发的企业目标”,“为了能够希望从内地得到确实而长期的补给,从何处得到何种原料,依靠何种生产机构制造各种军需品,以及为了维持军队的战斗力,如何适当使用代用品和如何利用当地的物资”。在这里,就显示了后来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重要趋向。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准备现代战争即国家总体战,进而应付当时的资本主义危机,开始确定了国家政权与民间企业加强勾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向,为此开始在中国大陆寻找必要的资源。

这种动向不仅是在军部中存在。西原贷款的推进者西原龟三，在1917年3月发表了《中国关税问题与日本》的论文。西原在这篇文章中“鉴于欧洲战乱的实情”，主张“一旦有事，能保证国民生活的稳定和重要物资的供应”，为此，主张“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煤炭生产生铁和确保日本的炼铁原料，利用义和团事件的赔款，在中国发展棉花、羊毛的生产和开采石油。其前提是必须取消日中之间的经济“国界”。”。西原的这一设想，是来自资本家关于实现总体战体制的主张。这是国际分工和经济区主张的基础。在西原设想中，还包含着要把东南亚也纳入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区。可以说，这里就有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萌芽。另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犬养毅，在1921年召开的国民党大会上，还主张“国际协调”和“裁军”，这是为了对付日益激化的国际经济竞争，推进总体战，谋求经济与军事的协调。

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勾结的加强与军部势力的抬头

这种由国家政权、军方、民间企业的勾结向国家总动员体制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主张，从1920年度起，就在各个年度的《军需工业动员计划》中反映出来。在1922年9月制订的《陆军军需工业动员计划要领》第53条中，有“所需原料，由于能从帝国的势力范围满洲取得，所以各部队以自给自足为原则”的规定。并且在《大正13年（1924年）年度陆军军需工业动员中央计划》的第10条中，还有“战时陆军的需要，原则上是以能从帝国领土关东洲、南满洲、东部内蒙古以及从间宫海峡到台湾海峡的沿海地区范围内取得的物资来补充”。在日本的军事动员计划中，这些地区的资源

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把中国东北的资源纳入日本总动员体制的事实有：合同规定1926年“满铁”正式投入石油精炼工业，海军按时价购进它的全部产品。在发生亏损时，由海军来补偿。这种对中国东北资源的渴望，也表现在满洲事变前夕的1930年3月陆密58号文件中，陆军秘密指令要在调查朝鲜、台湾资源的同时，调查中国东北的资源。

1927年前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当时，即使根据官方的统计，日本失业的人数也有15万。同年3月，以台湾为立足点向华南方面扩张的铃木商店倒闭了。在铃木商店有3.5亿日元无担保贷款的台湾银行也陷入了危机。这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并且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制的危机。在这一危机期间，同年4月，成立了以出兵西伯利亚时的陆相田中义一为首相的内阁，它以渡过金融危机和干涉中国革命为其使命。这就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为背景，企图通过国内反动和对外侵略来摆脱危机。田中内阁成立不久就发出了延期支付令以挽救银行资本。金融危机是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反映。通过这次危机，日本的普通银行从1926年底的1417家减少到1931年的680家，但是安田、住友、三井、第一、三菱五大银行的地位提高了。存款额占全国普通银行的比例，在上述时期内，从24%上升到38%，确立了大银行的霸权。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称为“最后元老”的山县有朋（1922年死）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势力，是依赖天皇制的反动势力的中心。同时，他们仍然坚持同美、英两帝国主义协调的传统外交方针。大资产阶级势力，特别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转机而兴起的大资产阶级势力，则要求资产阶级的统治权，不惜同英、美对

立，并以其全力反对专制主义势力和专制主义的统治机构，在日本资本主义危机深化之时，特别是面对着人民力量的兴起，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统治体制。适应这两方面的要求而抬头的是新的军部势力。专制主义势力、垄断资本和军部相互之间孕育着严重的对立。结果是，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把军部推上了政权的宝座。而田中内阁就是具有向确立军部权力过渡性质的内阁。

田中内阁的成立与张作霖被炸死

田中内阁成立刚刚一个月，就为阻止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而出兵山东。在6月中旬，还召集了以与中国有关的军人和外交官为中心的“东方会议”，强调满蒙的“特殊利益”，通过了宣称如果中国不尊重这种特殊利益，就“断然作出自卫措施”的《对华政策纲领》。田中内阁为了对抗工人、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1928年3月15日，对当时的共产党、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评议会等实行大规模镇压。后来又把《治安维持法》从最高10年的徒刑改为死刑。

在进行了这样的国内镇压和加强了法西斯体制之后，在5月，以“侨民被杀”为借口，向中国山东增派了一个师团。

当时蒋介石已经在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同国内的地主势力和美、英帝国主义加紧勾结。但就连这个蒋介石，也不能无视全中国人民要求国内统一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田中顽固地反对中国统一，企图把中国的东北与华北置于当地军阀的统治之下，使其变成傀儡而继续加以控制，因此，也同蒋介石发生了冲突。5月4日，日本的参谋本部，对当地司令官福田彦助中将发出训令说：“同中国军队的停战，要

以显示国军（日军）的威力和根除祸因为条件”。福田司令官回电说：“相信这是日本为了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对南方进行断然惩罚的好机会”。8日，日军开始进攻，11日占领了济南，进而控制了山东全境。同时，在7月，参谋本部认为，这一事件“表现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轻蔑心理”，决定了《对华方策》即“要使整个中国受到震动，以显示我方之威力，根除彼等对日轻侮观念。这也是将皇军的威力显扬中外，并瓦解整个中国国运发展的基础”。这个《对华方策》在8日的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宣布了。日本政府也在15日和16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战乱已扩展到京津（北京、天津）地区，如战乱波及满洲时，帝国政府为了维持满洲治安，要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施”，对中国南、北两军发出了警告。这无非是前述东方会议的《对华政策纲要》的具体化。

中国的军阀张作霖，被蒋介石打败而返回中国东北的大本营，但6月4日，他在沈阳附近被关东军的河本大佐等炸死。日本的统治者以前曾策划把张作霖当作傀儡，使中国东北事实上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但在这一阶段，其计划显然是不可能实现了。在前年，关东军就已经向军中央提出排斥张作霖，“建立合乎帝国要求的新政府”，使东北“独立”的建议。因此，关东军的一部分首脑，就产生了要乘张作霖失败之机暗杀他，对整个东北实行事实上的军事占领的想法，并将其付诸实施了。但是，炸死张作霖事件，在中国内部引起激愤，“排斥日货”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2月，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誓效忠南京政府，并且由于这一事件引起了各国的强烈怀疑，关东军占领东北的计划未能实现。另外，继张作霖之后，其子张学良顶住了林权助特别大使施加的“如

果同叛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为了维持我国既得权益，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的压力，打出了同国民党政权合作的旗号。进而由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要通过蒋介石维护其权益，一个接一个地承认了国民党政权，批准关税自守权，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内部失去了代理人，在国际上也遭到孤立，完全陷入窘境。因此，田中内阁在1917年7月倒台了。

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朝鲜、台湾人民斗争的激化

以1929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暴跌为转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结束了，从此时起到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被卷入了世界性的危机之中。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指数，如以1929年为100，1932年则激减为6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中，生产衰退未曾达到7%以上，但在1932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度，却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比1925—1929年的平均数字下降了42%。世界贸易在1929—1933年间，按美元计算，缩减了65%。在世界各国，失业人数激增，大量工农业产品被销毁。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经济的破产，首先是从贸易方面开始的。作为当时重要输出品的生丝，从1929年4月的1400日元1捆，暴跌为1930年10月的500日元1捆。由于世界规模的贸易萎缩，工业品的价格也下降了，许多企业陷于破产。另外，农产品的价格继续暴跌，结果使农村经济受到巨大的打击。

工业生产从1929年到1932年，以价格而论，减少了33%，出口减少了46.6%，进口减少44.2%。失业和半失业

的人数超过 300 万。反映着资本主义这种空前的危机，劳资纠纷从1929年的1408起，增加到1931年的2415起；租佃纠纷在同一时期也从2422起增加到2689起。

由于这种空前的危机，日本资本主义受到沉重的打击。同时，通过这一危机，中小型工厂和金融机构被淘汰，进一步加强了大银行的统治。

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使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激化了。1929年，以在朝鲜光州的日本中学生侮辱朝鲜女学生的事件为开端，11月3日，光州的朝鲜学生高呼“反对殖民歧视”、“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举行了罢课和示威游行。到第二年的3月底，在全朝鲜54所小学、136所中学、4所专科学校共194所学校，54万名以上的学生参加了罢课和游行。在“满洲”的8所朝鲜学校也进行了支援活动。1928年，元山市文坪旭日火油公司的劳资纠纷，尽管遭到残酷的镇压，但却从第二年1月到4月发展成为有元山工会联合会所属的24个工会，3000名工人参加的总罢工。日本的《无产者新闻》提出了“援助朝鲜兄弟！”并募集支援这一斗争的捐款。处于地下的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也发起拒绝元山卸货的运动和支援活动。苏联、中国、法国等国的工人也进行了国际性的支援。在30年代开始的由金日成领导的朝鲜北部的游击队活动，也是以这种高涨起来的朝鲜人民的斗争为背景的。

1930年10月，在台湾发生了台中州雾社的高山族人民大起义。日本帝国主义以警察为后盾对高山族实行残酷的强迫劳动。而以这种强迫劳动和延期发放工资为直接原因，10月27日，约1000名高山族人民，在摩那·罗达奥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袭击了巡查驻在所、警察分署、公立学校，杀死约140名

日本人。台湾总督府派出了2000多名讨伐队，用飞机、重型武器和催泪瓦斯发动了进攻。讨伐队方面付出50多人的伤亡，才在11月中旬勉强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期间，即使根据正式公布的数字，也有1000多名高山族人民为警察所杀害。这件事暴露了帝国主义统治者的报复是何等残酷。当时的报纸，在谈论这一事件时，把高山族人民称之为“凶蛮”、“凶妇”和“凶童”。这反映了他们的帝国主义立场。

法西斯分子的抬头和石原莞尔计划

在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造成的内外矛盾的激化中，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国内的反动体制，同时在国家同垄断资本主义的紧密勾结下，露骨地提出了扩张军备和对外侵略的政策。

总危机的加深，也使日本的法西斯分子从20年代末起抬头的了。特别是军方领导集团，这时也从原来的藩阀，不断过渡到士官校阀。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军队作为“天皇军队”的特点，企图通过加强天皇制军国主义来摆脱危机。他们同德国法西斯一样，甚至摆出一副“反对财阀”的姿态。但其实质是，一面通过蛊惑宣传，冒充人民的要求，一面通过加强军国主义体制来渡过垄断资本的危机。军部内的法西斯分子，在他们内部反复发生多次冲突，以求掌握领导权，并常常引起流血事件。甚至有几个集团，在世界经济危机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激化的时候，策划了几次谋求掌握国家领导权的政变。这些政变计划，由于原来的统治集团尚不愿把领导权交给他们，夺取政权计划本身是失败了，但法西斯

分子所设想的加强军国主义的方向，作为统治阶级的共同目标，却从此开始实现了。军部法西斯分子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军队作为“天皇军队”的性质，对中国东北实行军事占领，建立起军部法西斯专政的傀儡国家。1929年，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在参谋本部的支持下，主张为了防止东北“赤化”，建立王道的国家，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1930年9月，军部法西斯集团的“樱会”^①，开始从事为“解决满蒙问题”而进行“国家改造”的研究。他们提出“国家改造是最终的目标，为此，不惜使用武力”，反对在当时的舆论压力下签字的裁军条约，认为“政党者流对海军所下的毒手，即将作为陆军的裁军问题表现出来”，要求夺取国家政权。

当时关东军的中校参谋，后来成为满洲事变导演的石原莞尔所制订的计划，形成后来实行的侵略政策的背景。石原自到关东军任职之后，起初从事于拟定作战计划，而从1929年前后起，开始研究有关满蒙问题的整个政策。石原于同年7月在《转变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的解决方案》中说：“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径。”“为了根除国内的不安，要依靠向外发展”，“如能解决满蒙问题，中国本部的排日亦可同时止熄”，“从历史上看，满蒙与其说属于汉族，毋宁说属于日本民族”，“满蒙问题，从日本领有该地开始就能完全解决”，“由于满蒙的合理开发，日本的景气就能自然地恢复，有知识的失业者亦可得到

^① 1930年9月，日本军部的一群法西斯军官，以桥本欣五郎、板田义郎、根本博为中心，成立了秘密组织樱会，专门策划“国内改革”和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政党内阁，废除议会政治，建立军人法西斯专政。——译者

救济”。在这里，就清楚表现出要通过侵略中国的战争解决日本国内矛盾的企图。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位的动摇

这时，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矛盾的激化，中国东北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意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从中国东北进口项目的变化，从第7表中可以看出来。而最初作为肥料用的豆饼和作为特殊纺织品原料的柞蚕丝供应地的东北，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化肥的普及，变成了大豆（油脂工业原料）、铁、煤炭等工业原料的供应地。1930年，日本投入东北的资本，占各国在该地投资的70%（仅次于日本的是当时拥有中东铁路的苏联，占26%），几乎占据了垄断的地位。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优越地位，由于形势的变化，受到了很大的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帝国主义之间对立的激化，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1928年，流入中国东北的棉织品，来自日本的是3926.4万海关两，来自中国本土的是1515万海关两，尚不及日本的一半。1931年，与从日本进口1332.7万海关两相比，从中国进口的数额是1462万海关两，超过了从日本的进口额。1930年，中国方面以美国资本为背景，制订了铺设连接已有地方线的满铁并行线的计划。并且制订了建设与大连分庭抗礼的葫芦岛港计划，不断造成包围满铁的态势。另外，在东北土地的商租权问题上，也由于中国方面的强硬姿态，日本必须成立半国家公司的东亚劝业公司，以国家资本的力量，救济陷于窘境在日本大土地经营者。

满铁的干部松冈洋右，在1931年1月的会议上声称：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

在这种情况下，当1931年7月2日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中国农民与朝鲜农民因水利问题引起的冲突事件一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就在朝鲜各地向朝鲜人民散布假报道，攻击中国人。当时的外务大臣是主张对美、英实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在这一事件发生时，币原却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另外，政友会的干事长森恪，周游东北并到处作报告，说由于“日本的存立权一天天土崩瓦解”，“在所谓外交方面是完全绝望的”，“为了挽回这种状态，除了动员国家力量以外，别无他法”，与此同时，政友会通过全国的游说，煽动排外意识。

四、万宝山事件和满洲事变

事件的起因

如上所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加强，加上中国军阀政权与朝鲜、中国地主与朝鲜农民之间的矛盾，所谓“压迫朝鲜人”的问题激化起来，其顶点就是“万宝山事件”。这一事件并且成为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借口之一。

长春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于1931年4月16日，租得长春县乡三区的万宝山地方，肖翰林、张鸿宾、孟昭和等12人生、熟地500垧（每垧约合10亩）租期10年；同时，郝永

德以前项生、熟地转租给韩人李升薰、李造和等9人耕种，亦以10年为期。5月上旬，在此地集中了约40户、210名朝鲜人。据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国方面提供的资料谈到当时的情况说：“郝同这些朝鲜农民之间订立的租地契约，没有受到中国官方的限制，并事先得到了长春县长的批准。长春的领事田代重德希望，今后如顺利地经营这个农场，在这里建设一些朝鲜部落，对于佃农来说，定将成为福音”（《从万宝山案到对华侨的大屠杀》）。但由于当时日中间的对立激化，而且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之一，并不像这里所说的那么单纯。而从后来日本方面的行动来看，当时日本方面的想法也决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当时中国方面的记述中说：

……（这些土地）因系租与韩人，故具呈长春县政府请求批示。该县以出租韩人，须慎重调查方能照准，当批令前，须将拟具合同呈核。郝永德等人当即与韩民缔结出租草约，并在合同内注明此事须经县政府核准，方能发生效力云云。

当时，围绕着高租权问题，日中之间正处于紧张状态，写入这样的事项是理所当然的。日本方面后来在同中国方面进行共同调查时，也不得不承认：

调查的结果，弄清了在郝永德从中国地主那里租佃土地的契约中，有如果县长不承认契约条项，契约就无效的规定。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日本方面强行提出来，如后面所说，是由于币原外相的强硬方针。

关于以后的经过，在同年8月发表的龚德柏的《从万宝山

案到对华侨的大屠杀》(《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中写道:

詎料草约初定,韩民等竟在该地挖掘水道,导引伊通河流,沿途占用民地,长约20余里,宽4丈。其地为另外之41人所有,初未与郝永德及韩人李升薰有何项之契约,且此项通引伊通河流之水道,对于地主农民所及之损害甚巨。缘水道挖出之土,堆置两旁,作为堤坝,宽约七、八丈,长约20余里,共计毁坏良田400余垧。水道经过地方,均为人民熟地。此项水道,将农民各户熟地,截成两段;更为导引伊通河水灌溉稻田计,须于旧有河流横筑止水坝,逼入水道。因堤坝横阻河流之结果,所有河流上游两旁低下民地,约计2000余垧,均将被淹没之害。且郝永德所租拟种稻田区域,地势较高,无处泄水,下游低下田地被淹没者约数百垧;水道两岸低下处,当河水涨溢,必侵入田地,约计又四、五千垧。加之河流之马家哨口,系河东河西往来孔道,因河中横坝堵水,水势增高,旧日河东河西交通,悉为断绝。该河本为长春农民夏令航行运输必经之路,中间坝叠丈余,两县公共运输航路,悉受断阻之害。沿河居民户,借航运营生者,不下数百户,其生计亦悉受损害。其事之为害至此,地方农民,利害切身,当然反对,事经长春市政筹备处,电省请示。

在这种情况下,长春市政筹备处长接到了“由于朝鲜人在各地有易于引起纷扰的倾向,要用适当的办法使已移住者退出国境,同时,对新移住者绝对不允许居住”的指示。在中国方面的记录中也谈到:“省政府以该项韩民,未经我当

局许可，擅入乡村，殊背公约”。

但是因为挖水渠的工程仍在进行，5月下旬，中国地主就直接向省政府提出申诉。因此，25日，长春地方公安局的中国巡警，拘留了正在挖掘水渠的朝鲜监工，而据说当时有两名朝鲜人被打。得到这个消息的长春领事田代，向市政筹备处提出释放拘留者和制止巡警“暴行”的要求，第二天向当地派遣了几名日本警察。另一方面，附近的中国人，一得知这项工程要堵塞伊通河把水引进水渠，在涨水期间会发生危险，不仅是土地直接受到威胁的地主，而且许多农民也被卷入了反对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硬态度

这样，就发生了6月1日的抓人事件。据中国方面的记录，谈到这期间的情况时说：“于6月1日，令县政府派员协同县公安警前往劝喻，期以和平手段令该韩民出境。乃韩民不去，公安当局将其首领申某等8人，带至县署。”另外，据前面引证的中国方面的资料说：省政府“30日派遣了约200名巡警和马队，通知他们停止工程，但因韩民未加理睬，6月1日，就将为首的农民10人，强行带到长春”。中国方面在记录中还说：“（被带走的朝鲜人）供称受日人命令来此种稻。3日，县公安局长和保卫队长率队，带着申某等到掘水沟处之马家哨口地方，将工作中之韩民施行驱逐。但日人竟于次日续令韩民百名到该地工作，一面并派警官5名前往保护，遂成对峙之势”。

这样，在6月3日，日中两国都出动了警察。长春领事田代在放弃“保护工程的方针”，撤退领事馆派员，还是增派

警察进行对抗的问题上请示了奉天总领事和外务省。奉天的林总领事^①认为，朝鲜人的土地契约是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的，是正当的，“如用枝节问题为借口，突以武力驱逐，甚不妥当”，要求中国方面的张作相^②撤退当地的巡警。当时林总领事说“形势颇为紧迫，日本侨民也甚为激动，或者就这样允许中国军警占据着，或者作为对抗手段将出动我方的驻屯军，作为领事，实是无力阻止，这就不能不使事态变得严重，以致不可收拾”，暗示要“出动驻屯军”，采取以武力为背景的露骨的强硬态度。

田代还向外务省提出了下列建议：

最近中国方面对鲜人的压迫日渐炽烈，以三姓堡农场问题的成功与否，将来会有日益尖锐之虞。本件作为一种试金石，在满洲的舆论也意外强硬。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对于距事件发生地点仅有4日里内外之地、日本警察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之邦人的正当事业，如不采取坚决保护的方针，则只能助长邦人在满洲发展的衰退倾向（中略），作为在现场的临时措施，由于中国方面坚决要求鲜人退走，则有失去本年度的农时之虞。势必使工程一气呵成，以造成既成事实再进行坚韧不拔的谈判，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正如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日本方面对这一事件所采取的强硬态度，是有其原因的。那就是，在离满铁终点的长春仅仅十几公里处，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被认为是“日本警察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以此作为试金石，挽回“邦人在满

① 当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是林权助。——译者

② 奉系军阀头目之一。——译者

洲发展的衰退倾向”，并想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另外，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正当的事业”，可以说是要试探中国方面的态度。在前面列举的中国方面的记录中，被带走的朝鲜人供认是“受日人命令，来此种稻”。朝鲜人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当然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了。

事件的根本原因

币原外相批准了奉天总领事林和长春领事田代的方针。而中国方面在6月5日，由吉林省政府的施履本对吉林总领事石射说，省政府在全省禁止租地给朝鲜人。在上述契约中，规定让取得中国籍的朝鲜人入殖，可是现在要入殖的人，并未取得中国国籍，因而是不正当的。长春县长对租地契约不予批准，并且抗议日本警察在中国内地“保护”朝鲜人是不正当的行为。由于中国方面的据理抗议，8日，林总领事不得不报告币原外相说：“因详情也有不明之处，在今天(8日)派柳井到长春去进行核实”。8日，在双方警察撤走后进行的调查中，弄清了在土地契约中有“县长如不批准契约事项，契约无效”这样的条款，明确了错在日方。但日方面对上述事实，企图以日方没有责任的蛮横态度继续进行工程。

日本方面的蛮横态度，是受到当地的外交机关和币原外相支持的。币原不仅支持上述外交机关的强硬态度，而且在12日，发出了强硬的训令，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中国方面的抗日政策是有责任的。

正如币原的训令所表明的那样，在明确了日本方面误解乃至无视朝鲜人方面的契约之后，又认为这一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抗日政策，与其解决事件本身，不如把重点放

在改变中国方面的政策和对中国造成既成事实上面。因而，由于当地机关也受到外务省的鼓励，日本方面从16日起，重新进行工程。在这时的谈判中，日本方面顽固地企图通过这一事件，为获得成为悬案的商租权打开一个缺口。日方坚持说：

在明治43年（1910年）的协定中，帝国以重新承认民国对图门江以北地方的领土权为代价，使民国承认在该地区居住的朝鲜人不仅有开垦权而且有土地所有权，后来，两国政府为了对两国在满洲方面的特殊紧密关系进行条约上的调整，大正4年（1915年）另行签订了《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帝国臣民在南满洲，为自由居住往来和营业，为建设各种商业上的设施及经营农业而获得商租必要土地的权利。这种情况，国民政府是清楚知道的。即使是延边四县以外，也在该条约的适用地区之内。作为帝国臣民的鲜人居住往来，经营农业，当然有商租农地的权利。在该条约中已明文规定，是不容置疑的。何况在万宝山地方，鲜农据与民国人的契约所取得之权利并非商租权，而仅仅是一般的租地权。

对此，中国方面根据1915年中国政府废除日华条约及其换文的通告，认为上述问题的主张已经失去了根据，说“贵国政府在此时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殊非谋求共存共荣之道，不能不对此表示遗憾”。并指出在东北的所谓朝鲜人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方面主张居住在当地的朝鲜人的主权和在满铁附属地之外行使警察权。在这里，成为悬案的商租权问题，就成了争执的焦点。

由于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在此，所以，日本方面在通过共同调查弄清了契约的内容后，仍然强硬进行工程。工程在币原的强硬训令后不久，从6月16日重新开始。在进行过程中，由于下雨和河道涨水，工程暂时中断。7月1日又开工。当工程眼看就要完成时，7月1日早上，附近的中国农民四、五百人集合在这里，开始以实力破坏水渠。田代领事企图增派警察完成工程，但是，中国农民在1日和2日将工程设施破坏了。在2日，日本方面又派遣甚至配备了机枪的增援警察部队。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对中国人的 暴行事件和朝鲜人的呼声

这样，万宝山事件的根本原因，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朝鲜农民为盾牌而实行的侵略政策。还应注意的是，以这一事件为转机，在朝鲜发生了反华暴动。7月2日，在朝鲜仁川，有两、三名中国人被打死。在首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从4日夜到5日早晨，在平壤有100多名中国人被杀害。反华暴动扩大到全朝鲜，并且蔓延至日本。而日本方面则在这一事件的掩盖下于当地继续进行工程，在7月11日终于将其完成了。

在万宝山事件中所发生的对中国人的暴行事件，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口头上叫喊着“保护朝鲜人”，但正如在事件的进程中所看到的那样，这完全是为了在商租权问题上造成既成事实的一种手段，是企图使中朝两国人民对立，实现其对两国的殖民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地方军阀对朝鲜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正确地

加以区别以及中国地主平时对朝鲜农民的压迫，就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只要看看当时在朝鲜的新闻、言论机关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把持，就可以知道，这次反华暴动，完全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

当时朝鲜人的真正呼声是什么呢？根据内务省警保局编《社会运动的状况（3）》，在东京，“全日本劳动协议会失业同盟”江东地区的朝鲜人通过了“必须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资本家阴谋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写成宣传文章予以抨击”的决议，并散发了印刷品。“全协失同”东京地方同盟筹备会的朝鲜人，散发了《粉碎资本家、地主在朝鲜、中国暴动事件中的反宣传》的印刷品。“日本反帝国同盟”北部地区的朝鲜人散发了题为《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作斗争》的印刷品。在大阪，“全协”系统的朝鲜人散发了《以罢业（罢工）和示威进行反对万宝山事件的斗争》的传单。“大阪朝鲜人协会”总部也散发了《希望同胞不要轻举妄动》的传单。

“平壤府吴服商组合”发表了《民众应自重的声明书》。这些都寄给了长崎县的朝鲜人。另外，在这一事件前夕出版的金三民著《在满朝鲜人的贫困及其解决办法》，有着相当丰富的内容。在《旅满朝鲜人的重大问题解决办法》中写道：

关于服从中国的法令和义务：

美国甚至还有日本，就连很好遵守其国法并尽义务的人，也以是外国人为理由禁止其入境或加以排斥。虽说是不完整并且陷入了混乱，但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被承认的中国，对于作为亡国民的朝鲜人仰仗日本的势力而不守法令，甚至故意违法，或者不履行纳税等义务的行为表示愤怒和排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全然无

视他们的主权、威信和体面的侮辱行为。就连在北满地方，中国农民和朝鲜农民受着马贼团的政治统治，也都缴纳税金，可是在（满铁）沿线等日本人的所在地，日本和朝鲜人都不承认中国的官府。说得过分一点，这是没有过国际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资格。就象“入乡随俗”的谚语所说的那样，居住其地就必须服从其地的规定，人不能没有识时务而安分守己的雅量。因为处在内地所谓不逞团统治下的时候，也同他人一样缴纳义务金，遵守规则，维持起码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自治，是社会共同生活的要谛。如果我谦让，对方也就会客气，实行某种程度的协调，以使事情得以圆满进行。日本人是根本瞧不起中国人的，而朝鲜人也带着这种想法而装模作样则是可叹的。虽然一等国民的日本人也许可以这样，但可称为亡国民的朝鲜人，要永远避免这样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吾人在改正日本人此种态度的同时，作为朝鲜人不应有那样的想法和那样的恶习。在吾人看来，那的确全是日本人对华政策的错误。

由于这个建议是通过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合法出版物提出的，带有不得不把自己叫做“亡国民”的局限性，但其真正的用意是说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认为一部分朝鲜人无视中国主权的行爲，责任完全在于日本人的对华政策。由于这一著作还谈到“第一，允许归化；第二，站在朝鲜人立场上对中国人进行陈情交涉或斗争；第三，通过服从中国人的法令义务来使压迫得到缓和或者消除”，这就反对了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住在中国东北的所有朝鲜人加入日本国籍的企图。这样的呼声在万宝山事件的前夕出现，是在分析万宝

山事件时所不能忽视的。

柳条沟^①事件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沈阳郊外的柳条沟炸毁了满铁路轨，而把它说成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所为，又用秘密运送的重炮轰击沈阳，占领了北大营。当时，由于蒋介石对东北军下了“即使遭到日军进攻，也要慎重行事，尽量避免冲突”，“为了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的反击。在满铁沿线同时采取行动的日军，在5天之间，就几乎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全境。日军进而在11月，占领了达到苏联边界的整个东北三省。在12月底，侵入邻接华北的热河省，到1932年1月中旬就占领了该省。日本经济联盟、日本工业俱乐部、日华实业协会等垄断资本家团体，积极支持在满洲的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1932年1月，日军进攻了驻在抗日运动高涨的上海的中国军队。但是，与作为军阀的地盘、人民大部分处于无组织状态的东北不同，上海是中国的心脏地带，工人运动和解放斗争的传统很强，在这股力量的支持下，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士气很高，加之在上海，帝国主义各国的权益交错，也不利于日军的行动。由于这种战线的僵持状态与当时日本还没有做好同中国开始全面战争的准备，并由于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以进攻中国红军为主，害怕抗日战争和抗日运动的发展会破坏自己的政治基础，便于5月5日签订了停战协定。此后，日军就集中其全力进攻抗日军队。在日本国内大

^① 据徐建东、王维远在《九一八事变肇事地名考释》一文中所作的考证（《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应为“柳条湖”。——译者

肆进行“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蛊惑宣传，确定了以军国主义化和对外侵略转移国内矛盾的方向。

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一直进行到1945年战败为止的侵华战争的序曲，是日本资本主义必然要走的道路。

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

满洲事变是日本统治阶级制造的，而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和先进的工人、知识分子，则不顾残酷的镇压，勇敢地反对侵略战争。据内务省警保局编的《社会运动状况》说，在此之前，1927年春，“以反对帝国主义，支持成为战争牺牲品的无产阶级子弟，反对军费负担”等等为目标，组织了“反对干涉中国同盟”，第二年改称为“反对战争同盟”，1929年又改为“反帝同盟日本支部”（简称日本反帝同盟）。日本反帝同盟采取了如下的方针，即“作为一支以苏联为首的、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力量，一贯坚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反对重新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国际上组织结合起来”。在反帝同盟的行动纲领中提出了从“反对准备战争的企业合理化（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强化劳动、失业）”，“反对对军需工厂实行军管，反对对化学、金属、交通等其它工厂及机关实行军管”，“反对榨取工农租税的军事预算以及反对其对失业保险、社会保险的分配”，“粉碎从内部、外部进行的青训（青年训练）、军教（军事教练），反对其它的军事教育”，到“要求从朝、台、满撤军和反对对其增

兵”，“坚决反对对中国进行所有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干涉”等口号，反对国内的军国主义化和对国外的侵略。另外，反帝同盟还提出了赔偿由于征兵和演习等给人民造成的损失和满足士兵的要求，即“全部付给退伍、入伍、征兵检查的旅费、住宿费和其它费用，全部付给征兵检查日的薪水，反对演习时在戒严令下的强迫住宿，反对征收和破坏田野农作物和建筑物并赔偿全部损失”，“反对由入伍、点名、召集预备役造成的失业，退伍时立即恢复工作，保障在入伍、预备役期间的家庭生活”，“改善士兵生活，保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外出、通信、读书、会面的自由”等等。反帝同盟还把“通过盟员的入伍，在兵营中建立班的中心，争取尚未组织起来的士兵，加强在兵营中活动”、“理解并灵活运用把兵营中的不满情绪大规模地酝酿和集中起来，使其朝向一个斗争目标的方法”、“顽强地宣传兵士提出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以及不向兄弟的工人、农民、殖民地民众开枪”等任务纳入运动方针之中，重视对士兵进行工作。采取这种方针的反帝同盟，仅在这一年，就进行了下列活动：9月1日在水户团内散发了传单，向在新泻县下步兵第16团村松分屯队兵营附近的入伍欢送者散发了大量传单，在石川县金泽市内特科队附近张贴了传单等等。

在发生满洲事变时，反帝同盟进行了斗争，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战争动员了全部军事机器，利用满铁爆炸事件，发动了侵略满蒙的战争”。它还规定了如下方针：“日、满、鲜、台、中国的工人农民，加强国际的团结进行还击，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确保远东的和平”，“进行群众性的反战斗争，将工厂农村中的一切反帝活动集

中到反战斗争中来，组织群众的行动，为准备起义而系统地
进行活动”。提出了“在工厂、农村、兵营掀起反对侵略
满蒙的斗争”，“立即从满、蒙、朝鲜、中国撤出军队”，
“日、中、朝、台的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等口号。会津若松步兵第29团的二等兵金田于第二年的
三·一五纪念日在兵营的便所张贴了檄文。在被捕时携带
写着《停止去满洲》、《去满洲是送死》、《反对出兵满洲，反
对帝国主义战争》等口号的传单50张。据当时检察机关方面
的资料，还有受到无产阶级教育运动影响的小学生，也在作
文中写道：

日本现在正在同中国打仗。在满洲内地，日本的财
主杀死无辜的农民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给他们带来莫大的
痛苦。中国农民对造成自己痛苦的日本兵进行了反
抗。但这不是士兵的罪恶，而是财主的罪恶。在日本也
把中国农民叫做匪贼。被称作匪贼的是什么人呢？是坏
人。但实际上是不是坏人呢？因为日本是主张忠君爱国的，
所以一说匪和贼，就认为真的是那样。这大概是由于在报
纸和杂志上写着着的吧。看一看把日本人叫做匪贼的例
子，首先是揭露神武天皇在我国所干的坏事而反对天皇
的人。无论如何，被称作匪贼的人不是持有先进武器的一
方。同样，在今天也把反对日本财主的人叫做匪贼而杀害
我兄弟。兄弟们觉醒吧，匪贼不是我兄弟的敌人。真正
的敌人是财主，打倒财主。

灌输侵略中国的思想与平顶山事件

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统治阶级侵略中国的思想，也

给国民大众普遍地造成强烈的影响。当时的社会民众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声明认为：“在坚决反对始终拥护资产阶级权益这种态度的同时，我们也坚决不采取因为是资产阶级的权益，满蒙就应该无条件放弃这种空想的国际主义态度”。进而在第二年1月的大会口号中提出“把满蒙的权益从资本家手中夺回来”。在全国劳农大众党1931年12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即“总而言之，我军这次出兵山东，实出于万不得已的行动，不是只用一个小小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公式就能解决问题的”，“把满蒙的权益从资本家手里夺回来，交给工人和农民”，“把我国现在的200万失业者派到满蒙的原野，满蒙的权益应该通过他们的手来处理”。显然，这些主张是完全支持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这种主张表明，顽固的反共主义者“无产政党”的右派首领们起了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另一根支柱的作用。

通过侵略战争转移激化的国内矛盾的倾向，在文艺中也表现出来了。当时的流行作家三上於菟吉在日军开始对中国东北侵略时写道：“呵！国民们，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吧！缺乏食物而要世世代代生活下去的国民，应当希望获得丰富的国家资源而形成自给自足的乐土，谁也不要为此而不好意思，这是自然的意志”。呼吁全体国民参加侵略战争和掠夺中国的资源。他还写道：

我看到过北中国，那里土地广阔，缺乏民治。民众的生命财产没有保证，处于危险之中。那里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军阀的诛求，土匪的暴力，无能为力的人们抛弃了开发的希望。而对这些人给予生命财产的保护，同时考虑把这广阔的土地，让日本民族从事耕作和共存

的可能性。

鼓吹对华北进行侵略。

另外，当时的流行作家直木三十五，在其小说《日本的战慄》中描写了一个饱尝人间辛酸的工人出身的主人公，被投入侵略战争的战场，虽然怀有许多疑问，但终于感到“比起俺入伍前所搞的罢工来，是远为纯粹的、勇敢的事业，这是事实”。直木是把这种态度作为“美”来描写的。但这样的文学，结果是把阶级矛盾引向赞美侵略战争的方向。同时，当时国民大众的大部分，事实上就是这样参加了侵略战争的。另外，在直木上述小说中，借用一个新闻记者的口吻说：“也许只有在欧洲，军阀才是不需要的，对要控制近邻中国的日本人来说，目前必须实行彻底的军国主义，因为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是错误的”。这证明了在明治以来的军国主义政策中所加强的对朝鲜人、中国人蔑视的思想，通过关东大地震时的屠杀，深刻地渗透到国民大众之中，而通过利用侵略战争的机会进行的种种宣传更进一步加强了。其结果表现为，1932年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平顶山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中国人的事件。

“满洲国”的成立

全部占领中国东北之后，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10月向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提出了如下方针：

使中国东北同中国本土绝缘，以建立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而实权握在我手中的独立的新满蒙国，其疆域为东北四省及内蒙。以此为目的，在促进此间政权神速演变的同时，在实质上确立我方在各方面进行经营的牢不

可破的基础。

企图建立一个傀儡国家。12月成立的犬养内阁的陆相荒木说：“新满蒙是与日本本土没有任何政治关系的特殊地区”。日本政府也按这个方针行动起来。1932年2月，在日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声明中说：

不得认为中国是联盟章程中的所谓“有组织的国家”。过去按照各国间的协议，中国也受到好象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那样的待遇，这是事实。但是，凡假设都是不能持久的，……如果日本在中国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可以尊重该地是被“有组织的国民”所占据的假设，但因日本同时有巨大的利害关系，因此不可能把中国的混沌状态看作是有秩序的状态。在中国各地存在的权力，只是在实际上行使权力的地方有其基础，超出了这个地区，就丧失了代表中国的资格。

这个声明的实质就在于，认为中国在过去是按照大国间的商定，才被恩惠地当作“有组织的国家”对待的，并认为中国人没有行使主权的能力。在中国拥有很大“权益”的日本，有占领、统治中国的权利。根据这一方针，1932年3月，日本政府承认了傀儡满洲国。三井与三菱两财阀，还在4月26日与“满洲国”签订了2000万日元的贷款合同。

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国家“满洲国”宣布“独立”，把旧清朝的逊帝溥仪抬出来充当执政，进而在1934年3月实施了帝政。日本同“满洲国”之间的关系，正如在1932年9月的《日满议定书》中说的：“应确认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它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予以尊重”；“确认对于缔约

国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同时也是对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相约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这就继承了日中间的不平等条约（象使此地日本人的商租权转化为所有权那样，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条约），其军事力量也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1943年满洲国政府编纂的（实际执笔者是日本人）《满洲建国十年史》恬不知耻地说：“唯有根据日本的国体原理，遵照日本国的指导，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先驱基石，以追求各民族的理想为动力的国家，才可以说是满洲国的真面目”。这就是说，“满洲国”完全是一个傀儡国家。“满洲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在经济结构方面也清楚地表现出来

第11表 “满洲国”贸易累年比较表

（单位：千日元）

年度	出口额	指数	进口额	指数	贸易总额	指数	超过额
1931	739235	100	341560	100	1080795	100	(+)397675
1932	618156	83	337672	98	955829	87	(+)280484
1933	448477	60	515832	151	964310	88	(-)67355
1934	448426	60	593562	173	1041988	95	(-)145136
1935	421077	56	604149	176	1025227	94	(-)183072
1936	602758	81	691830	202	1294589	119	(-)89072
1937	645297	87	887411	259	1532709	141	(-)242114
1938	725454	99	1274747	374	2000202	185	(-)549293

（据细川：《殖民史》）

了。除了苏联经营的中东铁路外，全部铁路都被“委托”给满铁经营（中东铁路也在1935年被日本收买），其它重要产业也为日本所控制。

经济关系的变化，首先在贸易方面表现出来。第11表说明，从满洲事变时到日中战争初期，满洲对日本出口的指数从100下降到99，相反，从日本的进口，在同一时期却从100激增到374。因此，贸易收支大幅度地从黑字变成赤字，完全从属于日本经济。

经营殖民地的基本方针

1932年7月24日关东军总务部制订的《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策案说明》，反映了后来经营殖民地的基本方针。该文件说：“日满经济建设的重点，是把日满两国合成一个经济‘区’，这不仅是应付现时世界上转入封闭经济的局面，实是确保、开发作为日本生命线的满洲资源，确保平时和战时日本的生存，使日满成为一体，以图确立和发展东亚经济”。“满洲的经济开发，考虑到同日本产业的关系，要最合理地给以指导，并且为制止列强经济的扩张，以期迅速地发展经济，根据所谓统制经济的主旨，按照统一的方针，实行切实的统制是绝对必要的”。由于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帝国主义竭力划定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区），使得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激化了。而在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倾向，就是面临着这种事态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垄断中国东北的资源与市场，来改变这种形势。其次，在该文件中还说：“从一般产业上和国防上来看，重要的基础产业，在目前的情况下，不管在经济核算方面有利还是无利，必须

在列国的经济扩张及国内的难题发生之前，作为一项紧急事业来办。为了适应这一要求，使具有国家代理机构性质的满铁，综合经营各种事业是最为妥当的”。日本统治集团对中国东北提出的要求，首先就是进行现代化战争所不可缺少的国防产业的资源，而企图以满铁为中心来组织这种建设。这除了满铁历来同关东军有着互为表里关系的近亲感外，还由于把重要产业作为日本的国营产业，当时尚有许多应加以考虑的问题。该文件说：“满洲的重要事业在国策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日本国的直接经营为理想，把它作为日本国国营事业，以避免对满洲国及第三国的关系是明智的。又因作为满洲国国营事业尚缺少这样的实力，故使在满洲开发方面负有国家代理机构使命的满铁公司进行经营最为妥当”。正如在这里所表明的，虽然他们是以历来的“军工厂”型的资本主义官营事业作为理想的，但在当时还不得不从对外的观点来加以考虑。1933年3月，以“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表明了占领下的殖民地经营的方向：

鉴于无统制资本主义之弊病，必须实行国家统制，灵活运用资本的效果，以求整个国民经济健全和迅速的发展。这样来使国民大众的经济生活丰富稳定，充实能提高国民生活的国力，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谋求文化的提高，以实现作为建国伟大理想的模范圈为经济建设的最终目标。

为了达到上面的大目标，在下列四大根本方针之下向经济建设迈进：

一、以国民全体的利益为基调，消除由于开拓利

源、振兴实业所带来的利益被一部分阶级垄断的弊病，使万民共荣；

二、为有效地开发国内蕴藏的一切资源、综合发展各个经济部门起见，在重要经济部门，要采取实行国家统制的合理化方策；

三、在开拓利源、奖励实业时，要本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精神，广求世界资本，特别是适当有效地利用各先进国之技术、经验及其它一切文明之精华；

四、以东亚经济之融合与合理化为目标，首先鉴于善邻（日本）与我国（伪满自称）间之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须置重心于彼我之协调，以使相互扶助之关系，日益紧密。

基于上述根本方针的宗旨，以在目前形势下可能实现并且是最有效的手段，在以下范围内实行国民经济的统制：（1）具有国防的或者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产业，以公营或让特殊公司经营为原则；（2）除上述之外的产业及资源等各种经济事项则委托给民间的自由经济，只是为了特别重视国民的福利和维持其生计，要在生产、消费两方面进行必要的调节。

军部反资本主义姿态的本质

上述基本政策的主要精神，不消说在于结成“同日本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虽然在这里打出了“非资本主义”的招牌，但这不过是把殖民地经营冒充“国民的”事业的一个幌子。日本统治东北，并不排除大资本，这一点只要看看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1932年11月说过的“不只是大资本家，

也希望零细资本的发展”就清楚了。其本质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欺骗宣传下，加强国家统制，以建成国家垄断资本的实验国家。这从后来日本在东北的资本，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引导下，财阀资本不断扩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纲要说：

在开拓利源、奖励实业时，要按照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精神，广求世界资本，特别是适当有效地利用各先进国的技术经验和其它一切文明之精华为第三个方针。

如前所述，当时日本统治者为了经营东北和准备新的战争，尚必须进行一定的外交考虑，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由于采取了把东北作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殖民地而开发的姿态，企图努力引进它的资本和技术，为此暗示有外国企业活动的余地。

这个纲要又说：

在把重要产业委托给一般自由企业时，企业家和专利转卖者们只是抢先垄断矿山、未开发事业的专利权，事业的着手不易进行，而坐待周围的发达给事业带来希望，在此期间，或通过利权转卖而取不劳而获之利益，大有阻碍开发之虞……，即使暂时着手事业，也是只选能尽快得利的部分而放弃为开发整个满洲所必需之设施，有阻碍全面的综合开发之虞……。不仅如此，假如将重要产业分解为铁道、炼铁、煤矿事业，同国内同种部门的产业团与同一系统的资本结合起来，固然有使日满间的垄断企业相结合，排除摆在日满双方经济欲求之间矛盾的好处，但同时，这种垄断企业的结合，基本上

无法考虑企业合理化方策等，有盲目地被内地财阀掌握其支配权，日满经济关系不过是从资本家的观点得到调整，而满洲的经济建设并不是为了一般国民的利益，而仅仅是以追求资本家的利益而告终之虞。因而，目前以完全由国家进行统制的半官半民的企业形态的满铁作为改善其外部监督制度的手段为适当。

在这里虽然可以看到似乎是反对“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姿态，但决不是否定资本主义本身。当时，军部法西斯分子的任务是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它的实现，虽在追求利润方面暂时受到限制，但也必须忍耐。就是说，他们必须更优先地解决所追求的“高度国防国家”的任务，不允许“追求专利”、“转卖专利”成为它的障碍。他们面临着当时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和为士兵提供给养的农民的衰落，散布“反资本主义”的蛊惑宣传，但其理想的形态是“完全由国家进行统制的半官半民企业”。当时，他们大大不满于日本国内向总体战过渡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对既存的财阀怀有不满，认为国家资本的扩展与半官半民的企业形态有利。从这个纲要中所说的“今后要在满洲尽量发展的事业，主要是对国防经济有意义的重工业，而在经营上要达到有利可图的阶段则需相当的岁月，大多不是私人资本容易经营的对象。我国资本家当然想输出资本，但却不喜欢带冒险性的企业投资。因此，可以推想在满洲的现状下，会选择利润有所保证而将危险转嫁给他人的方法进行投资（对满铁的信贷投资等）”，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在日本本国建立“高度国防国家”速度，对军部法西斯分子来说，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的这就是他们企图在中国东北建立法西斯“实验国家”的原

因。基于上述理由，“纲要”期待满铁“在今后困难的满洲经济建设中，应以有实力的满铁为中心，在可能的范围内使其发挥全部能力”。同时也没有忘记要求由关东军完全控制满铁，要“以在满洲的日本一方的最高统治机关关东军司令部作为满铁的直接的和最高的统制机关，使其统督满铁公司的整个业务，当然还有对满铁干部的任免，也掌握着任免权或至少是同意权（本件以改正敕令正式地承认权限为理想，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建立实质上能运用自如的机构）。

向实行总体战的“高度国防国家”过渡

在1932年8月的《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策案》中，制订了“把日满经济合理地融合为单一体”，“比外国更早地在满洲扶植牢固的日本经济势力，诱导后进国的满洲国经济”的方针。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使其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另外，这个《根本方策》还以“铁道、河流、港湾及其附属事业”由满铁经营，而“一般产业方面及国防方面的重要产业”，“像武器制造这样的与军事直接有关的工业”，则由日本方面经营。特别是关于资源方面，指定了铁、煤、特殊钢、石油、有色金属、苏打、硫酸、煤炭液化等等，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在中国东北获得什么物资。并且还规定了“以不陷入让内地资本家垄断该项事业或榨取利益的弊病为要件”，摆出“反资本主义”的姿态，但这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即为了“加强日满经济界的团结，使之互相均沾其利益，调整同日本经济界的步调，并且为了在满洲国经济界扶植牢固的经济实力，使其与内地的同类部门的产业团和企业合并为目的”。另外，像所说的“在炼铁事业方面，要注意

在内地审议中的炼铁业合并问题，谋求事业的圆满发达”那样，不是同日本垄断资本根本对立的，只不过是 要把建设“高度国防国家”摆在首位，为此要求主导权而已。另外，在《根本方策》中谈到了“农业移民事业是日本方面的半官半民事业”，“特设奖励邦人农业移民的机关以期其实行，特别是以复员军人为骨干”这样的移民方针。这是在日本农业问题深刻化的情况下，企图从“满洲移民”方面寻找出路。这成了当时计划的武装移民的出发点。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对其采取的基本政策到1934年基本上完备了。1936年以后，进入了以《长期计划》为开端的长期计划阶段。1932年9月1日，由关东军司令部制订的《关于日满经济统制实行上的基本要件的意见》，在上述《根本方策》的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了补充。

这个文件继承了《根本方策》，认为“如前报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策所述，关于在满洲的日本方面及满洲国方面的经济统制，以使在满之日本最高统制机关收所谓统制经济之实效为本旨”，进而谈到“然把满洲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而得到完全合并统制之实，一定要按照日本未来的经济机构，彻底改善日本本身的经济统制，并指导日满经济的统制，以此为一转机，进行日满经济区产业的改建”。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以关东军为中心的法西斯集团，以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为杠杆，为使整个日本经济过渡到实行总体战而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的意图。另外，在这个文件中，还认为“为了把满洲的资源及产业真正掌握在日本的手中，必须使日本的资本最有效地使用于满洲。为此，要设立大投资公司，动员邦人的大小资本”。在这里显示出，

他们所谓“反资本主义”姿态的本质，只是限于对“高度国防国家”建设的速度不满。实质上非常期待大资本的活动，表现了接近日本垄断资本的姿态。在这个文件中，还认为“至于像炼铝工业那样的有利于在满洲开发的国防资源，希望在满洲开发，但在内地也不加以阻碍”。这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所谋求的是什么。

接着，在1932年11月21日经关东军特务机关之手制订的《关于根据日本国策满洲开发事业的组织及其形态的方针草案》，在方法上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个文件说明了由特殊公司经营重要的产业，而“满洲国政府赋予上述各特殊公司一定的特权”，并全面地规定了特殊公司所起的作用。后来经满洲国之手编纂的《满洲建国十年史》说“特殊公司通过所谓一业一社^①主义被赋予了垄断的地位，与这种一业一社主义必然联系着的，是企图进行所谓‘巨大建设’虽然出于时局的需要，在这里可以看出所谓满洲的意识形态”。正如这里所说的，特殊公司是以日本的国家资本、满铁和日本垄断资本为中心而构成的垄断经营组织。上述文件，关于这种特殊公司的统治机构有这样的记载：“公司干部在尽量采取多数制的方针下，经理为满洲国人，副经理为日本人，其下以5名日满两国理事组成理事会”，“上述理事，日本人3名，满洲人2名”，“副经理行使理事长的职权”，“满洲国对上述公司的监督权的行使，须预先得到关东军的认可”。这种特殊公司是按与其它傀儡组织（国家机关等）同样的原则经营的，其实权都操在日本人手里。以特殊公司为中心这

① 即一个行业，一个公司。——译者

一原则是以1934年3月1日公布的《满洲国经济建设要纲》中的“带有国防性质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以使国营或特殊公司经营为原则”这样的条款表现出来的。

五、《二七年纲领》和《三二年纲领》

日本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劳农派、讲座派

由于“战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世界资本主义、特别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表面化的时候，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围绕着路线问题发生了争论。当时的共产党抛弃了改良主义的、议会主义的幻想，指明了打倒帝国主义和革命的道路。

贯穿于《二七年纲领》和《三二年纲领》的基本路线认为，日本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它的整个政治、经济中，还大量存在着封建的因素。在经济特别是农业方面，半封建的地主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皇制是专制主义的，它对垄断资本和地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认为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天皇制和实行土地革命，是迅速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与此相反，“劳农派”却认为，农业中的封建制是残余而不占统治地位（认为高额地租不是由封建的本质而来的，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由于人口过剩等原因，变成了竞争地租），天皇制在政治上也是残余，资产阶级掌握着全部权力。认为革命的目标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带有广泛的资产革命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天皇制的斗争和

土地革命则是第二位的。

当时的日本已经达到了发达的垄断资本的阶段。但是，为了使革命成功，它的任务就不但要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问题，而且必须抓住政治权力、经济结构的现实，指明既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又把广大的农民和市民团结起来的方向。在这一方面，劳农派的主张，可以说是无视以哪个阶级为中心，团结哪个阶层这一实践上的课题，无视天皇制在当时日本的政治思想领域内所起的作用。如上面已经说过的，如果不能明确揭露资本主义的缺陷并对它进行批判，弄清包括地主制在内的权力结构，并明确如何对其进行斗争，就不能团结广大的人民，使革命力量壮大起来。这是由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讲座派”围绕着《三二年纲领》形成了与此相同的看法。其出发点可以说就是1922年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制订的《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在这个草案中，认为日本的国家政权“掌握在大土地所有者和一部分工商业资产阶级联盟手中”，由此，不但可以把工人，而且可以把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等广大人民集合在革命周围。而把当前的革命性质规定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认为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将成为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序曲”。

《二七年纲领》

《二七年纲领》（《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认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远东在世界经济及世界政治上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就

成为特别紧急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经过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扩大侵略以及对中国、印度、近东、太平洋各岛屿和苏联领土的侵略，使日本成了整个广大亚洲大陆上的头等帝国主义强国。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对立的主要焦点之一就逐渐在太平洋沿岸形成起来。与此同时，一个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具有无限意义的现代最强有力的革命运动，也正在中国发展着。

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极其危险的存在的认识和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及其意义的评价作为出发点。《二七年纲领》还说：

对缺乏铁矿和煤矿的日本来说，中国是其主要的原料来源地。同时中国又是日本工业品的主要市场，占日本出口总额35%的产品是运往中国各港口的。中国又是日本资本输出的主要投资国，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首先是在满洲对工厂、矿山和铁路投资的总额就约达25亿日元之多。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对上述自己利益的直接威胁。为了扼杀中国工农革命运动，当然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和消耗巨额费用，同时也不拒绝任何同盟者。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险恶的敌人，它运用着非常狡猾的外交手腕，企图占领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据点。

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依赖中国的资源和中国的市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

《二七年纲领》还认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抬头，围绕

着统治中国和亚洲的霸权，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了。它说：“日本帝国主义与英帝国主义间的利害关系，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至于日本与美国的矛盾则更为严重”，“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共同打击中国革命、共同准备对苏战争的同时，又准备把太平洋沿岸的帝国主义式的分割推向一场血淋淋的斗争，因而各自加紧军备”。而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认为工人与农民的革命同盟“必须站在以日本国家的民主主义化和消灭各种封建势力为目的的日本全体劳动人民的斗争的前列。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一刻也不能忘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一般发展规律。共产党必须与日本的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建立紧密的联系，并给予他们一切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支持”，提出了“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危机进行斗争”、“停止干涉中国革命”、“殖民地完全独立”等等行动口号，作为从正面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口号。这样，从正面同当时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路线，就在正确认识天皇制和正确评价中国革命的基础上产生了。

《三二年纲领》

《三二年纲领》（《关于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任务的纲领》）是在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的新形势下制订的。《三二年纲领》认为：

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强盗战争，正在把人民大众投入一个世界大屠杀战争以后的最大的新的历史危机中。中国东北的占领，在上海和中国其它各地的流血事变等，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所进行的全部军事行动，是在

现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由最大帝国主义国家之一所发动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的这个帝国主义战争，反映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总的危机和经济恐慌的深刻，反映着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

这种认识，是从满洲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的观点出发的。

另外，《三二年纲领》认为：

目前的日本帝国主义扩张领土的战争与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有着直接的联系。

详细地谈到了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在各个阶段都是同侵略朝鲜、中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三二年纲领》正确认识了天皇制的本质，指出：

日本的天皇制一方面主要依靠寄生的封建的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又依靠暴发的贪婪的资产阶级，它既与这些阶级的上层结成极紧密而持久的同盟，以相当大地灵活性来代表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但同时又保持着它独立的相当大的作用及仅仅被似是而非的立宪形式掩盖起来的绝对的性质。以前日本共产党内曾过低估计了天皇制，存在着把议会和政党内阁同天皇制对立起来看的思想，认为议会和政党内阁对天皇制是独立的，是特殊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形态。这种思想是根本错误的。

上述观点的产生，是由于正确地认识到，从日本资本主义产生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整个过程，就是通过侵略朝鲜、中国及牺牲这些国家的利益来完成的。《三二年纲领》还认为：

日本的革命能使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首先是邻近

日本的东方各国（中国、朝鲜、印度等等）反帝国主义，反半封建的革命的胜利，易于实现并且促其实现。谈到了日本的革命同亚洲各国的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同亚洲各国的革命力量建立了紧密的团结之后才能胜利，并提出如下口号：

解放朝鲜、台湾、中国东北部以及其它从中国掠夺来的地区。立即从这些地区撤退日本军队。拥护苏联和中国人民。

以上就是《二七年纲领》和《三二年纲领》，在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亚洲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和加紧侵略中国的时期，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最深刻的认识和制定的同它进行斗争的路线。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其它思想相比，是空前充实的和科学的。但是，这样一条基本上正确的路线和勇敢的斗争，并没有能把广大人民集结起来。这是由于残酷的镇压，未能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所致。还因为，当时的革命运动，没有切身地经历像中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政治力量是不足的。明治以来没有经历过因对外战争的失败受到巨大打击，把国家权力、特别是天皇的权威看成是万能的，这种印象仍给人民群众以强烈的影响。尽管如此，它在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同它进行斗争方面，必须给予高度评价。正如已经说过的，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议会的改良主义的区别，尚不十分明显，只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才掌握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是忠实于这一思想的。由于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所以产生了上述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认识。

六、朝鲜与台湾的作用

朝鲜大米增产计划的推进与朝鲜农民的贫困

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使日本统治下的朝鲜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朝鲜变成“大陆兵站基地”。

正如朝鲜总督府的出版物所说的：“奖励和指导麦类及补充作物甘薯、马铃薯等品种的选择、栽培及贮藏方法，减少半岛内大米的消费，以求增加其出口量”（《施政25年史》），日本帝国主义一占领朝鲜，首先就准备把朝鲜作为自己廉价的粮食供应地。因此，朝鲜向日本出口的大米，从1911年的36万石激增到1919年的280万石。在这期间，朝鲜每人每年大米的消费量也减少了3升2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日本的“抢米暴动”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低工资政策，推行了“增产朝鲜大米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按1.86亿日元的预算，从1920年到1935年，改良土地40万町步，以便增产大米920万担。这个计划，由于日本国内米价的变动与同地主势力的矛盾而进行了修改，成为《修订大米增产计划》。《修订计划》要求，从1925年起，在10年之间以2.85亿日元的资金，改良土地30万町步，加上“农事改良”，共增产大米800万石。这时的“土地改良”，就是对一向主要依赖雨水的水田实行灌溉，因此，农民在水利方面就受到更加严格的控制。另外，作为“水利合作费”在20年以上的时间内，每反要征

收5—10日元。当时在朝鲜发行的为数不多的朝语报纸之一《东亚日报》冒着被残酷镇压的风险，在1925年7月12日的社论中指出：

看一看当局一面要我们增产大米，一面又奖励用满洲粟代替食用米，就不难推测出增产大米计划的根本精神何在。

进而在1927年2月1日的社论中说：

水利事业是必须积极奖励与促进的，朝鲜的山河，切实地要求这样做……。但是，现有水利组合的实际情况却使我们不寒而慄。看一看水利合作的现状，在水利组合地区的朝鲜人土地，几乎全部为水利组合所占有，也就是为日本人所占有。在水渠经过的地方，由于过重的水税负担和组合方面的狡猾伎俩，使贫弱的朝鲜小地主不得已廉价拍卖土地。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组合方面同地方监督官厅之间对此似乎有某种程度的私下交易。

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水利化，无非是更进一步压迫、掠夺殖民地人民的一种手段。

此外，“农事改良”也是通过购买肥料和增加农业机器，使朝鲜农民更多地受到日本资本家的掠夺。因此，正如朝鲜总督府的官员久间健一所说：“农业的飞速增产是实现了，但与此同时，也迅速增加了无地的农民。无地农民如此大量的出现，从反面证明了土地的集中。水利合作事业对这种土地兼并，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朝鲜农政的课题》）。这就使朝鲜农民更加贫困。1919—1932年间，朝鲜佃农占全部农户的比率从37.6%激增到51.7%。这些朝鲜农民失去的

土地，主要集中在日本人手裡。在朝鲜的日本人占有的土地，从1920年的25万町步增加到1925年的40万町步。进入山岳地带实行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的火田民，从1926年的9.4万户激增到1932年的15.6万户，这一事实，就同朝鲜农民的贫困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增产大米计划》完全是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虽然按照这一计划增产的大米是270万石，但向日本的出口却超过了600万石。在此期间，从中国东北向朝鲜出口粟的增加，就是因为生产大米的朝鲜人却吃不上大米。日本资本主义企图使朝鲜成为保证在日本实行低工资的廉价的大米供给地，一旦遇到农业危机，就毫不犹豫地牺牲朝鲜农业。因此，1930年朝鲜大米的丰收，反而使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更加厉害了，与前年的米谷生产额相比，朝鲜农民损失了7265万日元。棉花、蚕茧的价格暴跌。即使根据1930年的保守的统计，佃农的60%，甚至自耕农的20%—30%，在秋收后至第二年春天都成了缺粮的“春荒户”。

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所造成的朝鲜经济的变化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给朝鲜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视察过当时朝鲜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高桥龟吉说：

而且，由于作为其主要销路的日本内地的米谷过剩而造成的内地农村贫穷和基于满洲国的独立而出现的同日满经济区的关系，这种农业国朝鲜的苦闷日益加剧了（《现代朝鲜经济论》）。

高桥还谈到

从日满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朝鲜农业的位置为一变。其理由是，历来以内地、朝鲜、台湾为一个区域而制订经济政策的日本，现在不得不把满洲包括在该区之内。这是因为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在区内作为农产品的供应地，今后不得不把农产品的供给权给予比朝鲜更为有利——至少是在今后的农业开发方面——的满洲（前引书）。

由于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朝鲜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地内部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高桥还以下述理由，主张在朝鲜实行工业化。这就是：

朝鲜的人口过剩，实质上超过了内地，所以容易得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

作为满洲物资的集散港和加工地，为朝鲜的前途开拓了一大新天地。

如果条件具备，向满洲输出产业亦有发展的余地，这也将大大开拓朝鲜的前途。如果现在不把粗工业在朝鲜建立起来，那么，由于同中国等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日本的粗工业迟早不得不遭到衰落的命运。因此，要求我国工业家尽早把这一类粗工业在朝鲜兴建起来，从历来的经验看，意味着把迟早要遭被中国夺走的命运的工业提前移植于朝鲜而加以预防。

同时，像他说的

将朝鲜今后的大策置于它的工业化和满洲移民，实为解决现在朝鲜农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贫穷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那样，就是通过朝鲜地位的变化，促进利用朝鲜低工资，建设殖民地工业。

高桥还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写道：

如从日本地区分工的立场而言，把日本作为精工业地带，把朝鲜作为粗工业地带——因特殊资源而建立的产业另当别论——，把满洲作为农业地带，并使三者间互相协调，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对立的关系最少，相互依存的关系最紧密，是最妥善地保证三者各自利益的最佳且进步之方法。这同时意味着，朝鲜今后应停止迄今为止的费钱多而收效不大的农业开发，极力将其过剩人口移到满洲，使其帮助满洲国的农业开发。

在这里所提出的设想，是从满洲事变以后的日本资产阶级立场来看待殖民地朝鲜所处的地位。高桥认为朝鲜工业化的理由是：

由于日本经济势力在世界上飞跃发展，朝鲜与其作为日本工业品的市场，不如作为日本工业地带而出现在于新时代。

作为农产原料及粮食供给地的朝鲜，由于满洲独立及世界农产品过剩，显著地减弱了其重要程度。

从前不能用于工业化的朝鲜资源，由于日本经济最近的技术上的发达和进步，现在可以将其有利地用于工业化。

日本经济从原来的粗工业阶段，进一步发展到精工业阶段，其结果，把粗工业阶段的工业在朝鲜发展起来，未必意味着会发生同内地工业的对立和竞争。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殖民地工业化的本质

野口、森^①等“新兴财阀”充当了日本资本向朝鲜大规模扩张的急先锋。所谓“新兴财阀”或者“新兴康采恩”，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电力、化学、轻金属等新兴工业部门迅速发展之际，钻了原三井、三菱等旧财阀所控制的传统的产业部门与特权的空子，而在新兴产业部门中迅速发展起来的财阀。它们像在朝鲜的野口（日本氮气）、在中国东北的鲇川^②（日产）那样，起了侵略殖民地的尖兵的作用。20年代末期，野口康采恩在赴战江、长津江建设发电站，接着，三井、三菱、住友等垄断资本也侵入朝鲜。历来以半封建地主的佃租经营为主的东洋拓殖公司也投资于工业部门。在30年代初期，水力发电、金属工业、纺织工业也兴起了。近代工矿业工人，从1932年的21.4万人激增到1938年的60万人。炼铁、炼钢、有色金属等重工业，在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以后，被迅速移植进来，在1939年占整个工业的47%。1942年，工农业在全部生产额中的比率是工业占42%，农业占32%。近代工矿业工人，在1943年增加到175万人。

^③但是，这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朝鲜工业，是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日本垄断资本统治新的朝鲜殖民地服务的。朝文报纸《朝鲜日报》在1927年5月31日的社论中说：

自日本的大资本家三菱经营的水力发电公司进入咸兴以来，宁静的咸兴，再也不为旧日的主人所有了，他们不得不远徙到西间岛去。在农村佃户的呻吟声，城

① 即野口遵和森 轟昶。——译者

② 即鲇川义介。——译者

市小资本家、商人的破产，在工厂，工人的绝望的哭声，实在到处可闻。现将咸兴退潮（地名）的情况简单报导一下。铝工厂占有的土地是27万坪^①，为此而被夺走租佃权者有120户、700余人。尤其是渔业工人，谁都欠日本人的债，能够自力维持的一个也没有。日本人乘此机会逐步夺走了退潮的房屋，最可笑的是暗地里进行活动，一天之内要有两、三次的收卖运动，在不久的将来，退潮定会全部变成日本村。另外在云田一带，其惨状也是无法形容的。

关于殖民地工业化的本质，金日成曾经说过：

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工业设施，主要是掠夺原料然后运往日本，即使有点加工设备，至多也不过是制造半成品。

我国过去从来没有机械制造业。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虽有几百台机床，但大部分仅能加工零件，而不能制造机器。炼铁、炼钢工业虽是从前有过的部门，但日本帝国主义却原封不动地大量运出铁矿石。虽然在朝鲜也曾生产生铁和一部分钢，但轧钢却几乎没有（《为胜利地完成技术革命而斗争》）。

这种殖民地的畸形性，表现在尽管重、化学工业迅速发展，但1939年即使在机械制造部门，也不过仅占朝鲜工业部门的4%（占日本整个工业部门的0.8%）。另外，根据日本垄断资本的要求，片面规定朝鲜北部是重、化学工业，南部是轻工业。朝鲜的民族资本，从1911年的17.2%到1929年的

^① 坪：每万坪约合50亩。——译者

6.4%，其地位进一步下降。朝鲜工人的工资，仅为日本工人的一半。正如金日成所说：“日本垄断资本家只是拼命掠夺朝鲜的廉价劳动力，以榨取高额利润，一点也不愿采用现代化机器。在工场、工厂和矿山等处，朝鲜人都是背着孩子进行手工劳动的”（同上书），就是说以低工资的劳动，赤裸裸地进行掠夺。在30年代初，一天劳动12小时以上的工人，在日本本国不过是全部工人的0.3%，但在朝鲜却达到47%。通过这样残酷的掠夺，在朝鲜的日本资本家的利润率达到本国的2—3倍。这样高额的利润又进一步促使日本垄断资本向朝鲜扩张。

台湾对日依赖的加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对殖民地台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甜菜制糖业受到极大的打击，再加上各国的企业都转向军事化，使台湾的制糖工业迅速地扩大了。台湾的砂糖生产量指数，如以1914年为1，那么，1919年即为4.8，1928年为8。日本向制糖业的资本输出指数，如以1914年为1，1919年增加至1.6，1926年增加至3.4。并且，这个时期，同时又是以台湾为基地的制糖资本走向垄断的时期。明治制糖公司早在1907年就吞并了蔬豆制糖公司，而在1912年又吞并了横滨制糖公司；1913年合并了中央制糖公司；1920年吞并了大和制糖公司；1926年吞并了新高制糖公司。在这个时期，以台湾为基地的大制糖资本还向其它地区扩张。这些大资本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控制了冲绳的制糖业。1923年，明治制糖公司吞并了北海道的日本甜菜制糖公司，1918年创立了苏门答腊兴业公司，1924年在上海创

立了明华糖厂等，乘机向中国和东南亚输出资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农业也加深了对日本经济的依赖。这个时期育成了蓬莱米品种，这是使日本米适应台湾的水土而进行的改良，“这与其说是作为台湾人的食用米，倒不如说是作为向内地运出而奖励栽培的”。“通过蓬莱米的栽培和运出，在这里就加强了把内地与台湾的大米生产融为一体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久在下一阶段，即在统制经济时代，就表现为内地台湾农业一体化或者使台湾成为内地农业的补充。推而广之，就是内地台湾经济的一体化或加强相互补充的性质”。（《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台湾篇）而以这样的目的增产的台湾米，通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为以三井物产公司为首的日本垄断资本所操纵。

香蕉业也从1921年前后出现了，而随着日本和朝鲜市场的扩大，成了有力的企业。1924年根据总督府的指导，建立了台湾青果公司，它垄断了向运出、输送、贩卖、生产者提供资金的事业。在进行台湾解放运动的台湾文化协会的指导下，对此进行了抵制，在台中、台南、高雄三州成立了芭蕉生产合作社和联合会。

专卖事业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有力手段，它也由于同日本垄断资本的结合而被加强了。1922年，食盐制造被台湾制盐公司所垄断，向日本运出事业被大日本制盐公司所垄断。樟脑的销售权，1918年被日本樟脑公司所垄断，赛璐珞^①原料为赛璐珞公司所垄断，1919年成立了垄断公司——台湾樟脑公司。

① 赛璐珞：（Celluloid）假象牙。——译者

铃木商店与台湾银行

在这期间，与总督府相勾结而发展起来的是铃木商店。铃木商店在1902年以35万日元的资本成立于神户，通过贩卖台湾的砂糖和樟脑而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囤集各种商品进行投机而获得巨额利润。在“抢米暴动”发生时，神户人民曾经烧毁铃木商店，其原因就在于此。铃木商店在台湾拥有东洋制糖公司、盐水港制糖公司，并垄断了林本源制糖公司的销售权。另外，它所控制的日本樟脑公司和再制樟脑公司由总督府给予了垄断权，并受委托垄断了副产品的赤白油、芳油的销售。

铃木商店的迅速发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告终。铃木商店想通过得到台湾银行的贷款来克服经营萧条，因此呆帐相继出现。1926年，台银向铃木商店提供的贷款达3.5亿日元（铃木商店的债务总额为4.5亿日元）。当这些呆帐无论如何也不能收回时，台湾银行就停止了台湾内部以外的业务。其影响也波及到经办皇室财产的第十五银行。

台湾银行在其成立宗旨中规定：“目的在于开发台湾富源，谋求经济上的发展，进而把营业范围扩大到华南地区和南洋诸岛，成为这些国家的商业贸易机关，以调剂金融”，而成立了中日实业银行、中日银行、中华汇业银行等合办事业，并积极地参与了西原贷款等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台湾银行的破产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殖民统治的破产，威胁着它对华南、东南亚的扩张。因此，政府根据《关于对台湾金融机关资金通融的法律》，通过政府的补偿，从日本银行提供了1.85亿日元的特别贷款。同台银有关系的台湾工商

银行和华南银行，也得到了650万日元的特别贷款。当时向日本其它银行提供的特别贷款是6.8亿日元。此外，台湾银行在同年接受了4.6亿日元震灾期票的救济。铃木商店的倒闭及在它影响下台湾银行的破产，虽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破产，但却以此为转机，进一步加强了垄断。制糖业被三井、三菱、藤山三个系统所垄断。还有，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大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日本经济的军事化，也给台湾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台湾大米是为了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提供廉价的粮食而增产的。可是，随着日本经济本身矛盾的激化，当时在日本，台湾米、朝鲜米的运入却受到了限制。日本在1921年就已经实行了《米谷法》，经过几次修改，在1933年实行了《米谷统制法》，大米被置于国家资本的统制之下。1934年公布了《临时米谷运入调节法》，限制从台湾、朝鲜向日本运进大米。这是企图以牺牲殖民地来渡过本国的农业危机。这种企图以动员国家资本的办法来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动向，还表现在1936年成立了半官半民的国策公司——台湾拓殖公司。

台湾拓殖公司的成立与台湾变成“南进基地”

台湾拓殖公司成立的目的，除了开拓、开垦、造林、栽培、土壤改良和移民等等之外，还向榨油工业、化学工业、香蕉、纤维工业、移民提供贷款和向子公司进行投资。在3000万日元的资本中，有1500万日元是台湾总督府官有地的实物投资，1000万日元是日本糖业联合会和三井、三菱等垄断资本的投资，其余500万日元是一般募集来的。这种国策

公司，与同一时期在中国东北殖民地经营的拓殖公司是一路货色。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台湾拓殖公司其后向华南、海南岛、越南进行的扩张和其对占领区的统治。另外，在侵略中国东北后的“准战时体制”中，在台湾建立了无线广播设施。这“可以看出，关于台湾在中国事变爆发后，作为对外通讯和宣传广播的第一线所起作用的极其周到的准备，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完成了”。（《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台湾篇）1936年，预备役海军大将小林跻造被任命为台湾总督，结束了19年之久的文官总督制。这标志着台湾已经实行准战时体制。同时，总督是来自海军的，意味着在以海军为中心的“南进论”中，台湾被赋予重要的位置。

这个时期以后的台湾殖民统治，以下列6项为中心：
（1）发扬皇民精神；（2）彻底加强国防；（3）确保国民生活的稳定；（4）扩大南方的施策；（5）扩大生产力；（6）改善国际收支。这是一种要把台湾建成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基地的政策。在农业方面也采取了减少砂糖、大米的生产而增加了热带性的工业原料的措施。从建立“南进基地”的立场出发，在台湾拓殖公司的主持下，进行了纺织、炼铁、铝、水泥、电力等工业的开发。1937年台湾的农业生产总额为4.03亿日元，占生产总值的47.9%；工业为36381万日元，占43.25%。而在1939年农业为55183万日元，占44.9%，工业为57760万日元，占45.94%。工业生产超过了农业生产。但依然是食品工业（其80%以上是制糖业）占大半。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但其情况是：“本岛的机械工厂共有315个，其规模没有超出内地（日本）街道工厂的程度。在这次大战中，专门担负武器、小型船舶机械、飞机和

汽车零件，与筑城有关的机器、工具，以及其它一般机器和工具的制造、装配和修理等，同时还进行重要工厂的机器修理（《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台湾篇），当然，这只不过是起了向南方扩张的前进基地的作用。而且这种工业

第12表 台湾的工资、物价指数对照

	制糖工每日工资	指数	临时工每日工资	指数	台北市批发物价指数	台湾糙米物价指数
1929年	1.28日元	100	.80日元	100	100	
1931年	1.39日元	108	.90日元	112	80	
1933年	1.35日元	105	.70日元	87	>109 87	144
1935年	1.54日元	120	.80日元	100	>105 92	>141 204
1937年	1.57日元	122	.80日元	100	>136 126	204
1939年	1.76日元	137	.90日元	112	>112 >108 137	>120 246

备考1. 台湾市批发物价指数数据台湾金融年报昭和17年（1942）版（品种35种）。

2. 台湾糙米指数同指数表中大正3年（1914）7月基准指数。

（据大藏省管理局编：《关于日本人的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台湾篇）

化，如第12表所示，是随着实际工资下降和加强掠夺而进行的。在本表中可以看到，批发物价指数的增长率稍微超过了工资的增长率，但就当时占工人支出的大部分的米价而论，其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工资增长率。另外，如第13表所示，从代表日台工人工资的制糖业看来，台湾工人的工资不过是日本工人工资的一半或2/3。再根据1938年的《高雄产业调查会商业贸易部资料》，新式工厂的工人，与日本人的工资2.12

第13表 台湾制糖工人的工资

	日本人	本岛人
1929年	2.57日元	1.28日元
1932年	2.76日元	1.75日元
1935年	2.39日元	1.54日元
1938年	2.47日元	1.57日元
1940年	2.04日元	1.40日元

(据大藏省管理局编：《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台湾篇)

日元至2.69日元相比，台湾工人只不过是0.85日元至1.49日元。台湾的工业化，就是这样伴随着掠夺的加强而进行的。

七、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日本帝国主义在有利条件下占领中国东北

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世界在大危机下面挣扎，美、英两国都正在忙于寻找对付危机的办法和镇压国内的人民斗争与殖民地的解放斗争，没有余力干涉远东的事变。虽然从其控制下的国际联盟派遣了李顿调查团，但因希望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将被用作侵略苏联的基地而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英美帝国主义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合作者，

并希望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美国总统胡佛在1931年提交议会并得到批准的备忘录中说：“不许满洲存在无政府状态”，“在北方与布尔什维克俄国为邻，也许还勉强可以，但如在傍边又出现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就一定会危及我们的生存”。接近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早晨邮报》在11月30日的社论中主张：“日本是维护辽阔远东的秩序和良好政治的唯一因素”。美、英两国虽然抗议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但出于上述原因，处于他们影响下的国际联盟在12月的理事会上通过了“不采取妨碍为对付匪贼和不法分子与直接保护日本臣民的生命财产而采取必要行动的宗旨”。因此，日本在讨伐“匪贼和不法分子”的名义下，得以公开地进攻抗日武装力量。1933年5月缔结了塘沽协定，在日中之间实现了初步的停战。9月就任外相的广田弘毅，在10月的内阁会议上表明：“在帝国的指导下，实现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并说：“一般说来，为了使他们放弃抗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常常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之”，“就我方来说，要避免造成急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印象”。这就表明，广田弘毅的目的是，在“满洲国”成立后的新阶段，要在远东地区确立日本的霸权，为此，不惜采取强硬的态度。另一方面，蒋介石当时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把对红军的进攻置于优先的地位，对日本则实行“边抵抗、边谈判主义”的妥协政策。1934年在满洲事变后第一次会见了日本武官，1935年，对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的以“日华亲善”、“经济提携”为中心内容的“日华亲善论”表示赞同。这样，蒋介石1月在上海会见了日本的公使有吉，3月举行了有吉—汪精卫会谈，5月，两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在这

期间，蒋介石按照日本方面的要求，从2月起，加强了“对排日运动的取缔”，对国内的抗日反帝力量进行了镇压。从而由于满洲事变而锐减的日中贸易又开始有了相当的恢复。

围绕着中国的国际形势的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对满洲的占领，围绕着中国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20年代，同国民党发生过冲突、威胁着长江流域的英国，由于蒋介石上台后的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和对帝国主义采取妥协政策，重新接近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扩张面前进一步感到威胁的英国，实行了援助国民党政府“建设和统一”的新对华政策。其中，特别显著的是援助币制改革。1935年初，英国向日本建议共同进行对华贷款，4月，向日、美、法提议召开国际会议。但这一建议由于日本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因此，在1935年秋，英国派遣里兹洛斯到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指导。里兹洛斯首先就对华共同贷款、日英华经济合作、承认“满洲国”等问题同日本进行了会谈。这是企图通过同日本的合作，以援助国民党来统一中国，以便和美国抗衡。但这个建议也由于日本的反对，谈判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动荡，银价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到1931年，银价不断暴跌，但由于各国停止金本位制而造成的币值下降和随着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而来的一般物价的飞涨，1933年7月伦敦会议上国际银协定的达成，再加上美国的白银政策等等，银价在1932年以后又急剧暴涨。1934年6月，美国制订了《白银收买法》。进而在8月，为了控制中国的货币和市场，公布了

《白银国有令》，此后美国开始在世界市场上收购白银。因此，银价腾贵，中国白银开始潮水般地流入美国。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白银外流，同年10月提高了白银输出税，并附加了平衡税相对抗，但由于中国的白银很多都是集中于外国银行，所以没有效果。日华接近、英华接近、日英经济合作的动向，也是在这种形势下表现出来的。

对于中国以英国为后盾而进行的币制改革，美国以同年12月停止在伦敦购买银元的办法相对抗。为了缓和美国的对抗措施，1936年5月，国民党政府缔结了美华银协定，接受美国的援助。这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承认里兹洛斯币制改革的成功，并且对此巧妙地加以利用。这样，以先令代替英镑的法币的币制改革，就大体上取得了成功。中国在经济方面加强了统一，这也意味着日本在围绕着中国的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的舞台上陷入孤立。在《驻满大使南（次郎）关于促进华北分离工作向广田外相的进言》中说：币制改革，是中国“抛弃了伪装的亲日态度，重新恢复了露骨的排日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与统治华北计划的具体化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本来是想解决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但却反而使它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因此，控制华北的计划又重新提上日程。曾经当过关东军参谋、策划过“满洲事变”的石原莞尔，在1935年8月，当上了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长。他在同年年底所写的《目前国策的重点》中认为：

皇国的经济要求所期待于中国及南洋者，多半在于使其成为满洲国特别是对付苏联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据

点，目前国策的重点是完成满洲国的建设，使苏联放弃发动远东攻势的念头。

并说，

虽然把重点放在东北，但在消除北方的威胁后，以实力对南洋及中国积极实行我国的国策。

石原的军事设想，是在考虑到北方的苏军和西方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而提出来的。因此认为，“为了完成上述两种军备，就要实行昭和维新，作为军部，首先要强制国家发挥其全部能力，使航空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必须迅速解决燃料问题”，希望早日完成总体战体制。这条基本线索发展成为1936年6月20日参谋部的《关于满洲国的要求》。在这个《要求》中，主张在准备对苏作战，“为了备战而要求迅速发展满洲工业”的同时，“以日、满、华北为范围，发展进行持久战所必需的工业”。同年7月，参谋本部在《关于为备战而发展工业的要求》中，还谈到，“为了准备对苏战争，以昭和16年为期限，以日、满、华北（河北省北部、察哈尔东南部）为范围完成，特别在满洲国，要坚决迅速开发之”。这些全部都是在石原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在这个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把确保中国东北作为重点，为了确保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所需要的战略资源，把华北划为战略上、资源上应该确保的地区。这个方向发展成为7月29日参谋部第二课的《战备计划方针》，而在这个《方针》中，要求在1940年以前，以“日、满、华北（河北省北部及察哈尔东南部）为范围大力发展进行持久战所需要的产业，特别是迅速开发满洲国”，“在华北至少要尽快着手开发龙烟铁矿”的方针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

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的具体计划

如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适应帝国主义战争阶段的总体战体制即“高度国防国家”，赋予了中国东北以重大的战略意义，而在已经谈过的基本方针的基础上，从1936年前后制定了具体的建设计划。

1936年5月，由满铁经济调查会制订的《满洲产业开发长期计划》的基本方针写道：“负有稳定东北使命的日本，基于国防、治安、经济上的理由，建立了‘满洲国’。由于日满经济区的结成，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日本要由此解决的经济资源不足、国内市场狭窄、人口过剩三个问题，依然构成了日本经济上的根本缺陷，最近愈来愈痛感有消除这一缺陷之必要。即一方面国内不安定的社会情况，反映了此种缺陷所造成的遍及城市农村的生活不安定；另一方面，国际对立激化的最大原因，也是由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因此，应该说，从国内形势和对外关系两方面，消除这些经济上的根本缺陷，乃是日本迫切的需要”。正如这里所说的，在中国东北推行《长期计划》，首先是为了“消除日本帝国经济上的缺陷”。而作为经济上的缺陷表现出来的“经济资源不足”、“国内市场狭小”、“人口过剩”以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国内不安定”，是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矛盾，并企图通过推行殖民政策来解决这些矛盾。《长期计划》还认为，“日本要把扎实地经营站在大陆发展前列的满洲国，作为基本方针”，把经营东北的殖民地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并说：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极大地并迫切地期待着日本经营满洲的进展及其效果”。

还有，《长期计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希望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积极扩张，连以前曾经出现过的“反资本主义”、“反财阀”的骗人宣传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露出了其本来的面目。其中在《为开发重要产业而促进日本资本的积极扩张》的标题下面有这样一段话：

为了改善作为促进资本扩张之主要基础的现有企业的经营和促进资本的扩张，虽然依靠金融机构的技术合理化，也可以期望取得某种程度的直接效果，但其根本的基础却在于生产部门的收益如何。即使采用投资仲介机关承担危险的办法，但如不能保证作为投资对象的企业利润率本身，则仲介机关的担保能力也一定是极不稳定的。因此，改善企业的经营，提高利润率，不仅是吸引新的投资的基础，而且可以防止把增大的利润立即撤回日本并延长它在满洲新设和扩充的时间。这样，通过使满洲的资本活动兴旺来扩大企业经营的范围，就能够使日本对满政策的主要目标即开发重要的资源得到积极地贯彻。不消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实广义的国防能力。为了改善已有企业的经营，即合理地维持已经投下的资本，必须尽量使资本的经营技术自由地发挥出来，把追求利润看作自己的责任。国家应保证这种正当的企业利润，使企业的活动兴旺起来。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对企业的统制，即一方面为防止滥设企业的弊病而从全局上指导资本自治统制，另一方面为防止侵犯消费者利益，根据公益规定进行全面的监督是妥当的。

在改善为促进日本资本扩张而已设立的企业经营方面，处于最重要地位的，就是在前节交通部门政策当中

所明确的满铁在满洲产业开发当中所充当的角色和作为日本对满洲出口的担保能力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指出了确立满铁经营基础的方向。

改善统制企业经营的方向，是应该在半官半民的企业中，提高民间资本的参与率，按照资本的参与率而赋予相应的经营上的发言权，国家只是在必要的限度内参加经营。对民间企业的统制，要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而且从反面使自由企业具有实际上的自由的效果，而这个反面的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14表 对“满”投资与各渠道地位的演变

年度	投资合计 千日元 (%)	政 府 千日元 (%)	满 铁 千日元 (%)	其它各公司 千日元 (%)	满洲重工 千日元 (%)
1932	97203 (100)	20000 (21)	65000 (67)	12203 (12)	
1933	151245 (100)	30000 (20)	87200 (54)	40045 (26)	
1934	271675 (100)	10000 (4)	166000 (61)	95675 (35)	
1935	378598 (100)	71400 (19)	146340 (65)	60858 (16)	
1936	262995 (100)	38600 (14)	133205 (51)	91190 (35)	
1937	348273 (100)	75360 (22)	161000 (46)	111913 (32)	10000 (3)
1938	439481 (100)	101040 (22)	87344 (19)	261097 (59)	38300 (9)
1940	1103713 (100)	85000 (8)	290391 (26)	728322 (66)	177135 (16)

备考：根据对满事务局调查算出。

(出处：《满洲建国十年史》)

就是说，扩大和保证自由企业的经营自由、消除资

第15表 “满洲国” 国家资本变动比较表

(单位: 千日元)

年 度	特 殊 公 司 资 本 总 额				政 府 投 资				B对A %		
	公司数	名义资本 指数	实际(A) 指数	公司数	引受额 指数	实际(B) 指数	指数				
1937年底	34	1309240	100	991807	100	23	106826	100	83377	100	8.4
1940年底	68	3383225	258	2610809	263	47	875550	820	604453	725	25.1

(出处: «满洲建国十年史»)

本的不安，其结果就会促使资本向这些部门发展，但是，由此而来的自由企业的旺盛的活动，要是没有培养属于统制企业的重要产业，就不能纠正现在所看到的工业的畸形发展，也不能恢复正常的均衡，和顺利地进行资本的社会再生产的过程。

建设计划的实质

以上所说的计划的实质，就是对日本垄断资本的全面期待、“使资本活动在满洲兴旺起来”以及为了引进这些资本，准备提供一切方便。其方法是，“保证企业的利润率”、“尽量自由地发挥资本的经营技术”、“应保证正当的企业利润，造成兴旺的企业活动”。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方法，就是指为资本活动提供最大限度的保证。即为了实现“扩大广义国防能力”的目的和促进日本资本的扩张，而“扩大和保证自由企业的经营自由和消除资本的不安”。因此，所谓“防止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不过是一句有名无实的空话。

《长期计划》声称以“统制经济”为其目的。但是这个“统制经济”清楚地表明，与其说是限制资本家追求利润，毋宁说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它追求利润。那么，这个计划，在“统制经济”方面有些什么具体的设想呢？

《长期计划》谈到，为了“扩大广义国防力量”、“保证正当的企业利润”和“使企业活动活跃起来”，要实行“国家对企业的统制，即一方面为防止滥设企业的弊病而从全局上指导资本的自治统制”。这就是根据“一业一社主义”来培植特权的垄断企业。关于为防止“滥设企业的弊病”而进行“资本的自治统制”一点，该《长期计划》是这么说的：

满洲近代产业的开发，是以日本经济的发展为目标、通过日本的资本和技术来完成的，自然，日满间的对抗关系，必须通过确立以日本经济的要求为主体的合理分工关系来加以纠正。就是说，必须通过确立在整个日满经济范围内的资源及生产力的最合理分工关系来加以纠正。因此，前面所说的资本的自由活动，只有在日本的资本自治的统制（卡特尔统制）的指导下，消除了日满间对抗的摩擦之后，才能达到维持合理经营的目的。就是说，在整个日满范围内的一元化统制，即实际上是仿照日本产业统制而实行的日满两国的国家统制，就是必须按照上述资本自治的统制（卡特尔统制）并以纠正由此产生的不合理现象，促进其正常的发展为目标，使之一元化地统一起来。换言之，把日本对国家产业的统制扩展到满洲是最合理的。

在这里，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长期计划〉的目的就在于“发展日本的经济”，特别是建立一个能经受近代战争考验的“高度国防国家”。而且还谈到了所谓“资本的自治的统制”，就是指卡特尔统制，是企图在日本资本自治的统制指导下达到其目的。另外，假如同前面所引的方针，即“改善统制企业经营的方向，是在半官半民企业中提高民间资本的参与率，按照资本参与率赋予相应的经营上的发言权，国家只是在必要限度内参加经营。对民间企业的统制，要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且明确规定其范围，应以保证资本的安全活动为目标”等等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这里所指明的方向，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证日本垄断资本的利润，并强有力地推行其统治。

满洲农业政策

这些政策以在东北的“特殊公司”占有压倒优势的地位而具体表现出来了。从第15表可以看出1937年至1940年“特殊公司”资本的变化。而在这期间，名义资本和实际资本一起占有很大的比重。《满洲建国十年史》说，“特殊公司通过所谓一业一社会主义被赋予了垄断的地位。与这种一业一社会主义必然联系着的，是企图进行所谓‘巨大的建设’。虽然是出于时局的需要，但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所谓的满洲意识”。

在农业方面，《长期计划》认为“把完成大陆政策作为最高目标的满洲农业政策，既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纯的和平经济政策”，“满洲农业政策当然必须是处于武装的和平之下的农业政策”，露骨地表现出侵略性殖民政策的本质。《长期计划》规定“满洲农业政策所担负的最高任务之一，就是不使满洲的农业人口中发生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摆出一副似乎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姿态，但接着又说：“满洲农业经济现在所立足的基础，是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这样，满洲农业政策，首先必须是维护当地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且又不在农民阶层内部促进现代的阶级分化”，“关于满洲实行的业主权的性质还未有定论，但不妨把它断定为实质上是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中对土地的总体的支配权能即土地所有权。由于现在在满洲的土地所有关系当中，地主不仅居于佃农之上，而且也处于农村秩序的中心，所以，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定会引起可怕的混乱”。这是企图维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使半封建的地主，成为自己的殖民统治的合作者。

加藤完治^①等主张立即实行向满洲移民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就让在日本国内陷入贫困的农民往这里移居，企图在实行殖民地化的同时，把国内的矛盾引向国外。

日本帝国主义从日俄战争后不久，就制订了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这在已经提到的儿玉源太郎的设想中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就具有军事上的意图。日本帝国主义对从俄国手中接收的“关东州”（旅顺、大连地区）和“满铁附属地”，在1914年前后，就送出一批农业移民，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繁荣，使得日本本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因此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前后，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激化了。作为天皇制统治的基础之一的农村统治一陷入危机，就表现出企图通过侵略战争和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来摆脱危机的倾向。

后来成为满洲移民的推动者的加藤完治，早就主张“突破鸭绿江的满蒙殖民论”，建议将“缺少土地”的日本农户的第二、三个儿子送往满蒙，但由于当初东北的中国人的抵抗而未能实现，就成立了“朝鲜移居协会”，把农业移民送到朝鲜的郡山、平康，并且乘机在1927年成立了“日本国民高等学校”，以培养“了解自己在农业这个被称为天地化育的圣业中应承担的责任，为衣食住的生产而流汗，为大日本的繁荣而献身的日本农民魂”（《石黑忠笃传》）。其出发点是

① 当时是日本国民高等学校校长。——译者

企图掩盖由于天皇制统治的掠夺所造成的农民贫困这个基本事实，强化农民的劳动，使其为对外侵略服务。还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动向是与“金融危机”和“出兵山东”同时出现的。

1931年9月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占领，使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了。1932年1月，在关东军领导机关主持召开的“满蒙法制及经济政策咨询会”上，加藤与该集团的农林次官石黑忠笃、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桥本传左卫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那须皓等人一起，主张立即向满洲移民，以后关东军就把他们的主张，作为实行移民的主要依据。在这个会议上，那须皓说：“即使将来想搞农业，在内地也没有土地了，然而，千方百计想得到土地从事农业的青年大量存在，要把这样的人弄到满洲去殖民”；“鉴于今天农村的实际情况，把缺乏土地、经济情况非常窘迫、陷入十分穷苦境地的人，特别是佃农的子弟移入这个新天地，将来如能忍受一点困难，就有希望经营10町步和15町步的土地，因此，相信愿意到这里来的青年一定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认为农业移民“作为民族运动，对于日本民族的发展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因此，那须皓认为，日本人入殖的土地“要尽量多地毫无顾忌地取得，为将来大和民族农业和殖民的发展作好准备”，“因为土地如不迅速取得而逐步取之就难了，所以要下决心大胆地把广大的土地‘弄到手’，以备将来殖民之用”，强烈要求确保土地。在这里，根本不考虑中国东北的土地究竟属于谁。另外，为了以“忠君爱国”的精神教育日本农业移民，那须皓建议设置日本移民训练所，认为它必须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尖兵。那须皓在这次会议上还说，农业移

民必须是集体移民，必须是自耕农主义。

关东军的移民政策

以上的主张为关东军所欢迎，成为后来实行的政策的基础。1932年2月，关东军领导机关所制订的《移民方策》，认为日本农业移民“对于确保日本本国的生命线”是必要的。同一时期制订的《日本移民纲要》，认为“向满蒙送进日本农业移民”，在国防上以及在确保满蒙永久和平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在《日本移民纲要说明书》中还写道：

把邦人移殖到满蒙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缓和本国的人口过剩，而且在发展帝国在满蒙的权益方面，在开发满蒙确保将来的帝国国防第一线方面，都是绝对紧迫的急务。

凡在一地权益的发展，不是仅以投下资本和扩大事业的设施，就可以一劳永逸了，而只有在培养相当多的富有朝气的本国人之后，才能使资本和事业有效地运转。导致今日的满蒙形势的最大原因，应该认为是邦人特别是农业移民的缺少。

满蒙之地文化未曾普及，有千古未入斧钺的大森林和亘古未曾耕耘的大荒原，开发这些处女地，使其产出丰富的农、牧、林、矿的产品，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工业原料问题的关键，故邦人移入文化低的满洲进行殖民活动，实为吾人所应肩负之天赋使命。加之帝国迫于国防上的需要，虽然合并了朝鲜，但为确保东洋永久和平起见，如不把满蒙完全掌握在我手中，南制渤海西扼兴安岭以确保满蒙，则不能保证这一点。就是说，满

蒙作为军事上最枢要之地特别是国防的第一线，任何人也不应有所怀疑。然将如何为之呢？只要能将大量邦人移殖于满蒙各要地，使其开发资源并用于文化上之开发，就可以在一朝有事之际，期待同胞弃锄操戈而奋起。

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解决它的矛盾需要干些什么了。同时也表明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东北殖民地化来说，日本的农业移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一阶段，制订了“普通移民”和“屯田兵制移民”的计划。

普通移民与屯田兵制移民计划

“普通移民”也是用轻机枪和步枪武装起来的“国防移民”。当初预定拨给10万户“无偿提供地”1031500町步和“买收地”636500余町步。“无偿提供地”预定为铁路附近的良田。在关东军的计划中规定，对日本移民免收地价的半数，其余的半数缴纳长期的低利年赋，待地价全部付清时，就归个人所有。《日本移民纲要》还制订了“使用多少中国工人的方案”，把剥削中国的劳动力作为前提。并且，为了进行移民的招募和准备成立的以援助为任务的半官半民的援助公司，其资本为1亿日元，除半数由日本政府提供、1/4由满铁提供外，还预定由大仓财阀及其所属的华兴公司、满洲棉花公司提供。

“普通移民”也带有“国防移民”的性质，而“屯田兵制移民”更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根据1932年2月关东军领导机关制订的《屯田兵制移民纲要》，决定让屯田兵制移民入殖当时苏联经营的中东铁路以北。由于国防上的

理由（对付苏联）和气候风俗与日本迥然不同，尤其要以军事组织进行移民。“屯田兵制移民”从满洲驻屯军退伍军人”中优先招募。3年中间，过以屯田兵营为中心的共同生活，进行共同经营。到第四年，每人分得50町步的土地，使其独立，而实行以10人编成分队，5个分队编成1个小队，10个小队编成1个大队，以500人为单位构成1个兵村这样的军事编制。另外，农业所需劳动力的80%，依靠雇佣中国劳动力。而在1932年关东军特务部制订的《关于满洲移民纲要》中，以这种武装移民为重点，“普通移民”则降到次要地位。

第一批武装移民

经过上述筹备之后，关东军在同年与1933年制订了送进500户的移民计划。在这个移民计划的说明书中，规定招募“配备充足警备力量的移居者1000户”，“特别是从经济上贫困的农村和山村招募”。在计划中，起初把地点定在黑龙江省勃利县八虎力河和七虎力河附近，后改在依兰附近。

按照这个计划，1932年9月1日开始了正式招募。10日，候选者进入岩手县六原、大高根、茅城县支部的各训练所，10月3日从东京出发。出发时，“大亚细亚主义者”的拓务大臣永井柳太郎说：“满洲农业移民的重要性已经毋庸再说了，站在我国的开发大陆的第一线，作为满洲国开发的先驱，其使命是极其重大的。仗剑而进，持镞而出，其精神是何等高尚”，“诸位成功与否，不仅对我国将来的大陆政策有颇大的影响，而且直接对后续部队的士气亦关系甚大”。另外，在沈阳的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在10月10日的“训示”

中说：“这次能否成功，不仅与诸位一身一家休戚相关，实是左右大和民族的大陆发展和实现日满协和的未来”，认为武装移民是“被派遣到满洲农村的大和民族的先锋”，“大和民族发展的基石”，“必须有且耕且战的觉悟与准备，为此，要在陶冶应有之军人精神，熟悉战斗技术的同时，不断弄清四周匪贼的情况，以免遭到失败的打击。这里所说的“匪贼”，当然是指抗日武装力量。从政府和关东军负责人的这些发言中也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侵略来摆脱国内矛盾，并准备把这些农业移民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的先锋。还可以看出，日本农业移民在满洲殖民统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一批武装移民，于10月14日乘船到达佳木斯，但当天就被抗日武装力量包围而未能登陆，不得不在船上过夜。

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这样一来，被送进的第一批武装移民，由于自然条件的剧变，尤其是抗日武装斗争，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在第二年度，第二批武装移民进入七虎力河附近，而在1934年，因征收土地而引起六、七千人的中国农民大起义——“土龙山事件”。在这期间，遭到了关东军的一名团长饭塚被打死这样的打击。在《拓务省第一批武装移民事业成绩调查报告》中说：“自昭和7年(1932年)10月入殖以后，到昭和10年(1935年)3月为止，退团者有177名，被打死者12名，病死者8名，共计减员192名(原文如此，共计应为197名——译者)，如以百分比表示，与入殖人员492名，补充入殖19名，计511名相比，相当于38.5%，退团者为34.6%，被打死者为2.3%，病

死者为1.6%。“今以发生10名以上的退团者的月份为例，略记其环境与退团情况……大体上都是发生在遭到匪袭之后不久。很明显，匪贼的猖獗、治安的不稳，与退团有密切的联系”，另外，在《第二批农业移民事业成绩报告》中还说：

“迄今团员的减少，已达200名以上，因进入匪贼巢窟而遭到战死12名、病死6名的惨重牺牲，此事甚为遗憾”，“退团者的不断产生……其首要原因实在于匪贼，即处于开垦、建筑等建设工作和战争破坏工作的恶性循环的漩涡中，重复过着精神上、肉体上动摇疲弊的日常生活，得了所谓屯垦病，也是一个重大原因”，“东京、千叶全部退团，埼玉、神奈川也显著减少，最近甚至到了全班解散的程度，概因关东地方和东北地方^①的人不适宜作为移民”。这里所说的“匪贼”，当然是指抗日武装力量，但正如这些资料所谈的，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农业移民曾一度濒于破产。由于后来关东军和日本政府进一步实行刺激，才勉强得以继续下去。后来，在1941年11月制订了《开拓农场法》，实行移民的事情在制度上也完成了。《开拓农场》规定，除了把土地、房屋一并作为开拓农场和世袭财产在金钱上强制执行之外，禁止分割继承。这就是说，日本移民的土地所有被给予特权上的保护。还规定在本人丧失劳动力的时候，由开拓组合征购，以防已被征收的土地重新回到中国人手中。

满洲拓殖公司的土地征购

如上所述，向东北送进农业移民，是为了摆脱国内尤其是农村日益激化的矛盾，同时也是企图使其成为殖民统治

^① 这里的关东、东北均系指日本地方。——译者

的核心。关于这种移民的性质，在“满洲国”最高检察厅作为内部资料编辑的《有关开拓问题》中有所记载。编辑这个资料是因为日本移民同中国人、朝鲜人的关系以及在日本人内部发生了很多问题，发展下去，就“有把本是亲满、亲日或是没有多少反抗情绪的地主、资本家和满洲民族大众推到反满抗日阵营的极大危险”。

帝国主义统治同中国人之间的矛盾，首先以征购土地为契机发生了。在《有关开拓问题》中，列举了5点产生矛盾的原因：“（1）收买的价格低廉；（2）收买熟地；（3）收买未利用地；（4）对出卖了土地的地主、农民的转业、迁居没有提供充分的保护；（5）对选定收买土地的做法不服”。这表明，作为土地掠夺机关的“满拓公司”和日本拓务省所经常强调的“不买熟地”、“价格公正”和“对土地所有者提供职业上和居住上的保护”的原则，完全是骗人的。日本移民流入时的土地分配，全靠“满洲国”政府和“满洲拓殖公司”所收买的土地。如第16表所示，其面积是庞大的，而且其中包含的熟地（已耕地）的比例很大，并且往往是未付地价的土地占大部分。

1939年，在今辽宁省铁岭县，“村民吴敬烈被唤到县公署，因国策规定要建立移民村，强迫其卖掉自己的土地，见此人不肯就范……就对他施以殴打等暴行进行威逼，因而使其将在该县新台子村自己所有的水田845亩（时价约4万日元），以16355.27日元的价钱出卖了”，村民吴赵氏（女，当时61岁），苦苦哀求不要无偿征用自己的土地，……就用所带的棍子敲着她的头，以要不要脑袋和驱逐到国外相威胁，遂迫使其同意了”。在这期间，从一百几十名农民那里，以时价

1/3或1/2的价钱掠夺了许多土地。此外，还征收了大量的木材、砖和征调了大量劳役，并对木材进行了大量盗伐。由于这种做法未免太露骨了，对此事负有责任的日方副县长被拘留，于是，引起了“满洲国”日方官吏的“猛烈谴责”，说“检查厅不懂国策，并且妨碍国策的贯彻。在为实行开拓政策而收买土地时，对不顺从者实行暴力胁迫，也是不得已的”。“暴力胁迫”已是日常的方法，由此可见一斑了。

**第16表 “满洲国”政府与满洲拓殖公司
取得土地面积（1941年）**

（单位：陌）

	取得总面积	支付地价面积	未支付地价面积
“满洲国”政府	8306000	4875754	3430246
满洲拓殖公司	11720000	5925176	5794824
计	20026000	10800930	9225070

注“满洲国”政府是1941年4月底、满洲拓殖公司是1941年3月底数字。（出处：喜多一雄：《满洲拓殖论》1944年）

在吉林省的额穆县，以小姑家、伊马河子为中心的约4000町步的土地，被青少年义勇军（在当地叫青年义勇队）作为开拓用地收买了，而日方所规定的价格，水田每垧为140—160日元，旱田为100—130日元，山地为45日元。这个价格，对当地农民来说，是1/2.5以下的价格。当地居民强烈反对说：“假如当局实行过于不恰当的征购，我们的家庭生活就会陷入悲惨的境地，这是同建设王道乐土的主旨

背道而驰的”。因为当地的土地，一垧的价格是350日元，而当局公布的价格，是非常不合理的廉价。“满洲国的国币（纸币），将来会贬值，物价必然越来越上涨，卖掉土地而存现金是不明智的”。农民说：“这时土匪抢金银物品而不抢土地，满拓（公司）强制收买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丧失了土地，对农民来说是最痛苦的”。

在安奉铁路沿线的凤城县，满铁于1939年准备在四台子附近设立“铁道自警训练所”，企图让居民移居东北的北部，对北部移住者在移住地给予所需要的土地。在15年计划中，制订了头5年贷给农具和资金，从第6年起以年赋偿还的计划。在向居民公布时，出现了“陈述谁也不想离开长年安居的土地而向前途未卜的北满移居的意见，作出了应该阻止该训练所设立的决议”，“对放弃家业而感到不安的人甚多”的情况。

通过雇佣劳动和强制劳动对中国农民进行压迫

把中国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不仅仅是为日本移民的入殖准备土地。由于日本移民当时几乎不使用机器，并且由于日本移民的家庭人口也少，分到的土地，超过了自家劳动力所能耕种的范围，必须准备雇佣劳动力和征调劳役。

1940年1月，在公主岭附近，“由于军事上和开拓团发展上的需要”，经满拓公司和县之手收买熟地2300町步，荒地700町步。当时决定“为使满人（中国人）变为开拓团的劳动力，从开拓团无偿贷给菜园5亩和所需要的相当数量的房屋”。这样，就为日本移民雇佣劳动力打下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无偿“贷与”房屋和菜园，即使按计划实现

了，从各国的农业工人的历史上所有的许多例子看，反而只会加重农业工人的隶属程度和使工资下降。

从上述铁岭县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日本移民的经营，除了租佃制和雇佣劳动之外，还是通过强制劳动来支持的，而通过劳役的征集也发生了许多事件。

吉林省辉南县适合于开水田的土地很多，是朝鲜农民很久以来就居住的地方，中国人同朝鲜人的关系也很好。但日本人副县长，计划实行分村移民以援助乡里佐贺县的农村更生计划。1939年入殖50户，1940年入殖50户，作为其用地，经县公署之手，收购了600町步，对日本移民每户分给水田4町步、旱田1.9町步、宅地0.1町步。这时，已进行了两次收购。由于第一次收购的土地漏水，不适于作水田，第二次以与第一次收购价格相同的220日元买下了更合适的土地。虽然当地农民“因上述土地肥沃，收获量多，不愿出卖”，但从“国策的观点”出发，实行了强行征购。另外，居住在被征购土地上的80户中国农民，被迁到由县所管理的荒地，以免收3年地租为条件（税金照收），建立了集团部落。这样，就被以苛刻的条件夺走了土地，进而在该县，为在日本移民的水田进行水利工程，征调了大量的赋役（劳役）。

关于县民对水田工程负担事项：

为了从河川里把水引向水田，须从1.5万米的上游挖掘水沟和开凿400米的隧道。关于该项工程所需的劳力，是强制向各户摊派的赋役。全部人役在去年半年间实际上超过了204568人之多，今年仍在大量使用。此等赋役，按资力大小由各户出1—3人。每人每日由县公署支

给工钱70钱^①（从中扣除30钱的食宿费）。而有人住处甚远，须从开工的前一天动身才能赶到工作地点，而工程完了的第二天才能回到家中，结果是，3日的工程，对出工者来说实需5日。在出工期间，自耕农、佃农及商人等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家业，其处境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当局虽言明工程一般在农闲季节进行，但却在农忙季节也强行施工。因此，使得在贫困中生活的人民负担更大，故此等农民或商人，不忍抛弃自己的家业而雇人代己出工，一天要化2—4日元工资以完赋役。去年半年中，该县每户最大的出役负担超过800日元，其中有些主要的大商店，要负担1600—3200日元的巨额费用。这样，如从赋役人数达20万之多的情况看，县民每人要从事2—3日的赋役。由于他们是被县当局通过各街公署强迫出工的，这些人夫的摊派、召集等就成了街村公署的大半以上的事务，只能办与开拓民入殖有关的事情。只要是处于被迫接受这种负担的情况下，人民心中会有多大的不满情绪，就不难推知了（以下略）。

上面这段记录，说明了日本移民的开拓（实际上是从当地农民手中夺取土地为基础的）是建立在从当地的中国人、朝鲜人那里征调大量劳役的基础上的。傀儡“公署”几乎完全成了这种劳役的征调机关。另外，从找人代替所付的雇佣工资和“工钱”之间的差距极大这一点来看，也反映了这种劳役具有强制劳动的性质，当地的商人也不能避免庞大的负担。

① 1钱等于1日元的1%。——译者

对朝鲜农民的压迫

以征购土地为主要手段对当地居民所实行的压迫，不仅是针对中国农民，也是针对朝鲜农民的。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着朝鲜，许多朝鲜人移居东北，从事农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东北，企图利用这些朝鲜人，并挑动中国人和朝鲜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导致了万宝山事件。但是，正如吉林省辉南县上述文件中所记载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之前，“鲜人（朝鲜人）和满人（中国人）之间在很多地方相处得很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朝鲜人也同中国人一样，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朝鲜人的土地也同样被征购了。特别是由于朝鲜人大部分从事于水田耕作，其土地被征购的机会也就更多。

1938年，在吉林省敦化县为了日本人入殖而策划“收买”土地，但是“由于无法充分提供可以代替被征购土地的土地，并且，收买的价格远比个人出售的价格低廉，甚至不过是1/3，只因按日本的国策要实行强制征购，才不得已出卖，而在内心里却对县和拓殖公司极为不满”。在这个地区居住着许多朝鲜农民。他们控诉说：“作为国策，尽管规定了内地移民^①入殖当年开垦地及荒地的原则，但却决定把大部分鲜农居住地区作为移民用地，强制收买其所拥有的已垦地”，“鲜农与满农不同，由于从事水田耕作，不象满农那样，可以到处为耕。假如收买现在所有耕作地而欲重新得到可作水田的土地以建立生活的基础，那就困难了。不仅如此，

① 指日本移民。——译者

连换地也不允许。即令称之为国策，而出此强制收买之举，也是一种无法响应的方针”，“我等对日满两帝国未曾有大罪，何故要被赶到不毛之地”。正如这些资料所表明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行所谓“黄色人种的大团结”、“五族协和”等等欺骗宣传，但实际情况是，朝鲜人移住者也同中国人一样，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无以复加的残酷统治。

在黑龙江省的阿城县，由于1940年有北海道八紘开拓团、山形县大谷开拓团的入殖，使朝鲜农民1000多户500人被移往他方，而当时，朝鲜农民对于“日本政府只在鲜农的开拓地移住内地人，鲜农常常被放逐的实情无限愤慨”，说：“日韩合并30年，连姓名也被改成日本的，征兵令的实施和近乎日鲜同化，满洲政府的日系官吏，其态度越来越冷淡”，“在满鲜农常常被逼得没有安定的时候，诚为可怜”。表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朝鲜农民在哪里也不能安生。

如上所述，从中国人和朝鲜人那里征购了许多土地，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日本移民的入殖。1938年在吉林省舒兰县四家房入殖的长野县大日向开拓团，在向满拓公司指定地点入殖的时候，得知当初准备开拓的水田和旱田已经准备好了。在这个入殖地，曾有4000名中国农民和2000名朝鲜农民居住着，但日本移民入殖的时候，被强迫迁走了。当时的大日向开拓团团长在《大日向村第一年度建设情况报告书》中说：“二、三年后，大部分满、鲜人将遭受从当地撤出的命运，其境遇是极其悲惨的”。征购土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农村的基础，最大的矛盾就在这里。1933年第二次武装移民时发生的中国农民大起义的“土龙山事件”，就是

由这种征购土地所引起的。另外，庞大的劳役征调和低工资劳动力的使用，也是在这种征购土地的基础上建立的。

通过“集团部落”对居住东北的朝鲜人 进行统治和使中国人变成佃农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在满朝鲜人的典型方式是“集团部落”。“集团部落”建立的目的，是使朝鲜农民与抗日的武装斗争隔离开来。虽然在建立“集团部落”时，宣传“生活安定”，但据“满洲国”军事顾问部编纂的《满洲共产匪研究》第2辑指出，由于伴随着向“集团部落”移居开支的增大和劳役保甲费的增加，“……耕种面积是非常狭小的，随着集团部落的建立，越来越出现了耕地不足”，“移居集团部落之后，其（家畜）的数量减少了，无牲畜、农具的农民增加了，他们在耕种和运输时，不得不依靠人力，成为导致人力劳动的酷使，农业粗放的原因”，“出现了农户向佃农转化的显著的倾向”。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的移民，规定要使佃农变为自耕农，让次子和三子能够独立，标榜所谓“自耕农主义”。但在实际上，正如《满洲国立开拓研究所》的资料所说的“自耕地多了，雇工就要多，因此，与其大量支付工资，不如减少雇工，把自己可以经营的土地留作自耕地，剩下的租出去，收取佃租，这样既安全又有利”。这就是指导要依靠租佃制。据说在前述吉林省舒兰县四家房的大日向开拓团中，虽然每户平均分到20町步的土地，但其中自耕地只有1町步，其余的出租，收取占收获量60%的佃租。

日本移民在“自耕地”上也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这不仅

是日本家庭的劳动负担，而且从中国人、朝鲜人中征调了大批的劳役。在春迟冬早的东北，农耕期极短，满打满算只有4个月。在这期间必须进行从耕种到收获的全部工作，劳动力是极其宝贵的。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人那里也夺走了他们宝贵的劳动力。

强制劳役

在吉林省五常县太平村阳川开拓团，雇用中国工人从事农耕和建筑业。当地的民间雇佣工资是每天2元5—6角，可是日人发给的工资很低，每天只有1元。另外，在农忙季节，从附近的中国人部落征用的劳役也不少。因此，该开拓团的劳务科还发牢骚说：“该部落民对开拓团怀有恶意，设法逃避对农耕等开拓团工作的援助”，为此，发出通知，要中国人部落在7月出50名民工进行农耕。但是，因为中国人部落，到7月10日只出了24人，便在7月10日，将中国人部落的头头召集在一起，命令在第二天的11日提供剩下的26名民工。但在当天夜里10时左右，在离开开拓团劳务科的办公室只有20米的李洪玉家中，有6名中国农民聚在一起闲谈。于是，日本人“以为在李洪玉家里部落民集合起来商量反对上述提供劳务之事……对此加以令人讨厌地曲解和极度地愤慨。在部落民的这种状况下，关于部落民向开拓团提供劳役是不可能圆满解决的，要使部落民与开拓团的劳务关系好转，决定不得不杀掉一、两个该部落民的人。便从开拓团本部作为警备用而配备和保管的三八式步枪，装上实弹1发，从居室的窗缝窥看李洪玉屋内，察知在屋内的灯火下有部落民，便对准了灯火的稍左方向开枪，命中了正在该屋北侧炕中央吃

饭的李洪玉的右锁骨，李因右颈动脉被打穿出血以及两肺受伤而当场死亡，遂达到了杀害的目的”。在上述文件中，虽把这个事件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从错误的优越感出发而无视满人的思想而造成的”，但为了强迫提供劳役而不惜杀害中国人，这是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本质中产生的。

1940年5月，两名中国农民驾着马车经过辽宁省密山县的山中。当时，一名日本人要求搭车。日本人在乘车时，突然用护身的短刀（刀刃有4寸），砍断了同车尹雅东的右颈动脉后，又对马夫陈忠礼的右肩及其它数处用刀乱砍以致杀害，强夺了马匹。应该注意的是，还记载了当时“犯罪的动机”是“基于在满洲干什么也无妨的思想而遂其残暴的欲望”。

日本青少年袭击中国人事件

1940年10月在丰荣训练所还发生了大规模的袭击事件。

一、开拓青年义勇队满铁丰荣训练所收容16岁到21岁的训练生330名，在这里发生了以下事件：

（一）康德^①7年（1940年）10月6日下午7时许，池田某等5人，赴永安二道沟向部落民孙唤章买鸡，尽管遭到该家拒绝，还是捕了1只鸡，并把被狼狗咬死的1只鸡拿走，在经过邻舍赵国喜家时又索要20个鸡蛋，还闯入邻近的于延海家。该家得知这些训练生到来赶快把门关上。他们便用满语强迫其开门。该家大声呼喊，引来几名部落民，使训练生从现场退走。回所后，他们对

^① 伪满洲国年号。——译者

其他训练生隐瞒了自己的不正当行为，撒谎说遭到了部落民的非法包围和追赶。听到这事的50多名训练生，便策划进行报复。于是准备了步枪3支，刺刀1把，短刀、木剑、棍棒十几支，在当夜9时左右，离开训练所到了上述于延海处，威胁性的开了几枪，然后砸破关闭的大门，侵入屋内，打碎门、窗和其它家俱，并殴打了家人，在第二天7日零时半回所。

(二)他们不仅不以前夜的暴行为满足，由于当时有一名训练生负了轻伤，7日早又在一部分训练生中策划再搞一次袭击。在征求各训练生的意见时，同意者有97人。便仍同上次一样，准备了步枪3支，刺刀3把、短刀、木剑、棍棒等十几支，在上午10时左右，三三五五地悄悄离开训练所，分两队到了部落。一队侵入二十里站，一队侵入二道沟及头道沟部落，打了十几发步枪，对部落民进行威胁，闯进约20户人家，打破了门、窗、毁坏家俱几十件，杀死家禽和家畜，抢走其它小器具、衣服、食品、小额现金，还追踪避难的部落民，用刺刀和棍棒殴打了许多人，并用短刀逼迫妇女脱掉裤子。这些暴行造成1人重伤和5人轻伤。下午两点半带着抢掠的东西回所了。

上述事件，都是16—21岁的青少年挑起的。从事件的经过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土匪行为。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被说成是“训练生的精神弛缓、错误的优越感、少年的恶作剧。由于从部落偷盗家畜已经习惯了，认为受到了于延海侮辱性的冷遇，发脾气而作了此案”，但是，所说的“少年恶作剧”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

本质。还有，这个事件“给与部落民精神上的影响，确实是严重的，本来由于开拓使当地居民出卖土地和迁居等已蒙受相当严重的牺牲，再加上这样的暴行，进一步引起对开拓民的反感，给开拓政策罩上了一大暗影，在满人（中国人）当中蕴酿着反满反日的强烈情绪”。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以征收中国人土地为基础的帝国主义统治的必然结果。

由于生活苦造成的移民团纷争

如前所述，日本帝国主义的满洲移民政策，是在军事占领之下，以征收中国农民、朝鲜农民的土地为前提而制订的。

同时，送往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生活遭到困难，为了把日本的内部矛盾转移到外部而遣送出来的。在这方面，日本移民团内部的矛盾，也是相当深刻的。这种矛盾，首先存在于移民团一般成员与干部之间以及青少年义勇军训练生与干部之间。尤其是在青少年义勇军中，它是伴随着多次杀人、放火的“骚扰事件”而反映出来的。

日本移民团的内部矛盾，在第一次、第二次武装移民团的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了。特别是第二次（千振村）移民团，与第一次一样，是由复员军人编成的，但面临着因征收土地而爆发的大起义——土龙山事件，战死12名，病死6名，从起初的491名当中，有215名退团者。

在青沟子开拓团，不断发生开拓团相互之间的倾轧，一时流传着要求遣返的呼声，两年之间更换了3次团长。其原因，根据团员对团本部的会计事务所的报告如下：

该团土地贫瘠，特别是水田，在已耕地有近70%是“冷害”地，几乎所有水田的收获希望都不大，再加上除大米之外，其余日用品直到油盐酱醋之类全得自己花钱买。但还得两、三年，才能作为自耕农将收获全部归己（即使收获物现在就全部私有，也不可能自给）。其生活尤为困难者（如三重乡来的人），一反开拓民的本来性质，得从内地（日本）邮寄物资。还有以满鲜人等原居民的名义经营商业和从事木材业者。尽管不允许个人经营，但除京都两乡之外，其它乡几乎都转入个人经营，团部也加以默认。

这个移民团发生纷争的原因，很明显是由于生活上的困难。该开拓团虽然“在原居民的耕作地放牧团员的牛马，而当原居民的家畜进入该团的耕地时，则立即将其打死，还有殴打原居民等坏事，干得也不少”，但他们也还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

移民团内部对立的激化

在这些移民团内部的矛盾中，应该注意的是，由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在当地称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所引起的骚扰事件。青少年义勇军的内部矛盾是相当深刻的。1939年8月写了《再三恳请当地考察》申请的一个小学教师（60岁）报告说：看到“长满了杂草的旱田，混乱不堪的宿舍，大量吃剩的饭菜，甚至盗卖供应品，装病休养，站岗时睡大觉等等，确实是出乎预料之外的事情。其中有9队长××^①事件、2中队的杀伤事件、12中队的殴打事件、6中队干部与队员之

^① 原文如此。——译者

间的不和以及昌图的宁安事件。更严重的是发生了许多由于所出身的党派不同的内讧等作为参加圣业的圣徒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在黑龙江省饶河训练所从作为青少年义勇军起源的“饶河少年队”中所发生的事。负责进行武装移民的东宫鍊男在1934年9月，将加藤完治、大谷光瑞等14名少年送到此地，以“建设皇化圈”、“涵养牺牲精神”、“领悟大和民族的使命”为纲领，进行农耕训练。后来在1935年7月增加到16名，东宫鍊男因日中战争出征之后，相继发生了与干部之间的纠纷事件和队员离队事件。在1940年的报告中记载着“有因感情问题，小队时常发生争执，打死1名小队长和1名队员，因而被解除武装的事情。”

如上所述，青少年义勇军内部的矛盾，最后表现为同直接统治者的干部的抗争。1940年1月在黑龙江省海伦县的三井子训练所发生骚扰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井子训练所收容了17—20岁的270名训练生。24名队员“商议要以暴力对付干部，以促使其反省，对训练所进行改革”，便袭击了干部宿舍，殴打了所长以下的干部。

这一事件的原因，训练生列举如下：

- 1.在内地募集时所宣传的进所后从事各自希望的职业这一点并没有实现；
- 2.虽规定在父母、兄弟死亡和病危之时，可以由本部发给旅费回国探亲，但实际上，为此而拍来的电报都被扣压了；
- 3.虽规定内原训练所，在到达满洲后负责提供训练生必要的薪金，但这一点完全没有实行；

4.内原训练所，教职员的品质好，教育训练的方法也适当，但满洲的训练所，教职员既无诚意，也不亲切；

5.虽答应在从铁丽训练所转移到三井子训练所后，作为祝贺征兵适龄者，对中队全体人员发给酒1.3加伦、猪3头，但也没有兑现；

6.本应象亲人一样的干部，对训练生讲话就象对待叫化子一样，到医务室去，手还要消毒；

7.训练生在内地的孩子，被用粗鲁的言语辱骂为满洲棒子，甚至差一点被辱骂为国贼；

8.发给先遣队与本队的物品不一样；

9.尽管按照满拓总公司的规定，每人每月有5角钱的夜餐费，但却从未发给，干什么用了也没有说明；

10.在病死的寮友的遗骨运到三井子训练所时，干部虽让训练生紧张搬运，但自己却开着收音机在灵前饮酒；

11.在遗骨送回内地时，某职员用一只手象提东西一样把它带走了；

12.干部把家属搬来之后，还常常要轮班为教职员洗碗、洗衣和打水。干部的家属可先进澡塘洗澡，当学员提出这样的要求时，就遭到斥责和殴打；

13.干部不准学员饮酒、抽烟。虽说要使民族协和，但自己出差海伦时却喝得烂醉，并且有时不付规定的马车费和把车夫赶走；

14.把有定量的大米倒卖给建筑业者，使学员每天只吃两顿饭；

15.干部不关心病人；

16.干部们经常为了一点小事，也要饮酒闹到深夜，

早晨不出来作礼拜；

17. 在训练作业时间内，学员拼命干，干部却在下围棋；

18. 随便说话，常常受到拳打脚踢的体罚；

19. 在零下40度的早晨作礼拜时，假如迟到就让趴在天上；

20. 去年的防寒用品破损者，尽管几次提出申请，仓库里有也不发给；

21. 值班干部在早晨作礼拜时也不打裹腿；

22. 中队训词中明文记载要“和睦相处”，而干部却分为两派；

23. 12月31日，学员们买来准备过元旦的白酒被发现，在早晨作礼拜时，不仅对这些学员责骂，而且殴打，甚至用脚踢脑袋。

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赤裸裸地表明了帝国主义制度下，帝国主义内部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所谓“为了国家”、“保卫日本的生命线”等口号和把日本内部濒于破产的生活在殖民地重建起来的希望，统统不过是为了驱使青年充当殖民统治的工具所进行的欺骗。而这就造成了在当地屡次暴露出来的干部与一般队员之间的对立。“满洲国”检察当局说：“训练生的犯罪，现在完全是因全满指导员的人手不足和训练生对领导者的尊敬完全消失，其中甚至出现人数众多的学员围攻训练所长并进行暴力胁迫的情况”。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上述三井子训练所发生事件时所提出的要求中，显示出觉悟了的青年批判干部对中国人犯下的暴行（第13条）这种国际团结的萌芽。

第六章 走向灭亡之路

一、纳粹掌握政权

世界经济危机与法西斯主义的抬头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是企图通过侵略战争和经济军事化来摆脱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激化了的国内危机。这也是以日、德、意为首的国际法西斯主义抬头的原由。但是，由国际法西斯主义所造成的侵略战争的升级，也使各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抵抗有所加强，并使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即英、美、法各帝国主义国家同各法西斯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激化起来，接着，便发展成为全面的世界战争。

1929年的危机也给德国以沉重的打击。工业生产在1929—1932年间下降了40%。世界经济危机特别给德国以沉重打击的原因，是停止了对第一次大战后德国的复兴起着巨大作用的外资（特别是美国资本）的流入。在1932年，德国的失业人数，超过了800万。德国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也使德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激化了。德国共产党的得票数，从1928年的320万票迅速增加到1932年的540万票。在国内，反对失业和饥饿的运动高涨起来。另一方面，德国垄断资本为了阻止人民的革命化，则竭尽全力援助纳粹。垄断资本企图以镇

压人民、扩张军备和发动侵略战争来摆脱面临的危机，便选择了纳粹作为它的执行者。而这种矛盾的激化，对纳粹的蛊惑宣传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另外，国际垄断资本希望阻止德国的革命，并把德国建成对苏作战基地而同纳粹妥协。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则害怕工人阶级的革命化。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接着，纳粹在3月27日制造了国会纵火事件，以此为借口，通过总统紧急法令建立了法西斯的统治，共产党被勒令解散，5月，解散了工会总同盟，到6月底，解散了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建立了彻底的独裁体制。

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德国，处于以德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和以纳粹党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之间激烈搏斗的时代。斗争是以纳粹的胜利而告终的。这有种种原因：虽然当时德国共产党在德国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确实加强了它的组织和扩大了影响，但正如在1932年号称36万党员中有72%是失业工人这个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它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微弱的，并且对农业工人和中农、贫农的影响也很小。可是，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对在当时矛盾激化当中日益兴起的革命势力，没有能不断地按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方向进行教育、组织和训练，特别是在1929—1932年德国的形势下，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已经作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出现时的教训表现出来。在1921年意大利的大选中，尽管遭到残酷的镇压，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总得票数，从1919年的184万票增加到186.1万票。议席以社会党122席、共产党16席、两党合计138席相比，法西斯得到的议席只不过是35席。社会党机关报《先锋》发表声明说：“意大利的无产

阶级，以红色投票浪潮制止了法西斯的反动”。但是，法西斯分子对革命工人的进攻也进一步加强了。翌年，法西斯分子通过“罗马大进军”掌握了政权，可见“红色投票浪潮”是不能制止法西斯主义的。在1932年11月德国的大选中，与纳粹失去200万张选票相比，德国共产党的选票增加60万张，接近了600万张。但是，甚至在所谓最民主的魏玛宪法之下的“红色投票浪潮”，也没有阻止纳粹夺取政权。

这在法国也是如此。当法国面临国内法西斯势力抬头的危险时，社会党、共产党、急进社会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在1936年4月的选举获胜后，成立了人民战线政府。它虽然在阻止法国法西斯的抬头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却没有成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前提。

法西斯主义抬头的过程显示出，在危机激化的时候，垄断资本就抛弃“民主主义”的假面具而加强镇压与独裁，如果不以革命起义去夺取政权，即使由于危机的加深而使人民力量兴起，也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使法西斯夺取政权。

人民战线与西班牙内战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使西班牙推翻了帝制，成立了共和国。这次危机大大动摇了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建立在半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与殖民统治基础上的西班牙统治体制。1930年，西班牙国王阿尔丰斯十三世企图以罢免独裁者来摆脱危机，但是群众的斗争却更加激化，同年8月，成立了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革命委员会。工人的罢工浪潮高涨，在同年11月的马德里总罢工中有25万人参加。在这

种形势下，共和派在1931年4月的自治体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国王亡命国外，由资产阶级共和派成立了临时政府。在6月的选举中，该派获得过半数票，12月，制订了包括国家与教会分离、男女普遍选举、言论出版自由、少数民族自治在内的共和国宪法。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把持的政府，没有解决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一西班牙革命中的重要课题。没有对大资产阶级采取坚决的政策，没有触动军部的核心。在西班牙依然保存着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在这种情况下，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失望，就使法西斯抬头和革命势力兴起了。在1933年1月的大选中，执政党的社会党和左翼共和派遭到了致命的失败，相反，右翼的各法西斯党却从以前的42席增加到210席。另一方面，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得票数，也从以前的6万票增加到40万票。这一事态，反映了西班牙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1934年，历来分成社会党系统、共产党系统和无政府主义者系统的工会统一起来，面对着法西斯政府的镇压，在10月，下令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一部分工人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有4万人被投进监狱，仅在阿斯土里亚一地就有5000人被屠杀。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全部农民都站在反动派一边，社会党把总罢工看作是防御性的，缺乏夺取政权的意志等等。

1934年10月起义的失败还不意味着法西斯的完全胜利。由于国内矛盾的激化和以1935年10月被揭露的大贪污事件为契机的群众运动的高涨，1936年1月，议会被解散了。另一方面，在同月，左翼共和派各党同社会党、共产党之间根据包括释放政治犯、改革法院、减轻地租、对银行进行统制、

制定工人立法和恢复最低工资制在内的纲领达成了人民战线协定。2月的大选，在全部473个议席中，人民战线派占265席，中间各派占64席，右翼各派占144席，成立了人民战线内阁。

西班牙人民战线政府的成立，是西班牙人民斗争的产物。在它成立之前，西班牙人民反复进行了包括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在内的斗争。同时，法西斯势力也不是和平地交出政权的。以同年7月在殖民地摩洛哥发生的法西斯分子佛朗哥所率领的军队叛乱为转机，西班牙内战开始了。集结在共和国政府下面的西班牙人民，拿起武器，同反革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也以援助武器和派遣志愿军、义勇军等方式尽力支援西班牙共和国。英、美、法及法西斯统治下的德、意人民也组成“国际旅”参加了战斗。在中国的苏区也多次举行支援西班牙人民的集会。

尽管有这样一些动向，但随着1936年马德里的陷落，在西班牙还是建立了法西斯的独裁政权。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除了德、意的法西斯政权竭力援助佛朗哥之外，在西班牙有着大量投资的各国，如美国，当然还有英国的“工党”政府、法国的人民战线政府，在右派所策划的“中立”的名义下，拒绝把武器卖给共和国政府，间接地援助了法西斯势力。在人民战线内部，没有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坚决打碎军队、警察等旧政权机关，另外，小资产阶级各派、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妨碍了团结等等。但是，其最大的教训是，即使以合法的手段建立了人民政权，反动派也决不会和平地交出权力。

日本军部掌握了领导权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企图逃避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但它同时又加深了争夺世界市场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在1931—1932年，日本贸易由于危机的打击和中国抵制日货而锐减，但日本以国内的低工资为武器，对东南亚、印度、西南亚和非洲强行倾销。就连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日本的商品甚至超过了英国的商品。这就加深了同统治了这些地区的英国、美国、荷兰和法国等的对立。这些国家想以对日本废除通商航海条约和协定来对抗日本商品，到1934年底，对日本商品提高关税和实行限制贸易的国家达到了40个。

同时，这种情况也显示出，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造成的帝国主义之间对立的激化。在这种对立激化的情况下，日本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了国际联盟。企图通过法西斯主义的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来摆脱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不仅仅是日本。1933年1月，德国纳粹上台，同年10月便退出了国际联盟，开始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在日本，1934年以陆军省新闻组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的小册子，把当时的形势看作是“世界的非常时期”，认为“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主张完成总体战体制，并主张“以真正的举国一致，坚决实行经济及贸易统制政策，同时谋求新市场的恢复，必须研究可以突破危机的对策”。这也就是主张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和建立起国家政权同垄断资本相结合的总体战体制。1936年发表的英国产业联盟的报告书指出日本商品对外扩张的原因是，除了工资极低

和劳动条件恶劣、汇兑行情下降之外，还有政府补助费、降低货物运费和国家的倾销政策等，这一切，在日本都是由国家政权同垄断资本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的。问题在于军部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而在这方面，是军部最大限度地利用了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完全掌握了主导权。

二、中国革命的发展

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指出：“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1930年以前的军阀混战，是革命武装根据地发展的有利条件。其后屡次发生的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对革命武装根据地起了有利的作用，在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安徽、四川、陕西各省诞生了革命武装根据地。但在1930年冬，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内战一结束，蒋介石便正式开始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由于毛泽东的指挥和红军的英勇奋战，第四次以前的反“围剿”战争以红军的胜利而结束。到了1934年，红军扩大到30万人。同时在此期间，也是“左”倾机会主义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的时期。因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未能取

得胜利、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第一次“左”倾错误，在1927年11月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形成，一直延续到1928年4月。这就是临时政治局书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他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认为即使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形势仍然是处在“不断高涨”之中，反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强调“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把暴动的城市作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领导者”。这一方针由于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和抵制，很快在全国的实际活动中被克服了。

第二次“左”倾错误表现为从1930年6月起至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为止约4个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特点是，认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是“由农民意识产生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并且不承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呼吁全国各地立即准备起义。在李立三的指导下，中央政治局制订了在全国中心城市立刻组织武装起义的冒险计划，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一错误导致了红军几次攻打湖南省会长沙受挫，由于毛泽东等许多人的努力，才克服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从而得以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

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取得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开始了历时4年之久的第三次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

王明等人认为，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不是“左”倾，而是右倾。在“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下，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王明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之中，主张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进攻路线”。从这种认识出发，制订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武装暴动、“飞行集会”和总罢工的冒险方针。由于采取了这种方针，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被破坏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尚在上海，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也还没有对城市以外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红军能够在1933年2月以前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但由于城市党组织被破坏，以博古（秦邦宪）为中心的临时中央（1931年9月成立），在1933年初转移至江西省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成为直接的了。王明等人还无视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以后，中国同日本的民族矛盾与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高涨，认为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对他们开展“拼死的斗争”，主张打倒一切，给革命斗争造成巨大损失。

1933年11月，在前年于上海同日本军队进行了英勇战斗的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时候，未能估价其意义，而后来要缔结抗日作战协定已经晚了，福建人民政府遭到蒋介石的攻击而失败。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2月开始，其规模是空前的。另外，各帝国主义国家也从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中有了某种程度的恢复，美国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粮棉贷款，日本也提供2亿日元的贷款援助蒋介石。蒋介石还招聘了德

国国防军的将领赛克特将军^①以及英、美、法、日等的军事顾问团。此时，蒋介石动员了百万大军与200架飞机，采取了边扎边打的“堡垒政策”。另一方面，前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红军也扩大到30万人。这时在“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的红军方面，采取了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的所谓“正规”战，要求进行在战略上的速决战和战役上的持久战。并且不是采取像毛泽东那样的诱敌深入，然后把敌人歼灭的战术，而是采取“拒敌于国门之外”、“不丢失一寸土地”的消耗性的单纯防御战，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分散兵力的方针，结果红军不能防守根据地，1934年10月，不得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丧失了90%。

长征与毛泽东的领导权的确立

长征途中，在1935年1月于贵州省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由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和红军的英勇奋斗，长征以胜利而结束。1935年10月，红军主力到达了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在长征途中，张国焘率一部分红军企图另立中央，但这一阴谋被粉碎了。长征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而被迫进行的，但是通过长征的胜利，得以在所经过的11个省份和两亿人民中间宣传红军的存在及其政策。

^① 汉斯·冯·赛克特（Seeckt, Hans von）（1866—1936），德国将军，1932—1935年曾来华充当蒋介石的军事顾问，镇压中国革命。——译者

1935年1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陕西北部的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同时，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建立包括广泛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术和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决定的意义，并谈到了它所应起的领导作用。

此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侵略的加强，全国的抗日运动发展起来了。1936年12月12日，针对着顽固主张进攻红军的蒋介石，发生了要求抗日的国民党东北军在西安逮捕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使其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主张，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建立起来了。毛泽东从这时起到翌年8月止还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开始全面侵略的前夜，就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好了与其进行斗争的准备。

三、侵略华北计划的完成

华北经济的调查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必然成为对华北侵略的序幕。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不但没有通过对东北的占领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激化了。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设想中，早就想得到华北的资源。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殖民地统治，必然要在它的邻接地带华北打主意。为此，即使

是历来主张“满洲第一”、对向华北“深入”存有戒心的石原莞尔，也强调对华北资源的控制与“日、满、华的协调”，并为实现这一点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1933年2月，作为奉天特务机关头子、满洲事变后台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当时为少将），未经正式宣布就当上参谋本部的副长官，到天津进行对华北的工作，这就是所谓“天津特务机关”的诞生，以后对华北的工作就活跃起来了。同年10月，“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委托“满铁”进行了华北经济的调查，其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

为了促进帝国对华经济的发展，以及使战时我国国防所缺少的资源易于得到充实，将重点置于扶植增进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力量和对促进日、满、华经济区的建成进行必要的准备。

第二、要点

根据对华北的产业、经济、金融、交通等各个部门进行的基本调查，为了达到前项目的，必须研究具体的方案，而鉴于对非武装地带，即由日、华两国规定为特殊地区的有关地区的施策比较容易实行，必须首先从调查该地区的有关事项入手。

第三、纲要

基于上述方针，将调查纲要规定为下列4项：

1. 研究将成为帝国对华经济发展障碍的各种事项，为了排除这些障碍而研究适当的方策。

2. 为建立日、满、华北经济区，研究应在华北设置的产业、经济、金融、交通等以及研究其实施的方策。

3. 研究确保帝国在华北的现有势力和将来应该扶植的对象及其方策。

4. 为满足战时缺乏的资源，研究培植、开发、改良、增加华北资源的方策。

贯穿于上述“基本项目”之中的有3点，即确保战略资源，建立“日、满、华经济区”的准备和控制华北的经济。

基于上述基本方针，指定的具体调查事项是：1. 为扶植对华利权，与中国方面的排外及各种确保和收回利权的运动相对抗的办法；2. 开发华北煤矿问题以及对长城周围地区各种矿产的调查；3. 关于华北的铁路、港湾的调查；4. 关于平绥铁路问题；5. 为了建成日、满、华经济区的参考事项；6. 龙烟铁矿；7. 华北的棉花、羊毛及石油；8. 华北的盐；9. 在华企业及其指导对策等。

在调查事项中，最被重视的是作为能源资源的煤炭。这在下列言论中可以看到，如“为了确立对该地（华北）的经济势力，以对煤矿的投资作为最有力的措施”，“而我国为解决百年的燃料问题，以我日本之力，开发华北的煤矿，是绝对的要求”等等。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关心，是从对煤炭的关心以及与它有关的运输、交通、销路的控制而发展起来的。

关于铁路、港湾的调查、是为控制煤矿资源进行的，而委托事项，涉及到整个华北的铁路和港湾。“作为河北省的吞吐港，可在天津或其它地方寻找”，“根据港湾位置的确定，应如何在其腹地建筑铁路”等设想，可以说反映了要把整个华北经济纳入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的意图。另外，铁路在军事上是有极大价值的，由此可以大体看出华北作战计

划的具体化。特别是关于平绥线，谈到了“必须在这里扶植有绝对保证的利权”，可以说作为联结东北—华北的纽带而受到了极大的关心。

对“日、满、华北经济区”的建立，也表示了强烈的关心，从而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是，想同已经占领的东北一起，把华北置于其统治之下，以突破危机。提出“日、满、华经济区”的主张本身，就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已把统治华北提上了日程。在要求调查的事项中，特别必须对“华北金融市场与上海的依赖关系及能否使其分离”给以极大的注意。这可以说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傀儡组织使华北分离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这个委托调查中，还有铁矿、羊毛、棉花、皮革等广泛的项目。谈到“为了不使无知的中国人得利而对我不利，必须合理地加以计划并付诸实施”。“……这些，在一旦有事时，当然有中断进口之虞，故渴望从安全的势力圈内得到满足”。再从以后的历史经过来看，在这个时期，日本军部已经把侵略华北和控制华北提上了日程，可以说正在研究其具体措施。1934年12月，在被委托进行调查的满铁调查机关中工作的岸田英一说：“毋庸赘言，对华经济工作是当然应予考虑的问题。而且随着满洲国的发展，满洲同华北、山东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日满经济区，不仅是有待同河北、山东两省实行经济合作之后才能完成，而且如果考虑到满洲国3000万民众的大部分都是山东人这一事实，促进华北的经济工作，诚可谓恰合时宜。并且，这样就帮助和促进了应使日华两国相互之间经济生活的基础得以稳定的两

国经济的结合……。”这可以说是从专家的观点说明了占领东北必然发展到侵略华北，采取“日、满、华经济区”形式的原因。

华北分离工作的活跃和兴中公司的成立

如上所述，日本对华北的工作，从1933年前后就进行了。当时，日本尚未从1929年以来危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准备不足，所以尚需同英、美等国进行一定的协调。另外，由于蒋介石把对中国共产党的进攻摆在首位而同日本妥协等等原因，在表面上似乎出现了小康状态。

但同时，以日本军部为中心的集团，却对政府同蒋介石实行一定“协调”的政策表示不满。1935年1月，关东军首脑召开了“大连会议”，3月，制订了《关东军对华对策》。这个《关东军对华对策》说：“一、根据（塘沽）停战协定和附属议定事项，公正地主张我方的既得权利，以引导华北政权绝对服从；二、为了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建立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对棉花、铁矿要迅速促进产业的开发和进行交易”，主张完全控制华北和通过这种控制来进行经济扩张。这个方针，可以说同上述，“中国驻屯军”参谋部的委托调查事项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对华对策》中还说：对同蒋介石对立的西南军阀的政策是：“一、为了使其能够对抗中央，秘密给以物质援助；二、作为将来把华南的经济掌握在帝国手中的第一步，建立必要的经济设施”，策划全面统治中国。

对华北的分离工作，表现为1935年10月“冀东防共自治

政府”的成立。这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一贯追求的目标。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军的操纵下，公然承认以正规关税1/4的查验费进行秘密贸易，企图在巩固自己经济基础的同时，以降低关税来压迫中国的经济。为此，中国的产业遭到巨大打击，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并且也加深了同以关税收入为贷款担保的英、美的对立。

满铁本身也在1935年初决定了《关于对华经济工作的方针》，其中说：“随着满洲国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华政治经济工作将日益重要”；“尽管政治工作是由国家机关直接进行的，但关于经济工作，有必要在国家机关的指导下，由国家机关以外的机关来承担”；“以往的对华工作，大多是依靠一般民间资本家以及通过他们进行的，没有任何的统制，所以全都归于失败。仅仅由大资本家进行的事业，不过是保持其经营的现状”；“一般民间资本为营利主义所束缚，不可能真正进行从国家观点出发的经济工作”。以这种认识为前提，主张“统制对华经济工作，使之政出一门”，对华经济工作由直接执行机关以直接方式进行”，这种执行机关不是委托一般民间资本家，而是建立国策机关”。作为其实行方法，认为要“动员满铁资本”，“成立兴中公司”，“把兴中公司作为对华经济工作的统一机关，使之直接经营及仲介、斡旋各种在华经济事业，并对各种事业进行投资”。

根据这个方针，在满铁、关东军、日本驻华武官三方一致同意下，于1935年3月在满铁正式决定成立兴中公司，经日本驻满洲国大使的申报，在8月2日取得了日本总理大臣的批准，12月20日，在大连召开了成立大会。从其成立的经过

可以看出，兴中公司的成立在日本帝国主义整个对华北工作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时期。它是在军方、政府机关和满铁的紧密配合之下进行的。此后，兴中公司取得了长芦盐的对日贩卖权，并且按照“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令接收了津石铁路、龙烟铁矿、龙烟钢铁厂的经营。另外，除了从德国人手里收买了井陘煤矿的德方股票等之外，还通过与天津市政府签订合同，让日本电力联盟参加，成立了天津电业股份公司。正如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的那样，兴中公司是包括日本垄断资本在内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构成因素都参与了的对华北经济工作机关，它并且成为日本军队占领华北后，在1938年11月成立的华北开发股分公司的前身。

使华北变成完全殖民地的计划

1935年7月，由“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订的《华北新政权诞生后的经济开发指导方案》和9月制订的《对华基本观念》，是了解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日军方针的重要资料。《指导方案》说：

我们此次交涉，取得了前所未见的特殊成果，一步一步在不断向着成立新政权的目标迈进，确实令人不胜欣慰。然而，按中国人之脾性，虽在当时感谢、称颂日本使华北政权能有今日之恩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被忘却。最重要的是，吾人在此建设期中，抓住一切机会，在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进行持久的投资，为将来造成确乎不动的权益。

主张抓住成立华北傀儡政权的机会，获得为完全统治华北的“确乎不动的权益”，就是说，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

经济工作，正进入一个与以前不同的新阶段。

接着，《指导方案》认为：

尽管有人主张要保护权益，就应从扩大和充实既得权益开始，但是，既得权益已经作为权益而存在，随着新政权的加强，只会扩大而决不会缩减。而由于国防上的需要，要尽可能迅速向获得新权益迈进。

表明经济工作的目标首先是获得新的权益和国防资源。认为获得新权益比扩大充实既得权益更为重要的这种认识，正如下面一段话所表明的那样，由历来以山东省为中心的经济扩张转变为以整个华北为对象的经济控制，即：

尽管应开发的地区涉及整个华北，但因山东省已经有相当的权益，所以除了金融之外，山东省暂作为第二位的。

另外还谈到，“开始时，要按照交通、矿物资源（煤）、农村问题等等的顺序去做”。这显示出帝国主义对华北所要求的是怎么了。

在《指导方案》中还表明以下具体的目标：

根据5月14日关东军同天津军（中国派遣军）的协议，关东军组织在当地的各各种财团（满铁、东拓、东亚兴业、鲜银及其它），首先收集可能得到的资金，尽快地组织一个小规模的开发公司。作为未来对华投资团体的中日实业公司及东亚实业公司，在以恢复其权利为目的的意义上，逐步指导其与本事业合流。使天津军在中国方面的民间，组织地方经济开发的团体，并使其与本事业的调查及实施密切合作。中国方面一概为实物投资。

这表明在当时已经驻在中国领土内的两大驻屯军之间关于统治华北的具体方针已经确定，进行了以后来的“华北开发股份公司”为中心的统治华北占领地的准备。这些方针就是：

让以满铁为主体的公司进行投资，建设交通（铁路、汽车、航空、水运、港湾）及开发矿物资源中的铁和煤，其余让日本方面的投资者随便投资。此时对华北的民间投资，军方虽无统制它的法律上的权限，但关于交通及矿物资源，从避免投资者的相互竞争和为不良中国人所利用，由军方和有关外交部门组成的华北经济开发委员会进行统制。

这反映了对华北的经济工作，像在东北一样，首先是动员国家资本和半国家资本与由国家进行统制的“高度国防经济”。

进而，这个目标在下述方针下被付诸实施，即“当南京政府不允许日、满、华合办事业时，须待另外的强制实行时机的到来”，“本案实施之际，尽管表面上提倡门户开放，但要尽力驱逐在华北的外国势力”。这就是同“华北分离工作”融为一体。具体计划包括控制铁路、汽车交通、航空、水运等主要干线，开发龙烟铁矿等主要矿山，“收买以及委托经营已有的纺织工厂”等。这些经营是在下述基本方针下进行的，即“统一华北电政”，“在谋求向华北扩张满洲国势力的同时，努力建成北宁线的外线，驱逐危及其自立的外国势力”，“迅速建立大型火力或水力发电公司，垄断华北的电气事业”，“希望撤除关税壁垒”，“撤销战区的满、华两关税，或者减轻其严厉程度，或者对中国方面的关税施以高压，使日、满商品流入华北”；“谋求满洲国的货币流入华

北”等等。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了要使华北完全变成殖民地的计划。

完全统治华北计划的具体化

以上就是在“华北分离工作”有了一定进展时期的经济工作方针。而这年9月由“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订的《对华基础观念》，则是《经济开发指导方案》的依据。在这个文件中，谈到了“利用军阀的贪婪及无节操，使其提供利权以助我经济之发展，或给予资金与武器而加以利用，此为以往采用之方式。这不但与帝国正大光明之主义相反，难以认为是适当的，而且在中国驻屯军已于华北获得事实上支配权的今日，几乎全无此种必要”。“世人尝谓蒋介石是个机会主义者，并断定如大势不利其必转向，此可谓过于盲目之观察”，“盖彼之此种转向，既意味着其屈服，且有留污名于千载之性质，同时完全改变此种已成为信念的方针，将会招致等于自杀的后果”，“看看我们同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等为中心的军阀和江浙财阀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同英、美的关系，特别是他们的大部分私财都存于英、美系统银行等事实，就可明白他们能否同与其利害不同的我日本结合，作为帝国不可把如意算盘打得太响了”。这反映了当时“中国驻屯军”的主要观点。在当时的华北，中国旧军阀日益走上了没落的道路。因此，它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已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并且与日本帝国主义凭借“援助”从各个军阀手中收买利权的时期不同，这时已把直接统治整个华北提上了日程。从这点来看，各地的军阀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已是无用之物。同样，在把直接统治整个华北提上日程

的阶段，也没有同蒋介石妥协的余地。这关系到后来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①的方针。正如前述资料所表明的，这是由于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高涨，不允许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而帝国主义相互间对立的激化，也使日本帝国主义同以勾结英、美的江浙财阀为重要支柱的国民党政府也没有妥协的余地。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分离工作”有了某种程度进展的时期，可以说到了制订从前一阶段“对华北事实上的统治”到由日本完全统治华北的蓝图的地步。

中国驻屯军统治华北的计划

到了1936年，“中国驻屯军”所负责的统治华北的计划，进一步加紧进行，制订了《华北自主币制施行计划纲领》和电业、钢铁、煤矿等等以“华北分离”为前提的特殊公司设立计划。同年6月，根据“中国驻屯军”和军中央的协议制订了《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要》。这里提出的方针，其中中心思想是：“对国防资源的开发和其它重要企业，要投大量资金”，就是说控制着华北经济命脉的部门，完全由日本人把持，首先使其为日本产业服务。在中国方面，仅让其担负“无需大量资本而较易开发的部门。尽管如此，按照需要由日本方面提供管理知识和技术，以确保日本方面的权益，同时，企业经营及技术上的要害部门由日本人掌握，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的效果”。这样，当时以“中国驻屯军”为中心的华北经济工作，首先是企图由日本直接控制经济的命脉，

^① 即1938年近卫发表的“帝国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声明。——译者

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的效果”，代表了达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资本主义的意图。所谓“对国防资源的开发及其它重要企业要投大量资金，依靠日本方面的积极投资促进开发，为此，我政府当局当然要特别促进财阀巨头的崛起”的意见，就是由此而来的。当然，尽管同样代表了垄断资本的意图，但在日本当时的情况下，其代表的方法，在政策上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传统的财阀垄断资本，为了像往常一样能够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和同美、英资本进行竞争，虽然在军方首脑提倡的“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和向东北、华北扩张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在执行的时机和速度问题上，同军部的要求未必一致。这种情况以及为了通过蛊惑宣传，掩盖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挣扎的人民的的不满，在军部的部分人中，主张暂时从东北撤出财阀垄断资本。当然，如前所述，他们的本质在代表包括财阀垄断资本在内的日本帝国主义意图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

《指导纲要》还规定要排除外国的权益。说“指导在新政权管辖区内排除外国利权的创设，并将外国系统企业的权益逐渐纳入我方势力之下”。另外，还规定“需要输入的产业开发用资材和官厅、政府系统各机关需要的资材，为了尽量使其满足日、满生产品的需要，统制这些材料的规格，以图在通过尽量使日本方面投下的资本回收，进一步产生投资余力的同时，加强日、满、华的依赖关系”，保障利润和垄断日、满产品的市场也在计划之中。

此外，在“中国驻屯军”的《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领》中，还谈到如下企图控制华北经济命脉的方策，如“铁路官营，而按其建设的主要目的分为国防线和经济线，以国防线的迅

速完成为基调”，“航空开发由满洲国航空公司投资成立满、华合办公司，军部要指导、援助开发和经营，努力排除外国系统的航空事业”，“苏打业、硫酸业、水泥业及造纸业等，要适当加以抑制，不使其同日本工业相对立”，“在根据产业开发的需要必须设立日、华国际法人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政权不允许，要按照同华北新政权的协约，断然实行我方之意图”等等。而且为了实行这一方策，制订了《成立作为华北产业开发机关的华北兴业有限公司计划纲领草案》。这个计划的推行是从下列原则出发的，即

1. 避免投资的竞争，在根据国策合理地促进国防上必要的产业开发的同时，能够有助于民众的更生；
2. 能够增强日、满、华的依赖关系；
3. 有能够对抗外国经济力量之实力；
4. 能够以最少的投资发挥最大的效果；
5. 除了在经营上要有灵活性并能够综合地取得利润外，政府保证一定限度的红利；
6. 当然，在实行方面要避免革命性的变革，至少不要影响现存的经济机构。

这就是企图不改革中国历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机构，使其原封不动地作为统治新的殖民地的基础。在计划中，名义资本是两亿日元，设立资金除“华北新政权”（傀儡政权）之外，民间投资主要是来自日方有实力的资本家。股东是“日本政府和华北政府”——半数以上，“民间（日本和中国）——半数以下。这种企业的性质，是以国家为先导，吸收日本垄断资本参加的企业。因此，它拥有这样一些特权，即“日本政府及华北新政府对各自国家的股东在10年中间保证6分的分红”，“本公司的股东使金融机关作为一流股份按公债处理”，“本公司因非事业公司而不交纳税款”。这同

东北的特殊公司本质上是相同的。另外，这个公司规定“要在华北现有的各种企业中进行整理，未来有希望的企业，则掌握其股分的半数以上而使其更生”，妄图控制华北的整个企业。还规定“本公司只是持有各事业公司股份的子公司（投资公司），不直接经营事业，仅在发挥企业的合理统制机能的同时，成为企业计划的源泉”。这可以说是占领华北后成立的“华北开发股份公司”的雏型。

兴中公司的性质，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日本侵略华北计划的本质。打算成立这种机关本身，就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华北的计划，已做好了随时可以实行的准备。这个计划是在华北傀儡政权下，以不惜同中国政府发生冲突的姿态制订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就必然要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在1937年7月7日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一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已经制订好了统治华北的完整计划，侵略战争就是沿着这个计划开始和发展的。

法西斯阵营的形成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

在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了对华北的统治计划并准备付诸实施的时候，日本同德国缔结了《防共协定》。这个协定是以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假想敌国的事实上的同盟条约。后来意大利也参加了，形成为法西斯阵营。

日、德防共协定，从1935年年底起，就在以军部为中心的亲德派与纳粹之间进行了谈判。这一谈判，起初是通过驻德大使馆所属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后为驻德大使）同纳粹的里宾特罗甫（后为外长）之间的私下会谈进行的。当时，纳粹德国认为，“要同日本缔结协定，在进入外交机关的谈

判之前，必须首先征得日本陆军的同意”。因此，这次谈判是在连对正式外交机关和驻德海军武官也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日、德防共协定，开始是作为对苏军事同盟而策划的，但在将谈判转到政府间的谈判和成立日、德间的军事同盟时，却受到了担心同英、美两国的关系根本恶化的日本内部亲英、美势力的强烈抵制。但是，退出国际联盟以后，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日本，是必然要同纳粹接近的。因此，条约便正式地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为对象而实现了。

1936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署的《日德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的本文规定，（一）交换关于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讨论防卫措施和进行合作；（二）劝说第三国参加协定。在附属议定书中规定，两国的有关官员合作，对共产国际的活动家进行镇压，设立为了两国有关官员合作的常设委员会。根据这个附属议定书，后来在日本的特高警察和纳粹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之间进行了人员的交流。在这个协定的附属秘密协定中还规定：（一）以苏联为假想敌国，受到攻击时的措施；（二）限制同苏联之间缔结政治性条约。它具有事实上的军事协定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侵略埃塞俄比亚而同英国对立的法西斯意大利也与德国接近，在《日德防共协定》签字1个月前的10月，结成了“柏林—罗马轴心”。而在1937年11月，意大利参加了防共协定，形成为《日德意防共协定》。进而三国的防共协定，又发展成为1940年9月27日成立的日、德、意三国同盟。这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根源的法西斯阵营就形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着战争的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制订了全面统治华北的完整计划，并

在逐步付诸实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1936年5月，成立了全国性的群众抗日组织——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此外，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发生的“西安事变”为转机，蒋介石再也不能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妥协了。

“西安事变”的实质，也被日本军部深刻地理解了，并感到要推行统治华北的政策，已是刻不容缓了。

日本垄断资本的迅速扩张与侵略政策的加强

正如大量资料所表明的，占领满洲后，主要是以“中国驻屯军”为中心，通过对华北的“分离工作”和“经济工作”、“经济开发”，进行了统治华北的准备。同时，日本垄断资本也向包括天津在内的华北各地迅速地扩张。天津是拥有7个中国民族资本的纺织公司、23.4万枚纱锭、1.3万台纺织机的中国民族资本纺织业的中心。过去，日资工厂一个也没有。但是，日本资本乘着中国资本失去东北市场的机会，到1937年，使其中的4个公司处于日资的控制之下。在青岛，1925年日本资本有纱锭133万枚，而到了1935年，则达到228万枚。另外，从东北撤出来的朝鲜银行也开始向华北扩张，在1936年，吞并了中国正隆银行的天津、青岛分行，就连对天津银行和上海银行系统的企业，也通过股票的过户掌握了控制权。

进而在日本政府方面，1936年8月，由总理、外相、陆相和海相所制订的《帝国的外交方针》，也规定在“华北方面，促成与日、满两国经济上、文化上的融合和合作，同时努力使华北成为日、满、华共同防御苏联扩展赤化的特殊地

区”，“鉴于日、苏关系的现状，对华实际措施的重点，在于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靠日本”。为了使这个决定具体化，同月在各有关省^①之间又通过了《对华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对华实施的策略》，一面认为，“亲日、满的地带，以华北5省为目标，如徒然为扩大地区或一举而完成理想的分治而操之过急，反而会增加纠纷，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并且其结果会与迅速形成有利于反苏阵势的想法相反”。一面又认为，“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把该地区作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防备苏联的侵入，另一方面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先逐渐专心一意地完成冀、察两省的分治，对于其它三省，特别是对于山东，则努力以防共、亲日和日、满、华经济合作为重点，进行各种工作”；“关于分治的形式，不管名义如何，着眼于掌握实质，也要考虑南京政权的面子，使该政权在其授权形式之下，实际上承认华北联省分治，此种办法，最为上策”，要求南京政权缔结防共军事协定，建立军事同盟，雇佣最高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在《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中，认为“分治的地区，最终以华北5省为目标。如果为扩大地区操之过急，反而不能达到我方所期待的目的，因此，首先全力以赴地进行冀、察两省明朗化工作（即经济的开发和民心的安定）和分治的完成。”并谈到了由兴中公司和满

① 即政府的部。——译者

铁，开发包括龙烟铁矿在内的“河北省各个有希望的铁矿”，用合办井陘煤矿的方式开发焦炭，得到长芦盐和山东盐，取得棉花，改良羊毛，开发液体燃料以及为实现这一计划而整修铁路网。在这里所提出的方针，同“中国驻屯军”的方针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而这一方针，在1937年4月由外务、大藏、陆军、海军4大臣所制订的《指导华北的方针》中，再次被确认。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前夜所提出的统治华北的设想，包括政府、垄断资本和军部在内，基本上取得一致了。

侵略政策的加强和国内矛盾的激化

同时，这种侵略政策的加强，是以国内矛盾的激化为背景的。由于以满洲事变为转机出现的暂时军事景气与镇压而一度衰退了的工人运动，在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从1936年前后起又开始有了起色。1937年的上半年，以重工业、军事工业、交通运输部门为开端扩大到整个部门，均打破了过去纪录。租佃纠纷也大幅度地增加了。以这种人民斗争的激化为背景，在4月的大选中，尽管有政府的干扰，“无产政党”还是获得了空前的进展。日本人民对从前年二·二六事件开始的军部独裁和经济军事化强烈不满。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由于遭到镇压而几乎全被破坏了，所以未能有效地把这种人民的不满引上反对侵略战争的方向。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之中，整个日本统治阶级，都企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加以摆脱。上述革命的动向，进而由于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等国际法西斯阵营的加强而被阻止了。

四、全面侵略中国的准备——芦沟桥事件

全面侵略的开始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近郊芦沟桥，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全面侵略。在政府的部分人中，有人担心同中国的战争会破坏同英、美的协调、并且从要进行全面战争为时尚早的观点出发，出现了希望不扩大事态的呼声。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人，坚持对苏战备第一主义的立场和加强东北的殖民地体制，反对事件的扩大。但是，正如已经谈到的那样，华北的殖民地化是军部、政府、垄断资本等的一致要求，因此，尽管11日在当地达成了停战协定，在同日的内阁会议上，还是决定从日本本国派遣军队，近卫首相对政界、财界、言论界的代表提出了合作的要求。政友会的中岛知久平、民政党的永井柳太郎等政、财界人物强硬地主张“暴支膺惩论”。这样，战争就扩大了。进而在8月13日，战火蔓延到了上海，进入了事实上的全面战争。这时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充满了坚决抗战的气氛。当时住在北京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北京近郊南苑的战斗记述说：“在这里，包括几名共产党员在内，共计300多名学生出身的士官候补生，其中有200多人牺牲了。这些青年的死，充分证明了北京爱国学生的诚实和严肃。而这在唤起延续两年的全中国的反抗精神方面起了异常

重要的作用。另外，在中国，被认为是不能在战场上找到将军的尸体的，可是在这次战斗中，却有3名年轻的中国将军丧失了生命”。由于震动整个中国的要求抗战的呼声高涨，连蒋介石也不能再同日本妥协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8月25日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了进行全面抗战的基本战略。9月下旬，蒋介石承认了国共合作，驻陕北的中国红军主力，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另外，在1935年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在华中原苏区的红军部队，也作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而活跃在长江中下游的前线，这些都成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核心。

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应

另一方面，天皇在9月4日发表了“今朕要军人排除百难，继续效忠，务要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和平”的敕语。这成了事实上的宣战布告。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10月进行了杭州湾登陆作战。11月，设置了大本营，12月，占领了首都南京。在1937年一年中，投入了相当于整个陆军2/3的16个师团的兵力。这样，虽然向中国派遣了大军，并设置了大本营，但在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中，并没有对形势作出切实的估计，缺乏军事与政治之间的统一考虑。首先是日本统治者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因此，在12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今后不一定要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一面另行考虑收拾时局，一面……应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进而在1938年1月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所谓《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即“将

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基于这一方针，枢密院通过了决议，并在16日发表了“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首相声明。在这里，军部主流派要把整个中国置于傀儡政权的统治下的方针，就作为国策确定下来了。同年11月3日，政府发表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是企图引诱当时由于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对日妥协而在国民党内部陷入孤立的汪精卫派。24日，陆军省制订出要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将其置于傀儡中央政权之下的《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工作要点》。在30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日本政府关于调整日、华国交的根本方针》，其内容有，（1）停止中国的抗日；（2）根据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和《日华防共协定》，在特定的地区驻扎日本军队；（3）给予在全中国的日本人与中国人同等的居住权和营业权，特别是赋予在满蒙的特权。这一方针，12月22日，作为首相谈话形式的“近卫三原则”发表了。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以完全统治中国为目标而进行了战争。

希望扩大战争的垄断资本

想要扩大战争的，不仅仅是军部与日本政府。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小林一三，在芦沟桥事件之后的1937年8月5日，为《文艺春秋》8月号临时增刊写了《天祐哉，华北事件》的社论。小林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为什么假定……这次的华北事件定会发生呢？这是因为（我）相信，由于近卫内阁的所谓财政方针，将使日本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生产的扩大，通过外汇管理来控制对外贸易与维持外汇市价，持续实行低

利息，制止物价的暴涨以及消除赤字公债等，凡此政府所提出的计划，如果是自相矛盾的，就决然不会成功”。“应该说，在华北确实有极妙的天意的安排。通过华北事变，假如能第一次在这里巩固既得利益，那么，即使为此而花费10亿、20亿日元的临时军费，也决不是昂贵的代价。这是因为我相信，由此，以诸如和平经济提携及其发展这类问题构成的所谓广义国防计划，就会立刻第一次在辉煌的太阳之下，根据新的认识编成，制订出国民所高兴和欢迎的财政方案”。正如在这里恬不知耻地表白的那样，当时日本资本主义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为了通过侵略战争和经济的军事化来摆脱这一危机，垄断资产阶级也欢迎战争的扩大。小林还在同年10月11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华北经济建设理想方案》，认为“必须决定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也是尽快建立新政府。……开始时，河北一省也可以。因为这个政权是联合的政权，建立了日本能够自由行动的政府。这个政府要马上设立以及改造银行，发行法币和纸币，逐步整顿原来发行的内外各银行的纸币，为尽早使只有法币通行而工作”。强烈主张尽早建立傀儡政权和使华北变成殖民地。另外，小林还在1938年6月23日，在《战后会怎样？》的论文中说：“我……相信，最终的结局是，中国作为一个合众国从属于各国的势力范围，应通过地方政权的建立，暂时使其稳定下来”；“就是说，关于战后会成为什么样子的问题，要按照日本的想法解决好。华北开发公司、华中振兴公司及附属于它的小公司的设立，毋庸讳言，目的是通过有雄心的人的进取，很好地开拓日本的市场，使日、满、华经济成为一体。为了达到此目的，可以依赖富于资源的该国的丰富资源耐心地进行经营。

如果梦想安逸的和平，认为中国人容易就范，则必招致追悔莫及的结果”。这表明，当时的垄断资本，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追求由战时经济提供的利润，是希望战争扩大的。因此，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由军部和政府扩大的战争，是按照资本家的这种要求进行的。

日本帝国主义与美英帝国主义的对立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成为走向日、德、意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世界战争的序幕。此后，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同英、法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激化了，接着，在1939年便爆发了全面的战争。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朝、苏边界的张鼓峰和中国东北与蒙古边界的诺蒙坎地区，试图对传统的假想敌国苏联进行战争挑衅。由于在斯大林领导下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的坚决反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不得不后退了。为此，在德国法西斯军队于1941年侵入苏联之后，日本军队也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方式大搞示威活动，蓄意悍然侵入苏联。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占领了重要城市，压抑了中国广大地区的经济，便同此时正在迅速向中国市场不断侵入的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激化起来了。为此，当日本军队乘着战争的长期化，以及法国本土投降纳粹的机会占领了当时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时，美国就限制向日本出口包括石油在内的军需物资，向日本施加压力。这样，日本便是在1941年12月同美国和英国开始了战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必然要走的道路。

经济的军事化与工业同军事相结合

日中战争的发展进一步促成了日本经济的军事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后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就为克服这种矛盾实行了加强国家的统制、动员国家资本和经济的军事化。1933年颁布了《米谷统制法》，以便把作为主食的大米置于统制之下。在1934年，又统制了贸易。1936年宣布了《准战时体制》，制订了陆军10年数十亿日元的计划和海军6年20亿日元的计划。企图以经济的军事化为基轴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尝试，一度在日本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工业指数如以世界经济危机开始的1929年为100，在1934年，美国为64%，英国为98.8%，法国为71%。这些国家都没有从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可是唯独日本达到了141.8%。这种现象是由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以满洲事变为转机而实行的经济军事化所造成的。

侵略战争的全面展开，使财政开支，特别是军事开支飞速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但与此同时，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极端的不平衡现象。例如在日本，就军舰的制造能力来说，可以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军舰，但是汽车（客车与卡车）的生产，在1938年，与美国的269.1万辆、英国的44.8万辆、德国的35.6万辆相比，日本只有17051辆，仅能满足国内需要的30%。包括机床在内的重要机器设备，许多都要依靠进口。每个工人的机器设备马力数，为美国、英国、德国的1/2乃至1/3。这种情况成了要把全面的侵略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巨大障碍。

为了克服这个弱点，由政府向垄断资本家投入了庞大的

第17表 财阀对军事工业投资的内容

(千日元)

财阀别	基础军需部门		舰船及机械 军事工业		弹药炸药及化学 武器工业		合计 A		资本总额 B	A/B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三井	167815	51.5	87500	26.9	70500	21.6	325815	100.0	1720800	19.0
三菱	110304	43.7	127425	50.4	15000	5.9	252729	100.0	950800	26.6
住友	84100	53.5	37115	23.6	36000	22.9	157215	100.0	1100000	14.3
大仓	—	—	10000	63.0	5875	37.0	15875	100.0	91275	17.4
日产(站川)	138750	47.2	83688	28.5	71400	24.3	293838	100.0	579000	50.7
日窒(野口)	14149	9.5	5479	3.7	108841	86.8	148469	100.0	276000	53.8
日曹(中野)	17949	30.5	2250	3.8	38660	65.7	58859	100.0	63000	93.4
森	15750	31.0	1775	3.5	33250	65.5	50775	100.0	61000	83.2
理研	—	—	9453	52.8	8480	47.2	17933	100.0	18821	95.3

注 据梅井义雄：《战争、财阀、军需工业》制表。只有日窒的固定资产数字，另参照《满铁调查月报》，昭和12年12月所载：《军需工业与日本财阀的性质》。(出处：小山：《日本军事工业史分析》)

第18表 财阀控制民间军事工业的状况

(单位:千日元)

财阀别	舰艇武器 制造公司	实际资本 合计	百分比
(旧财阀)			
三井	7	87500	11.5
三菱	6	127425	16.7
住友	6	99615	13.0
十五银行	4	107000	14.0
台湾银行	2	25000	3.3
浅野	3	31750	4.2
古河	2	30150	3.9
涩泽	3	20625	2.7
大仓	5	10875	1.4
财阀共同经营 (新财阀)	6	29650	3.9

日 产	3	95687	12.5
日 室	1	2750	0.4
团 曹	1	1500	0.2
森	1	1075	0.1
中 岛	1	12000	1.6
川 西	1	1250	0.2
地方 财 阀	6	16820	2.2
以上 合 计	58	700672	91.8
其 它	24	62840	8.2
总 计	82	763512	100.0

注：数字据梅井义雄的计算，自昭和12年上半年至今。

（出处：小山：《日本军事工业史分析》）

国家资金。政府对运输业签订的契约与同时支付的“部分付款”的比率，1937年达到21%，1938年是12%，1940年是5%。至于器材的订货与同时支付的“部分付款”的比率在1937年实际上达到了31%，1938年是42%，1940年是61%。工厂方面对1938年度政府定货的未消化率，在汽车工业中达到了533%。在个别企业中，以三菱重工业公司为最多，达到421%，东京芝浦电气公司达到217%，日立制作所达到125%。这个数字表明，当时日本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能力是如何低于战争所需要的水平，同时也表明，军需订货为垄断资本家提供了广大的市场。

以上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军事化与国家资金的投放，当然给垄断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润。以钢铁业为例，1930—1934年的利润率为3.7%，分红率为2.6%，但在1941—1944年，利润率为11.1%，分红率为7.3%。特别在机械工具工业和金属工业中，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据兴业银行调查，1939年下半年，三井系统9个公司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3.9%，三菱系统26个公司的平均利润率达到22%，住友系统19个公司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5.9%。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三井系统企业的资本从11.8亿日元增加到28.2亿日元，三菱系统的企业从8.5亿日元增加到21.6亿日元，住友系统的企业从3.8亿日元增加到28.2亿日元，安田系统的企业从2.6亿日元增加到20.9亿日元。日曹、森、理研等新兴财阀，也通过国家资金的扶植进一步迅速成长起来。同时，这种大量的国家资金投放和把物资用于军事部门，使物价急剧上涨，并造成了实际工资的大幅度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如以1937年为100，1940年则迅速下降为68%，1942年为70%，1944年

为62%。经济的军事化与垄断资本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对工人的掠夺。在这个过程中，更进一步促进了金融的统制与银行的大合并，这是通过1942年的《全国金融统制令》来完成的，而其结果，采取了指定银行与强制贷款的制度，除了五大银行之外，其余都变成了资金的吸收机关。以对中国侵略的全面展开为转机而实行的经济军事化，自世界经济危机以来，逐渐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倾向，产生了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五、日军的暴行——南京屠杀事件

日军的南京大屠杀

芦沟桥事变以来，日中战争一发展成为全面的战争，就在中国各地发生了几起日本军队所制造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其中最大的是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时所发生的。这一事件直到战后由远东法庭揭露出来为止，在日本国内，人们是一无所知的。

日军在占领南京时，俘虏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据当时的纪录，一个团竟有捕获俘虏1.5万人的例子。在占领南京后不久的新闻报道中，据称“抓到了达六、七万人的俘虏”，但在入城式结束后所发表的数字则为“有俘虏数千”。据远东法庭的资料和当时日本的随军记者在战后所揭露，在12月17日的入城式前，这些俘虏的大部分和无数的一般市民被屠杀了。

有一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由于运输、补给中断，日本军队无法养活大批俘虏而进行的。但是，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为了让俘虏能吃上饭，已把贮藏了数百俵^①大米的地点告诉了日军，但是，就连这名军官也被杀害了。另外，凡被怀疑为当过兵的人，都一个不剩地抓了起来。而当时在难民收容所中，检查了全部身体健康的男子，凡是手上有拿枪磨出的手茧，或是头上有戴帽子痕迹的，全部被抓起来。这些中国人，与被俘的中国士兵一样，都被在城外集体屠杀了。目睹约两万名中国人被杀的当时随军记者，在战后谈到其惨状时写道：

码头一边是黑糊糊地堆积起来的尸体之山，其间有来回走动的人影。大约有50人或100人，迟缓地拖着尸体将其投进江中。呻吟声、滴流着的血、痉挛的手足。犹如哑剧一般的寂静。对岸隐约可见。微弱的月光照射着码头的一边。遍地是血。不一会，搬完尸体的“苦力们”，被弄到江边排成一行。机枪哒哒地响了，人们或是仰面倒下，或是吃惊地来回奔跑着，象舞蹈一样，纷纷掉进江里，结束了他们的生命。（洞富雄：《战史之谜》）

还有失去约束的大批日本兵，大肆掠夺、破坏家屋、放火，对妇女、儿童犯下暴行。据远东法庭提供的资料，有人看到有延续2/3英里的辎重队，拉着紫檀和黑檀的家具扬长而去。驻在南京的外国人的国际委员会委员长，在占领后不久报告说，日军至少制造了两万起强奸事件。翌年2月，

① 每俵60公斤。——译者

日军的高级军官对金陵大学的外国教师说，已向日军的军官和下士宣布，为了日军的士气，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状态。这样，日军自己就承认了占领南京之后，对一般市民所犯下的令人震惊的野蛮行为。同时，上述的外国人说，并没有听到对犯有强奸及其它残暴行为的士兵进行处罚的事情。

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之后不久，由慈善团体等所掩埋的中国人尸体，据记载约有20万具。此外，再加上被日军自己埋葬的、由亲友埋葬的、被打死后掉进长江的或想乘船、筏逃向长江而遭机枪扫射死亡的，估计约有30万中国人被杀死。（洞富雄：《战史之谜》）

这里包括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据说当时南京的守军为10至15万人。即使假定其中10万被消灭，一般市民被屠杀的数字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且这样的屠杀与掠夺不只限于南京。当时在中国居住了35年的一位美国人这样写道：

如果我不明确地指出下列事实，那是我良心所不容许的。如果还有人相信，在中国的日本军队，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人的生活和使他们愉快为目标的，我想请您看看南京和上海200英里以内的情况，请您看看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凉与破坏的景象。6个月以前，这一带即使在世界上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中国最繁荣的地方。但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些被轰炸了的城市和化为灰烬的乡村。在荒芜了的肥沃土地上，只能看到少数老头老太太在默默地耕作着。家畜不是被杀掉，就是被抢走了。（洞富雄：《战史之谜》）

三光作战和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行为的揭发

日军的暴行，不仅仅是南京的屠杀。在北京、南京等重要城市陷落、国民党系统的军队西撤之后，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入了日军占领区的后方，在人民的支持下展开了游击战。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以这时的革命军队与人民的合作关系为基础的。而由于这样活跃的游击战，尽管日军占领了广大的中国领土，也只限于确保“点与线”，甚至“线”的确保，也常常受到威胁。面对着这种同人民牢固结合起来的抗战，日军采取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复屠杀，即所谓“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的战术，妄图连根铲除这样的抗日根据地（亦称解放区）。

1971年7月7日，在大阪的中之岛公会堂，由“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关西地区居住者主持，举行了集会。该联络会是曾经在中国被判为战犯，由于认识和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宽大处理而被释放的人们的组织。会长是原中将藤田茂。在当天的集会上，他们通过原原本本地讲述自己犯下的罪恶，揭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野蛮罪行。

1941年8月，对分配在湖北省某部队的见习士官，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现场教育，最后一天下午的课目是“试斩”。在团长以下的军官的监督下，26名赤手空拳的中国人被杀害了，其中有大约十七、八岁的少年，临死前不断咒骂“日本鬼子！日本鬼子！”。

1942年3月，在湖南省抓到一名被疑为“密探”的农民，没有任何证据，只是说“我是附近的农民，到市上去卖菜刚

回来，什么坏事也没做。因家里有妻子和3个孩子在焦急地等待着，所以早早回来了”。但他被打得脸色发紫，然后抛到房间里的泥地上，嘴里塞上毛巾，不断往肚子里灌水，再用靴子踩着肚子把水放出来。最后，他被砍死了，死前嘴里还念叨着妻儿。

1942年7月，在当时的热河省承德附近，日军宪兵队把分散在山间的中国农民的房屋全部烧毁，开枪打死受惊的猪和鸡。跑不动的老人和小孩，跪在地下不断地求饶，但被用手枪打死了。

1945年4月，在山东济南附近，一位64岁的老人，只因保存着一张“每年支給年金20元”的中国共产党地区委员会的文件，就被倒吊起来打死了。此外还谈到把俘虏当作靶子让新兵练习突刺、大规模屠杀和活埋、让军医做活人解剖、谋杀、抢劫、强奸、奴役劳工、经济封锁、用人体进行细菌试验等罪行。而这里所说的，只是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并有勇气将其坦白出来的人所知道的事情。“凡是宪兵、警察所到之处，凡是有特务机关的地方，每天都犯下了大量暴行”。

通过上述例子，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包括南京事件在内，这可以说是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和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的中国俘虏所犯下的暴行。这就不能说“因为是战争，所以是迫不得已的”了。

上述报告者们进一步谈到在当时军国主义体制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时说：“当时我们有根深蒂固的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和对其他民族的蔑视感。而且有把杀人看成是英雄行为的残忍武士道精神。并且由于崇拜天皇的专制主义，有对强者和当权者绝对服从，使弱者和无权者绝对被服从的非人道

的思想。这些思想是通过少年时代的教育和军队中的军人精神培养出来的”。这些话表明了，在屠杀的背后是由什么思想支配的，以及它是怎样形成起来的。

这些报告人还说，即使从战败作为战犯而被收容的时候起，在相当长时间内，还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保卫日本的权益和在华日本人而进行的战争”，“是服从命令干的”，“日军也有正义感，也做了救护中国人的事情”。认为“我们不是战犯”，担心“中国人怨恨日本人，会不会杀死我们”。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打一下和骂一句”，“相反却关心我们的健康，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由于人民中国的工作人员采取了完全尊重人格的人道主义措施和接触了革命后的中国人的生活，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这些中国人的行为，是根据要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人格的毛泽东的教导行事的。他们使我们“从魔鬼恢复了人的良心”。

六、中国、朝鲜斗争的蓬勃发展

毛泽东的预见

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一开始，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及亚洲各个地区的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就高涨起来了。在这种斗争中，开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地进行了抗日战争，这成为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而中国人民胜利的

过程，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过程。

毛泽东早在芦沟桥事件的前夕，就清楚地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已经迫近。毛泽东在芦沟桥事件的一年前，就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说：

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论持久战》）

而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确实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毛泽东还在1937年5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说：

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已经极其秘密地决定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方针，但在表面上却宣传“中日提携”，在新的伪装下，进行侵略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带有新的伪装的政策，在当时的中国反动统治者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幻想，而毛泽东则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向中国人民明确指出，它开始全面侵略战争的日子已经迫近了。

关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战争的地位

芦沟桥事件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采取“片面抗战”的路线，谋求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因此，面对着日本军队的进攻，接连遭到重大的失败。那时毛泽东就把“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了彻底发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在敌人的后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了后来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进而成为新中国成立的基础。

这十大纲领就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妥协动摇。

二、全国军事总动员：

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抗战。

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的方针。

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和作战方针。

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

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

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

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国各地军管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

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的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

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动员蒙、回和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

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

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和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

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

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废止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调节粮食。

赈济灾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新制度、新课程。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和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毛泽东在这一年10月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还说：

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垂手而得东四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

清楚地表明了胜利的预见，同时明确了抗日战争在世界革命斗争中的地位。

在抗日战争战略问题上的争论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上，不只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存在着争论。在共产党内部，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一味迷信日军的强大，认为只有国民党能够领导抗战，而轻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王明认为蒋介石是“抗日建国的领导者”，共产党的军队也应置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之下，“必须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反对动员全国的群众，在日军的后方建立解放区。毛泽东在1937年11月发表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自主原则和党对军队的领导。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

义。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片面抗战”的机会主义及其压迫人民的政策，于1937年12月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屠杀了大约30万中国人。在1938年，占领了包括武汉、广州等中国重要城市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在国民党及其影响下的中国人中“亡国论”抬头了。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轻视游击战争和解放区的建设，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和国民党军队的“速胜论”。

这时，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认为

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夕。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之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了通过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必然是中国人民的，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战争的理论。武汉失陷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来说，是最困难的时期。关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产生了如何巨大的影响，从当时在中国，同中国人民一起进行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池田幸子后来所说的以下话中看起来。她说：

正是这一著作使中国人民确立了胜利的信心，指明了胜利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一著作，中国肯定是会崩溃的（参照《中研月报》第304号）。

的确，由于毛泽东的这些著作，使中国避免了崩溃的危机，迅速发展了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埃德加·斯诺当时在

《亚洲的战争》一书中说：

其它的中国军队，在训练、补给、装备各方面都比八路军优越。但却出现了一个奇迹，这就是人们的期望只寄托在贫弱的八路军方面。要是八路军以外的军队，以这样贫乏的装备和训练，一定会马上吃败仗和被消灭，不会给动摇的群众带来士气和自信。而且，如果日本军队真的把八路军消灭了，数百万中国人民就会丧失最后胜利的希望。

正如斯诺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战争的真正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所领导的在日军背后建立的解放区的迅速发展，是通过抗日战争的正确主张实现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在解放区使人民彻底站起来，同时，把他们组织起来，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人民参与政治。创办了许多学校，整顿了卫生设施等，并建立了许多中国人民从未见过的福利机关。1939年访问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国红十字代表，指出“尽管处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在清洁、秩序、对病人的护理方面’，新四军的医院设备是最好的。”（斯诺：《亚洲的战争》）。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边进行着残酷的战争，一边在解放区进行了植根于人民的文化创造。陕北的延安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是其中心，在各个解放区有它的分校，由鲁迅培植的版画、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等许多文艺作品，都是在毛泽东的《文艺讲话》的指导下产生出来的。从事抗战的中国人民，从这些作品中受到了不可估量的鼓励。从各地的民谣、舞蹈中产生的健康作品，也被推广和发展起来。同

时，这些文化活动，成了革命后新中国文化的基础。在抗日战争时代的解放区，走向中国未来的准备，就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进行了。

毛泽东主张的胜利

面对着解放区与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的这种迅速发展，日军将其锋芒主要指向解放区与八路军、新四军，实行了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蒋介石消极抗日，企图同日军妥协。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胡适，1938年12月在纽约律师俱乐部的演说中说：“由于广州、武汉的失陷，已向日本非正式的、间接地提议媾和，但因日方提出的条件，对中国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所以决定继续抗战”。同一时期发行的国民党机关刊物《血路》说：“我们认为，日本如果确有同中国停战与媾和的诚意，就应该马上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据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在同日本进行交易，并且那时已不把收复东北作为前提了。

蒋介石一边消极抗日，一边积极反共，让他的军队包围解放区，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蒋介石对解放区最大的一次进攻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参谋部要求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转移到黄河以北。乘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的约1万人的部队向北方移动的时机，在安徽省的泾县、太平附近，以约8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和进攻新四军。新四军部队进行了英勇奋战，但终于弹尽粮绝，只逃出1000多人，副军长项英以下大部分牺牲，叶挺也被俘。这一事变是由蒋介石的进攻而发生的，但新四军内部也

存在着严重的认识上的缺陷。作为共产党代表的项英（叶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在《新四军抗战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中，强调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这是如前面所说的已被毛泽东批判了的观点。项英从这种观点出发，拒不执行来自延安的“巩固游击根据地”的指示。以皖南事变变为转机，蒋介石加强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但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和全中国人民的抗议，未能达到其目的。另外，通过这一事件证明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和毛泽东主张的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经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走向胜利的道路。在这里所提出的理论，不仅在以后的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威力，而且成为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的理论武器。另外，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对于新型政党的建设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

是说，一个老中国。……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在胜利的前夕，呼吁中国人民在未来新的情况下，抛弃一切对蒋介石反动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准备进行新的斗争。而后来的历史，的确是走着毛泽东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揭示的和科学预言的道路。

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成立

朝鲜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发展的过程，也是金日成路线的确立与发展的过程。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朝鲜工人阶级的成长以及三一革命斗争的直接影响下，朝鲜共产党在1925年成立了。但是，20年代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普及时代，工人阶级也未充分成长起来，运动主要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进行的。因此，虽说这个党对工人运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未能克服宗派主义。由于反复发生的派系对立，结果在1928年解散了。其后，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为马列派、火曜派等，未能打下群众基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编纂的《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活动》，在谈到当时情况时这样写道：

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中大部分自封的领导者，无例外地不是分裂分子，就是顽固的民族主义

者。他们没有任何群众基础，而是各自纠集本派系统的几个人同其他一些人，为了把持“领导权”而进行派系斗争，发表一些完全脱离具体的现实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词句和空论。分裂分子们，各自摆出“理论家”和“领导者”的架式，玩弄着“朝鲜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朝鲜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民族资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等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诡辩，把青年学生引入迷途。

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在1926年秋组织了非合法的革命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它的将来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当前的目标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实现朝鲜的独立。这个组织在1927年夏改称为“反帝青年同盟”，进而由其骨干分子组成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930年夏，金日成在卡伦召集了由“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领导成员参加的会议，指出了当前朝鲜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其基本的动力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也可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金日成还认为，革命的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同它勾结的地主、买办资本家、亲日派和民族的叛徒。革命的任务在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经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而完成世界革命。这样，就阐明了当时朝鲜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阐明了工人阶级在这一革命中的作用和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化问题，进而明确地规定了朝鲜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可以说，以后的朝鲜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道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在这里打下了

基础。

间岛五·三〇事件的失败和教训

1930年春，在朝鲜边境地带的中国一边，爆发了仿效1925年上海五·三〇事件的称之为“间岛五·三〇事件”的大暴动。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在整个东北掀起的激烈暴动，即使只从间岛一处，也可以看到李立三“左”倾错误影响的严重性。这些暴动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并以失败而告终。

金日成从这一暴动的失败当中汲取了教训。李立三“左”倾错误是轻视游击战、不管形势如何都进行正面进攻、轻视根据地建设的。金日成同年5月在明月沟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必须克服极左冒险主义路线，贯彻革命的组织路线》的演说。在这个演说中，激烈地批判了“极左冒险主义的五·三〇暴动，给我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并说：“我们首先应该反对分裂主义者和事大主义者的极左的冒险主义，加强对群众的组织和政治活动，做好迎接今后的更严重事态的准备”。另外，金日成在同一演说中还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起劲地助长由极左冒险主义的五·三〇暴动所引起的朝鲜、中国人民之间的不和与争吵，一面实行老一套的民族离间政策，企图通过使朝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分裂和对立，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的侵略野心”，主张朝、中两国人民的坚强团结。

金日成还在同年12月于明月沟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论组织和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的演说。金日成在这个演说中认为：“为了以游击战的形式，组织和开展

武装斗争，就必须创建游击根据地。只有有了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才能够在强敌的包围中，不断扩大和加强武装部队，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并且能够在敌人无差别的屠杀之下，保卫革命的群众。”“游击队在建立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加强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后，才能克服在长期的困难斗争中遇到的障碍和难关，取得最后的胜利”，确定了游击战是抗日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并且只有创建根据地，抗日游击队才能拥有进行军事活动的据点和自己的后方基地，才能加强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根据这种方针，1932年，金日成在安图、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县组织了赤色游击队，开始建设根据地。此外，在北方的饶河、虎林、抚远等各县，崔庸健率领的游击队也开始了活动。

在金日成的领导下日益发展的斗争

金日成的抗日革命斗争在克服着巨大困难的同时，向前发展了。正如《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活动》所说的那样：“金日成同志一面在外部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在内部组织和开展了打退分裂分子和极左机会主义者所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的深刻斗争，一面把根据地建设成革命的坚强堡垒”，“在革命根据地创设之初，对武装斗争一窍不通的分裂分子和极左机会主义者们，只主张创设解放区形态的完全根据地，而反对在其周围创设半游击根据地”。由于很多朝鲜人在国内无法容身，不得不在本国之外进行斗争，这也带来了许多困难。在当时东北的朝鲜革命家之间也存在着许多派系。另外，除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之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抗日势力。这种复杂的情况也带来了许多困难。在毛泽东的领

导地位确立以前，特别是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强烈影响，在集结整个反帝势力和对各民族的政策方面，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也存在着许多缺点。

1933年春，在汪清县召开的会议上，金日成主张将历来的苏维埃形式的革命方式改变为以使一切阶层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革命政权，把解放区的政策变成基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原则的政策，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把没收土地只限制在亲日的反动地主的范围内。在以人民的统一为基础的同时，也大胆地同国民党系统的抗日部队进行共同行动。而在1933年6月，不顾危险和困难同附近的国民党系统的抗日部队成功地建立了联系。

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反活动和金日成领导权的确立

在这种斗争的发展面前，日本帝国主义也进行了在反帝斗争内部捣乱和离间中朝人民的活动。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起御用团体“民生团”，进行了特务活动。“民生团”本身因缺乏活动的基础，不久就解散了，但它却在反帝力量的内部留下了一条祸根。

1934年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中，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指导下的“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主张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方针下，中国红军主力蒙受了巨大损失。1934年9月，不得不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这种极左的方针，在东北的表现是不让朝鲜人居于领导地位，并且产生了认为朝鲜人民提出自己的民族解放的任务是具有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的错误观点，结果出现了许多朝鲜活动家被怀疑为“民生团”分子并被处刑的事情。1936年在由“满洲

国”军政部顾问部编纂的所谓《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一辑中说：

民生团以镇压共产主义运动为主要目的，其成员是朝鲜人。……虽然开始了扑灭共产主义的运动，但作为实际活动并没有收到特别显著的成效。然而，民生团的成立，在共产主义内部造成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派系等问题同潜入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民生团的活动结合起来，疑心生暗鬼……引起了大恐慌。因此，即使在民生团解散，协助会成立之后，民生团的名字也成了这样的反共产主义组织的代名词。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行的白峰著《金日成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其影响一度曾出乎意料之外的严重，在革命队伍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这是因为，堕落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一部分分裂主义者，假手于民生团的破坏谋略活动，利用反民生团的斗争来进行它的分裂活动，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了。分裂主义分子们不仅进行种种捏造，给不中他们意的坚强共产主义者贴上民生团的标签，而且发展到对他们随意加以杀害的暴行。这确实是日本帝国主义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日本侵略者乘此机会，一面动员潜入革命队伍的走狗对分裂主义分子进行煽动，一面玩弄各种手段收买他们。在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分裂主义者勾结起来，使朝鲜革命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依靠和坚持革命的主体而前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从1935年2月到3月召开了大荒藏会议和腰营沟会议。在

这些会议上，金日成同分裂主义者和民族沙文主义者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金日成在朝鲜共产主义者之间的领导权，可以说从这时起就确立了。

以东北为舞台的朝鲜人民的解放斗争，走着艰苦的道路。其原因是，这个地区处在复杂的情况下，并且在当时，中国、朝鲜两国人民各自的内部，也处在正确领导的确立过程中。为了克服李立三“左”倾错误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即使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随着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左”倾错误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被克服，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及在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内部形形色色的分裂主义被克服，金日成路线取得了胜利，两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才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建立了正确的关系。

祖国光复会的创立宣言与十大纲领的发表

1936年2月，在宁安县南湖头密林中的一间小木房中召开的会议上，金日成提出了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加强创立朝鲜革命的先锋党准备工作的方针，进而强调了“今后活动的中心课题是创建以白头山为中心的鸭绿江、豆满江^①等等边界地带的新游击根据地，在国内使武装斗争的范围愈来愈扩大，必须直接地组织和领导国内的革命运动”（《金日成传》）。在5月召开的抚松县东冈会议上，使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更进一步具体化了。5月5日，发表了祖国光复会的创立宣言和十大纲领。祖国光复会选举金日成为会

① 即图们江。——译者

长，并决定发行机关刊物《三一月刊》。

祖国光复会的十大纲领是：

一、通过对朝鲜民族的总动员，实现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统治，建立真正的朝鲜人民政府；

二、依靠朝、中两民族的亲密团结，推翻日本及其傀儡满洲国，建立中国人民自己选出的政府，实行居住在中国领土内的朝鲜人的真正自治；

三、解除日本军队、宪兵、警察及其走狗的武装，组成为朝鲜独立而斗争的真正革命军队；

四、没收日本国家及日本人所有的企业、铁路、银行、船舶、农场、水利机构和卖国的亲日分子的全部财产与土地，作为独立运动的经费，以其一部分救济贫苦的人民；

五、废除日本及其走狗对人民所持有的债权、各种税款和专卖制度，改善群众的生活，不断地发展民族工业、农业和商业；

六、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恐怖政策和反对宣扬封建思想；

七、取消两班、常民及其它不平等，实现基于无歧视原则的男女、民族、宗教等的平等，提高妇女的社会待遇，尊重妇女的人格。

八、取消奴隶劳动与奴隶教育，反对强制性的军事服务和对青少年的军事教育，实施以我国语言和文字进行的教育和免费义务教育；

九、实施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

等，确立劳动法案，国家机关实施各种工人保护法，救济失业的劳动群众；

十、同对朝鲜民族采取平等立场的民族和国家亲密地团结，同对我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善意与中立的国家和民族，保持同志式的友好关系。

这个纲领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基础。即使在今天，其原则仍将作为南北朝鲜统一的基础。

长白县内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朝鲜的人民革命军重新集结起来，开向边境地带，同年秋天到达了鸭绿江边，在长白县内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组织了祖国光复会。根据十大纲领，在长白县活动的由朝鲜民族主义者梁瑞风领导的“朝鲜革命军”也加入了人民革命军。另外，在边境的朝鲜一边，组成“甲山工作委员会”而进行活动的朴达、朴金喆等共产主义者也根据金日成的指示，使其组织发展成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开始建立了地下组织。被称为“惠山事件”的这些活动，遭到了被捕数千人的镇压，但祖国光复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在包括清津制铁所、兴南制铁所等重要军需工厂在内的工厂、农村、学校开展了活动，组织了罢工和怠工，进而咸镜北道的天道教（以天人合一的理想之乡为目标的朝鲜独特宗教）的领导者朴寅镇及其影响下的教徒参加了祖国光复会。现在，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天道教青友党参加了统一战线，其起源就在于此。祖国光复会的影响就这样迅速扩展到朝鲜全国。在日本警察的文件中也说：

朝鲜边境的居民，……特别是对岸……以长白山为

根据地正在活跃中，……相信金日成……为世界的伟人及朝鲜民族的救世主，敬慕他，明里暗里支持他的人很多。（惠山署：《惠山事件调查书》）

普天堡战斗的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

1937年6月，在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本土扩大侵略战争的前夕，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渡过鸭绿江向朝鲜挺进，攻打了普天堡，捣毁了警察驻在所，面^①事务所、金融组合等等统治机构。金日成在谈到这一战斗时说：

其意义不在于消灭了多少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在于朝鲜人进行了拼死的斗争，树立了只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就能取胜的信心，看到了革命的曙光。普天堡战斗是朝鲜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殊死斗争，这就是不承认内鲜一体^②，朝鲜人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是同祖同根，朝鲜人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起侵略中国，朝鲜不抛弃本国语言，不把自己的姓改为日本的姓。它并向全世界宣布，只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能够取得胜利。这就是普天堡战斗的战略意义。普天堡战斗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在当时日本方面的记录中谈到当时情形时说：

对于我方的不利形势，时时刻刻在加深着，宛如精神和肉体全被摧毁了似的。如果有佛教所说的地狱的话，那么，这里实际上就象是在那黑暗中彷徨的饿鬼一样。当时的悲愤、苦恼、焦虑心情，确实是笔墨难以尽

① 面：朝鲜的行政单位。——译者

② 内鲜一体，内指日本，即日朝一体之意。——译者

书的。一想起普天堡事件，就会令人产生千日积薪，瞬间成灰的情绪。它（人民军）的活动是有组织的，有着良好的纪律，实际上与一国的独立军队毫无二致。

在全国范围内斗争的高涨

芦沟桥事件之后不久，在1938年8月召开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战员大会上，金日成分析了新的形势，提出了要开展积极的斗争，9月，在给朝鲜人民的呼吁书中，金日成说：

我们必须把经过训练的政治工作人员派往朝鲜的重要军事基地，即兴南、咸兴、元山和其它地区，而且，必须使他们同已经派出的同志取得紧密的联系，着手扩大和加强其组织。作为实现敌后武装暴动和破坏工作的前线执行组织，创设工人突击队是特别重要的和迫切的。

根据这一方针，通过被派遣的工作人员，不久在兴南肥料厂、本宫化学厂、兴南火药厂等重要工厂建立了祖国光复会的基层组织，进而发展成为兴南地区委员会。1937年10月，祖国光复会兴南地区委员会在市内各地散发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扩大与加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檄文。日本的警察当局也说祖国光复会计划和实行了

向道内（咸镜南道）兴南、咸兴、元山等军事上和国防上的重要城市和咸北方面……派遣政治工作人员，组织了各种非法团体，或者通过谋求与天道教徒合作，扩大与加强抗日人民战线运动，同时，把这次事变，看作是收复失地、使朝鲜独立的绝好机会，动员在朝鲜国内的成员，举行武装起义和扰乱后方。（咸镜南道警察

部发行《治安状况》)

通过这种活动，在直至釜山的整个朝鲜开展了广泛的罢工和租佃纠纷。租佃纠纷，仅在1937年就达到了1.7万多起。这样高涨的斗争，是同政治工作人员的活动分不开的。

日本帝国主义加强镇压与极左方针所造成的损害

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应付这种形势，加强了在朝鲜国内的镇压，同时，对金日成的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讨伐战。另外，东北的革命运动，虽然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加强起来了，但“当时混入共产国际内部的一部分极左冒险主义分子，企图让满洲一带的朝、中抗日武装部队远征热河地区”（《金日成传》）。中国东北南部地区，交通网发达，不利于游击战，并且是日军大部队集结的地方。这种主观主义的极左方针，给这一地区朝、中抗日武装部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杨靖宇率领的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开始向南方移动，但付出了重大牺牲而未能达到目的，杨靖宇也在1940年2月阵亡。满洲事变以来在东北大大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武装斗争，也遭受了巨大挫折。这在战争末期，对于八路军的活动也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朝鲜人民革命军也在这个极左的方针下，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1938年11月召开的濛江县南牌子会议上，金日成批判了远征热河的计划，坚决主张在朝鲜边境地带继续活动。朝鲜人民革命军为重新返回朝鲜边境而进行了长征。这次行军，被称之为“苦难的行军”。它是在人民革命军所遇到的最困难时期，而且是在冬季的严寒条件下进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39年春到达了鸭绿江边。同年

5月，在朝鲜的茂山战斗中，狠狠打击了日本军队。这次作战，向朝鲜人民显示了人民革命军的力量，在张鼓峰、诺蒙坎战斗中，牵制了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0年8月，在敦化县小哈尔巴岭召开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干部会议，根据金日成的建议，实行了方针的转变，决定此后不断加强以小部队为基础的游击活动和部队的军事、政治活动，全面动员一切反日势力，准备解放祖国。

日本军队对朝鲜人民革命军，反复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从1939年起进行了3次进攻的日军司令官野付少将，在就任训示中说：“尽管进行了数年的讨伐，在吉林、间岛、通化3省的边境一边，匪势依然未衰”（《讨伐肃正计划纲要》1939年9月）。在1940年9月的秋季作战时还说：“至为重要的是讨伐金日成，应尽量搜索歼灭之。”（《野付讨伐队秋季作战计划》）在1941年1—3月的冬季作战中还指令：“重新进行部署，以主力对金日成匪，以一部对魏拯民^①匪实行搜索歼灭，誓要各方面完成最后之肃清”，“间岛地区讨伐队长，协同通化地区讨伐队于安图县方面活动，并将讨伐队的主力使用于和龙县方面，努力对金日成匪进行捕捉歼灭。”（《冬季作战计划》）这时还规定：“在讨伐实施方面，特别要倾注全力于匪首的捕杀，在捕杀主要匪首时给予赏金如下：金日成、崔贤（曾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相）1万日元；魏拯民、金光3000日元。”这表明，金日成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心目中，已成为最危险的人物了。

^① 魏拯民（1900—1941），抗联第二军政委、中共东满特委书记。1936年10月，率队在长白县与金日成同志会师，展开抗日武装斗争。——译者

朝鲜人民的希望所在——金日成的斗争

另一方面，金日成的斗争，给谋求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朝鲜人民带来了希望。这在日本警察的许多报告中都有所反映。平壤的打铁工人们计划在自己的工厂中制造武器，加入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平安南道警察部：《铁工厂职工等的朝鲜独立企图及其它文件》，1944年）全罗北道全州师范的学生说：

金日成是为朝鲜独立而斗争的志士，带领着人数众多的部下，拥有强大的势力。……我们必须互相帮助，锻炼身体，成为他的部下，为朝鲜的独立而尽力。（《高等外事月报》51号，1944年）

还有平安南道的青年认为：

现在，活跃在满洲的金日成……是为朝鲜独立而积极斗争的，必须作为我们的先驱而加以崇拜，我们必须同他们一起，为朝鲜的独立而积极行动起来。（平安南道警察部：《“斗争”集团事件检举文件》1944年）

在朝鲜人民的独立运动中，被日本警察所破获的事件，在1942—1944年间达到30多起，而《高等外事月报》1943年9月号说：朝鲜青年学生们

几乎全部相信日本将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打算乘此绝好的机会达到造反的目的。其具体方法是，同无限崇拜的金日成将军取得联系，并在其保护之下，勇敢举行武装起义。

1952年发行的镰田泽一郎的《朝鲜新话》还谈到

大约7年前（1945年前后），我在某小学的6年级

学生和中学2年级学生的集会上发表讲演后，提出一个问题：“大家认为在日本人中（包括朝鲜人），谁是最伟大的呢？请正直地进行无记名投票，决不要害怕”，于是让他们安心地进行了无记名投票。令人吃惊的是，67%写的是金日成。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下，金日成的名字是要求解放的全朝鲜人民的希望。

金日成的名字对于在外地的朝鲜人民来说，也是一轮红日。据笔者的调查，在入殖吉林省舒兰县四家房的长野县大日向开拓团中，当日本少年欺负朝鲜少年时，朝鲜少年就说：“告诉金日成揍你。”据《特高月报》认为，在被日本强制抓来的朝鲜人中间，例如1944年居住在杉并高圆寺的朝鲜工人也认为：“金日成在满洲组织了朝鲜独立团而进行活动。将来朝鲜的总统是金日成，我们应该跟着他，……在金日成的领导下，紧急行动起来为了朝鲜而工作”。大阪的朝鲜贫苦学生集团，1944年决定“当金日成军队正式举起反旗时，与之相呼应，毅然举行起义。”金泽的朝鲜学生俱乐部也作出决议说：“北朝鲜出身、热心从事独立运动的金日成，以白头山为根据地……为了朝鲜独立而战，同时在训练优秀的朝鲜同胞，我们也应该协助他们的独立运动”。被强制抓到北千岛的朝鲜工人，在运输船中说：“如能同金日成将军见上一面，那该多好啊”。

这些例子说明，金日成的斗争，给予许多朝鲜人民以希望，促使他们觉醒起来。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接近失败，朝鲜人民要求独立的斗争也日益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就是这样崩溃的。同时，在解放前就已结成自己的军队与政

治的核心方面，其意义是很大的。

七、宣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日本统治中国占领区的四个时期

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的占领区扩大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可以分为4个时期：1.从芦沟桥事变到欧战爆发；2.从欧战的发生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处于攻势的时期；4.日军丧失了主动权以后的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日本对占领区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倾向于掠夺各种资源，日本的国策公司及其子公司相继成立了。在第二个时期中，日本帝国主义改为重点主义的经营，集中精力掠夺以二白（盐和棉花）、二黑（铁和煤）为代表的重要资源，进行新的战争准备。在第三个时期中，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地把占领区扩大到南方各地，企图在从华北、华中直至南方的占领区中建立“日元区”。在第四个时期中，日本帝国主义在作战上转入守势，随着这种情况而来的，在占领区，也在“企业调整”的名义下，从重点主义出发进一步集中掠夺少数重点产业，在地方上，也不得不集中于一部分重点地区。劳动力的直接征用和强行抓人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由于1939年修改了华北关税，对日本商品的进口税率降到了最低限度。另外，通过同日元相联系的“联银券”、“蒙疆券”的发行，加强了经济控制。日军一旦夺取了中国

的企业，主要是通过“军管”和“委任经营”两个方法来利用它。所谓“军管”，有军方直接经营的“临时军管”和委托给日本的公司两种情况，而大部分是后者。其委托事项是由特务机关决定的。“委托经营”是军方拥有主权，日军任何时候都可以把经营委托给别人。与此相反，“委任经营”则无论是主权还是经营权都是日本的民间公司掌握的。这种形式特别是在华中较多。此外，还有以“日中合办”（有国策公司经营下的垄断事业和“自由企业”之别）、“租赁”、“收买”等形式进行控制的。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则建立了华北开发股分公司、华中振兴股分公司等特殊公司，作为统一掌握这些企业和“有计划地”掠夺中国资源的机关。但在这种公司设立之后，上述几种统治形式仍然继续被采用。

对华北占领区的统治

芦沟桥事变以后，随着日军占领地的扩大，对占领地的统治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最早在统治占领地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是1935年设立的、在对华北进行经济侵略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兴中公司。兴中公司于1937年12月着手恢复处于日军占领下的井陘煤矿，并从同年11月起，受军方委托经营石家庄、保定、彰德、济南等重要城市的电气公司。12月，龙烟铁矿一落入日军之手，翌年3月就把20万吨铁矿石运到日本，同时，把占领地的主要制盐工厂置于其统治之下。另外，大同的口泉煤矿被委托给满铁经营。兴中公司进而控制了华中的水力发电和交通。但是，随着占领地的扩大，经营被没收的中国企业，兴中公司和满铁已不能胜任了，因此，便计划成立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

第19表 受日本资本“委托”的中国工厂

	委 托 公司名	同公司中国名	被“委托”的中国工厂
纺 织 部 门	钟 纺	(华名, 公大纺)	仁丰(济南) 大兴(石家庄) 晋生(太原)
	东洋纺	(同, 裕丰纺)	鲁丰(济南) 晋华(榆次)
	上海纺		大益、蕴裕(新乡) 益晋(祁县)
	国华纺	(同, 宝来纺)	华新(青岛) 盛通(济南)
	其 它		
制 粉 部 门	日 东	晋丰(太原)	槐榆(榆次) 通丰(新乡) 集丰(石家庄) 大和恒(彰德) 乾义(保定)
	日 清	唯一(北京)	成纪(济南)
	日 本	嘉端(天津)	济南三工厂

(根据大藏省编:《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

从1938年1月起, 华北的日军特务机关制订了《华北产业九年计划》, 作为执行这一计划的机关而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这个计划是“基于以日、满、华北为一体的重要资源, 特别是铁、煤、液体燃料、矾土页岩、盐及棉花需求计划的设想而制订的”。正如这一计划的宗旨所说明的那样, 其目的是掠夺华北占领区的资源和把华北经济纳入日本的殖民地体制之下。在这个计划中, 规定从1938年—1946年把煤的产量从1285万吨提高到6000万吨, 同时, 把对日运出量从300万吨增加到3100万吨。铁矿石的产量从48.3万吨提高到270万吨(其中对日运出量从40万吨增加到135万吨)。生铁

第20表 兴中公司的受托公司

部 门	企 业 名 称
1. 煤矿部门	井 陘 正丰 磁县 中和 怡立 永安 六河沟 焦作 凭心 阳泉 寿阳 西山 东 山 轩岗镇 洪洞 孝义 介休 富家滩 华丰 中兴 柳泉
2. 电力部门	保定 高阳 石家庄 晋县 彰德 新乡 开封 太原 榆次 大谷祁县 平遥 临汾 新绛 除州 海州
3. 炼铁部门	石景山 太原 阳泉
4. 矿山部门	将军岭(石灰山) 宁武 定襄 东山 (以上铁矿山)
5. 制盐、苏打部门	久大制盐工厂 永利苏打工厂
6. 其它部门	太原铸件工厂 太原窑厂 贮煤场七处

(据大藏省管理局《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

的产量从6.8万吨提高到87万吨(其中对日运出量达到42.1万吨)。矾土页岩的产量从1.7万吨提高到40.7万吨(其中对日运出量从1.7万吨增加到36.2万吨)。盐的产量从123.6

万吨提高到249.4万吨（其中对日运出量从66.9万吨增加到161.4万吨）。液体燃料从无到生产105万吨（其中对日运出量从零到6.2万吨）。皮棉的产量从24.7万吨提高到59.7万吨（其中对日运出量从17.1万吨增加到25.6万吨）。这些数字显示出，这个计划的目的，首先是控制华北资源和将其输送到日本。

1938年，日本的73届议会通过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法案》。按照这一法律，6月27日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成立大会，经过日本政府的批准，在6月30日正式诞生了。该公司的资本由日本政府和民间各出一半。政府的出资为在占领地夺取的铁路、桥梁、建筑物、车辆等计3058.6万日元。另外，这个公司是特殊法人，被赋予了（1）达到民间红利6厘时，具有优先分配权；（2）可以发行达到实

第21表 日本向华北开发公司的投资者

业 种	股 数 (单位： 千股)	业 种	股 数 (单位： 千股)
生命保险	315	损害保险业	49
电气业	155	铁工业	112
煤炭业	100	海运业	63
造船业	42	纺织业	77
人造丝	35	糖业	63
证券业	155	三井财阀	315
三菱财阀	315	住友财阀	315

（根据1938年8月19日《东京朝日新闻》）

际资本5倍的债权，债券的偿还和利息由政府保证；（3）在开业后的10年中间免收所得税和地方税等等特权。华北开发公司的投资者如第21表所示，由此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由国家资本和垄断资本共同出资的特殊公司。这个公司，除接收了兴中公司的业务外，还在许多部门进行了投资。其投资特别集中于交通、煤炭、电力、化学工业部门，可见它同芦沟桥事变以前的《华北开发计划》是一脉相承的。

华北开发公司拥有发行达到其实际资本5倍的债券这样的特权。到1934年9月底止，发行了32次，约103750万日元的债券。认购者是日本的第一流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关。这些企业，由于受到政府所保证的特权的保护而获得了庞大的利润。

在华北开发公司的子公司中，最大的是华北交通公司。华北交通公司是于1939年4月以资本3亿日元（60万股）设立的。投资的情况是，华北开发公司的实物投资1.5亿日元（占领地区的铁路及其设施），满铁现金投资1.2亿日元，傀儡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现金投资3000万日元。华北交通公司又在1941年获得了华北开发公司的实物投资850万日元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现金投资1500万日元而达到资本4亿日元。华北交通公司在1941年控制了铁路6000余公里，在1942年进一步控制了铁路1.5万公里。此外，还对华北各地的水运（天津和塘沽的码头）和天津、青岛的公共交通事业进行了投资。华北电业公司是除战前由日资经营的天津电业公司和冀东电业公司外，合并了日军接收的华资公司，于1940年以资本1亿日元成立的。其后，济南、青岛、芝罘（烟台）等的电气公司也置入解除军管后的华北电业公司的

控制之下，在1943年6月，资本增至3亿日元。大股东有“华北政务委员会”的95.3万股，华北开发公司的59.7万股，傀儡“天津特别市”的4.7万股等等。华北电话公司，于1938年7月以资本3500万日元成立。1942年，该公司的线路达到137条、198局。大股东是傀儡政府19.99万股，华北开发公司26万股，满洲电气公司8万股，日本电气工程公司8万股，国际电讯公司7.9万股。煤炭为井陘煤矿、大同煤矿、山东矿业的3个子公司和7个合作社、4个销售机构所控制。日本垄断资本以华北开发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前导，不断向华北扩张。在井陘煤矿公司，贝岛煤矿拥有152440股，在山东矿业公司，满铁、大仓矿业公司、三菱矿业公司、三井矿山是大股东。另外，华北开发公司的子公司青岛码头公司，是为了把青岛和塘沽建成华北最大的港口而成立的，在成立时的2000万日元资本中，满铁的投资是80万日元，大连汽船等9个船舶公司各投资10万日元，三井物产公司、三菱商事公司各投资10万日元。华北棉花公司，是于1938年3月由兴中公司与在华纺织同业会、日本棉花同业会联合，以资本300万(日)元成立的，后来，在华北开发公司接收兴中公司的同时，成为它的子公司，在6万股股份当中，华北开发公司有两万股，大日本纺织公司有两万股，在华纺织同业会与日本棉花同业会各有1万股。另外，在华北氮气肥料公司中，日本氮气公司是大股东，在山东电化公司中，三井物产是大股东。

对华中占领区的统治

在华中，华中振兴股份公司相当于华北的华北开发公司。在华中的日军占领区里，通过“军管”和“日中合办”

的形式，很多中国企业被没收。而在1938年3月，汪精卫傀儡政权一成立，日本政府就为了掠夺华中的资源和控制占领区的经济，于同年4月发布了《华中振兴股份公司组织法》，11月，以资本1亿日元（实收资本3100万日元）成立。

第22表 华中振兴公司股东

股 东	股 数
大藏大臣	1000000
三井物产	39800
住友本公司	28540
军人援护会	25356
三菱	23040
住友金属工业	20000
三井矿山	19900
明治生命保险	11100
日本生命保险	11100
住友矿业	10000

华中振兴公司同华北开发公司一样，是特殊法人，获得了与华北开发公司所拥有的同样的特权：（1）该公司的民间股东达到红利6分，具有优先红利权；（2）为了核实民间股东，在营业开始与进行的5年以内，接受政府的一定金额的补助；（3）经政府允许，可以发行达到股金5倍的华中振兴债权。华中振兴公司的资本1亿日元（20万股）的投资者如第

第23表 华中振兴公司所属各公司资本构成比例表

公司名称	资 本 (万元)	日 方 (%)	“中 方” (%)
华中矿业	2000	48.5	51.5
华中水电	4300	49.9	50.1
上海内河	600	77.3	22.7
电气通讯	1500	66.7	33.3
上海恒产	2000	50.0	50.0
公共汽车	300	99.5	0.5
华中水产	500	90.4	9.6
大上海瓦斯	300	93.3	6.7
华中蚕丝	1000	71.5	28.5
华中铁道	6400	80.4	19.6
淮南煤矿	1500	61.0	39.0
华中盐业	500	50.0	50.0
中华轮船	3000	48.8	51.2
华中运输	800	68.8	33.2
华中火柴	1000	40.0	60.0

注 “中方”指傀儡政权

(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

22表所示。这个公司也是国家资本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特权公司。

华中振兴公司如第23表所示，也投资于各部门的子公司。对各子公司的投资情况是：在华中矿业公司中，日本制铁公司、日本钢管公司是大股东。在华中电讯公司中，国际电讯和日本电气公司是大股东。在华中水产公司中，日本水产和林兼商店(太洋渔业)是大股东。在大上海瓦斯公司中，东邦天然气、东京天然气、大阪天然气、神户天然气等公司是大股东。在华中蚕丝公司中，片仓、郡是、钟纺等公司与帝国蚕丝仓库是大股东。在华中铁道公司中，日本通运、日本制铁、日本车辆、川崎车辆等公司是大股东。总之，大股东都是与各个部门有关系的日本垄断资本。华中占领区的几乎全部面粉厂，为日本、日清、日东三大日本面粉公司所控制。

以华北开发公司、华中振兴公司为顶点的掠夺机关，是日本的国家资本与垄断资本的联合组织，拥有庞大的机构。这反映了正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勾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倾向，因为是占领地，所以采取了极端的形式。在华北交通公司的23970万日元的股金中，中国原有的器材设备换算为资本的部分占14970万日元。在华北电业公司中，其资本的大部分是中国原有的机器、器材转换成的“实物投资”。在华中地区，“实物投资”占股金的比率，上海恒产公司为100%，华中铁道公司为80%，华中水电公司为75%，华中矿业公司和华中电气通信公司各为67%，华中蚕丝公司、淮南煤矿各为57%，都是极高的。在各子公司的股金总额中，平均占66%。关于这种情况，当时日本方面也再三指出了日本资本的脆弱性。华中振兴公司的经理儿玉谦次，在1940年发表的新年感想中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规定由日本方面提供现金资本与技术，但当前实际上提供的只

是技术”。也就是说，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始终是以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耗尽中国的资材为目的的。

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控制

另外，随着向中国内地侵略的扩大，对已经占领的中国东北的经济控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战争的长期化，不得不改变已经制订的《5年计划》。在日本旧财阀由于顾忌美、英而停止向中国东北全面扩张的时候，新兴康采恩“日产”的经营者鲇川义介，则企图在关东军的援助下，全面向中国东北扩张。鲇川制订了一项经由西伯利亚铁路，把中国东北的大豆提供给德国的油脂工业部门，作为交换，从德国购进高级机械的计划，并于1937年亲自到德国进行了会谈。但是，这项计划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未能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的期望，在资金与技术方面遇到了暗礁，不得不依靠大量发行纸币。因此，通货在1936年—1941年间膨胀了约5倍，在同一时期，批发物价成了2.5倍，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在第一次、第二次《5年计划》的资金筹集中，“自有资金”率是极低的（16%），而社债、借入等等的比率占将近一半，专靠国家政权的支持来进行金融活动。

又据第24表所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地经营，包括满铁、满业在内的特殊公司的比重是非常高的。而从此时起，以国家为先导，日本垄断资本开始全面向中国东北扩张。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是于1912年9月以“日产”为主体而成立的。其资本如第25表所示。可见它是由国家资本（在这里是傀儡满洲国）与日本的垄断资本所设立的。日本垄断资本的其它各个集团向东北的扩张，由第25表和第26表可以看出。

第24表 在中国东北的公司对特殊公司比较表
 (至1943年2月底) (单位:千日元)

	全满公司	全满 股份公司	全满 特殊公司	全满公司 对特殊 公司%	全满股份公司 对特殊公司%
公司数	6373	2448	74	1.16	3.02
名义资本	8321837	8040219	5816755	69.92	72.35
已缴资本	5746030	5464412	4221234	73.46	77.25

(据《满洲建国十年史》)

第25表 满洲重工业的大股东

股 东	拥 有 股 份
“满洲国”政府	4500000股
共立企业股份公司	117422股
田村合名公司	39308股
富国征兵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000股
第一征兵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6900股
野村生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7000股
安田商事股份公司	28277股
日华生命股份公司	17500股
福井银行	15362股
合 计	4831829股

全部股东数为70329名 (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

这样，以国家资本和特殊公司为先导，日本垄断资本不断向中国东北扩张，参与了对殖民地的掠夺。

这就是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实际情况。而在1940年3月南京傀儡政权成立之际，日军进行了“军管工厂归还”。但这只限于被认为是没有“军事上的必要性等不得已的特殊理由”。归还时，原所有者，除去逃亡时留下的原料、在库品、半制成品外，必须作为军管过程中的保管费和修理费，向日军和日本资本家缴纳巨额款项。尽管在名义上叫做归还，事实上是依靠强制手段，用很少的钱，以租借、收买和合办的形式夺去了经营权，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第26表 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财阀对中国东北的投资

财阀名	在中国东北的 有关公司数	资 本 总 额	其中财阀投资额
三 井	57	1017545	1235836
三 菱	24	2028170	7496
住 友	15	825970	50587
东 拓	16	523000	177180
日 产	18	660215	42254
安 田	8	597000	25293
浅 野	8	52000	17100
日 室	7	251200	90700
日本酿造	9	15800	11575
日 糖	7	68500	12300

(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

“大东亚共荣圈”的宣言

1940年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进入一个新时期。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6月8日的演说中，鼓吹建立东亚新秩序，而在8月1日取代了有田的松冈洋右外相则发表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演说。松冈在演说中说：

我国当前的外交方针，必须本着这种皇道的伟大精神，先谋求确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走上大力宣扬皇道，为实现公正的和平而做出贡献的道路的原因。而我国国民坚信不疑的是，要排除摆在这条道路上的一切有形无形的障碍，进而与对我同情之友邦合作，以决不后退的勇猛精神，完成上天赋予我民族的理想与使命。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后来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而这一方针的发表，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公然要求重新瓜分美、英、荷等统治下的殖民地，企图控制整个东亚。

“大东亚共荣圈”宣布后不久，日本政府于9月2日签署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使原来的《防共协定》发展成为明确的军事同盟。在这个条约中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地位”。这是约定要相互承认并且相互支援进行以重新瓜分殖民地为目的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由于这个同盟条约的成立，日美之间的对立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于同年11月5日发表的《日满华经济建

第27表 日本总生产资本中殖民地企业的比重

产业名	年次	单位	日本		殖民地、半殖民地					统计	
			“内地”		朝鲜	台湾	桦太	中国的东北	中国	计(A)	(B)
煤炭	1940	千吨	57309	6117	2827	6435	21132	—	36511	93820	39.0%
铁矿石	1940	”	1042	1258	—	—	3367	—	4625	5667	81.6
生铁	1940	”	3512	246	1	—	1069	—	1316	4828	27.3
普通钢材	1940	”	4522	76	—	—	404	—	480	5002	9.6
纸浆	1941	千英吨	754	47	48	408	78	—	581	1335	43.5
水泥	1940	千吨	5980	1142	226	—	1017	—	2385	8365	28.5
硫酸铵	1941	”	1240	448	—	—	137	—	585	1825	32.1
纺织	1940	千锭	12190	153	—	—	207	3482	3842	15672	41.0
水力发电	1943	万千瓦	5605	1241	267	—	605	—	2158	7763	27.8

(备考) 稻叶秀三:《日本经济的现实》和《棉纱纺织情况参考书》、《内外棉业年鉴》。
(据井上、宇佐见:《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

设纲要》，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核心而规定的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政策。

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政策

《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认为，“确立以建设世界新秩序为目标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皇国的大方针，由于日、德、意三国条约的缔结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基于这一认识，把下列各项作为目的，即“1.重新改组国民经济；2.加强日、满、华经济的建设；3.扩大东亚共荣圈”。不用说这是想加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并以此为基础把东亚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这一点在下列的言论中也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日满华经济建设的目标是在大约10年中间确立把三国作为一环的经济体制，同时，促进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以加强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使皇国经济对外依赖的程度减少到最低程度，不管面临何种事态，保持丝毫不为所动的潜力”。

这个纲要在日本的地位，在于“谋求科学技术的划时期的振兴以及先驱工业的开拓”，“谋求高度精密机械工业的划时期的振兴，使重工业、化学工业、矿业等基础工业大大发展起来”。对中国的东北，规定要“迅速整顿与发展重要基础工业”，“在期待矿业及电气事业划时期发展的同时，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我国也提供必要的援助”。

“关于农业的发展，要适应作为日满华的粮食饲料补给基地及对世界提供特殊农产品来源的需要，期望大量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并且在开发农业的同时，促进皇国农业开拓民的入殖”。对中国本土，“谋求开发资源，复兴经济，特别是使交通发达起来，顺利地进行物资交易，发展重要工业部门

和开发资源”，“今后要发展矿业和制盐业，并期待大量生产工业原料”，“就农业而言，在努力确保国民主食的同时，期待棉花及土特产品的增产”。进而，《纲要》在这一基础上，要促进金融、贸易、交通的“一体化”并进行重新改组。

在这里所提出的方针就是，日本以高度的精密工业、机械工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中心，要使“满洲国”提供矿业、电力、轻工业，使中国本土提供矿业、制盐业、原料、资源。在“国际分工”的名义下，剥夺中国经济的独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加强对中国人民和资源的掠夺，以准备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其基本精神，贯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掠夺中国资源的方向。

国内总体战体制的加强

1940年12月7日发表的《确立新经济体制纲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确立国内的经济体制。《确立新经济体制纲要》说：

确立把日、满、华作为一环，包容大东亚的自给自足的共荣圈，依靠圈内的资源，确保国防经济的自主性。

在官民合作下，以重要工业为中心实行综合的计划，以便能应付紧急的时局和完成国家的国防体制，并谋求充实军备和稳定国民生活，使国民经济持久地繁荣。

正如在这里所表示的，“确立新经济体制”，是企图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加强总体战体制。在《纲要》中规定：

（一）在确定企业体制，使资本、经营、劳务成为有机的整体的国家综合计划下，依靠作为国民经济构成

部分的企业负责人的创造性和责任感，委托其进行自主的经营，通过其最高效率的发挥以增强生产力；（二）按照公益优先、职分奉公的宗旨，要在指导国民经济的同时，通过成立经济团体，发挥使国民经济成为有机的整体的国家总力，达到国家的高度国防的目的。

在这一方针下，规定了企业设立的许可制和由政府进行分离、结合，中小企业的整理统一等，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制。“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所在，首先是加强总体战体制，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纲要》中，虽然强调“防止发生投机的利润及垄断的利润，但这只限于“妨碍保持国民经济秩序”者，即阻碍加强总体战体制者，而对“特别能使国家增加生产者则承认其利润的增加”。并且正如“对有助于增加国家生产的企业，重点地帮助其扩充与发展”的规定所表明的那样，是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垄断资本的帮助。而在根据这个《纲要》，设立于各个生产部门、具有广泛权限的“统制会”的领导人中，无例外地都是财阀及其代理人，加强了国家政权同垄断资本的直接结合。

如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亚洲的设想与国内总体战体制的加强，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正如第27表所表示的，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大大依赖于对殖民地的掠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占领地的 统治和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关系

1941年11月编成的《第77届帝国议会关于兴亚院的说明资料》，对于反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占领地的统治同日本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份重要的资料。这份

资料认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国防上不可或缺的铁矿石、煤、盐、棉花等各种物资，继续大量地期待于中国”，“在开发中国地下资源的时候，特别要把作为炼铁燃料炭的华北的强粘结炭及长江沿岸等的铁矿增炭作为最大的重点，其次要努力增加钨、萤石、锰、云母、石棉、矾土页岩等的生产，以期使我方缺乏的矿物资源能够自给自足”。在回答“帝国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政策在各个地区有什么不同”时说：“在华北及蒙疆地区的施策是，以开发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埋藏资源为主，辅之以建立交通及通讯机关，在华中的施策是，在开发铁矿石等特定资源的同时，谋求增进长江流域的交易；在华南的施策是，着手开发海南岛的铁矿石及农产资源，此外大致维持地方的需要”。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所渴求的是中国任何地方的任何资源。另外还说“要把内地及满洲各煤矿中的比较富裕的物资设备，转移到中国煤矿，以谋求取得划时期的增产。这表明，当时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开发华北的煤炭成了燃眉之急。而在回答“对于华北煤矿由于匪患而遭受的设备破坏采取何种对策”时说：“如在华北的煤矿，由于敌方的活动造成意外的损失，担心出现煤炭产量激减的事态”，对此，要把日本和中国东北的通讯器材集中起来。

从这个记事中可以看出，以华北的八路军为中心的中国人民的抵抗是如何激烈，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多么严重的威胁。另外，在经济政策方面，认为“由于我国在中国支出了巨额军费，调拨了种种物资的同时，又要进行应确保国防产业的原材料的基本经济开发，恐怕很容易在当地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和给基本的经济开发带来障碍”。但这不只

是“恐怕”，而且已经是现实。这一点从该资料中也可以看出来，它说：“华北、华中之内的国税制度，从事变到最近仍沿袭原来的制度，而最近的物价腾贵，实质上造成了减轻租税负担的结果。另一方面，各政权都伴随着岁出的膨胀而有增加收入之必要，结果就实施增税”。另外，这里提到物价的腾贵好象减轻了租税的负担，但因占领地区的大部分生产都为日本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通货膨胀和傀儡政权的增税，中国人民就受到了双重的掠夺。

此外，作为文化对策，“为了使战争进行期间的时局容易得到控制，须对下列各点予以深入的考虑，即关于中国未来的思想要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另一方面，眼下对三民主义则要修正其有害于亲日防共的部分，要使中国古已有之的思想，特别是孔孟之道走向复兴。对其余的主义和思想，则要修正其能产生危害之点”。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大的强敌是中国共产党。

八、难以形容的屈辱和痛苦 ——被强行抓走的朝鲜人

朝鲜工人流入日本

随着日本本国的经济军事化，殖民地的经济也被从属于日本的战时经济。朝鲜北部的水力资源、金属资源和远远低于日本的低工资的殖民地劳动力受到了注意。新兴康采恩日本氮气工业公司，继三菱财阀和朝鲜总督府之后，以垄断控

制赴战江和长津江的水力发电为中心，控制了朝鲜氮气、日本镁工业、朝鲜煤炭工业、朝鲜石油等重工业。这首先是作为日本战时经济的一环而建立起来的。它加重了对朝鲜人民的掠夺。

但是，在战时迫害朝鲜人民最露骨的表现是把人强行抓到日本。随着朝鲜的殖民地化，原来的朝鲜社会被破坏了，许多农民失去了谋生手段而到处流浪。由于当时的殖民地政策所造成的产业本身的停滞，许多朝鲜人流入了日本，反映了第一次大战给日本资本主义带来的迅速发展，需要低工资的朝鲜劳动力。根据1922年（大正12年）朝鲜总督府的命令，废除历来限制朝鲜人到日本的《警务总监令》，改变为“自由航渡”，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大部分朝鲜工人，都被作为小工和杂役人员，干着日本工人所厌恶的脏活和重活。而其工资，只不过是日本工人的2/3。

使用近于囚犯的朝鲜工人

朝鲜工人流入日本，是由于在朝鲜确立了殖民地制度，朝鲜社会遭到破坏而造成的。正如有人认为是那样：“朝鲜工人洪水般的流入，实是内地工人一大威胁，难免愈益加强失业的不安”。当时尚存在着排斥朝鲜劳动力流入的主张。但是，这个时期对近于囚犯的朝鲜工人的使用和关东大地震时对朝鲜人的集体屠杀，在考虑以后朝鲜工人的不幸处境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北海道和桦太等地存在的“象监狱一样的小屋”，是前近代的因素加上殖民地统治的因素的混合物。在这里，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主人，对工人施以私刑，强迫他们从事建筑和伐木劳动，而且使其断绝同外界的接

触，采取监禁在现场的小屋子里的形式。关东大地震时的屠杀，反映了虐待朝鲜人思想的形成。这可以说是由殖民地统治者培植起来的，包含着重大的问题。

满洲事变以后，特别是日中战争全面开始以后，随着临战体制的加强，渡海到日本去的朝鲜人急剧增加了。官方出版物在谈到这个时期的情况时说：“以中国事变为转机，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日本内外突然增加，朝鲜的人力资源，不只是对朝鲜，而且作为整个日本的劳务供给来源，在进行战争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日本内地，由于动员参军的关系，劳力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大藏省管理局：《关于日本人在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朝鲜篇）。在1937年9月，芦沟桥事件爆发两个月后，日本煤炭联合会向商工大臣提出了应按产业的战时体制化补充劳动力的申请书说：“由于煤炭矿业在劳务募集上比工厂常常处于不利地位，要坚决实行每年雇用相当数量的朝鲜工人”。这样，在日中战争爆发的同时，在进行战争方面，朝鲜劳动力就被引起重视了。

以征用、官方斡旋和募集方式进行劳务动员

1939年，日本制订了劳务动员计划，其中要求朝鲜提供8.5万人的“劳务输出”。1940年禁止了朝鲜人的个别出境，完全采用集体输送。但由于当时还有把朝鲜变成兵站基地的要求，为了不使朝鲜劳动力供求关系失去平衡，便在朝鲜内地进行了“有计划的动员”。由于它成为日本整个劳务动员计划的一部分，集体抓人的基本条件就全部具备了。

这个时期的有计划动员，通过作为朝鲜总督府的命令而公布的《工人募集取缔规则》确定下来了。其中最应注意的，

是说这个规定中的劳动力，不是“自由的劳动力”。“职场变更与此无关”一项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另外，这个规则加强了民族压迫。规则所说的“从事为时局所需要的产业，自觉地对国家作出贡献”，就是强迫对统治殖民地的国家作出贡献；强迫使用日语和“适应内地的生活习惯，不做内地人讨厌的事情”，使接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强迫加入“协和事业”团体。

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劳动力的渴望进一步加强了。在1942年实行了“官方斡旋”集体输送的方式，在这里，通过国家机构直接进行了对朝鲜人的招募、选拔和输送。在当时的朝鲜，通过征用、官方斡旋和募集三种方式进行了劳务动员。

特别是渴望大量朝鲜劳动力的煤炭统制会，代办了历来的募集事务，并想实现“募集的简易迅速化”。为了通过这种制度的公布使其成为可能，在汉城和釜山设立了该会的劳务部派出所，以政权为后盾，直接攫取劳动力。

按照官方斡旋的规定，甚至像职业介绍所和邑、面（町、村）那样的机关，也必须经常“留心精通管内劳动力情况的变化”，“考虑可能提供的劳务所在和提供日期的缓急”，从接受分配的数字起，仅在5天之内就“选定”人员。动员了町、村组织等所有的机关，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实行的征集制度，就在这里完成了。据当时的被害者说，为了完成动员计划的数字，日本的警察使用了袭击朝鲜人的劳动场所和宿舍、恐吓和甜言蜜语欺骗等种种方法。

官方斡旋方式在1937年以前就采用了，而以日中战争为转机迅速增加，随着太平洋战争战局的激化更进一步急剧扩

大了。另外，在起初主要是面向土木建筑劳动的，但在日中战争开始以后，也向矿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军事劳务员”一项也达到了相当的数字。“军事劳务员”很多是送往南方战事激烈地区的。

以日中战争为转机有组织的强行抓人

如前所述，在朝鲜存在着征用、官方斡旋和募集3种方式。而“募集”已经不能适应劳务动员的需要了。“事业场方面，希望统一使用征用方式”，但根据政府方面的资料，由于“征用令的发布，往往有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摩擦之虞”，只采用了“官方斡旋”方式。但是，“官方斡旋也好，征用也好，在机关的手续上几乎是一样的”，“虽说是官方斡旋，也是半强制的”（《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作为国家强行征调劳动力的手段没有什么不同，所谓防止“不必要的误解和摩擦”只不过是一种遁词而已。但随着对日本本土空袭的加剧，由于逃避动员的风潮扩大，“为了在拒绝动员时进行制裁”和为了避免“对征用不应者严加惩罚时，不良分子常常逃脱，只有善良者必须服此义务这种不公平现象”，1944年完全改为征用方式。

仅在战争末期的几年中间，在朝鲜以外的地区，被强制抓走的朝鲜人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以日中战争为转机向日本强行抓人，是有组织的进行的，而其所从事的各种工作，向煤炭产业的集中显著起来，向工厂的集中也相当令人吃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44年的数字。仅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9万朝鲜人被抓到日本。另外，在这一年，以18岁至55岁的“可劳动年龄层”为对象，

在朝鲜内部动员的人数是：道内官方斡旋492131人，勤劳队1925272人，募集37321人。

“劳务管理”问题的产生

朝鲜工人被大量抓到日本，就产生了特殊的“劳务管理”问题。因为（1）这是被强制抓来的朝鲜工人，而不是所谓“自由的雇用工人”；（2）语言、风俗、学历、思想等与日本工人显著不同；（3）因为是强制抓来的，所以被集中使役；（4）要求加强由“皇民化”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殖民地统治。根据统治者方面的这种要求，几本关于特殊劳务管理的书出版了，如：《特殊劳务者的劳务管理》（1943年）、《关于半岛人劳务者作业能力的科学见解、煤矿中的半岛人劳务者》（1943年，劳动科学研究所）、《煤矿中半岛人的劳务管理》（1945年，煤炭统制会九州支部，部外秘）等等。特别是《煤矿中半岛人的劳务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详细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下面是以该书为中心所反映的情况。

作为强行抓人的“官方斡旋”，以集中抓人和6个月的训练期为特点。但是，强行抓人的制度化，是弥补随着战时体制的加强而产生的劳力不足。因此，在业主方面，由于训练需要花费时间等原因，凡是一时用不上和能力低下的，一概不用，裁去的人为数不少，即使进行训练，其天数也被尽量缩短，或是3天，或是最长1周。但是，规定6个月的训练期是有如下理由的：

……然而，这种使用方法的谬误，立刻就为事实所证明了。出勤率低，负伤率高，总之，使人看到，把从

事劳动的精神准备从根本上取消，却希望提高劳动效率是没有道理的。关于劳务管理、作业指导，其基本之点在于训练，这种认识通过使用和体验产生出来了。而训练，不是形式上的速成训练，必须是认真地、顽强地、心领神会地反复训练。表面上看来是远水不解近渴的训练，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并不是白费。不，毋宁说这种方法比起短期训练和速成就业，从长远看是有效的。

上述资料是担任现场劳务管理的人所提供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对朝鲜人进行训练的实质。对于朝鲜人民来说，使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下去和使军事体制加强，就意味着压迫的进一步加强，当然不会得到积极的合作。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就企图通过消除朝鲜人的所谓“迂腐精神”而达到其目的。

对朝鲜人的训练及运送到日本

训练的内容分为在朝鲜当地训练和在劳动地点训练。这些训练除包括“皇民训练”、“国语训练”、“作业训练”、“生活训练”、“体育训练”等之外，还有“不良者特别训练”。在朝鲜进行就地训练的目的在于：“第一件应教给的事情，是唤起作为皇国臣民的觉悟，使其确立去日本的决心”，“建立运送当中的纪律，防止逃跑，并使到达就业地点之后的训练得以顺利进行”。要求指导员“根据国体之本义，使其具有作为皇国臣民的觉悟，教给坚定的国家观念和牢固的国民信念，以炼成作为产业战士的资质”。这样，首先要求的就是精神上的服从，为此，强制记诵如下的“皇国臣民誓词”：

- 1.我等皇国臣民，将以忠诚报答君国；
- 2.我等皇国臣民，互相信爱合作，以加强团结；
- 3.我等皇国臣民，忍苦锻炼，增强体力，以宣扬皇道。

接着在乘船时，还用连带责任进行威胁，“如果有了差错将对自己的亲属和当局造成如何深刻的影响，尽量列举实例加以训谕”。

还有许多管理书谈到，上船之后，“对于入山后的训练给予预备知识，以便不使对内地生活的希望同实际情况产生矛盾”。“由于对内地的情况，很多人几乎都抱着梦一般的期待，应该预先说明这一点，以使不会产生幻灭的悲哀”。但是，在旅日朝鲜人所收集的资料中，同许多“抓人”的例子一起，也有这样几个例子：“我1942年在汉城，铁道工业股份公司（土建）引诱说：如果去日本，两年就可以存款2000多日元，这样就同91名同胞一起，被带到北海道的美呗”（《朝鲜人被强行抓走的记录》）。这就是说，在募集的时候，使用甜言蜜语，上船之后再告知实情。因此指导说，“由于旅行中有诱惑，容易发生逃亡，要以全体的责任，互相监督”，强调“彻底树立服从观念与责任观念”。

上述在送出地点的训练一结束，接着就开始集体运往日本。向日本的运送，有两条路线，即从釜山、丽水两港出发，经下关，送到日本各地和从两港用船直接送往日本各地。虽然用船运送比经陆路运送每人要多花10日元，但是据说“由于一次可以进行300名乃至500名的大批运送，并且为了防止途中逃亡事故，消除内地治安方面的担心，特别让北海道采用这种办法”。

随着以官方斡旋方式强行抓人的加紧进行，朝鲜人的运送就成了严重问题。因此，1942年5月，在煤炭统制会、矿山统制会、钢铁统制会、建筑工业协会等4团体的主持下，于下关市召开了有企划院、商工省、厚生省、铁道省、内务省、海务院、朝鲜总督府等有关政府部门参加的运送协议会，从7月起，实行了有计划的运送。即使在这里也强调，在运送时，如发生骚扰和其它重大事件要及时向朝鲜总督府和有关的道报告”，严厉取缔“需要警戒人物的混入和在行李中带有危险品”。

被强行抓走的朝鲜工人的生活

被强行抓走的朝鲜工人，到达目的地后就开始了在日本的生活。由于朝鲜工人主要是在煤矿中劳动，在到达之日举行了“入山式”，使其参拜山神社。在这种场合规定“必须由警察方面到场发表严厉的训词。由于这一训示对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应尽量详细并加以强调。而且，今后经常同警方保持联系，在训练指导上是绝对必要的”。

关于宿舍的设施和日用品，在几本“指导书”中曾有模范举例，当然这不过是“画饼”而已。在许多“指导书”中倒是可以看到大量暴露当时生活情况的记事。宿舍“一般都是匆匆改建起来的几栋简陋的房屋”，被子“顶多每人一条”，“因为棉花很坏，无法长期使用。棉花很多都是旧的，或者是代用品。用上3个月，被子就破得不成样子了，常常可以看到被面破烂不堪，棉絮掉出来，散乱在室内的场面”。这就是当时的实况。就是说，连一条象样的被子也没有。还规定“枕头是木枕就可以了”。“在某煤矿，由于新

宿舍落成，决定从旧宿舍迁入。新而洁净的房子，想必都会高兴和向往吧，但却都望而生畏，不得已让新入山的半岛人住进新宿舍。为什么都不愿住进新宿舍呢？其原因是，如果住进新的建筑物就得严格地进行打扫，当想到如果弄脏和损坏，定会受到重重制裁时，就踌躇不前了”。这是由于生活上无孔不入的压迫和繁重的劳动所造成的，事实上也是朝鲜工人几度经受这样体验的结果。“一住进新宿舍就几乎没有逃跑的机会”，这对朝鲜人来说，就成了新的灾难的根子。

在吃饭的时候，要在神棚作礼拜，念“皇国臣民的誓词”，合掌瞑目，唱“蒙赐与”和“承款待”，而且要求：“在决战条件下的劳动，必须有不吃东西也能干活的觉悟”，“即使吃不饱也能劳动。吃得饱饱的，倒是勤劳之敌”，“应该养成忍饥耐劳的工夫”。因此，当时的牺牲者大多是饿死的。如有材料说，他们“吃的是加盐汁的豆饭，而且只有一碗，中午的干粮，早上就吃光了，午饭常常没有吃的”，“当时的饭食很单调，几乎全是豆类，而在不吃午饭的情况下，还要支撑着身体，一天从事12或14小时的建筑劳动”，“在每天的食物中几乎没有米粒，有的只是大麦、羊栖菜①混合做成的饭及盐水，以后也有用进口大米杂炊的时候”（《朝鲜人被强行抓走的记录》），证明了许多朝鲜人都是死于营养失调。

至于其它生活上的细节，也无视朝鲜的生活习惯，统统列入“应清算的习俗”。劳务指导书也说：“总之，在私生活上习俗的不同，尽管认为在劳务管理上理解这一点是必要的，

① 野生植物，为暖海性多年生藻类，可采作蔬菜或加工成西施粉。——译者

但在内地生活中，永远拘泥于这种习俗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在劳务者从釜山出发的同时，就进行了旨在使其摆脱这种习俗而与内地生活同化的指导与训练”。这里所强调的，不是随着从前近代生活向近代生活过渡而发生的变动，而是对从殖民地抓来的被压迫者，在生活习惯方面也使其“同化”和从属。特别被看成反抗象征的是长发。在劳务管理书中说：“我知道，智能低下的半岛人，大都爱好这种不必要的装饰。如果真正具有皇国之民的感情并懂得战争的目的，谁都应该会谅解现在不是留发的时候，因此，我把剃头这件事，作为目标之一。”

不消说，这种极其残酷的“管理”的目的，在于加强苛刻的劳动。据说，当时“在作业能力方面，半岛劳务者与内地劳务者的比例是10比7”。朝鲜工人在采煤、塌方、矿车方面的灾害率，比日本工人高得多。劳动科学研究所编的《关于半岛人劳务者的作业能力的科学见解》，也承认“半岛人劳务者不得不在司空见惯的特别恶劣的条件下从事工作”。

最残酷的“皇民训练”

在对强行抓走的朝鲜工人所进行的各项训练中最被重视、在民族压迫政策中也最残酷的，就是所谓“皇民训练”。这种训练是如何被重视，从指导书等当中所强调的如下几点可以看出来，即“关于半岛人的皇民化，如不倾注全力，是不会收到劳务管理的效果的”，“必须纠正他们的以原有思想的顽固性为传统的癖性，使其具有热心与亲切的气质”，“应当说，对未来的青少年朝鲜人，进行作皇国臣民的指导，随着时局的进展，愈来愈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在

《特殊劳务者的劳务管理》一书中，强调“国民要把天皇陛下作为现人神和至亲加以供奉”，“使知道，皇室是国民的大宗家的道理，拥戴天皇陛下，是国民的自豪”，“说明日清、日俄两次战争及近代日本的飞跃发展，使其充分懂得作为皇国臣民的幸福和荣誉”。这一切是在战争期间，所有日本国民都受到的教育，但它作为民族压迫而提出来，就具有与对日本人进行的这种教育根本不同的残酷性，成了强制的奴役。把天皇作为“现人神”而形成绝对服从的根源的思想表现为强迫敬礼和参拜神社。在这里，神连一点救世的味道也没有，而是把完全的奴役作为强制的神表现出来的，这个神就是天皇。

此外，作为奴役的象征是强迫使用日语。认为“懂不懂国语（日语），关系到劳动的成绩。不仅如此，为了贯彻战斗的皇国勤劳观，无论如何非懂日语不可”。在这里，日语的使用，也被当作隶属的象征。还认为，“（朝鲜人）大多在思想上采取事大主义，具有易受煽动的性质。出于那种轻率的想法，有闹饭食和待遇、煽动他人的时候”，“表里不一，在人前撒谎不当一回事。这个特点要注意”，“私心重的和有欺人天性的要注意”，“对公物、别人的和自己的东西不分的和有傲慢性格的，要彻底加以矫正”等，从这种蔑视观出发，强调实行彻底的压迫。

如上所述，“皇民训练”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强行抓走的朝鲜人实行压迫政策的基础。这种“皇民训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想迫使朝鲜人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灰，像“雷伊泰湾特攻队的松井伍长和林伍长”、“薰空挺队的军曹金原”、“在巴姆作战中立了功并获得个人奖状的上等兵朴村

官彬”等等被日军召来的在战场上丧命的朝鲜人那样。1944年在朝鲜实行了征兵制，这同加强把朝鲜人抓到日本的行为是一致的。而其最残酷的支柱，就是“皇民训练”。

被强行抓走的朝鲜工人的抵抗

强行抓走朝鲜人集中表现了帝国主义统治朝鲜的最残酷的一面。对此，当然会引起各种形式的反抗。

在这种反抗中，最普遍的形式是逃跑。因此，尽管在运送时进行严格的监视，规定了对家属的连带责任，逃跑的数目还是极大的。福冈矿山局管辖的朝鲜工人的逃跑率，1942年每月平均为5.6%，1934年为3.5%，1944年12月前为3.7%。年合计分别为67%、42%、44%。而在这一时期，朝鲜工人逃跑的数字，随着强行抓人的发展而激增，可以说绝对数进一步增加了。这个数字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大为吃惊。因此，劳务管理书说：“一说为60%，一说为40%，用一句易懂的话说，就是有一半逃跑了，实在令人震惊”。

日本银行调查课的资料中谈到了以下的情况：

半岛人劳动者大体都是两年的契约，以挺身队的形式集体下矿的。在战争条件下，为了增产煤炭，又宣布将契约延长1年，因此，逃亡就不断发生了。逃亡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不足、逃避坑内作业和来自外部的诱惑。他们有追求粮食丰富的工作场所或不管减少多少收入也宁愿当一个自由劳动者的倾向。最近主要是到各地军用机场去当建筑工，而这样的逃亡劳务者对以前同伴的通信，更加动摇了早已为此所诱惑的、期满的半岛劳务者。特别是由于常盘煤矿对以3个月为期的勤报队提出了延长

1个月的要求，该队队员以从事上述工作的条件是允许搞原来的商业，而不是自己主动来的为理由群起反对之。听到这一消息的一些半岛人也表示不满，认为虽说1个月，但一旦如此，就会延长1年，而且以后也未必有解放的保证，便实行集体怠工。

作为防止半岛人矿工离山的对策，除采取接家属定居的措施外，继续允许3个星期的临时回朝鲜探亲，但这又引起了相当数量的归鲜者不再回来的问题。（《当前矿山的劳务情况》，《社会政策时报》280号）

被强行抓走的朝鲜工人，不是根据“自由契约”雇用的工人。因此，“即使减少一些收入，也愿意当一个自由劳务者”。不消说，前面提到的民族压迫和侮辱，是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另外，要脱离危险的坑内作业，特别是朝鲜工人的负伤率高也是一个原因。在逃跑后所进入的车间同样是利用朝鲜人的困难处境以低工资进行残酷的剥削。即便如此，仍比“官方斡旋”具有吸引力。

虽然被强行抓走的朝鲜工人反抗的最基本形式是逃亡，但也存在着所谓“闹事”的斗争。从当时特高^①所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朝鲜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条件、改善伙食、反对强迫存款、要求回国、反对歧视等要求，广泛开展了包括罢工在内的斗争。另外，从同一个特高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斗争很多是隔海与金日成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遥相呼应的。

在当时对日本的抵抗运动中，还应大书特书的是，1945年

① 即特别高等警察。——译者

7月1日在秋田县花冈矿山发生的中国工人的起义。这是以曾经当过八路军的人为中心进行了长期准备的、有组织的斗争。当时中国工人，通过笔谈，从朝鲜工人那里得知日本报纸、电台的情报，确信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经为期不远了。这些事实，从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的国际团结方面，应博得高度的评价。在日本战败之后，许多矿山成立工会的时候，朝鲜工人都站在建立工会活动的最前列。在几种工会史中都记载着，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在很多方面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这个事实。这同现在60万在日朝鲜人的大部分，都是被强行抓到日本来的人及其子孙一样，是现在的日本人所不能忘记的。

九、被强行抓走的中国人的反抗

日本政府决定强行抓走中国人的背景

同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把许多朝鲜人强行抓到日本一样，也从新的占领区中国把中国人抓到日本。由于过分苛刻的劳动条件与难以形容的酷使，使许多中国人丧失了生命。在这种条件下，1945年6月30日在秋田县花冈发生的中国工人暴动，从在战争中发生的最大暴动这一点上说，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从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以来，在日本国内，由于对壮丁实行征兵等等，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不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日本政府通过“国民动员计划”，

把朝鲜人民大量抓到日本，但劳动力的不足，在对美、英的战争爆发以后，进一步严重了。因此，在1942年11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华人劳务者移入内地的文件》。

在当时的内阁会议的决定中规定，“鉴于内地的劳务需求日益紧迫，特别是在重体力劳动方面劳力显著不足的现状，将华人劳务者移入内地，以使其协助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根据这个内阁会议的决定，许多中国人被强行抓到日本，使其从事重体力劳动。此外，这时的内阁会议的决定，尚是试验移入，而在1944年2月第12次官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促进华人劳务者移入内地的文件》。在当时的决定中，认为根据“昭和17年11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的《关于华人劳务者移入内地的文件》而不断实行的试验移入的成绩，大体上是良好的。并以此为理由，在这里开始了中国工人的正式移入即强行抓走。在1944年企划院的《昭和19年度国民动员计划需要数》中，规定总需要数为45.2万人，其中朝鲜人29万，中国人3万。

在政府这种决定的背后，有深感劳力不足的日本资本家的要求。东洋经济新报社《日本经济年报》1942年第4辑刊登了财界的下列意见：“据各方面的专家说，在长江方面有300万人左右，在华北也有相当的余力。——这是在芝浦的企业家那里听到的说法。日中事变发生以前，在芝浦一带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当码头搬运工人，既能干活，工资又便宜，所以现在一定要听听这样的意见：那些低级劳动和不重要的工作，如果可能，尽量使用中国人不是更好吗？”

这样，许多中国人就被强行抓到日本。据日本政府公布的资料，强行抓到日本的中国人的数字，从地区上来看，在

华北为35778名，占压倒的多数；在华中为2137名；在中国的东北（旅顺、大连地区）为1020名。另外，1942年的内阁会议决定还规定：“移入的华人劳务者的募集及斡旋，由建立华北劳工协会的新民会及其当地机关承担。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在占领地建立的傀儡机关来强行抓人的。”

提供劳动力的实况

提供劳动力的实际情况。据赤津益造氏的《花冈暴动》中作了这样的揭露：

行政部门提供：根据傀儡行政机关的提供命令，对占领地区的下级傀儡机关，按提供人员数字的比例，强制使其提供的责任数。

训练所提供：将日本侵略军在当地“作战”（猎获作战）所抓到的俘虏和降兵，作为一般“良民”释放（为了送往日本）交给“华北劳工协会”。在该协会管地（济南、石门、青岛、邯郸、徐州、塘沽、北京等）的劳工训练所，进行一定时间（约3个月）的必要训练后提供的。

自由募集：在主要的劳工集中地区（上海、天津等）用甜言蜜语，对失业者许诺优越的条件诱骗来的。

特别提供：把具有装卸经验的或掌握了木工等技术的在职工人，采取特别紧急要求的形式使其提供的。

战后的日本政府想掩盖强行抓人的责任，认为“具有俘虏身份的人，在从当地送往日本之前，已全部改变了身份，都是以雇用契约的形式送到日本的”（1958年3月15日外务省亚洲局长板垣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但是，这些中国人包含着大量的俘虏，其它中国人也决不是通过“自由

的雇用契约”被雇用的。这一点已由原第59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藤田茂（战后曾任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本部会长）在中国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所作的证言清楚地说明了，并且发表了参加猎捕劳工的原日本兵的手记和生存下来的中国人的证言。

刘连仁的发言

在北海道的山中连续度过14年洞穴生活的刘连仁作过揭露（1971年《人民中国》12月号）。刘连仁是1944年9月在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村庄正在田里干活时被日本军队抓走的。在与同时被抓的80名中国人一起押送的途中，因想逃跑被开枪打伤。这时七、八名中国人死于刺刀之下。刘连仁等被送往青岛，同约1000名中国人一起，监禁在“劳工协会”，同约1000名中国人一起受“训”，每天都要挨打。这时生病的中国人被扔到混凝土的地上死掉了。不久他们被用船送到日本。在7天的乘船期间，仅能吃上一点乘船时发的用橡子面做的团子。由于饥饿和晕船而晕倒了的3名中国人掉进海里。一到日本，刘连仁就同200名中国人一起，被送到北海道两龙郡治田村明治矿业股份公司的昭和煤矿。以后就吃着用橡子面和木屑掺上发了霉的玉米面做成的团子，在枪托和铁棍的暴行下，每人每天被强迫挖40炭车的煤。关于这个煤矿的情况，刘连仁说：“如果得了病，不仅不给治疗，连饭也不给吃。稍微得点病，就被活活地火葬了。从山东莒县来的一位姓陈的难友，由于煤坑倒塌打折了脚，伤口化脓了。于是受到像畜生一样的监督。在看到不能使用了时，就把他烧死……”。此后，刘连仁就逃到山中，度过了14年的极其

痛苦的洞穴生活。而在1958年2月刘连仁被发现时，当时的日本政府（岸信介内阁）想把他当作“不法入境者”。由于旅日华侨的奔走，从战时的中国工人名簿当中，发现了刘连仁的名字和照片，刘氏才好不容易免于被当作“不法入境者”。刘连仁在这个发言中还强调，虽然受到这样的虐待，但必须把日本军国主义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日本人民是真正的朋友。

花冈事件生存者的证言

下面是花冈事件的生存者之一刘智渠谈“花冈事件”。刘智渠是1944年1月作为河北省抗日游击战士被俘的。同在“猎获作战”中被抓的一般老百姓一起送到石门俘虏收容所。在这里收容了1000多名从十五、六岁至60多岁的中国人，他们身上一丝不挂，只准备了一条裤子在出去大小便时轮流使用。

还有，花冈事件的幸存者，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团证人而出庭的翟树棠的证言，说明了抓人的经过。

中国市民翟树棠的证言——国际检察团提出的2222号文件。

我仅将自己亲眼看到的敌人的罪行陈述如下：

我今年22岁，原籍河北省。1941年7月，日本军队侵入饶阳县附近的时候，我村的居民，见到日军到来大部分逃走了。日本兵逮捕了男女老幼60名，把他们撵进一间屋子里点起火来烧，并且开枪打死几名想翻越屋脊逃跑的人，屋外的尸体上全是弹孔。

1942年5月，约1000名日军官兵，带着翻译，把40

名妇女赶到一个广场上，用刺刀威胁着，剥光全身的衣服，裸体在广场上行走，同时令村民蹲在地上观看，如有不忍见此场面者，日军立即就用枪托痛打。

日军在旁边拍手嬉笑，妇女中有人不堪受此侮辱而跳进广场旁边的池塘，而在跳进池塘的8名妇女中，有3人立即被日军开枪打死。

我从来也没有当过兵。1944年2月，我同另外4名青年，被日军无理逮捕了。在强行抓走的一部分人中，一个个地被强迫表态希望加入和平军（伪军）或者希望当日军的俘虏。4个月后，我被送到日本强迫劳动，干着开山挖沟的活，直到战争结束。

我是被日军送到日本的981人中的一个。现在，418人已经死去了。我经常遭到日本人用棍棒毒打，或者是其它的刑罚，而且，日本人配给我们的粮食是非常少的。

以上口述，全是事实，决无虚假。如果上述敌人的罪行将来受到法庭审判，我希望作为一名起诉人或是证人出庭。如有不实，愿受诬告或伪证的处罚。特此宣誓。

接着翟在对证人质询的过程中，答复了被告辩护人关于“证人说没有当过兵，但是没有加入军队的人，怎么会成为俘虏呢？”的质询时说：“是日本方面强迫我当了俘虏的”。在回答“证人说不是作为俘虏而来的，难道也不是作为苦力而来的吗？”时说：“但是，我没有另外签署关于这种劳务的合同，也没有协商过有关工钱的事，完全是强迫抓来的”。

这样，通过几个证言，也可以证明是把俘虏和一般居民抓到了日本。而被抓到日本来的中国人不是自由雇佣关系这一点，在日本内务省和警察的指示中也得到了证明。

被强行抓来的中国人奴隶般的遭遇

在内务省的《移入华人劳务者取缔要领》中规定“使事业者方面担负起完善防止逃跑及隔绝同外部联络的坚固设施和监督劳务者的责任”，指示要进行监禁。它的执行，像后来釜石警察署的指示所表示的，是通过“看守”进行的。另外，《移入华人劳务者取缔要领》还规定：“在入境的检查中，要采取特别注意抗日不逞分子有计划潜入的细致、周到的措施”，“对把宿舍选在防谍和不妨碍公安及风俗的地方而加以指导”，“在实行关于移入华人劳务者的思想动向、经历等的详细内查的同时，注意其动静，发现化名者和其它图谋不轨分子的谋反计划”。这些规定说明，被抓来的中国工人不是“自由的劳动力”。

在《移入华人劳务者取缔要领》中还有下列等规定，如：“特别是关于同朝鲜人的接触，不管是在事业场内外，都要加以防止。对此要给以特别的考虑”，“在作业场，要警戒朝鲜人、俘虏同满、华人员的接触”。这件事表明，强行抓走中国人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何等害怕占领地区人民的相互接触。

各地警察署根据内务省的这些指示，发出了更具体的指示。其中釜石警察署对日铁釜石矿业所发出的《警察方面有关华人劳务者的指示事项》，表明了被强行抓来的中国工人受到了怎样的对待。

首先规定，除了县费警察4名和志愿警察（费用由公司负担）2名外，“由公司设置看守长以下5名看守”、“在宿舍附近，设置警察哨所”、“让警察点名并检查所携带的物品，处于严格的监视之下”。逃亡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指示中还说：“逃亡的原因与半岛人不同，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内地的劳动力，具有浓厚的思想色彩”、“要注意共产军的军官化名潜入苦力队员中，他们一当上下士官，队长的威令就无法施行”。从这样的指示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最害怕的是什么了。因此，作为“防止逃走的政策”，还规定“在宿舍外面砌上一道7尺多高的墙，在入口处安上铁桩”、“大量的铁丝网与板墙并用”、“在每人的衬衣和工作服（上下）上写明番号，在作业现场的开阔地带设置哨所”，并且规定要“以华人怕熊的心理，在入山时告以附近山上有熊，作为防止逃跑的一招”。另外，还规定“不许携带现金”、“不许携带火柴、火药及其它危险品”、“外部的华人和鲜人，当然要严禁同一般日本人（男女）接触”、“绝对不准出入事务所和其它地方”、“外出概不批准”等等。这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被抓来的中国工人的奴隶处境。还有如下指示：“宿舍如果床头有3寸（6至9公分）的空档就太长了”。“因为有被征服者服侍征服者这种中国的观念，所以没有安装洗澡设备的必要”。这就表明了被抓来的中国工人陷入了难以形容的奴隶处境。而且，这些指示还贯穿着这样一种对中国人的蔑视思想，即“汉民族不为感情所左右，越是对他亲切，他的要求就越高，所以没有亲切或爱抚的必要”。

被强行抓来的中国人的反抗

在这种处境下，许多中国人受伤，甚至丧失了生命。被抓到花冈的中国人确有在船中死亡，并且在进入事业场的短短期间，许多人丧失了生命。填写花冈死亡诊断书的一名医生说：“到我这里来的都是鹿岛建筑公司的人和从事矿业劳动的人，本来活生生的，不久就死了。患的是什么病，怎么也说不清楚。因为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就不再考虑了，随便给他们填上点什么，就算是诊断书”。这个证言说明，在所谓病死的人中，包含着很多被杀害的人。

这样的虐待自然会引起反抗。其中1945年6月在秋田县花冈的鹿岛建筑公司工地所发生的花冈惨案，就是这种反抗运动中的最大的一次，并且是在战时发生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最大一次武装斗争。

在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刘智渠的记述《花冈惨案》和洛泽著《花冈河的风暴》中，追忆了事件的经过。1944年7月28日，由青岛启航的信庆丸载着299名中国人开往日本。船于8月5日到达下关。由于船中的恶劣条件，已经有两名中国人死去了。中国人在武装警察的监视下被装上火车。在两昼夜中间，每人只发给1个盛着一点米饭的饭盒。

结束长途的火车旅行而到达花冈的中国人，开始了每天早上被强迫向“皇居遥拜”的严格生活。早饭是一块生萝卜和一个橡子面窝窝头，午饭和晚饭也都如此。因此，许多人因患痢疾而损害了健康。由于繁重的劳动和虐待，在中国人到后的1个月中就死了40多名，4个月后，死了100多名。

在这种处境下，开始了要求“发给馒头、允许请医生看

病、停止殴打、减少工作时间、把橡子面窝窝头换成白面馒头、发给裤子”等等的斗争。这一斗争虽被残酷镇压下去了，但不久，在中国人中间产生了“中国抗日别动队”的组织。

这个组织起初成立时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在内，但在实行阶段，主导权逐渐转到八路军系统的军队和群众一边。并且通过笔谈(传递纸条)从朝鲜工人那里得知日本快要完了。

于是就制订了这样的计划：

首先要那些禽兽不如的辅导员干掉，这样为我们已死的同志们报仇，同时也防止了这批家伙和外部的警察联系。……然后就派人去袭击隔壁山上的美国俘虏收容所和火车站近旁的警察局。据说防守美国俘虏所的日本兵有二十几杆枪，花冈警察局里也有一些武装。弄到这些武器后，就退到山里去打游击，等着将来我们的军队在日本登陆作战的时候，出来配合。

幸存者之一的洛泽，在归国后发表的著作《花冈河的风暴》中写道：

与其活着当奴隶，不如奋起拼死的斗争。也许我们全都会死去，但是今天必须勇敢地站起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我们应该同祖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相呼应，向日本帝国主义讨还从前受奴役的血债。

在被认为是处于绝望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制订出起义计划，就是因为有上述思想的支持。而在斗争过程中，还考虑到要解放附近的美军俘虏和把矿业所的中国工人和朝鲜工人发动起来，也是因为这一斗争是思想性很强的有组织的斗争。起义的时间决定在6月30日，指定了监视敌人、看护病员的人，制定了切断电话线、袭击警察局等的计划。

当天，600多名“中国抗日别动队”队员起义了，但由于出了差错，袭击办公室的一队人没有提前采取行动，只杀死3名监视员，其余的都跑掉了。为此，“抗日别动队”便向山中撤退，但被由复员军人、警防团、警察等组成的日本大部队包围。“抗日别动队”在经过一场雄壮、激烈的战斗之后，许多中国人被杀，或跳下悬崖而死，活着的队员再次被捕了。对这些队员的惨绝人寰的拷问，在炎热的天气下连续进行了3昼夜。在此期间，113名中国人丧失了生命。

花冈暴动决不是绝望的斗争。这是一场有思想、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在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日本帝国主义就无条件投降了。根据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的《实地调查报告》，“战争结束后，在（北海道）地崎建筑公司，宪兵极为恐慌，用机枪对准中国人的宿舍威吓说：

‘谁乱动就打死谁’。但在这里，同八路军有关系的中国人占很大比例，便决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组成了堂堂正正的队伍，包围了宪兵，解除其武装，用夺来的日本刀等武装起来，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自己”。《足尾铜山工人运动史》中说：“中国俘虏要求‘作为战时所受虐待的补偿，促进回国’，每人手中拿着橡树棒，排成队伍示威游行”。三井、三池煤矿工会合编的《三池10年》说：“在三池煤矿，战争期间使用了很多作为殖民地民族的朝鲜人，从昭和18年（1943年）起，大量使用中国及其它同盟国^①的俘虏，这些人还在战争期间，就在思想上做好了一旦时机成熟，随时推翻现存秩序的准备。通过战败，使煤矿历来的社会秩序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反法西斯联合国家。——译者

瓦解的，实际上是这些异民族的人”。

由于受到这些中国人和朝鲜人行动的教育，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开始了。《足尾铜山工人运动史》说：“由于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斗争，产生了成立工会的形势，这是事实”。三菱、美呗工会合编的《工会史》也记载着，在工会成立之际，“中国人来了，衷心祝贺我们工会的成立，并高兴地举杯宣誓，说我们如回本国，一定像你们一样为工人的解放而斗争。为祝贺工会的成立，中国人捐献了300日元。在1945年的工会成立大会上，在最初的日程上就报告了这件事，群众超越了国籍的界限，以雷鸣般的掌声感谢这种厚意。日本的工人也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国际团结方面的教育。

十、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

对东南亚的侵略

1941年6月，纳粹德国一开始进攻苏联，日本帝国主义就为了在瓜分世界中占据有利的地位，着手准备新的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是一贯敌视社会主义苏联的。因此，它妄图乘德、苏开战之机，从背后进攻苏联，便在中国的东北集结大军，进行了一次称之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但是，由于1938年日军在诺蒙坎地区为苏军大败时的余悸未消和中国人民抗战的加强，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能够进攻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另外，由于对中国的战争长期化，战略资源日益枯竭，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决定首先向

战略资源丰富、防卫能力不足的东南亚开刀，同时，这也使其同美、英的对立，成了根本性的对立。

1941年7月，日军进驻了当时法国殖民地越南的南部，这对美国的亚洲政策造成了重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冻结日本的在美财产。日、美之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日本政府在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对美开战。为了准备新的战争，10月18日，近卫内阁总辞职，成立了东条内阁。在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开战的时间为12月上旬，开始把袭击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机动部队极其秘密地集结在择捉岛的单冠湾，把进攻南方各地的南方军和运载南海支队的船队集结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支那地区。同时，日本政府为了掩饰开战的准备，11月6日，把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派到美国，协助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同美国政府进行交涉。而在12月8日，日本海军的机动部队出其不意地袭击了珍珠港，日、美间的战争开始了。

日本帝国主义以奇袭战术，仅仅在6个月中间，就占领了包括菲律宾、马来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印度在内的广大地区。但是，日军的大部分，特别是陆军的大多数依然在中国大陆上。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意味着美、英帝国主义企图使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德国进攻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一政策的破产。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必然要导致世界战争。而世界人民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则把矛头指向最凶恶的敌人日、德、意法西斯阵营。

由于这种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法西斯阵

营的优势没有维持多久。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失败，丧失了战争的主导权。在欧洲，从同年年底起，纳粹德国的军队被苏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1943年1月，33万纳粹德国的军队被歼灭，此后，法西斯阵营就走上了迅速崩溃的道路。

对东南亚占领地的统治

东南亚地区，作为战略资源的供应地，是极受日本帝国

第28表 日本工业原料中的东南亚资源

(1936年)

品 目	供 给 量	在该品输入总额中的比率
铁 矿	169万吨	44.7%
屑 铁	7.8万吨	5.2%
锡	0.27万吨	50.8%
煤 炭	88.5万吨	21.7%
磷 矿	9.9万吨	10.7%
橡 胶	4.3万吨	68.5%
原 重 油	82.2万升	21.1%
矿 油	48.3万升	66.1%
棉 花	4.1万俵	0.3%
麻及其它纤维	123万斤	57.0%
平 均		34.1%

(据大藏省管理局编：《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

主义重视的。按照1936年的数字，在日本工业不可缺少的18种重要原料中，东南亚就提供了其中的10种。从这个地区输入商品的数量同日本输入该项商品总量的比率，如第28表所示。通过这一数字，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因此，在1933年，这个地区就已经向日本输出了石油总输出量的21.8%，煤炭27%，铁矿80—90%，麻等植物纤维40—50%。1938年，菲律宾向日本输出了100%的铁矿石和铜，98%的麻和锰。此外，在东南亚生产了大米、树脂、椰子油、木材等多种农产品。

日本帝国主义一占领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就夺走了许多重要物资。在越南掠夺了大量的大米。在矿产当中，抢走了鸿基的无烟煤，老街的磷灰石。在泰国，日军征收了大量的“借用金”，由于收购各种物资，使一般的消费品奇缺，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米为例，如把1940年12月的物价指数作为100，在1943年就急剧上升为132，1944年为145，1945年1月为151，同年2月为207。纤维制品的价格上涨更为剧烈。法定牌价1943年为1204，1944年为2215，1945年1月为1964，实际上升到6389。

在马来亚，由于英国实行强制栽培橡胶的殖民政策，粮食主要依赖于泰国、越南、缅甸等国，但随着日军的占领，来自这些地区的大米供应断绝了，并且由于日军的庞大的消费，该地区居民的食粮，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在缅甸，也有大量的大米和矿产品被夺走了。

在印度尼西亚，石油和煤炭的一部分，由日军直接经营。为了掠夺镍、锰、钻石、白金、云母、铁矿、水银等，把这些产业委托给日本的民间企业经营。

在这些地区的物资筹集，并不采取任何支付手段，而始

终是单方面的掠夺。日本同占领区之间的“贸易”，是以日本提供的数量极少为特点的。而不采取支付手段的单方面掠夺，是通过在泰国及其它地区那样的“借用金”进行的。因此，由于军票和伪银行券的滥发，使各地遭到了急剧的通货膨胀。

国内战时体制的加强

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内的战时体制进一步加强了。在1940年10月，就已经解散了一切政党，而在这一年建立了一个叫做“大政翼赞会”的包括官僚、军部、财阀、地区首领及其政治代理人的组织，加强了统治体制。在经济方面，根据《重要产业团体法》，全部重要的产业部门和金融被组织在统制会中，所有的企业处于垄断资本与官僚的直接统治之下。军事定货、原料、劳动力的分配、生产指标和价格的决定，全为统制会所把握。随着战争的扩大，国家开支从1941年的165亿日元增加到1944年的934亿日元，其中军费占85%。为了维持如此庞大的国家开支，相继采取了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和滥发纸币等措施。结果是物价急剧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迅速下降。在占领地纸币和军票的滥发，也是这种战时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外，战争的扩大也使军队的人数增加了。日本的兵力从1937年的110万人急剧增加到1945年的713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适龄壮丁的1/3。为了弥补由此产生的严重的劳动力不足，1941年颁发了《劳务需求调整令》和《重要事业所劳务管理令》，1943年制定了《勤劳报国队整備纲要》，取消了工厂内的劳动时间的限制，加强了对工人的警察统治。进而

随着战局不利于日本，1944年实施了《国民总动员》，从12岁到60岁的男子和从12岁到40岁的女子，全部作为征用工，进行强制劳动。对朝鲜人和中国人强行抓走的人数的急剧增加，也发生在这个时候。这种措施，使财阀垄断资本日益膨胀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主张投降的势力

日本帝国主义于1941年12月8日同美、英两国宣战，一时利用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占领了东南亚一带的美、英、荷属广大殖民地。

但是1942年6月初，在太平洋的中途岛附近进行的海战中失利，丧失了海军航空兵的主力。8月，盟国军队在瓜达卡纳尔岛开始了反攻，日本转为守势。

同年12月，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也在高加索开始了大反攻。1943年2月，33万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斯大林格勒被消灭。至此，整个法西斯阵营处于守势。

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谈。此时，罗斯福提出要轴心国（法西斯阵营）无条件投降的主张。

自近代外交方式确立以来，在战争中还未曾有过交战国的一方要求交战国的另一方“无条件投降”的例子。因此，这一条款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产生了种种问题。

1943年4月，东条内阁在新的形势下进行了改组，任命重光葵为外相。

在近代的日本外交中，有过很长一段同美、英协调的历史，即使后来同美、英对立和开战，在外务省内部仍然顽强

地存在着亲美、英势力。重光葵与吉田茂等人就属于这个亲英、美派。因此，随着战局的恶化，作出了这种尽量使战争以有利的条件结束的对策。

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法西斯阵营开始瓦解。1944年2月，太平洋方面的盟军加强了攻势。在法西斯阵营的败局已经显露之际，木户幸一内大臣（天皇的政治顾问）与重光葵外相都认为，必须凭借天皇的权威来结束战争。

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说：

笔者（重光）同对天皇负有常侍辅弼之责的木户内府（内大臣）反复讨论过战争形势与和平恢复的问题。笔者建议在官中定例召集重臣会议（以曾经当过首相的人为中心的会议）以强调和平分子的意见，使其形成一股政治力量，鉴于重臣的性质及其背后的势力，这样易于达到目的。由军部所控制的内阁，若不到最后时刻，是不能在那里讨论结束战争问题的。如被军部觉察，事必难成。宪兵对失败主义者的镇压，在平时都是不择手段的。结果，只得在看准时机到来之际，依靠天皇的绝对命令（这就是我们当时常说的“鹤鸣一声”）来结束战争。这必须是在战争大局已定，德、意垮台，日本从三国同盟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之时。这是国民容易理解的时期。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准备。我们立下誓言，此事由木户内府和作为外务大臣的我负责。后来就按这个方针开始了行动。

象在这个资料中所表明的那样，结束战争的主导权，掌握在部分外务官僚和宫廷势力手中。当时在意大利，以人民为基础的反法西斯势力兴起，结果迫使墨索里尼放弃了政

权；即使在德国，国防军内部也开始出现相当大的反纳粹势力。但是在日本，以人民为基础的反法西斯运动却并不存在。这是因为在天皇制统治下，反战运动和反政府运动遭到彻底镇压，天皇制的思想控制给人民以强烈的影响。因此，在天皇制统治的构成要素中，由把军部排除在外的官僚、宫廷势力首先采取了行动。

那时，重光主张推动苏联在德、苏之间结束战争，由此取得日本同美、英结束战争的有利条件。1943年9月向苏联提出要在德、苏之间进行和平斡旋，但被苏联拒绝。

在9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把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西新几内亚岛一线作为“绝对防线”。11月，邀集占领地区一部分政治势力的代表，召开了“大东亚会议”，发表了《大东亚宣言》。

另一方面，同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始会谈。接着，从11月2日起，在开罗开始了美、英、中（国民党政府）三国首脑的会谈，签署了《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是规定战后对日本进行处置的最初文件，并成为战后对日本处置的基础。其要点如下：

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扩张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

三大盟国怜悯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按照这一宗旨，上述三大国与同盟国中对日作战之各国协调，为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坚持进行了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活动。

另外，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以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为中心召开了德黑兰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暗示在欧洲战争后半年左右，苏联可以参加对日作战。

准备投降的过程

进入1944年，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回不利的战局，一方面在国内采取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动员在中国大陆的13个师团，企图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这就是占领从朝鲜、中国东北到越南、马来亚的铁路沿线地区，试图打通纵贯亚洲大陆东部的“大陆交通线”，以此来弥补日本帝国主义对制空、制海权的丧失。面对着日军的这一新的进攻，实行“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放弃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丢失了包括洛阳、长沙、福州、桂林等重要城市在内的许多据点。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人民却奋起抵抗。1944年5月，在日军打通京汉线南段之后不久，八路军就解放了北段的南阳、肃宁、新安等重要据点。因此，京汉线的要地保定、石家庄也处于八路军的威胁之下。日军吹嘘为“本世纪最大远征”的大规模作战也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活动牵制了日军的大部，对同年6月美军攻克塞班岛和11月在菲律宾登陆成功起了巨大作用。1945年，中国解放区的人口达到1亿，解放区的正规部队达91万，民兵达到220万。此外，在亚

洲各地的日本占领区，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强大起来，解放了许多国土。日本占领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激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6月美军塞班岛登陆之际，日本海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丧失了它所拥有航空兵力的大部。这时在欧洲，盟国军队进行了诺曼底登陆战役，盟军的攻势日益加强。

1944年7月，塞班岛落于盟军手中，日本的“绝对防线”开始崩溃，东京处于美国轰炸机的活动范围之内。因此，对东条首相的批判加强，东条内阁倒台，成立了小矶昭内阁。在小矶内阁中，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他在日本军部中，20年代在裁军问题上属于同美、英协调派，曾经强烈反对过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因之一的日、德、意三国同盟。米内从9月下旬起，就密令他的心腹部下专心致力于结束战争的工作。

这时日本的统治阶层仍寄希望于美、英同苏联之间的矛盾。他们感到苏联为了对抗美、英，有可能同日本接近。于是认为苏联直到最后会保持中立。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苏联居间调停实现和平也是可能的。因此，在9月15日召开的战争指导会议上决定对苏联提出改善日、苏关系（其中包括德、苏和平）的建议。但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邱吉尔和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作为罗斯福的观察员列席这次会议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作出了对日作战的承诺。结果，1944年11月6日，在庆祝十月革命27周年的大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把日本称作“侵略国”的演说。但在同一时刻，日本外务省却在向重臣们秘密散发的《我国外交》的文件中，认为“日本实施同德国一起向美、英提出和平谈判的政策是困难的”，同时谈到

“今后苏联会愈加打入西方而无暇东顾”，“考虑到苏联和美、英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即使德国被击败，苏联也不会主动地立刻向日本挑战”。

此时，美国轰炸机全面进行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再加上来自占领地区的资源补充和对前线的物资供应都受到美国潜水艇的严重打击，工业生产力也迅速下降。

1945年1月6日，天皇命木户内大臣召集重臣听取关于战局的意见。另外，在同月，战争指导会议还通过了适应本土决战，以全军特攻队化为内容的《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和作战大纲。但是，同年2月，美军进入菲律宾的马尼拉，与此同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谈。

雅尔塔会谈的主要议题有：（1）战后处置德国的方针；（2）德国赔偿问题；（3）对被解放各国的处理；（4）联合国问题。

当时美国还没有制成原子弹，从历来同日本军队作战的经验出发，预计在日本本土的战斗中，美军将遭受重大牺牲。为了减少这种牺牲，无论如何也要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这次会谈所达成的美、苏秘密协定是：在德国投降后两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宣战，作为报偿，苏联将获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领土权以及中国旅顺的租借权，保证苏联在国际化的大连港的优越权，中国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合办，与此有关的苏联的优越权得到保证，外蒙古维持现状。关于这一秘密协定，不用说日本，就连当时作为美、苏同盟国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也是后来才从美国方面得知的。由此发生了民族的自主和各国的主权遭

到侵犯的现象。

2月4日，近卫文麿谈到了“由战败所引起的共产革命的威胁”，上奏天皇必须尽早结束战争。

在这个奏文中，近卫提到苏联军队在东欧的迅速进展和在法国、比利时、荷兰，领导对德军进行武装斗争的有共产主义者。因此，他认为“我国国内外的形势，现在正以很快的速度走向共产主义革命”，“战败虽在我国国体上留下污点，但美、英舆论至今尚未进而提及改变国体问题（当然也有部分过激言论，并且将来如何变化亦难预测）。如仅就战败而言，尚无须为国体而忧虑。从维护国体的立场来说，最堪忧虑的，与其说是战败，毋宁说是由于战败而可能引起的共产主义革命”。

近卫是当时与天皇家血缘最近的最高贵族，在面对战败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时，他最害怕的，不消说是由于战败所引起的人民起义。因为这将不单是因战败而带来的耻辱，而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灭亡。在投降的过程中，日本的整个统治阶级，在“维护国体”这一点上表现得异常顽固。这一方面是出于他们对被认为是具有绝对价值的天皇制的宗教式信仰，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皇室的存在是维持统治体制的必要条件。

另外，在近卫的奏文中，还提出日本投降，无论如何只能向美、英投降。

在近卫上奏之后，3月，近卫以及若槻、冈田、平沼4重臣同重光外相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若槻礼次郎提出质问：“面对战局的恶化，难道我们不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挽救的办法吗？特别苏联和我国订有中立条约，难道我们不能走依

靠苏联的道路吗？”对此重光详细说明了雅尔塔协定前后的国际形势，并说“苏联随时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而参加美、英阵营，而不是处于终究会为日本去同美、英斡旋的地位。根本问题在于必须作出重大决策。目前日本所能做的，只能是同美、英直接谈判。尤其要正确认识国家现在面临的事态。这个决策一旦作出，现实的外交手段也就立刻随之产生”。

这里反映出日本统治集团认为“向美、英投降”是维持统治体制的唯一道路，当时已经认识到有必要作出投降的决定了。

这样，投降已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认识，当时在统治集团当中已经相当广泛的存在着，唯有陆军仍然顽固地主张在“本土决战”中给美军以重大打击，至少也要以有利的条件结束战争。由于抑制这种“本土决战论”尚需时间，国民还须为此付出重大牺牲。

1945年，日本的工业设备，由于遭到轰炸的破坏和原料不足，弃置不用的达到90%。工业生产也下降到1935—1937年的28.5%。参加劳资纠纷的人数，尽管处于法西斯的镇压之下，也从1944年的10026人增加到1945年的164585人。工厂的缺勤率最高达到49%。另外，到了此时，尽管日本政府拼命宣传和叫喊“本土决战”和“一亿总奋起”的口号，人民群众的不满呼声还是加强了。警察破获的“越轨言行”，从1942年4月到1943年3月的一年间为308件（平均每月25件），从1943年4月到1944年3月的一年间为406件（平均每月34件），但从1944年4月到1945年3月却达到607件，平均每月51件。被警察破获的“流言蜚语”案，在1944年的一年中间达到6233件。而且随着战局的不利，其内容不仅仅限于

不满，而且增加了希望战争失败的情绪，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实际上不存在能够把人民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人民群众的不满并没有形成为通过人民之手打倒统治者而赢得战争结束这样的积极行动。

4月1日，美军开始在冲绳登陆。4月5日，小矶国昭内阁倒台。小矶内阁的垮台，原因之一是他暗中进行的对重庆和平工作的失败。

就在小矶内阁垮台的这一天，苏联通知日本废除日、苏中立条约。按照规定，该条约还有一年的有效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对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说过苏联在中立条约的有效期内严守这个条约。废除条约是苏联为履行雅尔塔密约的第一步，但日本方面却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这时日本正通过瑞典驻日公使对美、英进行和平工作，并试图通过瑞士海军武官等，同接近罗斯福的美国战略情报机关欧洲总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后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进行接触，但都没有成功。

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取代小矶组织了内阁。

趋向投降的具体动向

4月9日就任外相的东乡茂德决定不依赖瑞典政府的和平斡旋，而打通直接同美、英谈判的道路。

5月2日，柏林被攻克，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尽管德国投降，日本进行战争的决心不变。但与这种表面上的强硬相反，作为内阁中心成员的铃木首相、阿南陆相、米内海相、下村、左近司、安井等5人，5月31日以《战力的估计和将来的时局》为议题进行了商

讨。会上，阿南陆相主张“先取得一次胜利，而后结束战争”。米内海相认为“倘如此，国体将难以维持，应尽早媾和”。两者的意见发生对立。铃木首相指出：“小国日本同大国美、英交战是没有道理的，此时，实行可以保住日本面子的媾和才是上策，我打算，一面进行战争，一面谋求和平”。

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包括最强硬的陆军在内，都已认识到战败已成定局，问题是用什么方式结束战争。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就是要得到“维护国体”即天皇制的存在，至少是形式上承认天皇存在的保障，而决不是考虑全体国民的安危。以后在如何使同盟国方面提出的“无条件投降”同日本方面提出的“维护国体”相调和这一点上进行了努力，但国民却被迫作出重大牺牲。

6月6日，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通过的《指导战争基本纲要》的文稿中，有“以七生尽忠的信念为力量的源泉，利用地利人和战争到底，以此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决心达到征战之目的”。这反映了陆军的主张。

6月8日，御前会议向天皇提出第一号报告。作为反映当时日本的现状和统治集团对现状认识，这个文件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个文件中谈到“国力的现状”是：“伴随着战局的吃紧，陆海交通受阻以及重要生产日益下降，加上粮食越来越缺乏，近代的物质战力的综合发挥极为困难，民心的动向亦需深刻注意”，承认进行战争已是极为困难的了。特别是关于“民心的动向”，谈及“对军部和政府的批判日盛，易于出现对领导集团的信赖感发生动摇的倾向，国民的道义有颓废的征兆”，“且保护自身的观念在加强，在敢斗奉公精神不

够昂扬的庶民阶层，在农家也出现了旁观的风潮，在居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层中，也可以看到急于希求和平的潜流”。

在这个报告中还谈到无论从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看，都已达到绝望的地步。但在这次会议上，陆军参谋总长提出如下强硬意见：“过去在外岛及远洋作战中，我军孤立无援，以有限的战力承受了整个敌军的集中攻击，但在本土决战中，彼我的位置发生逆转，特别是不得不拥有很长补给线的大兵力进攻是敌之弱点，同我们所经历过的情形一样”，在谈到具体办法时，无非是主张使用特攻作战。

像已经看到的那样，在6月8日的御前会议阶段，陆军主张的以特攻作战为中心的本土决战论仍然占上风，但东乡外相和米内海相却对此极端不满。鉴于这种事态，木户内大臣起草了一份《时局收拾对策》，其内容是要求天皇作出决断，向苏联派遣携带天皇亲笔信的特使，由苏联居间调停结束战争。在6月1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阿南陆相也不得不在主张“本土决战论”的同时，同意着手执行木户方案。这时，冲绳已全部被占领，美机的轰炸更加猛烈，不只全国的大城市，甚至连中小城市也遭到破坏。陆海军为了保存本土决战的实力，没有出动它们的飞机进行迎击。

在22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天皇谈了“一方面准备完成战争，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收拾时局的对策”的意见。东乡外相据此决定在6月底向苏联派遣特使，想抢在美、英、苏三巨头的波茨坦会议之前，通过苏联调停结束战争。7月13日，东乡外相给在莫斯科的佐藤大使发去一份指示应向苏方说明的内容的电报，其中谈到“若美、英坚持无条件投降，则日本帝国为了祖国的名誉和生存，除了拼全力一战之

外，别无他途。如此，交战国双方的国民将付出更大的牺牲。这决非我们的意愿。为了人类的幸福，我们希望尽快实现和平”。此时，日本政府内不得不投降的意见已占了优势，问题是如何设法“维护国体”。日本政府拟派近卫文麿为特使去苏联，但苏联以“近卫特使的使命不明”为理由加以拒绝。日本政府又明确告知苏联政府，近卫特使的使命就是要求苏联对美、英进行和平斡旋，以便结束战争（不是无条件投降），但7月17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波茨坦召开了会议。26日，美、英、中（国民党政府）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苏联参战后也签署）。

27日，在通过广播得知这一公告的外务省内部，包括外相在内都认为不得不接受这一公告，但以陆军为中心的主战派仍然坚持“本土决战”的主张。媾和推进派的态度是：“虽不能尽早作出回答，但也不能拒绝”。可是军队统帅部28日以此事关系到军队的士气为理由，强硬要求首相正式发表不理睬这个公告的声明。所以，铃木首相在这一天会见记者时说：“三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而已，政府认为它毫无价值，不予理会。我们要走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

这一发言强烈地刺激了同盟国方面，给了美国使用原子弹和苏军参战以口实。当时铃木首相本人已在考虑不得不接受公告，但由于军部的压力，作了上述发言，其结果给国民带来重大牺牲。

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

8月6日上午8时许，美军在广岛投掷了原子弹。于是该

市几乎被毁灭，瞬息之间夺去了20万人的生命，还有大量的受伤者长期遭到“原子病”的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损害。

7日晨，美国政府通过电台广播了杜鲁门总统的声明，“6日在广岛投掷原子弹，给战争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只要日本不投降，就在其它地方投掷。”

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本可以采用彻底进行海上封锁、苏联参战的事前警告等种种方法，但美国却在不予警告的情况下，就投掷了原子弹，这是由于当时美国和苏联围绕着战后世界处理的对立激化，美国想实现对日本投降的主导权，而对苏联显示原子弹的军事威力，以求在此后的对苏谈判中占据优越地位。这点已为美国的许多研究者所指出。

8月8日，苏联的莫洛托夫外长交给佐藤大使一份声明：“（1）由于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日本向苏联提出的进行调停的要求已失去其基础；（2）因此，苏联按照盟国方面的要求，为促使战争结束决定对日参战”。

以陆军为主的本土决战论，是以苏联不参战为前提的。随着苏联的参战，这个前提也就被粉碎了。

8月9日，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心成员的会议上，陆相和军队统帅部也无法在原则上否定《波茨坦公告》，但是他们依然主张应当附加上保证维护国体、战犯由日本自行处理、自动解除武装、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等4个条件，反对外相只以“维护国体”一条为保留条件的主张。

这一天，美国又在长崎投掷了第二颗原子弹。

为解决上述不同意见的对立，深夜在皇宫的防空洞召开了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东乡外相发言说：“虽然皇室（问题）是绝对问题，但延缓答复最后通牒是困难的”，认

为“不得不接受”。但陆相认为“开罗宣言^①包含着对满洲国的抹煞，故接受它就将丧失道德国家的生命”，“即使一亿（全体国民）全部阵亡，大义犹存，必须坚决继续进行战争，自信尚能充分作战”，但由于天皇已经断定已不可能继续战争，就决定“在上述公告（波茨坦公告）不包含要求变更天皇的国家统治大权的谅解下，可以作出接受的答复”。

当作出上述决定之后，陆相还于10日发布了主张“一亿玉碎”的布告。试图阻止天皇在15日向全体国民广播《停战诏书》的部分陆军进行了叛乱，但未能阻止接受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战败投降。

① 《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译者

后 记

正如在本书前言中所说的，本书的写成，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其原因，虽然主要是由于准备工作的关系，但也是由于下列情况所造成的，即因经济变动所引起的出版情况的变化和笔者在这个时期从事于《“社会主义国家论”的研讨》（《社会科学研究》第36号）、《社会发展与分工》（同上40号）、《中朝团结的发展与朝鲜的自主的和平统一》（《中研月报》第296号）、《朝鲜无产阶级专政论的发展》（《亚洲经济旬报》第894—897号，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1937年12月8日转载）等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现在应经常站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前线，因此，在从事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所得到的认识，对本书的写成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是日本近代史，特别是战前历史的根本问题，所以想尽量多地吸收现有成果，多讨论一些问题。但由于篇幅、笔者的能力、资料以及研究尚未开展等种种限制，遗留的问题一定不少。特别突出的是，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在战后史的过程中起着什么作用，以及现在还起着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由于本书的性质与篇幅的关系，姑且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讨论。在本书中所未涉及的最大问题，是在各殖民地当地的资本问题以及日本和其殖民地各国的人民运动相互的具体联系。这都是有待于通过日本同这些国家人民合作和进行研究方面的交流来解决，也是最终将通过日本

近现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的问题。

为了历史学的进步，必须使大批人、包括青年研究者和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人参加这项研究。但是为此，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公开历史资料。特别是只有公布官厅资料和允许自由复制，才是把历史研究从一部分特权者手中扩大到更广泛的人手中的重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开展对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研究，公开官厅资料及自由出版是极其重要的。这里所说的官厅资料，包括政府的文件和由各官厅收集、编纂的资料。在对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研究中，有效地运用人民本身的资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弄清楚统治者以怎样的过程和怎样的意图决定和实行政策也是必要的。另外，统治者利用权势和地位所搜集到的统计数字和资料，也必须从另一种立场——人民的立场来充分利用。就连人民斗争的贵重记录，也有许多是通过进行镇压的统治者方面的资料才第一次看到的。从以上各点来看，有效使用官厅资料，按照人民的观点，同其它资料相印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公开官厅资料的要求，从我们所主张的知识权的立场出发也是重要的。

特别是现在，日本各官厅的秘密主义是不能容忍的。有关公害和镇压的资料被隐藏起来了。特别是隐藏有关公害的资料，助长了公害的扩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不仅仅是现在的资料，甚至连有关过去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资料也不公开并阻挠其出版。这就是现状。试举一例，当时的重臣对明治天皇提出的所谓《御手许书类》之类的文件，在过了将近70年的今天还没有公开。这一点说明现在的统治机构，严重地带有战前统治机构的性质。

几年前开设的国立公文书馆，是根据许多研究者的要求，第一次实现的。它是以保存和公开官厅资料为目的而成立的，但是，它对各官厅文件的管辖权很小，第一级文件仍然有许多被各官厅隐藏下来了。

战败后，大量的官厅资料被美国占领军弄走，其中外务省资料已为在美国的日本研究人员所利用，并且复制后藏于日本的几所大学供阅览。但是，外务省却依然拒绝全面地公开原本。现在，归还在美的日本资料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归还了，恐怕反而不能公开。为此，必须在研究者之间开展一个要求公开这些资料的运动。

为了研究的发展，就必须自由复制和普及资料。这一点，特别是在所谓不懂得“利用资料诀窍”的青年研究人员日益增多以及地方上的研究人员队伍不断扩大的今天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在这一方面，也因所谓“国家著作权”而阻挠了官厅资料的普及。本来，著作权具有私人财产权的性质，而国家编纂的资料，是以国民的税金进行的。既然其内容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国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那么，官厅资料的复制，就理应是国民“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研究，是以人民的力量消除这样的障碍而得以进步的。但是，对历史学的进步来说，决定性的东西，是使人民认识到只有人民自己才是历史的主人，让人民自己谈历史和作出评价。唯有那时，才会有不仅是历史学，而且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中文版附言

拙著此次出版中文本，对著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喜讯。

本书自日文本出版以来，已经过了近12年的岁月。在此期间，围绕着日中两国的形势发生了若干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签订了日中两国人民渴望已久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此，著者期待本书能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起到一点“惩前毖后”的作用。

另外，由于日文本出版以来形势的变化和研究的发展，在出中文本时，对内容作了若干修订。

著者

1988年6月